

察 觀

卷五第

五能書社

觀察

· 分五角一份每 ·

日八廿月八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 ·

期一第



卷五第

信 通 察 觀

一丘之貉
文 藝

匈牙利·B·易澳士

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
運動(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關於七五慘案最近的
報導(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悼朱佩弦先生
哀 思

吳 晗

德國問題的癥結

The New Statesman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

觀察特約記者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韓 國 通 信
張東蓀

金圓券能穩定物價嗎?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
鄉 村
特稿連載
費孝通

樊 弘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21) 92432
電報掛號：590327

訂閱價目

平寄：一元八角	掛號：一元八角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掛號：一元八角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航空：二元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封面：每行一元

定戶注意

讀者如欲訂閱，請將姓名、地址、電話、電報掛號註明，並附郵票或匯票，以便寄報。如欲退稿，請附郵票或匯票，以便寄報。

編者報告

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

四卷出完後，社例休刊兩週，日子過得快，第五卷又開始了。現在把要報告的幾件事情，分述如左：

自五卷一期起，我們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在第三卷本來辦過「華北航空版」，那時是由北平的新實書店承辦的。新實書店那批朋友本來不是一番業，中出身的人，但有意思自己辦一點事業，俾使精神有所寄託。編者去年在平時，對於他們的印象不壞，所以信任他們，交由他們承辦。不幸他們始終不能履行契約上所規定的義務，以致拖欠的數目越來越大。我們為了華北各地讀者的利益，不忍中途停止，所以勉強把第三卷出完。那時新實書店拖欠我們的數目，等於當時六七十令白報紙的數目。這個數目把現在的紙價一合，就要四十元左右了。他們一再說：「負責到底」，可是實際上，他們始終未能以事實來保護他們自己的信譽；結欠一直拖到現在；我們對此十分引憾。這次編者去年以前，有三方面來函和我們接洽承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做人做事，素無成見，任何人都可以合作，祇要彼此負責，遵守信用。結果因為和潘依風君先談妥，所以即由潘君承辦。但關於「華北航空版」的一切賬目往還，都由潘君負責，與本社無涉。潘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在行政系統上，和本社亦無任何關係。

半價定戶

清寒讀者來函登記定閱半價本的，已逾千名，但遠地讀者的信件，正在途中的，我們怕還有不少。業已收到的申請信件，我們已一一審查完畢，分別通知，希望合格的讀者如期匯款來訂，以便寄刊。以後

收到的也當隨時審查函復，以迄領滿為止。不過這裏要附帶說明的，凡是華北各地讀者來函申請的，如註明平寄的，我們按原定標準審查，凡是註明航空寄的，我們一律請他們就近向北平訂購「華北航空版」。因為航空郵資的負擔太重，舉辦一半價本的目的本在減輕讀者的負擔，假如如由上海用航空寄去，反而比在華北訂購「華北航空版」為貴，這就有違我們體貼清寒讀者的原意了。

篇幅問題

我們因為六七月月中物價漲得太利害，為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擔，將篇幅自二十面減為十六面。嗣後即收到許多讀者來函，表示不贊成。編者在四卷報告書中請求讀者，特別是後方的讀者，表示意見，以供參考。現在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大都要求恢復二十面。其中有幾位特別強調，說他們都是「窮光蛋」，但願意加重負擔，不願減少篇幅。有四位北平讀者聯名來信，這樣說：「我們為什麼愛讀觀察？為的是它內容充實，不是為它價錢便宜；以四卷二十二期定價論，每份二十元，在北平等於兩個燒餅的價值，一千公尺距離的三輪車價，半張普通電影票，苟慧生的戲票價五分之一。……我們的意見，兩個燒餅不換一飽，一個普通電影兩個燒餅，不會影響健康，一次普通電影影片所得的印象，僅是哥哥姊姊，鴛鴦蝴蝶，比從「觀察」所得的實益，相差遠甚。一個刊物能否吸引讀者，在乎內容是否充實，不在乎售價的貴賤。……編者先生處處顧及讀者的負擔，自是正確的；但為減輕讀者的負擔而至於減縮頁數，限制篇幅，因而連帶影響刊物的內容，我們是反對的。請編者先生不要誤會我們是為階級，實在我們都是低級公務員，要獨力支持全家的生活！既然愛好「觀察」，雖然負擔重些，還有什麼說的？我們並且還響應編者良心呼籲，放棄了定閱半價本的意思呢！」蘭州有二十幾位讀者都希望至少維持二十面的頁數。此外四川廣東等地的讀者也都有信來。現在我們就出二十面，假如以後情形有變化，再隨時酌量否決。

幣制改制以後

最近幣制改制，採用金圓券。我們報告三點如左：

1. 由於過去物價的過度波動，業務上受到許多苦痛，特別是數書的購買，得難了許多讀者，其詳已見第四卷報告書中。現在我們已將所出叢書，改用新標價，希望此後讀者來函購買時，由於售價的不致一時調整，可以避免「來款不足謹請補寄」的情形，這樣，在讀者，在我們，雙方都可比較方便。
2. 因為假定物價暫時可以沒有太大的波動，所以自即日起，恢復接受六個月期的定閱，價目請閱封面。
3. 由於美元和金圓有明確的比率，自即日起，國外訂閱半年者，一律改收美金二元（原為四元）。

提高稿費 (第十八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九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二元至四元。此啓。

觀察叢書·觀察譯叢

「觀察叢書」已出十冊（「中國在盤上」即出），此次編者赴平，又約好了十部叢書的稿子，連已有而未出的，一共十四部。我們希望十月底能出一批，十二月底再出一批，書名和作者當於出版前再宣佈。除了「觀察叢書」外，另擬再出一系「觀察譯叢」。「觀察譯叢」選書的原則，仍以「價值」和「重量」為第一，籍以符合「觀察社」的一貫風格。第一批四冊業已選定，並開始翻譯。但因本社創辦不過兩年，規模很小，出書能力受有限制，所以譯叢的出版，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實現。

致謝

在這休刊的兩週中，我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有的是熱情鼓勵我們的，對於這種鼓勵，我們十分感激，我們並願向讀者保證：我們一定像過去兩年一樣，繼續努力下去。有的是向我們建議指導的，我們對於這些建議指導，願意盡量接受考慮。編者精力有限，未克一一還復，特在此處向惠賜賜教的讀者先生致誠懇的謝意。

小啓

本期付印時，新制郵資，尚未公佈，本期封面上各項有關郵資，未克註明。我們希望本期出版時，新制郵資業已公佈，讀者訂閱或購書時，即請參照郵局的新規定寄下為荷。

觀察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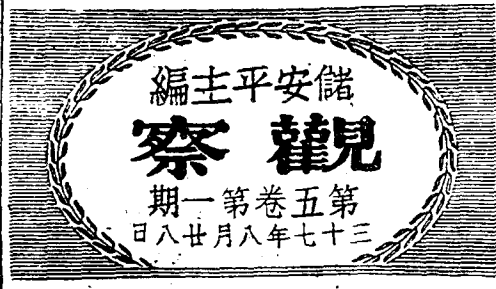
-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三版)
- 政學罪言 (再版)
- 唯物史觀精義 (四版)
- 鄉土中國 (四版)
-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再版)
- 英人法人中國人 (三版)
- 論雅俗共賞 (再版)
- 鄉土重建 (新出)
- 紅毛長談 (新出)

- 張東蓀著 (金圓五角五分)
- 潘光旦著 (金圓一元三角)
- 吳恩裕著 (金圓四角)
- 費孝通著 (金圓六角)
- 吳世昌著 (金圓五角)
- 儲安平著 (金圓六角)
- 朱自清著 (金圓六角)
- 費孝通著 (金圓九角)
- 塔塔木林著 (金圓四角五分)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吳晗：清華大學教授

金圓券能够穩定物價嗎？

樊弘

在物價上漲的狀態下，人人無不希望政府所發行的新幣，金元券，能够穩定物價，但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便能穩定物價呢？

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能够穩定物價，要看金元券是否能够根治物價上漲的原因，如果能够根本上消滅物價上漲的原因，那麼金元券便將能有穩定物價的功效。如果不能，那麼物價便將繼續往上升漲，而不聽政府的命令了。但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麼呢？

誰都知道，物價上漲的原因不外在一一定的時隔裏面，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大於物資供應的增加。試問金元券發行之後，是否能使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相對的減少呢？這個便要看看金元券的發行數量將來是否還要繼續的增加。同時當看金元券發行之後，在每一時隔裏面，它出來買貨的次數是否增加或減少，都絕對不由政府的威力決定，而係由現在的政府所控制不了的經濟的因素決定。何以說物價上漲的因素絕非政府的威力所能直接控制呢？猶記在三十一年的時候，政府曾用拋售美金儲蓄券的辦法來平抑物價，到了三十二年時兩億美金儲蓄券都拋售完了，但物價平抑了沒有？後來政府因見拋售美金儲蓄券的方法不行，改用拋售黃金的辦法，共耗費價值一億美元的黃金（約五百七十萬兩）用來平抑物價，但物價平抑了麼？在三十二年八月政府眼見拋售黃金的政策又失敗了，再採用黃金存款的辦法來平抑物價，但平抑了沒有？三十六年二月廿一日，政府忽又異想天開，頒布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由拋售黃金和拋售美金儲蓄券的平抑物價的政策，轉而採用取銷黃金買賣和禁止外幣流通的方法，結果不料更糟。由此可見，在過去六年之內，單憑政府的一紙命令的威嚴必是不能够平抑物價的了。過去不說了，但問，現在怎麼樣呢？

眼看起來，政府現在決然放棄法幣而採用金元券貨幣而名之曰金元券，它是何等儲蓄的東西，必且對元要高貴得多。在抗戰以前，銀元比金元不如，尚可相對的平抑物價，何況金元呢？而且依據政府的金元券發行辦法第一條，金元券每元之法定含量為純金零點二二一七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十足流通行使。第八條金圓券之發行採十足準備，前項發行準備中，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之國有事業資產充之。這點明白表示金元券是有十足的準備金的。因為政府既然規定每發一張金元券，都要有四角的金銀與美鈔和六角的金銀與美鈔，那末，在政府的金銀美鈔與國營的資產無法增加以前，便當絕對不會增加發行，而物價便將穩定了。可是，我們假如略一反查，立即便可明白，這種想法是天真的。

於此筆者應該特別強調，即金元券的發行是絕對用不着準備金的。金元券既不能自由兌換黃金、白銀與美鈔，而且在中華民國境內且不許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流通、買賣或持有，那麼，拿這筆黃金美鈔白銀存在那裏做什麼？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又必須存在那裏，並不許移作別用，這豈不是把國家的資源來盡費麼？凡有銀行學的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用作發行金圓券的黃金美鈔和白銀是絕對不可以移作別用的。移作別用便是犯法。並不可以其一元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否則，便是犯法。因為政府的法令既然規定金元券的發行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的現金，那麼，假如政府以一元現金兌換金元券，而不是以四角去兌換它，那麼，經此兌換之後，其他的金元券的準備不但不能移作別用，而且也絕對不能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即根本沒有用。現金的準備既然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又必須存在那裏作幌子，這豈不是資源的浪費麼？特別的是在中國如此需要外幣黃金與白銀來購買外國貨物的今日，即以現存的全部的金銀和美鈔來購買外國貨物還不足，而須有待於美國的貸款。今更把此有限的黃金、白銀和美鈔拿出一部份來作發行的準備，由急用化為無用，這

豈不是資源的濫費是什麼？

誰都知道，金元券的購買力或價值，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是與金元券的發行額為相反方向的變動的。假令貨物的供應沒有增加，或信用的狀態沒有變遷，金元券的價值且將與它的數量成反比例的。一件貨物兩個錢買與一個錢買，在兩個錢買的時候物價便是兩元，在一個錢買的時候便是一元。一物而賣兩元比較一物而賣一元是錢的價值低落一半，這豈不是金元券增加一倍，它的價值便低落一半麼？反之，如果發行減少一倍，金元券的價值便當增加一倍。金元券的價值既然與其發行的數量成反比例，那麼，為提高金元券的價值起見，政府只要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就行了，何必又要現金準備做什麼？現金的準備金既不可以用來作兌現之用，而又不可以移作別用，我們何必要用它呢？「割雞焉用牛刀」，減少發行金元券儘可不必一定要用黃金美鈔和白銀來作準備。

然則為什麼政府不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呢？亦就是說，政府為什麼不信任政府自己，偏要信賴黃金、美鈔與白銀呢？是不是說，由黃金美鈔與白銀所作出的發行準備更可以制止政府的通貨膨脹麼？須知政府的支出全靠他的收入來維繫。在收入不付支出不之際，除了向人民負債而外，就只有發鈔之一法。任何發行的準備也都把它奈何不得的。政府能够在入不敷出之際，靜聽護政府的官員餓死以圖維持金準備麼？這個問題容易解答得很。在很早很早以前，中國發鈔的金準備便是百分之六〇了。民國廿五年政府改用法幣仍然維持百分之六〇的比例，即白銀佔百分之二十五，外國貨幣佔百分之三五，合為百分之六〇。法幣的現金準備的比例高至百分之六〇，尚不足限制法幣的增發，百分之四〇，行麼？除了政府的國庫的開支能以稅收與公債來彌補外，單憑現金準備的比例，是絕對不足以阻止金元券不再繼續增發的！

金元券的現金準備的比例既不足以保證通貨的膨脹不繼續，或不足以阻止物價的飛昇，然則它是否可以延緩貨幣流通的速度呢？假如可以減少它的流通的速度，物價亦當不漲。可是這又要看金元券是否可以作為保存價值的工具。現在一般人民的心裏不相信紙，而相信金。金元券不但不能兌換金，且要收括市面的存金，他不但不是紙，而且比紙更壞，試問人民如何能够把它拿來作為保存價值的工具呢？似此，則是人民對於金元券還是不把它當作金元券，而把它當成一種關金券看待了。除非人民是傻子，否則在金元券發行之後，人民還

是不欲保存金元券而要保存貨物，結果金元券的流通速度，勢不能減少。金元券的發行的數量，既不能因十足的發行準備而減少，且亦不能因為它而使它的流通速度不增加，然則金元券的發行條例又有什麼理由使物價不再上昇呢？固然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即四元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一元。可是，我們莫要忘記了，法幣不是亦可以兌換美鈔的嗎？法幣，在政府的允許之下，亦是允換美鈔的能力，既不比法幣高，我們似亦看不出金元券的價值為什麼要比法幣更高。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考慮第三個問題了。即金元券發行之後，物資的供應是否增加。在內戰的烟火到處瀰漫的今天，國內生產的物資必是無法增加的。如欲物資有增加，單看外貨的傾銷的程度怎麼樣？且看外貨輸入的程度是否抵得上國貨減少之程度。這更要看中國人在國外的外匯存款或其他的資產是否能夠因為政府一紙的法令，趕快便把他們來買貨物輸入到中國內地來。可是政府今又限制輸入，而且他們恐亦不願以他們的外國資產來換成金元券或債券。由此可見，這一條路亦是很渺茫的！

現在我們轉而研究政府發行金元券的能力。依據金元券發行辦法第九條，金元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我們可以假定現在法幣總額約為二百萬億元。一元金元券合法幣三百萬元，二百萬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便收回來了。二十萬億中除了六億點七，尚餘十三億點三的金元券發行的能力。這即是說，政府如欲收回現存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就行了。在物資未增加，和美匯黃金與白銀均極感缺乏之時，政府如欲穩定物價我看六億點七已就足够了。其餘的十三億點四的金元券，莫說十三億點三，連一元我看，也用不着啊！然則政府又何必規定廿億金元券為發行的最高額呢？

歸根結底一句話，金元券是否能夠穩定物價仍須視政府國庫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足夠以符支出，和國內物資的生產是否能夠增加以為斷。單靠金元券的發行辦法本身，是不足以有為的啊？但政府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能夠維持支出呢？正如財政部長王雲五先生所說，「在收入方面，固有賴立法院之支持，與各方之努力，在支出方面，便須政府各部門充分合作，尤以軍費開支，佔歲出之最大部份，當特別嚴實與節約。」這當然都是最要緊的。

民卅七，八，廿。於北京大學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鄉村」

費孝通

晏陽初先生於八月十五日向中央社記者「縱談復興我國農村問題」，接着又發表「開發民力建設鄉村」一文。這裏宣布了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理論基礎，值得關心農村工作的人士詳細檢討的。

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

中國當前最基本的問題是廣大農民生活的痛苦，這一種認識我

們和晏先生是相同的。晏先生對這現象的診斷是：「他們受了封建傳統的壓迫，以及外來強權的欺凌。」這個診斷我們也認為正確的。晏先生希望「把舊藏在中國廣大鄉村中偉大磅礴的力量——民力——開發出來。」這個目標我們也是同情的。

根據晏先生的診斷去制定工作綱領，應當是怎樣去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怎樣去抵抗外來強權的欺凌。晏先生是反對「空洞的口號和標語」的，這一點我個人更是贊同，所以我們得更進一步具體的說出：什麼是封建傳統？這封建傳統怎樣壓迫農民？誰是外來的強權？這些強權為什麼要欺凌中國農民？怎樣欺凌法？除非把這些問題具體的分析出來，我們才能避免自己犯了「空洞口號和標語」的毛病。

晏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極簡略的。他說：「中國的農民負擔向來最重，生活最苦。流汗生產的是農民，流血抗戰的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派』，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擔。」即是在這簡略的答案裏，我們可以說晏先生也注意到租、糧、徵、派。租、糧、徵、派是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壓迫欺凌的手段，結果是中國農民負擔的重大，使農民血汗流盡，生活痛苦。

如果我們分析下去，就該問：誰在徵派租糧？向農民徵派出來的租糧給了誰？作什麼用？這些吸收農民血汗的人憑什麼力量能這樣向農民徵派？什麼人和什麼外來強權在支持這種力量？——這些問題晏先生並沒有答覆，非但沒有答覆而且提出了另一套理論出來，把這些問題劈開了。——這裏我們和晏先生的看法開始分歧了。

讓我們先看晏先生的文章是怎樣做下去的。他說：「鄉村建設工作是多方面的：凡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無不包括在內，而千頭萬緒之中，必須抓住問題關鍵之所在，那就是：建鄉須先建民，一切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然後一切工作，纔不至架空。」——以上所指的祇是空洞的原則，自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並沒有跳出口號和標語的範疇——「我們要達到開發民力的目的，須從整個生活的各方面下手。必須灌輸知識——『知識』就是力量；必須增加生產——『生產』就是力量；必須保障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須促進組織——『組織』就是力量。我們所開發民力，就是開發人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組織力。人民自己有了這種力，纔能稱作『自力』，有了『自力』纔能作到『更生』！」

這篇富於口號魔力的文章，骨子裏，至少由我讀來，是把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歸罪於中國農民的自己沒有出息，咎由自取。這種要農民引咎的理論是和晏先生幾十年來一貫的看法相吻合的，他一貫的看法是中國農民有四大病症「愚貧弱私」。喜歡對稱筆法的晏先生配上了「知識、生產、健康、組織」四個口號。現在主持執行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晏先生還是二十年前主持定縣實驗區的晏先生。「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的診斷到他要說到工作

綱領時已被遺諸腦後了。從書本上學來的名詞確是不會生根的。

自覺的教育是現實的生活

我們要瞭解晏先生的基本理論，不能不提到他對於「教育」的看法。晏先生一生事業的中心是他的「平民教育」。不論他今後會做什麼事，他在平民教育上的貢獻是不應當抹煞的。但是如果晏先生願意聽我們的批評，我也願意很坦白的說，他的貢獻是偏重在教育的技術，尤其是文字教育的技術。他對於「教育」本身的看法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我沒有誤解他的立場，我想說，他是以傳教精神去瞭解教育的。所謂傳教精神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去「教育」別人的「不是」。傳教就是「以正克邪」，被傳的對象在沒有皈依宗教之前，或是說沒有棄邪歸正之前，滿身都是罪惡。所以晏先生先得認定了「愚貧弱私」的罪惡，然後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識去感，以生產去貧，以衛生去弱，以組織去私。

我在此並不想討論中國農民是否有此四大病症，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教育者的態度。在我看來，教育並不是以「有」給「無」，更不是以「正」克「邪」，而是在建立一個能發展個性的環境。我這種看法裏承認每個人有他判斷的能力，有他的理性，教育者最重要的態度是在尊重人性。這話和晏先生「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的半句是相合的，但是如果承認這一點，接下去就該說：農民是有自覺的，我們教育者的責任是在幫他們排除阻礙實現他們自發的求生活動。這和晏先生下半句「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的兩個「使」字不同。這一點不同出於我們對「教育」意義認識的差異，因之也使我們對整個農村問題的對策有別了。

我實在並不能同意晏先生認為中國農民到現在還沒有「自覺」。我這樣說並不是從「鑽研中西書籍」中得來的結論，而是我實地觀察的結果。最近暑假裏我遭到短期去訪問過，就是十幾歲的孩子都能回答你，他們生活為什麼這樣苦的。他們的大哥給政府拉去當兵了，家裏缺乏勞力；他們田裏收來的麥子，自己吃不到，給保公所拿走了；他們被趕到門外，把房子讓給軍隊來住；到了秋天，借了債去回地租——這一切都是現實的經驗。當我偕同一些同學去替農家打D.T時，他們很感激我們，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當晚是否能睡在沒有臭蟲的坑上。這套現實的教訓中，他們還會不覺悟麼？還得靠幾幾幾幾字才能知道他們自救的道路麼？我願意晏先生回頭問問自己派到鄉村裏去教書的工作幹部，他們是否已從農民給他們的教訓中懷疑了自己工作的用處。

晏先生自己是主張不要在中西書籍鑽研出結論來的，他怎麼會這樣相信他的千字課呢？是不是因為晏先生先假定了鄉下人是「愚」了之後，才覺得他們還得鑽研一下書籍才會自覺麼？——我這樣說並不是否定晏先生的千字課的價值，更不是否定了文字下鄉，而是說，農民並不是從千字課中得到自覺，而是自覺之後才需要識字，才喜歡晏先生的千字課。這個分別很重要，因為農民已

經自覺的不單是認識幾個字，他們還要靠自己來糾正道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在這自救運動中他們才需要文字教育。

暑假裏我參加了華北基督教農村服務營，我的目的是要實地看看在這種局面下有什麼可以服務的。我是一個旁觀者，自己想虛心的向熱心服務的朋友們學習。其中有一項工作是識字班。但是開課發生了呢？我們應當用什麼教材呢？在實際工作中才會明瞭人不會「為識字而識字的」。識什麼字？看什麼書？如果依晏先生的說法，我們得「使農民覺悟起來」，所謂覺悟，依晏先生上文讀下來，應當是「使」他們認識現在的租、糧、稅、徵、派的不合理，「使」他認識封建傳統的壓迫，外來強權的欺凌。如果這樣做，晏先生能保證這些熱心的農村服務者不帶上紅帽子，不關在特種法院裏，不致連性命都丟了麼？如果不從文字裏去增加農民自動自發的精神，試問教些什麼呢？花呀草呀地認識幾個字，有什麼用處？農民為什麼要每天費上幾個鐘頭來識字呢？這是一個具體的事實問題。沒有一個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會瞎了眼看不到現在農民所遭遇的嚴重壓迫，但是晏先生所主持的中美復興農村委員會能有勇氣面對這個問題麼？晏先生呼籲知識青年來合作，為農村服務，在原則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但是如果晏先生要逃避這基本的解除壓迫的問題，是否能滿足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呢？晏先生不能回答這問題，他整個計畫也會「架空」的。

取消土革的農復方案

問題還是回到了，如果要避免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是否能談得到農村復興。晏先生的回答是「可以的」。他說：「這條路，今日也許有些人以為緩不濟急，他們認為目前最迫切的是解決饑餓、物價、戰爭種種現實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都是今日最嚴重的，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三十年前，當鄉村建設工作發動時，何嘗沒有人認為現實問題是戰亂、災荒、窮困等？何嘗不以為此種鄉建工作是太緩不濟急？這種被批評為緩不濟急的工作一天不動手推行就更多遲緩一天，而一切現實問題仍將存在。說『迂緩』並不能否定問題，不做尤不是『迂緩』的解答。所以三十年前應該走這條路，今日還是只有這條路可走。捨此別無二途，更無捷徑。」

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說得更清楚：「改革土地制度，自屬重要，惟此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意思是農復會不能做這件事。

根據這兩位負責人的聲明，農復會是想避免社會制度的改革而達到農村復興的目的。晏先生所提出來的理由很值得懷疑。他首先把饑餓、物價、戰爭作為現實問題是以現象代替了問題，因之忽視了造成這些現象的當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晏先生提出三十年前的事來作為不必從這基本問題下手的理由。這如果能成為理由的話，必須是晏先生在過去三十年的做法確實解決了農村問題。事實上，除了晏先生自己，很少人是認為這前提可以成立的。晏先生在農村工作上有的貢獻，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却說明定縣路線並沒有解決農村問

題。在我看來，定縣實驗最大的缺點就在不從社會制度去謀改革。晏先生並沒有覺得定縣實驗有什麼缺點，而且願意把定縣的成績作為「迂緩」路線的保證，這不能不使人失望了。

為什麼不從土地制度入手不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呢？這一個問題在我的「鄉土重姓」一書裏已經有過答覆。簡單說來，在農民的負擔中，地租是一個重要項目。過去幾年的內戰主要關鍵，在我看來，也就發生於土地制度的爭執上。農民已自覺，要求改革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階層硬是要維持這種特權，不從國家全體利益打算，而從階級利益着眼。和平方法既不能解決問題，結果引起戰爭。戰爭又增加了農民負擔，徵派跟着一層層加上農民肩頭，反抗的勢力更加擴大，造成晏先生所謂「他們汗有流完的一天，他們血有流盡的一日」。晏先生所指出的封建傳統在社會制度上說，除了這種剝削性的土地制度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外能是什麼呢？

在農民負擔這樣重，生活這樣苦的現況下，識字、生產技術、衛生等一類工作是不發生多大作用的。以生產技術來說，我在北平附近一個案以菜蔬出名的村子裏訪問過，現在瓜果蔬菜等一類作物都已不敢種，種了也收不着，軍隊過境，比蝗蟲更兇。時間還不過半年，而政府的徵收已經超過了全部收穫的三分之一。農民買不起肥料，看老玉米瘦得可憐。晏先生可以說，他們缺肥料我們送給他們，但是在農民看來是這又何必呢？既是要拿走的，這一道手，有什麼意思？這不能說是「迂緩」，而實在是「迂闊」，事實上還在吸血，輸血有什麼效果呢？吸和輸之間的差額這樣大，如果要「倒下來」，還是扶不起来的。我並不相信晏先生看不到這個簡單的道理，但是他可以認為這至少是「為老百姓做點起碼的基本的實際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可以說他並沒有反對土地制度的改革。正如蔣夢麟先生所謂「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但是事實上又是怎樣呢？美國拿這筆錢出來的目的是和軍事援華相配合的，就是打擊共產黨。共產黨實行了土地改革，美國就得另外想一個方案來對抗土地改革，那就是「復興農村」方案。所以並不一定就是晏先生喜歡迂緩路線，而是美援的來源注定了他不肯不避開已被共產黨搶去的土地改革。

過去半年來國民黨黨面也有高唱土地改革的，我們先不必問他們的動機如何，但是表面上看來至少可以說因共產黨的壓迫，不能不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了，而且回頭看看三民主義，內容裏本來也有這一個方案。有些地方，為了軍事需要，也認識了農民的力量，正在想學共產黨的辦法推行土革，雖則我們可以懷疑他們是否能收到效果，但是比之否定土地問題是進了一步。這一種趨勢到農復會的成立又打住了。晏先生的迂緩路線如果是代表中美同意的中國農村政策，那是可以說一種倒退的步驟。

我並不願意從政治立場上去批評晏先生的用心。但是晏先生自己却應當明白，以往他是以私人的資格，為社會服務，能做多少就可以說是他的貢獻，批評者必須從他所做的事上着眼，不應當從他沒有做的事上去挑剔，但是現在他的任務是代表政府去實行農村政策。他就得負這政策的責任；如果這個政策並

不能復興農村，反而避重就輕，以慈善家的救濟態度來拖延農村問題的解決，他將因這政策的錯誤而受到指責。個人方面我們儘管可以同情晏先生「含著眼淚」，但是爲了「中國的安危」不能不坦白的檢討這種政策的過失。

晏先生自己明白在這個局面裏，他的教育方案是很難見效的。他希望「各方面共體時艱，捐棄成見，轉陰爲光明，化暴戾爲祥和，都站在爲人民謀福利的立場上，以工作成績相競賽。那時，民力纔能發揚，民主纔能實現。」事實上確是如此，晏先生的鄉建工作是技術性的，當中國社會矛盾的死結解開了，他現在所提倡的四項工作，知識、生產、健康、組織，都是十分重要的。這些是開發民力所需要的技術。但是晏先生三十年來實地工作的經驗並沒有「覺悟」這些技術性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實施的條件，那就是沒有封建傳統壓迫和沒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上)

張東蓀

本書寫後，覺得還有補充的必要。在序上曾說，本書是在授課時期寫的，往往上課把思路打斷。有許多意思本來想說，却因爲思路遮斷，以至忘了。後來亦沒有追補進入。現在遂覺得應該補充的地方實在不少。乃決定做「此補義」。

§一、在書中曾提出一個意思：即人類有提高其物質生活的要求。詳言之，即對於物質生活有不斷增進其幸福的要求。舉一種淺的例，如走路總得慢而費力，遂發明坐車。車又嫌慢，乃發明飛機。又如吃東西，拾天生的果實不及人種的黍稻來得滋養。凡此種種都是證明人類對於其資生之具的物品總不免要想愈增進愈充足愈美備則愈好些。並不是一個人如此，乃確是人人如此。不過自有人類以來，却從未辦到這樣普遍提高的境界。在君主的國家，只有君主物質生活最優裕，而其人民中却有衣不暖，食不飽的。大家都是人，人性總是一樣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希望辦到所得最豐裕的物質生活，這是一個必然而不可抗的隱伏性趨勢。這個趨勢把人類向後推動了。人類的歷史所以有劃期的變化乃是全靠着這個推動力。因爲這樣的普遍向著物質生活充裕與提高而進的要求正是每個人的天性。人人都如此，所以其來也不可抗拒，正好像洪水一樣，一直沖下去。

這種理論當然可以說是「經濟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之一種。這一種的經濟決定論只是主張普遍提高物質生活的要求有推動文化前進的決定性。乃只是就歷史的整個前進歷程而言。却與任何個人沒有密切關係。決不包含有人們的思想行爲，一舉一動，一念一想，都爲其環境上的經濟因素所決定的意思在內。現在有一些論者主張查看一個人的思想行爲只須查看其所屬的階級。以爲階級決定人的一切。這種的階級決定論固然亦是經濟決定論之一種，但和我所主張的上述理論完全不同。事實上，我們離開社會主義運動

有外來強權欺壓的局面。晏先生悲天憫人的看法是發生在低估了中國農民自動自發的革命力量。這種力量並不是從文字知識裏得來的，而是從求生本能中發生的。

如果晏先生從過去的實驗中認識了這一點，他就可以轉移他私人的事業，用他的專長，從技術問題上多作實驗，有一天，他所貢獻的技術還是可以有益於農民生活的改善的。但是他沒有這種認識，終於牽入了政治性的漩渦裏去。雖根我不能不覺得他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缺乏真正的信念。他還是三十年前的晏先生，一個把中國問題看成是單純教育問題的晏先生。在這時局動盪，歷史轉換的當口，他又接受了一個更大的考驗。如果他真是一個受過科學教育的人，這一次如果失敗，他應當有勇氣承受這考驗的教訓，不應再像在過去三十年一般的在實驗中失去自我教育的機會了。

史必見社會主義的大師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出身於勞動階級的。同時如美國，有些勞動者因爲分潤得一些好處乃反而偏向資本主義。所以這種階級決定論的經濟決定論早已爲事實所反證了。著者堅決主張只有我說的這樣的經濟決定論是可能成立的。倘若把範圍放得太寬，把話說得太呆，則不爲真理所許。所謂在歷史前進上有推動力的決定性乃是指歷史上文化的變化而言。歷史是變化的，好像水流一樣。但却有階級性。每一個階段有其文化的特徵。由甲階段到乙階段的歷程在當時好像只是突變，而在其前却乃有漸變爲其預備。所以歷史的變化是漸變與突變同流，既不是只有突變亦不是只有漸變。

但突變只是限於社會的生產力被生產的社會關係所桎梏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原有的生產力不能再發展了，必須把封塞這個生產力的社會關係打破了，才會再發展下去。打破這樣的阻礙生產力的社會關係即是革命。革命是突變，而在革命以前却有漸變。漸變就是養成這樣突變局勢的種種條件。因爲這些條件不是一天能造成的。條件且有種種不同，有物質上的，有社會關係上的，有政治機構上的，有含有國際性的，有人事上的，亦還有屬於思想文化上的。同時還有正面與反面之分。反面的條件亦居同等重要地位。條件的成熟亦各有差池。然無論如何必須經過一個各條件自己造成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每一個條件本身在那裏變。此即所謂漸變是也，亦即所謂漸變乃突變之預備是也。

無論漸變與突變，而主要的推動力則仍爲人類對於普通的生活水準之提高之要求。我們應得進一步分析之。

§二、「阻礙生產力的再發展」與「桎梏了生產力」，這些言辭雖已爲現時論壇上的流行話，然而我仍相信很少有人真了解其中的意義。原來生產的推動是靠着兩個因素。一個是屬於智力的，同時又是物質的。另一個是屬於社會關係的，同時亦是在分配方面。質言之，即一個是生產工具的新發明，即有

新工具出現；另一個却是資本，即資本在社會關係上的功用。關於第一點，生產工具的發明與出現是以下列三個標準而定，即生產量的增進與增多，生產品的增精與所費人力的減少。達到這三個目的則愈發明新的生產機器愈好。不過這件事在本身雖只是人類智力的努力，然却須有社會關係的適當環境相配合方會出現。這便連接到第二因素，其實二者是絕對不可分的。即必須二者會合方成功。但事實上有時二者却有分開的情形。

我們先講第二因素，然後再論到其他。這就是人類勞作的獲得之堆積。普通名之曰資本。但不限定為資本制度的社會中的「資本」(Capital)。所以英文又有一個字是 *fund*。現在我們即取這樣廣義的意思。凡人類勞作的獲得如果能厚積起來，用作再生產的幫助，則都可名之為資本。一個人羣之富力就看這樣的資本有多少。社會學家把它名之為「社會的積餘」(social surplus)。文化學術是屬於精神方面的，而在物質方面則是資本，資本愈厚積則這一個民族愈富。所以資本主義可以被攻擊，而資本却只是實貝，不會是壞東西。資本主義的弊病是由於資本屬於少數人，不歸全社會。並不能罪及資本其物的本身。這常識我願青年們不可不記在心上。老實說，一部人類經濟史正只是資本發展的變遷史。在上文已說過，人類為了要增加生產，乃作發明新工具的努力。這是人對物的關係，却同時必有人對人的關係，就因為人類的勞作總是與人合作，而不能是一個人來做。這樣的人與人的關係遂把人對物的關係加以限制。我在中建半月刊上曾對於這一點有下列的說明：

「為甚麼生產情形會演變到無法再增的地步呢？這並不由於沒有新的生產技術出現。即便有了新的生產機器，而仍有不能普遍採用的可能。試以土地的生產為一例而言。土地要想增加其出產量，必須改用機器來耕植與播種。但農民以其所獲除了交付地主與納稅外，已早無多，衣食尚虞不足，安有餘錢來購買機器呢？這便是把農民勞作收穫上的剩餘價值都被地主們做為純粹的消費而派擲了。倘便能把這一部分交納於地主的保留厚積起來，用以換得機器，則土地上的出產必可增加其數量。所以土地改革上的廢除地主階級一事，其目的只在於要使一部分勞動價值保留為再生產之用，不讓它浪費了去。並不是專為了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尤其不是為了報復或出氣。」

在這一段話中表明社會演變中往往初期是助長生產的，後來却會變為阻礙生產的了。地主的發生亦就是一個例。全部經濟發展史都建立於這個原則。由遊牧進於農業就是因為農業的生產比遊牧高。原始共產之不能維持下去亦就是因為那種經濟制度不能再使生產提高。而人類却有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這個要求乃得把遊牧變為農業。同時在政治亦把公社變為封建。所以封建的初起是對於生產有幫助的。追到後來却變為阻礙生產的一種制度了。資本主義之功亦就在於其初起時能打破封建。就因為封建到了後來變為桎梏生產力的制度，人們乃自然而歡喜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初期確能把生產力做進一步的推展，

使人民大眾生活水準較在封建時代為高。所以我說，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是歷史變化的推動力。在農業生活下的人決不願再回到游牧生活；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成立後的生活下，人們亦決不願再回到農村去。這些都是極淺而易見的。

問題是在發展到何程度方會桎梏了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的情形，則比較容易說，就是集中財富在幾個少數人手裏。其實封建的情形亦何不是如此。只要財富愈集中，則每個人的生產力都被剝削了。其結果只有侈奢與浪費，而對於再生產便起了阻礙。這種情形是客觀的，不能憑主觀來妄加評斷。這種客觀情勢既存在了，其內部自然包含着革命的要求。有了革命的要求，便在那兒爆發着革命。正在醞釀革命，則一遇適當時機自然爆發出來。所以社會革命是和婦女生小孩子一樣，必須先懷孕，且必須在腹內長足，一旦瓜熟蒂落，即呱呱墮地了。不過歷史上的社會革命運動者總不免於性急，他們雖亦說必須客觀條件成熟，但他們依然是以主觀的判斷為準。其結果及只有用「碰試法」(trial and error)，因此歷史上社會革命反以失敗的居多。就是由於主其事者總以為客觀條件已成熟了，可以試一試看。其實這種試一試看的辦法是十二分危險的。最能給反對者以口實亦就是在此。因為徒事更張而無補於實際。即徒然紛更而對於生產增加的要求依然不能達到。其結果甚且會激起反動。所以才有改良派出來以反對這種生吞活剝的做法。其實苟能其適合於客觀情勢的需要，革命還是不可反對的。我敢說，真正了解歷史的人是不會反對革命的，所反對者只是某種作風的生吞活剝而已。

§三、所謂成功的革命與失敗的革命之區別就在於一個確是沖開生產力再進一步發展的桎梏或阻礙，而另一個却只是社會關係變化一下，並不能真把再進的生產力解放出來。先講前者。須知生產的增加係指全民族生產總量而言。須知稍一不慎，反會把生產總量降低。這是一個最可怕的事。所以使生產總量增加却是一個艱鉅的工作。在革命時只能開其端，而其後必須有一個建設時期。在革命的當時是做不了的。不過良好的開端却十分要緊。倘使開端不慎，種下了惡果，則必定仍歸於走上失敗之途。詳論此點，請俟下文。

現在我們注重的還是在那個失敗的革命。因為歷史上確是失敗的革命較成功的革命為多。尤其在我們中國。我們不能不大加警惕。中國人舊時於革命謂之曰換朝代。我們如果要換朝代與革命嚴加區別，則可說前者就是失敗的革命。失敗與成功以何為標準呢？亦就不外乎看它不能解除生產力的桎梏，致使一班生活水準提高。所以換朝代與革命只是差之毫厘以千里的。中國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世界各國中，算是最長久的了。但其中却有許多次的這樣換朝代的革命。每一次換朝代幾乎有一個公式：就是俗話所說的官逼民反，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本身腐敗到萬分，同時對於老百姓又榨壓無微不至。於是乃逼得造成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又因這個新興的集團，其作風比較良好。老百姓是沒有主動的，他們只知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新起的統治集團就根據這一點乃把舊有的統治集團打倒。舊的統治集團雖終被打倒，然而中間却經過

一個互相殘殺的期間。有時且這樣的期間經過相當長，有數十年之久。在這個互相殘殺的時候，老百姓在左右夾攻之下，死亡無算。人口過剩問題就在這裏得到一個自然的解決。所以新立的朝代得相安一時，却並非由於沖破了阻礙生產力再發展的社會關係，乃只是因為人口減少，在經濟結構無變化的狀態下，能不生太大的問題。（平心而論，即在社會改革以後，人口並不是就沒有問題了。所以同時在人口方面想一個限制過度的方法並不是絕對無必要的。俄國情形與中國不同。俄國無人口過密的情形，自不須主張限制。不過單就人口一端來說，似乎太偏，而一口咬定人口不成問題，亦未免太過。）這是中國歷史上歷次排演的戲劇。須知排演這樣的醜劇只有在閉關時代不與外邊文化較高的民族相接觸。一旦閉關不能再閉下去，如果仍如此排演，則斷難維持於世界。所以今後中國的任務乃是使如何設法使這樣的醜劇絕迹，不再重演。這不是歷史換新頁，乃是歷史翻身。也就是著者所贊倡導的一次革命論，以打破這個週期革命的專制。即主張一度革命以後，永不再有內戰。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

(漢城通訊)

觀察特約記者

朝鮮半島像一隻巨大的靴子，踏在日本海和黃海的中間。李氏統一半島，建國三百年。一八八六年新舊黨發生紛爭，使日人新黨戰敗。到一八九四年又有東學黨之亂，引出中日戰爭。中國戰敗，承認朝鮮獨立，這時才有了大韓民國的國號。又過九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宣佈韓國為其保護國。到一九一〇年又宣佈日韓合併，朝鮮就是正式亡國了。李王現時拘到日本去，結束了三百多年的李氏王朝。他現在已經是五十四歲的人了。

朝鮮亡國後，朝鮮人民被日本奴隸者開始了殖民地的惡慘生活。復國運動在愛國志士領導下作着強烈的鬥爭，尤其是在第一次歐戰期，受着「民族自決」的思潮鼓舞，朝鮮人民以滿懷的熱血與興奮，奔走呼號，如火如荼的展開了大規模的復國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三月一日，漢城及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流血慘劇。朝鮮人民及愛國志士被日本慘殺的有七十多人，受傷的有四萬五千人，被下獄的有五萬人。在日本高壓政策之下，很多愛國志士流亡海外，繼續獨立鬥爭，並且在中國設立臨時政府。另外有一部人去美國，還有一部人去蘇聯。現在日本打倒了，在開羅會議中本已有使朝鮮獨立之諾言。後經波茨坦會議及戰後莫斯科會議，始則有三十八度南北分治之決定，後又有所謂五年託治之議，這一切都違背了朝鮮人民的意志。現在託治之期業已將滿，而朝鮮獨立統一之希望還放在渺茫的渺茫。

流亡中、美、蘇三國的革命志士，勝利解放以後，多已返抵祖國，這是目前朝鮮政治舞台上的三派勢力。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以前，中日俄三國會角逐過朝鮮，現在美國代替了過去日本的位置。李承晚一系的人物和美國在韓教會領導下的一些基督教徒，無難地傾向美國。還有過去使附

於日本的財閥地主現在也轉投在這一系勢力的羽翼之下。他們的活動範圍集中在三十八度以南的南韓。在蘇聯參加國際共產黨活動的和在中國參加左翼抗日集團的韓國人士，就多集中在三十八度以北的北韓，在兩韓作着地下活動了。只有流亡中國的韓臨時政府一系的人物則趨向以後凌空了，在韓國似乎沒有他們的基地，內部也一再起著分化。被人目為保守份子的獨立黨，既不能容納於北韓政權，也不能在南韓得勢。金九、金奎植、趙素昂他們回國以後，一直在苦悶着。——南韓不收北朝不留。誰能向中國呢？中國勝利接收海濱及東北北各城市，在數個產業處理中，更使得被遺送回國的韓僑，抱着一大肚子的冤枉，有的竟史到對留學的華僑尋報復。即使金九他根據那些從中國回國的韓僑的不愉快的心情。而且中國連年內戰，也給兄弟之邦的韓國一個很壞的印象。早就有人想將來韓國是否也要重蹈中國來發動內戰？

金、李兩姓都是朝鮮的大族。北姓是金日成、金斗鳳（中國人時把「斗」誤寫「科」）的勢力，而金九、金奎植所主張的統一路線，在現階段的政治主張上也與北姓接近。南韓選出的總統副總統國務總理都姓李，所以今天南北分治的外形上看似是北金南李。在南半島大韓民國的招牌下，似乎復活了李氏王朝。在漢城有位反對李氏政府的姓李的對他的姓金的朋友說，「李」字了，請直接叫我的名字。他姓金的的朋友對他說，「您姓不姓李我不管，我還是照舊姓金。」

為甚麼中國會屢屢排演這樣換朝代的戲劇呢？這却是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與政治的人們之一重要課題。問題的中心是在何以革命者一旦取得政權以後，長此至多不過百年（中國歷史沒有百年以上的時間沒有內戰），短期僅有數年，自己變為革命的對象，讓別人起來把他革掉？其實回答這個問題亦很複雜。就是因為沒有把生產力再發展的潛能放開來。至於何以不能如此，却又由於中國社會有一個特性，這或許是中國根本上的一種悲哀了。須知一個社會內部業已經醞釀了革命在那兒，却仍須有人以從事於革命。這些從事於革命的人須要有一種性格，姑且名之曰革命家的性格，或反抗性。中國老百姓却是十分有忍耐性，實在不會反抗。有反抗性的人只限於少數。這些求出路的人是有遊離性。他們本來向舊有的統治集團中鑽營進去。倘使鑽不進去，便改為向新興的方面進攻。而革命者如想招兵買馬。只有在這些人身上打主意。因為普通的老百姓是不革命的。這裏很顯出中國社會的特質，我們還得進一步分析之。

朝鮮在美、蘇、中三國的影響下，政治的主流却只有兩個：（一）是統一政府的路；（二）是單獨政府的路。後者以李承晚金性洙為代表。前者以金九金奎植金日成平壤會議的一批人物為代表。此外並沒有第三條路或者所謂中間的路。談到這裏我不能不追述一下受朝鮮青年及中國人所愛戴的呂運亨和他領導的朝鮮民主黨。三革命以後，獨立黨人及其他復國運動的志士多流亡海外，繼續他們的革命生活與奮鬥。國內在日本及其走狗的高壓政策下，多與海外失去聯繫，四十年的皇民化運動下的朝鮮青年被奴化着，哀苦無窮，流亡的革命者給與他們的種種的援助與影響是萬分微弱的，因為他們大部分已經沒有了地下組織。只有朝鮮民主黨還在萬分困難中有一些地下活動，所以在全朝鮮除了三月三日在平壤公開外，只有朝鮮民主黨在她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在平壤公開外，只有朝鮮民主黨不斷如樣的三革命精神與日帝爭鬥。這個黨的本身內部又有三派，右派是曹晚植，左派是呂運亨，站在中間的是安在鳴。一九四六年四月有派曹晚植從平壤到漢城，廿五日再組織朝鮮民主黨。被李承晚提名為國務總理而遭受到百次的李尤榮，就是曹晚植的副黨首。左派的呂運亨在風雨飄搖後，曾宣佈組織朝鮮人民共和國。那個黨花一現的共和國後來被佔領軍解散了，而呂運亨也被右翼反對份子刺殺殉國。那該是獨立統一運動中無可彌補的損失。

這裏還有一點需要加以說明的，那就是朝鮮民主黨並不是韓國民主黨，這一點在海外非常容易混淆。朝鮮民主黨應當簡稱為朝民黨，韓國民主黨簡稱為韓民黨，這比較清楚一點。不過這個簡稱在國內還不算普遍，因為保守派每每喜歡把朝鮮稱做韓國，而非保守派的人却萬分討厭韓

這個名詞，他們認為韓國一詞來自中日戰後，承認韓國獨立而事實上走入被日本併吞的途途。他們常憤憤的說，「朝鮮就是朝鮮，用不到叫做韓國。」於是主張用朝鮮者一切冠以朝鮮，主張用韓國者一切冠以韓國。從這一詞之差上我們也可以意味到兩個民主黨創出的實質上的不同。不過現在南韓的朝民主黨已經失去了他獨立的立場，曹晚植、李九榮一直與韓民黨勾搭着，甚至於辦公地方都一同在漢城的世宗路一三九號。朝民主黨已經成為韓民黨的附屬黨了，李九榮雖曾充為國務總理，現在却因為與韓民黨的關係而成為無任所的閣員了。

七十三歲的李承晚與韓民黨的關係也是值得一提的。韓民黨是南韓政府中的第一大黨，他的組成份子也是財閥地主及與日帝合作的走狗份子，先天具有優厚的落伍性，與「民主」之名不甚調和，實在是新瓶裝舊酒。李承晚並不是韓民黨黨員，他在盟國勝利後自美返國，成了韓國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關於他的歷史經歷似乎用不道多作介紹了。他在國內並沒有社會基礎，到漢城後根據美國扶植保守勢力的政策，所以不得不與南韓第一大黨密切勾搭。因為在南韓二百名議員中，韓民黨佔有六十席，另外還有很多的在政治路線上與韓民黨完全相同的議員，因為韓民黨名聲大噪，所以不敢直捷聲稱自己是韓民黨，而掛着其他黨派或無黨派的招牌與韓民黨合作。這樣議會中的多數黨，要當南韓總統的人，是必須向他們低頭的。

李承晚初回國時為拉攏各黨派，曾與韓國在華之臨時政府金九主席他們合作。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創國民議會，李、金分任正副主席，十四日又組織大韓民國國民代表民主議院，李為議長，金為總理，並宣佈臨時政綱二十七條。另一個更重要的組織是同年二月八日創立的大韓獨立促進會，也是由李、金分任總裁副總裁。後來這兩位獨立運動者的老人，因為主張的不同而分道揚鑒了。主張單獨成立政府者與韓民黨合作，已經升入總統的寶座。主張成立統一政府者參加平壤會議以後，又返回了漢城，仍然在致力他的統一工作。

韓民黨與李承晚雖然互相利用，但是李為避免無黨派人士的反對，却並不敢提名叫金性洙組閣。首提李九榮被否決，以後又提了李範奭。一混合內閣的形式，恐怕早已是李承晚自己擬定了的腹稿。如此不能拉攏各黨各派，也難以在內閣中塞進他自己的去。

李範奭出任南韓首屆內閣，也算是出於冷門。他的地位與實歷，他選差的多，不過有一個地位較差的內閣，李承晚指揮倒也靈活。同時因閣僚的資望較低，閣員的資望也就等而下之了。例如軍政廳的警務部長沒有撈到外交部長，而他的部下首都警察廳長倒做了外交部長。多少有地

位的人，都沒有納入這個首屆內閣之中。

李內閣的特點除了一般的資望較低以外，就是閣員中多半都沒有直接參加過獨立運動，而且沒有一個部長是平民出身的。無任所的閣員金性洙倒是李內閣的一個大台柱。現在讓我們把李內閣做一個分析和介紹。

閣員中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有無黨派的外交部長張澤相，韓女國民黨的商務部長任永信；內政部長尹致暎，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是個軍人，二十歲的時候隨他的姊丈申錫雨去中國，畢業雲南講武堂，在中國居留近二十年，也兩次去過蘇聯。一九一八一事變後，他在滿洲隨金佐鎮組織韓僑抗日義勇軍，金與李都是右派思想的人物，後來金佐鎮被左翼的金日成一派人刺殺了，因此他們有血仇。據說美國知道這段歷史，他出任內閣後，不會與北韓合作。李範奭在光復軍做過參謀長和第二支隊司令，地位與金若山金奎奎相等，同在現任無任所閣員的李青天之下，所以他的地位是不高的。不過從那時候起他就與美軍方面有接觸，參與美軍太平洋總部日本登陸部門有關朝鮮的計劃工作。因此他回國後，組織以光復軍為基礎的半軍事性質的青年團，獨能獲得美方的協助。從這些關係上看，可以知道首屆內閣將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準備南北戰爭的內閣。怪不得李氏組閣後，對人表示內戰無法避免。即便軍中無成，誰又能担保他不是心中有妓？何況國內有南北分裂着的現實，國際有美蘇對立的鐵證呢？我們的內閣於是只有擴軍備戰了。

外交部長張澤相是留過美的，他在出任外長之前是首都警察廳長，指揮着日本時代的警察和特務，對於鎮壓羣衆運動盡了很大的努力，多少人從他手裏入獄，多少人被捉去受毒打。而在這三年中他也被罰過四次，有一次在汽車中他的衛士被槍打死，他却都幸免於難。他的計畧張吉相是日本時代青島北道有名的富戶。

商務部長任永信也是留美的。他是婦女國民黨的首領，也是中央女子大學的校長，為反對到聯合國去請過願。她同梨花在大學校校長金活蘭，是韓國政界中兩位有名的女性。金活蘭在日本統治朝鮮時代，是進步主義皇民化的人物，因此那五十歲的老處女在當時的名字是四個字，叫做「天野活蘭」。任永信做了部長，金活蘭拿着一個非正式的駐美公使的名義也遊蕩在美國。

內政部長尹致暎是與李承晚關係非常密切的人物，他是韓民黨的秘書長，也是李承晚一九四六年組織的大韓民國國民代表民主議院的秘書局長。

社會部長錢鎮漢是大韓獨立勞動聯盟的首領。是一個極右翼的組織。他也是一個促一的勞動部長。一九四五年

十一月組成的朝鮮勞動聯合全國評議會，（簡稱「全評」）是在勞動界比較最有勢力而公正的團體。領導人是許成翰、朴世榮、和名律師李仁。與「全評」對抗的「右翼勞動」在金鎮漢、劉起元、蔡奎奭、金鍾律等人領導下，專做著為資本家壓迫勞工的勾當。他們的份子駐屯在各工廠中並不做工，用流氓的手段來強迫工人入盟，並打擊與全評接近的份子。這樣的一位社會部長，其將來作用不可不知。

教育部長安浩相沒有黨籍，他是首都大學的一位純觀念論的哲學教授，在日本發動所謂大東亞聖戰中，他宣傳過教全體學生出兵。

財政部長金度演是韓民黨的重要份子。金性洙的智囊張總秀（韓民黨政治部長）被刺斃命以後，金度演與該黨的勞農部長金俊淵成了金性洙的左右手，他的重要性在白南露以上。

運輸部長閔熙植原來就是軍政廳的運輸部長。

司法部長李仁是個跛腿的名律師。也是「全評」副執行委員長。做過軍政廳的檢察長，他與勞農黨的許憲是好朋友，人還淵明，有時能講幾句公道話。

農林部長曹奉若是個比較奇特的人物，他是參加過政黨組織的，他與朴憲永同屬於許憲的南鮮勞動黨，而且原來就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被日本人拘押過。託治問題發生，朴憲永他們表示贊成託治，曹獨表示反對，因此被開除黨籍，雖然如此，他還向人表示並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惟反對託治。直到出任部長以前他是有過長時期的沉默的，這次為什麼能以出任農林部長則是一個謎。

此外關於無任所的閣員三人，金性洙李九榮分別代表著韓民黨與韓民黨，李青天原是臨時政府之一員，與金九金奎植比較接近的，李任無任所閣員可以以和緩獨立黨的反對。而且他與李範奭有舊的部屬關係；回國後兩黨分別組織大韓青年團及民族青年團，李老將軍不但在光復軍中有其最高地位，大同青年團的團員比民族青年團人數還多。三個無任所閣員的年齡與資望比較各部部長還高一截。

總之，這個首屆混合內閣是離李承晚的，以這個內閣作基礎總難達成獨立統一，南韓李氏王朝是在走着分裂之路，因為只有分裂才可以維持特權，只有分裂二三流的人物才可以出任部長，也可以有三流人物出任閣員，李承晚才可以指揮裕如。李範奭表面上未忘情中國，骨子裏是美國馬首是瞻，而中國首先臨時承認了這個政府，這是韓民黨人民所不能瞭解的。中國多少年來培植的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寂寞的住在京橋莊，金奎植住在三清洞，他們還在堅持統一政府的路線。但是沒有方法扭轉這已經逆轉的局勢。

八一五解放三週年前夕

德國問題的癥結

Real Issue in Germany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July 17, 1948

英美政客們依舊在用「毋忘慕尼黑」來號召，如果除了戰爭祇有屈服時，要我們再敢忘戰。但是一般人民却不那樣容易地回到一九三八年。戰爭結束還祇有三年，我們還沒有準備接受另一次更可怕，也更不像會「挽救民主」的戰爭。人民不願接受這種火藥味的論調，一部分的理由是在他們拒絕把蘇聯和納粹德國列為一談，把新聞記者老問題，他們看不出對德國產權控制權的爭執和當時是否應支持捷克斯拉夫之爭執有什麼相似之處。

當前盛行的那種聽天由命的情緒還有它較深的原因。至少，在英國我們都知道如果今年夏天發生戰爭，這個戰爭將是兩個非歐國家在殘破的歐洲土地上的廝殺，這戰爭的初期將是紅軍的西進，不但佔領柏林，佔領德國，而且將佔領大部分的西歐。普通人民看得很清楚，在這種局面中談戰爭是虎虎的，不能認真的，糾紛還是得和解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希望這種信念是正確的。除非雙方同時在外交上踏下大錯，戰爭不致發生。

但是這並不是說目前的僵局是容易打開的。德國問題，是實際利益衝突的結果，柏林危機不過是雙方選擇出來作宣傳的焦點罷了。三年以來這個基本的衝突已經被種種女裝的皮見所籠罩得被人遺忘了。在我們決定柏林對策之前，把這基本結構提醒一下大概是有益的。

要這樣做，我們得回到波茨坦協定之前，記起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間的情形。在那個時候，英美政府主要關心的是兩件事。第一是奧拉任蘇聯在戰爭中，防止蘇聯的單獨議和。正確地說，錯誤也罷，大概是錯誤的——邱吉爾和羅斯福很怕蘇聯的和議。在德黑蘭和雅爾達兩次會議中，他們預備作很大的讓步去討好史大林，用得到他在被認為這是長期而且嚴肅的對日戰爭中出力參加。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讓步似乎是過分的了。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去防止德國軍國主義的復興。現在東西強國爭鬥熱潮中，德國人，尤其是柏林人，已被認為具有基督教文明和民主勇氣的美德了，但是在三年前沒有人這樣想法。我們可以記起在魁北克，邱吉爾和羅斯福曾接受了廢除核武的方案。（這是一個最嚴厲的解除德國經濟能力的方案。）那個時候，德國經濟因大量實物賠償所可能引起的危機並不受關心，關心的是德國復興的可能。蘇聯在德的那樣搬運機器，當時不但沒有增加蘇美的距離，反而很得美國的歡心。英國各黨都認為蘇聯對德的嚴厲處罰是獲利的，他們歡迎艾森豪威爾馬夏爾白河時，不遠或柏

林（那時他很可能以這樣做），一部分原因是在他們相信蘇聯可以比我們做得更徹底。就是在波茨坦會議的時候，這種見解還是很盛行。艾德禮不受史墨登將軍的警告，姑且捷克和波蘭驅逐德國人的行動。並不是因為一九四五年蘇聯有異於一九四八年的蘇聯，而是因為英美當時覺得德國問題的解決祇有用蘇聯的觀點去反抗德國復興的危險。

在戰時和戰後剛結束時，我們不信的警告過分的長遠心理，而且預言接着會進轉而成親德的性情。當英國人看到了蘇聯方案將創造一個真空的德國，而這個真空祇有被共產主義所填補時，他們會轉而同樣的過分去親德的。這個預測不幸而會中了。當歐洲人民，不論東歐和西歐，還沒有改變他們長遠的心理時，美國政策——英國在程度稍差一些——已開始把德國看成一個反共的潛在同盟了。現在有人再提起奧斯維茲的毒氣囚室時，英美官方會覺得「不太幫忙」而且打擊西歐聯盟，因為法國和東歐相似，還記得上次大戰之後曾發生過完全一樣的情形。

不真實的親德並不是惟一足以指責英美政策的項目。同樣重要的是在佔領區裏並沒有實行社會改革，沒有社會改革，和平的民主的德國是不可能創立的。除了不徹底的消除納粹的工作外，現在的四德還保持着一九三九年的社會結構。重工業既沒有國營又沒有國際共管，土地改革已經無限期的拖延了，新法西斯的力量，在地下原來是很強的，受到鼓勵而公開了，進步的勢力日漸衰落。對社會改革的消極態度加上親德的情緒，馬歇爾計劃的中心又是重建魯爾，還要一再聲明 *Ost-West* 疆界的暫時性，這一切都使一般的歐洲人——且不提蘇聯——無法不認為，不論目的如何，英美政策是在重建一個強大的德國，使它可以用重軍侵略。這是蘇聯反對四歐列強的真正理由。

我們反對蘇聯的理由也一樣。自從波茨坦以後，蘇聯在德國問題上從來沒有合作過。首先是克里姆林宮決定單獨管理東歐佔領區，在那個區域裏建立了一個極權的政府。在外長會議討論不完整的議程裏，莫洛托夫的要求以現有生產品作賠款（實際上必須由英美支付）使德蘇無法完成。他又阻礙了貨幣的改革，逼使西方國家除了建立獨立的西德政府外，祇有接受經濟崩潰。西方國家無可奈何的——法國一直反對——把德國分裂了。蘇聯捉住了這一點，控告西方國家破壞波茨坦協定，開始封鎖柏林。西方國家的理由是：如果他們是在扶植德國反抗東歐集團，

那是被逼出此的。把雙方爭執坦白說明了，很清楚的，柏林問題並不能孤獨予以解決。四方國家固然缺乏遠見，沒有得到交通線的確切保障，在法理上說，他們是有權住在柏林的，但是蘇聯也可以合理的質問，新馬歇爾的發行在佛朗脫蘇聯西歐政府是否係片面破壞四強協定，這協定却是佔領柏林的根據。如果四方國家決定要把三個佔領區合成西德國家，東部佔領區包括柏林是否同樣在柏林局留，他們一定得準備討論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組織一個中央政府。如果他們決定在佛朗脫蘇聯建立政權，他們得接受柏林糾紛所引起的結果。

馬歇爾和貝文曾設法想避免這個危險的局面。一年前，在柏林還沒有成為我們在歐洲的聲望有關的問題前，我們可以決定從柏林撤退，作我們對蘇聯不合作的抗議；我們可以自動的在佛朗脫蘇聯建立一個德國的京都。這種做法是困難的，但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相反的，我們一方面留在柏林，一方面又建立西德政府。我們又向柏林人民許下神聖的諾言：一定要保證並且接濟他們。這個政策不但接受了個技術上近於不可能實行的束縛——供給在戰後後一百二十萬英鎊的城市所需糧食——而且要蘇聯作一個危險的決定。讓我們留在柏林，同時又讓我們建立西德政府，他們將在世界面前表示對威力的屈服。如果我們覺得放棄柏林有損面子，從蘇聯方面說，讓我們留在柏林和同時建立西德政府將更有損面子的事。雙方為了面子都不能讓步了。

柏林危機却帶來了一個有利的轉機。它表明了西德政府在實際上是不通的了。幾個月之前也許還有此可能，現在沒有一個德國政府上的人物願意接受這個辦法了，因為在現在的局面上接受這辦法等於承認德國的分裂。四方國家不願一切的要維持他們在柏林的地位，實際上却犧牲了倫敦的六強協定。

美國的政論家李普曼瞭解了這個情形，所以寫了很長的文章，主張重開外長會議，再度試求全體德國問題的和平解決。李普曼一直是反對組織西德政府的，他覺得柏林危機是從不可守的據點撤退的良機。在華沙文告中東歐集團一再建議佔領區的德國盟軍提早撤退，建立一個有足夠保證的統一的德國。李普曼認為這個建議應當接受，至少也應當看看他們有無誠意。

李普曼的看法是值得支持的。如果蘇聯提出了建設性的和平建議而我們拒絕討論，四方國家的地位是難堪的，所以我們不能讓蘇聯受我們走到地位上去。即使外長會議不能解決魯爾和蘇聯問題，至少也可以有一個過渡辦法，好像協議一個大家在佔領區裏遵守的施政綱領。預斷談判是不會有損失的，不願協商則將蒙受一切的不利。（觀察特約記者譯）

悼朱佩弦先生

吳 晗

佩弦先生的死，對於中國人民，中國民主前途，中國文化學術界，那是無比的損失。

我和佩弦先生的關係，可以說是師友之間。二十年前我進清華讀書時，他已在清華當教授，雖然系別不同，沒有過過他的課，因為他是清華專報的編輯人，我常寫論文在專報發表，因之也就認識了，一直到現在為止，他是在文字上口頭上叫我原名齊哈的少數前輩中間的一個。

學校南遷以後，幾千人擠在一個小破子裏，見面的機會反而比在北平時多了，生活上比較接近，彼此間的瞭解也比以前更多。

復校以後，為了編輯開一多先生遺著，經常有問題要商量解決，不但常見面，也時常通信。不料一多全集正要出版，他已經不及見，繼亡友而去了！兩年內統計有他的二十多封信，都是關於一多全集的，幾年來的習慣，不保存友朋信札，這些書簡也沒有例外，更以為承教之日方長，又誰能料到，誰能忍心料到有這一天？到今天追悔也無法補救了！

整飾、慎重、週到、溫和、寬容、高度正義感，加上隨時隨地追求進步，這些德性的綜合，構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

和一多相反，在性格上，他屬於溫文爾雅一類的典型，從來不會放言高論，聲震屋瓦，也不會慷慨激昂，使人興奮共鳴。無論是私人談話或是公開演講，總是娓娓而談，引人入勝。又如其人，文字上的表現是細膩、穩到、心平氣和。拿酒來譬喻，一多是烈性的，佩弦先生是這年陳紹，可口而力氣大。

性格上的整飾，也表現在服裝上，無論在任何場合，任何季節，衣服雖破爛，總是穿得很整齊，終無無情容。因為多病，服裝的季節性要比一般人提早，去年十一月有一次去看他，穿著大棉袍，腳下一雙大毛筒。今年七月十五日晚上，開一多紀念會，他出席講演，這晚上海熱，我們都脫去上衣，只有他，一直到終場，沒有脫衣服，也似乎不很出汗。

處世作事，小心謹慎，從來不曾得罪過人，當然，更不會阿諛。教了幾十年書，總是那份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作一件事，事先考慮周詳，不輕於允諾，也決不翻悔，改變主意。誠實、坦白、是非非，表裏如一。幾年來，在昆明，在北平，朋友們經常對國事發表意見

徵求他簽署時，大部份是毫不猶疑的，譬如如北平十三教授的入權宣言，就是他領銜發出的。最近拒絕接受美援的宣言，也有他的名字。提到這件事，應該鄭重指出，在另一篇悼文中，我曾經過這樣寫，臨於前兩天：

有人說，他告辭太遲：「有一件事千萬別忘記，我以後便沒有說過話了，這句話是他唯一的遺憾。今天晚上，有當時目擊耳聞的人證實了這件事。」

不過，在有的場合，他會告訴你：「請原諒我，也許是年歲太大的關係，太刺激的文字於我不適宜。你們要鬥爭是可敬的，不過，我得慢慢的來。」用充分的同情透出門。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他出席一個公共集會，討論知識份子今天的任務，他除了指出知識份子有兩種，一種是朝上爬的，幫凶幫閑的，一種是向下的，為人民服務的。並且坦坦地承認：「要許多知識份子每人都去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羣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該接受的，是習慣上變不離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

事實上，幾年來他確實是在向青年學習，他出席每一女學生所主持的文藝座談會，討論李有材板話，趙家莊的變遷，王貴和李香香，提出極精到的意見。他發表「標準與尺度」一文，指出今天文學的道路。在同樣的場合，領導朗誦詩，親自參加集體朗誦。並且，還參加本系師生新年同樂會，化裝扭秧歌。朗誦詩和秧歌秧在青年人也許是家常便飯，但是，一個五十歲的老教授，一個學系的主持人，意義就不同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和青年人肩並肩，走得並不慢。

七月十五日，他出席四個會，其中一個似乎是交代系務，因為他下學年休假了。第一個會是開一多遺著整理委員會的最後一次集會，他報告了遺著整理和出版的經過，以及有關事項的處理決定後，宣告這個會的解散。（這些情形我是親身參加，知道得明白自的。這幾天清華校刊登出這會的紀錄，上午代國文系主任浦沅清先生寄一份給我，到下午又收到同樣一份，封面上寫著朱寄。）第二個會是晚上的一多紀念會。過幾天他就病了，二十三日那個會，勉強扶杖出席，沒有吃飯就走了。

沒有他，這部書是編不成，出不了版的。大約在一個半月前，校內一個送別休假同人的宴會，飯前飯後我們談得很多，談到華樂同學的苦悶，有許多學生在抱怨學了許多X.X.X之類科目，對今天的局面瞭解一無裨益。甚至有學課是專門應付教育部的功令的，從不上課，教授官僚化，有些課變成衙門。他感慨地說，這問題太大，牽涉太多，不能談。不過，也不是絕對沒辦法，比如國文系，他主張著重現代和近代，從後向前推，這樣，學生縱然不知古，至少也可以通今，不枉作一個現代人。

國文系的同人和學生對佩弦先生的看法，同人認為是最好的同事，最理想的系主任，系中大小事務，從聘請教授到指導學生研究，都召開系務會議決定，議案通過以後，執行的情況，或者稍有變遷的地方，他照例一個個分別用書面或口頭通知。平時有一定的時間在系辦公室處理系務，選購圖書。學生感激他上課時候的認真，更喜歡他在課堂以外的講演和指導，他和同學一起討論，一起研究，一起玩，是可敬的師長，是親愛的父兄，是民主的學者。

胃病多年了，尤其是對日戰爭這幾年，家眷住在成都，單身在宿舍吃包飯，陳倉爛米，加上種子沙粒，營養談不到，健康一天天被侵蝕。回到北平以後，還是過的苦日子，成天要為柴米油鹽發愁，課務系統以外，用全時間來寫作，過度的工作更損壞了體力，單是這半年，就犯了三次嚴重的胃病，進醫院以前的體重只有三十五公斤。胃潰瘍，十二指腸也壞了，割治後轉成腎臟炎，又變成肺炎，終於不治。

一年前，有一天他告訴我，第二個孩子在南京作事的，寄了五十萬元來，心裏很難過。

在醫生說必需立刻進醫院割治以後，為了借債，到處張羅，就讓了一個半鐘頭。其實，要是在十年前，他一定不會搶到這樣嚴峻的情況，早就進醫院割治了。

我不敢相信，假使他生了一個和平的中國，民主的中國或者早生、晚生二十年，他不會死，至少還可以再為人民工作二十年。

然而，他恰恰生在這個時代，史無前例的激烈內戰時代，既不要文化也不要學者的時代，他營養不良，他的工作，他欠債，他死了！

最後，應該說明的，雖然在黨化教育的幌子下，這學校的行政人員都有不能免於黨化的自由，佩弦先生似乎沒有成為黨員。另一方面，雖然提倡朗誦詩，贊揚樹德，甚至化裝扭秧歌，這些行動在今天都是可以構成達到特種刑庭的罪狀的，佩弦先生的朋友也可以用直覺來保證他決非另一黨的黨員。他是獨立的、自由的、進步的作家、學者、教授、人民的友人。

八月十六日晚於清華園

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當內戰打了兩年，步入第三年的夏秋之交的時候，空谷來風的和聲響徹着，全國各戰場現了一種小休的狀態。乘此喘息時會，我們不妨再做一次總的檢討與展望。

持久戰 年中無疑是國軍採取全面攻勢

共軍以運動消耗避開主力決戰，從運動消耗中變化整個形勢，以達於相持及反攻。抗日時期毛澤東一論持久戰的戰術思想，又完全應用到對內的新戰爭中，而且得了更具體而迅速的再實踐的機會。當戰爭步入第二年的時候，劉伯承、陳毅、陳賡相繼南下，展開了大舉反攻，我們曾經指出「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的形成（觀察三卷六期），以及「八方風雨會中州」的必然趨勢（觀察三卷十二期）。政府方面人士却一口咬定了就是共軍是在三求戰術下的逃亡。真

就要有人吃不了，共軍便入川的兩大企圖

以及雙方的三南三北策

略，我們早經論到過，不知者在當時或許懷疑我們在「當匪張目」。現在共軍渡江入川的大願雖尚未得償，而他的有利基礎却在江河之間已經奠定。至於所謂三南三北策略，時過一年，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在「半年來戰局總檢討」一文中，也說出了

國軍在東北求穩定，在華北求鞏固，在西北阻敵擴展。一個戰爭的形勢與趨勢擺在那裏，誰都可以看得到的。我們不是以欺騙嘲諷討論生活的職業宣傳家，只是把所知道的事實（這其中也是多數讀者已經知道的事實）加以系統的說明與報導，使關心戰局的讀者能夠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概念而已。

這半年來，全國各戰場，都有很大的變化。據國防部的統計，關內外國軍半年中放棄了八十九座縣城。一城一地得失固無足重輕，但是當有軍略價值及政治經濟意義的城市却不能準此而論。從一些名城要地的身手中，我們可以意味到共軍攻堅力

戰場的增強。在涇渭河谷

及豫東黃泛區兩次大會戰中，我們可推想到共軍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的陣地戰條件。所以我們檢討過去半年以來各戰場的情形，綜觀全局，共軍已經不再專搞外線流竄，而開始嘗試攻堅與陣地戰。這是半年來內戰中最重要的變化與特徵。

從主要的變化與特徵中，即可以窺察發展的一個大致的趨向。至於雙方最近發表的一些有關的數字，倒用不到過份重視，因為在宣傳戰中的數字，難免有其利於自己的增損。當然，要是將兩方的數字加起來用二除開，也可以得到接近實際的數字，但我們又何必找那麻煩呢。而且何應欽部長在立法院中的秘密軍事報告，各種比較接近事實的數字，均大致透露出來，兩軍實力的變化及現狀，大致可以看得出來，更用不到在宣傳數字上多下工夫。還是讓

的談話各戰場半的變化吧。

戰場，國軍在完成了

稱爲陸上歐克爾克特林撤退及失去四平街以後，沒有經過什麼陣地戰。最近一個月前後採取速戰，宜稱東北已有小廉局勢，派接增區政察團到華北參戰，從北平請教授去東北講演，另外又宣佈實施總動員與土地改革，似乎孤立在東北的瀋陽，真正的

東北是共軍絕對優勢的戰場，做軍情判斷須根據兩方的實力與形勢，不能聽無所根據的空氣。東北的小康安定，不過是枯井無波而已。這真當然要有一個疑問，共軍在他絕對優勢的戰場上，爲什麼在開凍以後不會發動一個稍具規模的攻勢呢？原因也非常的簡單，因爲牠丟了生產乃至忽略了生產的戰爭是最原始的戰爭，是不可想像的戰爭。東北共軍可能是在

的，北平無波是變化最小的

與以後，利用東北廣步

富饒的原野和交通工礦的基礎，開始一方面整補一方面從事擴大生產的工作。因爲他們要利用東北做爲支援這個戰爭的總基地，就不得不以擴大生產來建設這個基地。反正他們看準了枯井不會生波，在東北的戰場上國軍沒有反攻的力基。看住錦州，固因

長春瀋陽，以生產對消耗，使國軍坐以待斃。衛立煌、范漢傑、鄭洞國，也藉着這個時機，將兵力集結，獲得一個喘息整頓的機會。瀋陽還勉強支持，長春却到了垂死的邊緣，糧食尤爲恐慌，高粱米一斤已

售到一億七千萬元。

關於華北

華北呢？本刊四卷後第一期有一北方戰局展望一文略述梗概。半年來的時光，在森榮臻與傅作義兜圍推磨中過去，誰也沒有給誰以致命的打擊，這裏還有補述與追述的幾點如下：

(一)冀東戰事現已告一段落，不過冀東在將來還是北方最重要的戰場，因爲有這個地區才可以支援東北，使錦州乳虎有所依托。而且國軍控制了平津唐三角地與平津保三角地帶，構成一個四邊形的形勢，才能使華北心臟平津安全。共軍在秋季攻勢中也不會放棄這個地區。

(二)東北共軍八及十一兩縱隊曾進關在冀東作戰，現又退至長城線附近。這兩個縱隊的進關，不能看做東北共軍在戰略上將拋開瀋陽來到關內作戰。因森榮臻最近四個月內在華北各省的角逐，兩方兵力都有相當的折損。據估計傅作義在這個時期內折損的補充部隊、地方團隊、和改編過的偽軍，共計有十多個團。主力部隊凍凍水一役以後還沒有吃過大虧。對北方平西兩部舉行軍政會議

在十個團左右，但是除

了少數軍區部隊以外多爲野戰軍。原來他就選爲主力決戰，在這樣相對的折損情形之下，主力就失去了均衡，萬一主力撞在一起那怎麼辦呢？東北共軍兩個縱隊的進關，是爲了均衡兩方的主力。

(三)察綏是傅作義的老根據地。綏綏還得與寧夏呼應，支援陝北的榆林，尤其是榆林的糧食多從包頭運去。森榮臻在雁北綏東兩走了趟，把平綏路破壞了到現在還沒有通車，東北華北共軍如再在冀東發動攻勢時，可能同時使用賀龍徐向前及姚喆的部隊對綏包大同發動攻勢，使傅作義首尾東西不能兼顧。

(四)華北五省除察綏以外，晉冀熱三省省會，太原、保定、承德都被孤立起來，陷在嚴重的被圍困局勢之中，這三個大包袱，國軍不得不很吃力的去指。平保平承公路還有打通的希望，太原的對外交通是一時沒有方法打通的。將來空軍補彈都是沉重的担負。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運動

晏陽初的禍 去與現在

(觀察南京通信)

美援也把農村建設運動復活了。行政院在八月十一日公布派蔣夢麟、晏陽初及沈宗瀚為中國農林復興委員會委員，等候美方委員到了便可開會。據說該會內定的執行長，就是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所稱為「中國啓蒙運動之父」晏陽初，從民國初年，第一次歐戰後就是接受美援的執行人，那時所得不過只是二十萬美金，如今增到二千萬美金，他出執行長當無疑問。

中國在第一次歐戰後的農村建設運動，好像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贖罪運動，那時候被「五四」啓蒙了的人，都紛紛湧於這種「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這一個有生命的運動，在最近十年中經過了兩次考驗，不幸却落了伍，一次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民族戰爭，一次是勝利以後以土地問題為中心的國內戰爭。在這些運動中，有名的農林運動者似乎都與現實脫節，假如勉強地扯在一起，那麼，過去鄉村派領袖梁漱溟的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與今天平民教育組織晏陽初的主持美援農建運動，又都可以說是對於這兩位最有地位的領導者的考驗。這也是二十多年碩果僅存的二位代表者。

政治協商會內定的執行長，就是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所稱為「中國啓蒙運動之父」晏陽初，從民國初年，第一次歐戰後就是接受美援的執行人，那時所得不過只是二十萬美金，如今增到二千萬美金，他出執行長當無疑問。

中國在第一次歐戰後的農村建設運動，好像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贖罪運動，那時候被「五四」啓蒙了的人，都紛紛湧於這種「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這一個有生命的運動，在最近十年中經過了兩次考驗，不幸却落了伍，一次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民族戰爭，一次是勝利以後以土地問題為中心的國內戰爭。在這些運動中，有名的農林運動者似乎都與現實脫節，假如勉強地扯在一起，那麼，過去鄉村派領袖梁漱溟的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與今天平民教育組織晏陽初的主持美援農建運動，又都可以說是對於這兩位最有地位的領導者的考驗。這也是二十多年碩果僅存的二位代表者。

至於晏陽初便不同了，讚美他的人罵他如何像宗教家一般的嚴肅，政治家一般的雄辯滔滔，以及對留法勤工儉學者羣中，如何盡其友愛之能事，而在定縣十年，救活了不知多少「死眼瞎子」，只要經過四個月之平民教育，認識了一千多個長用字以後，就具備了「平等的」、「整個的」、「人的基礎」。但這些工作從開始就是得到美國慈善團體如洛氏基金的協助及羅城村的開明士紳的支持，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四大教育，變成了一個四季常青的盆景。抗戰開始，大批幹部撤到湖南，從事於七十五縣的農民抗戰團的編組，但是長沙大火動搖了張治中的政治地位，也燒光了平教會的本錢。晏陽初乃以四川巴中人士資格入川求救，成都雖地位優厚，但只要求他擔任復興農運的「乾手」。

勝利之後，他回來了，他對「愚窮弱私」四大病源，所提出的一「自治」仍是「自給」、「自強」。於是又應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聘請，再度赴美。當他看到美援快成熟時候，便高唱他自己的成就：「中國文盲原為百分之八十五，經努力二十四年之後，已減少至百分之六十五」，並且他相信「十年之內，文盲可減為百分之十」，同時又在宣傳平民教育道：「世界的基本是平民，並非黃金或鋼鐵，與其說是要有一個較好的世界，勿寧說是要有一羣較好的平民」，而他便是這羣牧人，是二十年來的平民教育家。

晏陽初自此乃一步登天，除了接受「中國啓蒙運動之父」的桂冠外，並且一再與社魯門晤談，且衣錦榮歸就任了美式裝備下的「農村復興運動」的乾手。

平教會三十
年來的方向

眼光向人民，就不免有

進步的嫌疑。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啓發了政治意識，開門見山的第一條「先集中除文盲，後集中作新民」，雖是對舊軍閥下的作「舊民」的不滿表示，但對於革命却終缺乏更多的合作。城市不易居，於是十五年秋季應定縣紳士米油剛之請到羅城村去下鄉。十八年五月，晏陽初由美募款返國，在定縣考察兩月，決將平教會中心從北平移到定縣試驗區。這年十二月，與基督教訂立了全國基督教平教會研究會的合同。有了錢又有了人，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會、華美教會、倫敦會、華公會、友愛會、長老會、十一個不同省份派人來合作之下，基督教有了出路，平教會也有了新生命。「無異識字運動中又增加了數百生力軍」。晏陽初與美國慈善團體的關係因之也更進了一步。衆口同聲地叫着「愚窮弱私」是中國病根。

晏陽初的這一本小冊子就是解釋平民教育的「真義」，他說：「平民教育的平民，就是指一般已過學齡時期而不識字的男女，或一般的已識字而缺乏常識的成年」。又說：「所謂平民教育的教育共分三步，先以識字教育使之獲得知識的工具，繼之以公民教育，使之能有改良生活的技能，輔之以生計教育使之有熱誠奉公的觀念」。

他更認為這種教育不是歐美的「成人補習教育」，也不是「移民教育」，是「義務教育」的朋友，却不是「社會教育」的別號，「千字課」只是開端，還要繼續不斷地受教育，既不是一「貧民教育」，也不是「階級教育」，而是「全民教育」，因此這「不僅是中國的創舉，也是世界上的創舉」，這種空谷足音的呼喊為人民之聲，從城市走向鄉村使人感到晏氏平教會亦有如真正教會的宣教士，在不顧一切地宣揚「主」的福音。

平教會那時候能夠眼光向人民，就不免有進步的嫌疑。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啓發了政治意識，開門見山的第一條「先集中除文盲，後集中作新民」，雖是對舊軍閥下的作「舊民」的不滿表示，但對於革命却終缺乏更多的合作。城市不易居，於是十五年秋季應定縣紳士米油剛之請到羅城村去下鄉。十八年五月，晏陽初由美募款返國，在定縣考察兩月，決將平教會中心從北平移到定縣試驗區。這年十二月，與基督教訂立了全國基督教平教會研究會的合同。有了錢又有了人，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會、華美教會、倫敦會、華公會、友愛會、長老會、十一個不同省份派人來合作之下，基督教有了出路，平教會也有了新生命。「無異識字運動中又增加了數百生力軍」。晏陽初與美國慈善團體的關係因之也更進了一步。衆口同聲地叫着「愚窮弱私」是中國病根。

北伐勝利後的局面是多變的，從十五年十月到十九年六月在定縣平教會的工作也是多變的。在道不滿四年中，變為遊戲的鐵騎。

五次的變動，工作者六六單位，為了農民教育花了二萬二千一百零九元一角(以目前幣計，應乘七百萬倍)，而定縣城還經過兩次戰火，晏陽初與教會觀察的結果，訂立了一個「十年實驗計劃」及完成了他的第一期的四大教育主張——文盲、生計、公民、衛生、包括了生活需要上的一切從頭至尾，繼續進行，作為兒童、青年及成人全部教育的內容。

至於十年計劃，從民國十九年八月開始，平教會主要幹部湯茂如說：「十年計劃是我們研究縣單位教育建設方案，編製工具及培養基本人才的計劃」。十年計劃劃分為三期，第一期三年偏重文盲教育，第二期三年偏重生計教育，第三期四年偏重公民教育，而衛生教育則貫徹十年。不幸當晏陽初一行正在努力介紹美國種畜、醫藥、倫理以及大量美元在佈置這一個個花園時，日本帝國主義不肯等待，先有了「九一八」，再有了七七抗戰，這「華北實驗區」自此而告毀滅，一部份地方幹部作了日人的順民，一部份則變為遊戲的鐵騎。

平教會理論家，墨爾在檢討十年來定縣平民教育的結論中說：

「我們的困難之點，一部分是條件不充分，一方面還是教育問題。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不夠，與社會既得權益階級的抵牾等等，是一方面，而社會習慣的阻礙，一般人對於教育看法不同的阻礙，這一類心理建設的問題，根本上還是教育問題。」

雖然理論家們不放棄教育問題的中心看法，但是執行人晏陽初已把二十年前的「平民教育」加上了「最新式美式裝備」了。

美式裝備下的農建理論

「美式裝備」下的「中國農村復興方案」是不是過去定縣的一套呢？晏陽初的法費由教育性平民教育一變而為政治性的力的教育了，這位三億平民發掘者對中央記者說道：

「環顧世界一切，無不受理力量強弱的左右。有力量的支配他人，沒有力量的只能受人支配，只有人民發掘出自己的力量來，才能作民主國家的主人翁，才能談得上富強。力量是什麼？知識是力量，生產是力量，健康是力量，組織是力量。」

因此他在「和平時代」的文藝、生產、健康三大教育外，公民教育取消了，加了一個「亂時代」的一組織教育。藉此發掘農民潛伏的偉大力量，因為最後一項有「自衛」與「自治」的作用，是一運用政權，實施憲政」的基礎。生活是一個有機體，這四大教育相依為命，但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生產落後的地方，先從生產教育開始，民智落後的先從文藝教育開始……人民有了教育，才能自動，自發，自行改善。他又指出平教會曾有華北華中和華西三個實驗區，所選各地點各有其代表性，這些由各不同單位領導的農建實驗工作，「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運動」。

今天的工作却與過去的不盡相同了，晏陽初承認民國十二年開始的平教會，十九年在河北定縣的實驗，抗戰以後在湖南衡山、四川新都設立的機構都是私人學術機關的研究實驗，而現在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設立，則是從政府立場的推廣，一至於

全國性的以龐大財力集中中美專家，並由政府以政治力量扶助推動，則係自今日為榮耀。他對此會的設立表示欣慰，對將來的成就也有信心。

美國對中國的新認識就是要爭取民衆，動員民衆，不僅扶植上層，而且要以美式訓練的農運專家來領導人民，所以晏陽初回國之後便說：「美國人民今日最重視的是抗戰八年後的中國人民，這是中國目前唯一的希望」，「鄉村建設的重心扶植中國農民的力量」。美國華盛頓中，有一個最動人的口號，就是六元美金可以訓練一個「瞎眼瞎子」變為「現代化的中國人」，這可能就是根據「平民教育」的成就來計算的，如果有二千萬元，則可訓練三百多萬「現代中國人」，豈不富強增強了美國在中國目前的「一線希望」，可使其他方面也不至於空。

「報章上煽動人的文章」他說，「官冕堂皇的立法條文，並不能實施憲政。請問人民連名子都不會寫，肚皮都吃不飽，羸弱待斃，何以談自衛與自治？」

這便接近到現實問題了。可是他卻習慣地避開了主題，而以一倍「作者」來道：

「中國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的求增加農民福利，解除農民痛苦的農村建設方案。這次美國無非協助我們充分發揮自力，我們憑著「自力」，方可達到「更生」，一切都要靠自己已努力與社會各方面的合作」

誰是晏陽初的合作者

誰是晏陽初的合作者？除了美國政府，美國教會及三十五年到中國來考察了一次的中美農業合作團的技術專家外，政府派來助他的前教育部長兼北平校長蔣夢麟，與中央農運實驗所所長沈宗瀚，前者只是一位事務人才，而後者則是一位技術專家，在理論方面只能著墨，只要中了一個人來變戲法，無論變出什麼來，都是可以逃得過的。

在對中央記者談話中，晏氏已經很大方地在讚美過去三十年來的同路人，呼籲他們來合作，他說：

「同一時期，由梁漱溟、梁仲華兩先生主持的有山東鄒平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江蘇無錫由高踐四先生主持的教育學院，隨行知先生所領導的南京曉莊學校和上海復旦大學，以及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金陵大學、華西大學、南開大學等教育機構在農村所設的實驗工作，都有重大的貢獻。」

「數十年來的中國農村建設運動已經以科學化的方法，進行了實驗研究的工作，各省在戰前戰時亦有相當的推廣工作。」

「數十年來從事農運人士之深入民間，研究培養民力的方法與制度，一反一般學人的鑽研中西書籍，實在可以說是一種革命的舉動」

這不啻是一篇甲古戰場的談話，如今死的死，走的走，消沉的消沉了，除了梁漱溟以外，已經沒有晏氏的對手了。那麼梁漱溟氏是否與晏氏合作呢？原則上是不可能的，但橋梁也是沒有，那就是現任晏氏在華西主辦的鄉建育才院院長梁仲華。河南宛西的民團已經支離破碎了，梁氏也就暫離了「鄉建」基地而到「平教」營陣來暫居。他

是唯一可以代替晏陽初作團結工作的中間人。平教會今日在華西實驗區的核心，——鄉村建設育才院也社會教育，農學，水利及社會四系。有五百多畝良田，自設了一個水力灌溉系統，分給了不少佃戶代種，稱之為「實踐農家」。當他們的「實踐農家」任孫則讓出任第三區行政專員後，則又擴大到璧山縣的若干鄉鎮成立自耕農示範區、及土布合作社、與機械合作社。同時又接受了若干物產合作社的方法，為農產生產合作社訂立一創造社田的規則，內定是先由銀行按揭，再轉售於各合作社，而農民要入合作社必先識字，這樣「創造社田」運動，乃成為推行識字運動的一個工具。

「以創造社田為解決土地途徑的平教會看來，不能不說是已經大大進了一步。」

「創造社田在客觀上是無實踐的可能性的，提倡這個辦法者的主觀上亦沒有必須求其實踐的立意，只是一向無識及否認土地問題存在的鄉村建設運動者，竟亦對土地分配提出改良辦法，足證現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已是佔取了如何重要的地位。」

這一點地方性的僅有的進步，晏陽初肯不肯承認？他的已定方案有沒有修改的可能？如何開展這二千多萬美元的事業，人民當以雪亮的眼睛看着他。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先生遺著

這是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前最後的一本書，包括作者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百讀不厭，蓬真如畫，書生的酸氣，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開闢詩，美國的朗誦詩，常常在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作者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開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職論透澈，見解深遠，文章樸素，風格沖淡。朱先生困於貧病，上月去世，本期吳哈先生有專文悼念，愛好朱先生作品的，尤宜購讀，並留紀念。觀察社出版 每冊金圓六角

一丘之貉

匈牙利·B·易漢士作

（一）

深秋的一天夜裏，在麥藉加松鄉鎮上的一座遠近聞名的設有十二張病床的醫院遭了火災。兩個住院的病人打窗口跳了出來。其中一位甚至還救出了一隻老灰貓。可是金麥法爾大夫二十年來所羅致的設備却焚毀得一乾兩淨。除了四堵燒焦的土牆之外，原來的建築已無一倖存。

當麥藉加松鄉的加特力教士已經確信他想引用上帝的書行來勸慰他的教徒們的努力一點都不中用的時候，他決定在別方面尋求藉慰。

「安安心心的吧，我的孩子們，國家不致不關心我們的。」

國家呢？——匈牙利帝國政府倒實在是很關心麥藉加松哩。火災後的幾天，一位憲兵官長率領了四個弟兄來到鎮上。憲兵官長——微現老態，紅光滿面，髮有二色——駐留在教士家裏。在那兒吃了一餐豐富的油火，然後才開始工作。他們拷問着鄉民，搞了兩天兩夜。憲兵官長很長於使用威脅利誘的法寶，而弟兄們却乾脆用槍托來對付。可是儘管是利誘，儘管是威脅，甚至棍棒的重擊，結果全不中用。原來無論誰都不知道起火的原因何在。拷問的結果是六個鄉民的受傷——在審問的過程中，弟兄們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

「要是醫院沒有燒掉，此刻正好讓這些不能說出火災的原因的人們享用了。」大權在握的鄉長克利克說。

「醫院必需重建起來。」教士回答。

由於加特力教士的建議，大家決定請求政府補助。教士所寫的理直氣壯的請願書，三百八十二個鄉民簽了名，於十月初寄出。第二年二月底得到回示。政府的批示是：着該鄉自行籌款重建燒於火災之醫院。

四月尾，鎮上流行着猩紅熱的傳染病。這時在麥藉加松不但沒有醫院，甚至連醫生也沒有。一個跟麥藉加松的居民離過四十年病的金麥法爾老人家，在他疼愛的孩子——醫院夭折後，也抑鬱而死。當傳染病帶走了十個孩子的時候，克利克鄉長拍了一封電報給政府，請求撥款重建醫院。直到六月中才接到回示。政府寄給麥藉加松鄉民兩本通俗科學書。一本是關於兒科病症的，而另一本却是談的怎樣對受傷者作初步救助。

「等等吧，癩皮狗們！」克利克鄉長叫罵着。「等我來告訴你們怎樣作初步救助，你們就用這種初步救助去治療孩子們的病吧。」

（二）

克利克鄉長——中等身材，五十歲，肥胖肥胖，發滑地眯着眼睛——在年青的時候是個有名的好事者，有時不惜動武，可是現在却要算鎮上最賢明的人物了。雖然他一共只有五畝土地，麥藉加松人還是選他擔任第三屆鄉長，因為——照他們的說法——克利克的智慧值得十畝地，如果這十畝土地加上他實際上所有的五畝，那麼克利克就可以算作一個富人了，所以他是十足夠格當鄉長的。他曾因插門在別列薩坐過四次牢，在孟加恰完過牢，現在每個星期他都要坐了自備馬車到別列薩去趕集，賣掉一些青菜，成對的可愛的小雞和一些雞蛋。因此他對城市的好完全不是憑他個人的印象。城裏人他不大喜歡，但却敬畏他們，特別是敬畏那些在衙門裏任有一官半職的人。他知道這些人都是一些大壞蛋，誰要是和他們打交道，就得提防上當。

「衙門裏的人——就是這樣一些色鬼。他教訓着麥藉加松人。——如果你向他們要一瓢水，他們給你的却是一條小鞭。」

「當然是價昂物醜哪。如果你要香烟，他們却給你冷水。」

鄉民們應該請求什麼呢，假使他們需要得到的是醫院的話！這個，克利克可不知道。可是他明白：在那兒，從什麼人那裏可以得知這個。散集後，他去找到別列薩的律師捷列士。

認真說，捷列士已經不是律師了。摸約十年前的光景，他坐完了半年半的監牢，就是他入獄的那個原因，使他失掉了執行律師事務的權利。可是當他從監牢裏出來，來找他的顧客多了起來。很顯然，即使是在同業們不願與他為伍，然而人們還是把他算做一個能幹的能手。

真的，這位過去當過律師的捷列士只帶付給五塊銀洋，他就對任何案件作出建議來。鄉民們認之若鶩。

「老實說吧，你們為什麼一定要一間醫院呢？」捷列士聽了克利克的訴狀之後問道。一規矩短的人可以死在自己家裏呀。」

「信不信由你，」克利克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所愁心的却完全不是：沒有醫院我們也可以長生不老。律師先生，您聽聽吧，我們對您該是懷着多大的信仰啊，我告訴您，醫院裏失之後，麥藉加松也就完了。在基薩一帶，各個鄉鎮裏，只有我們這一鄉有過這一個唯一的瘋大夫，他他就產經於鴻毛，三十年來，他食不甘味地奔走找藥，才為本鄉建造了一座醫院。您在任何別的鄉下決找不到一個有着自己的醫院的吧。因此，假使有個外鄉人——從京城或者從什麼外國來的——來到我們這個區域，人們總

要引他到麥藉加松鄉來觀光觀光，以便證明匈牙利的農村該是生活得多麼美好。『它竟有自己的醫院呀』。這是麥藉加松人的最大光榮，而光榮本身也就是一種東西呀。而且，除了光榮之外，外國人的來訪還可以得到一些錢。準先生們在鎮上吃呀喝呀，買點土布和柳籃做紀念品呀；而這些什物，我們可以賣得比在別列薩市場上賣個五六倍。而且那些照照慣慣的城裏人一定也很喜歡麥藉加松的娘兒們的。相信我的話吧：在荒年的時候，只要我們的醫院便可以養活我們了。」

「哦，哦，我明白吧。你的意思是說醫院必需重建起來。好吧，那就重建它吧。你的意思是說醫院必需重建起來。好吧，那就重建它吧。」

捷列士在他那間以石膏塗白的木影的正義女神為唯一的裝飾品的房間裏來回地踱着，付思着，幾分鐘後，他說：

「鄉長先生，您知道有一種埃及結膜炎嗎？」

「不知道，先生，別列薩我倒是每週必去的，埃及可還不會到過。」

「這倒不須到埃及去跑一趟，」捷列士微笑了。「結膜炎，好像執達員辦理稅案一樣：不請自來，甚至到地獄裏去找鬼也分毫不誤！」

後來，捷列士詳細地向鄉長克利克解釋：埃及結膜炎——是一種非常易染而又十分危險的眼疾。患了這種病的人就再不能為國王服兵役了。唯其如此，所以，政府就把結膜炎看作最大的敵人。政府訂了法律，依法應當貸款人民，以便抗拒這種眼疾。

「現在明白了麼？假使結膜炎在麥藉加松流傳起來，你們的醫院就可以重建，城裏人也就要到你們鄉下來求醫了。現在您就去找眼科醫生捷列士，——他住在我對門——您可以從他那兒得知，怎樣感染結膜炎以及患者的情形如何。不過，您當然不可告訴他，說是我要您上他那兒去的，那會立刻叫他滾蛋的。」

「您放心罷，先生！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不會把我們的友誼拿來自誇自耀的。」

當眼科醫生捷列士聽到「結膜炎」這個字兒時，他的臉上掠過一層萬分嚴重和感動的表情。不過，他明白了克利克並非想醫治這種埃及結膜炎，而相反地却是希望他幫實自己鄉鎮上已有這種疾病之後，他立刻就請自己的患者離開診所，以致她未發覺克利克又到捷列士家裏去了。

過了一會兒，捷列士律師同克利克一塊兒去見捷列士醫生，用了意所，提出來求醫了，在鄉長再度付出了五塊銀元之後，醫生這才開導他，說是對付政府裏那些坐辦公廳的無能的傢伙，並不需要什麼真的結膜炎，就可以醫到醫治這種眼疾的款子。夏天——打發期前後，總有幾個人的眼睛患炎症的。如果在這些發炎的眼睛撒一點兒香煙末子

它們便撐不開了。一個從未見過結膜炎或者一個愛食鹽一點小包便的醫生。他一定會把這種發紅的眼睛診斷成埃及結膜炎，蓋寫必需的證明書，而有了證明書，那就不管願不願意，政府都不得不拿出錢來了。

八月初，克列克向京城拍出了一封急電：
「麥藉加松埃及結膜炎流行乞火急救濟」。

(三)

京裏派來一個主治醫師宋巴痕，他身穿黑禮服，頭戴博士帽，架上一付金邊眼鏡。這位先生又高又瘦，枯瘦得彷彿從未吃過一頓飽飯，蒼白得宛如一雙手沒見過太陽。他一來到麥藉加松就在加特力教士府上吃了三個鐘頭的早餐。克列克鄉長與高采烈地親自為這頓早餐送來葡萄酒。但他也有很不滿的地方：這位主治醫生雖然喝了葡萄酒，又是李子酒，可是在這頓長時間的早餐之後，却還是一直沒有移動他那雙細瘦的腳的打算。

「好吧，現在讓我們來瞧一瞧那些患結膜炎的病人吧！」
「他們已經來了，先生，都在我院子裏候診哩。」
三個戴黑眼鏡的赤脚農民，早就遵照鄉長的命令，立在院中一棵桑樹下恭候着宋巴痕大夫。

「不必着急吧，善良的人們，」宋巴痕說：「靠着現代醫學成就的幫助，埃及結膜炎早已不是不治之疾了。如果你們肯照我的指示治療，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包管諸位可以完全復原。取下眼鏡來！」
三個赤脚農民道謝了。

最初，宋巴痕只是小心翼翼地，隔了好幾步遠地診察着病人的發炎的紅眼，一邊還表現出一付憂鬱的面色。可是後來漸漸地逐漸地走近患者的面前，臉色也開始慢慢地爽期愉快起來了。最後他走近一位患者——馬東里老頭兒仔細地撥開他左眼的下眼皮。

「你病了很久麼？」宋巴痕問。
「從一星期起，先生。」馬東里回答。
「很疼麼？」宋巴痕問。
「病得血都流出來了哩，大人！流了一大灘血啊。」
「真可憐！那麼你呢？」宋巴痕問。
「兩個星期來，我沒有吃一塊麵包，也沒有喝一滴水。」

「好了！你們且戴上眼鏡回家去吧。」
鄉長和布達佩斯來的醫生在桑樹下沉默地站了一會兒。克列克望着醫生的面孔，而醫生却正在觀察那些在樹下散着步，嚼着桑樹的羊羣。

「您瞧吧，先生，」鄉長說：「這是上帝在懲罰我們啊。如果國家不救助的話，恐怕有沒一個麥藉加松的青年可以服兵役了。」
克列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請平靜一些吧，鄉長先生，沒有什麼可怕的，有我在這兒。為我準備住宅吧。我願意住在加特力教士那兒，伙食也開在他那邊吧。還要預備一輛四輪馬車。我留在鄉，一定可以治好那些病人。」

「為了您的工作，上帝一定會賞賞您！主治醫師先生，您看最高政府什麼時候可以發給我們一筆足以與結膜炎鬥爭的經費呢？」
宋巴痕微笑了。

「我的旅費政府已經發給我了。」他說。「至於在此間停留時期的開支，應該由貴鄉負擔。藥品算我的，沒有什麼。至於別的開支，鄉長先生，那是不會一點兒都沒有的。」

(四)

在三個星期中，宋巴痕每天早上沐浴，浴罷，接着是釣魚，黃昏時駕車四處兜風。有幾次甚至坐了這種鄉下馬車跑到別列疏去過哩。
他住在教士府上，吃喝飽暖。和教士打紙牌玩到半夜三更。由於炎熱的陽光的照射他的面孔變得微呈黧黑了，雖然他有本領一口氣獨食半隻燒鷄，可是他卻總是胖不起來。

他每天為三個病人購藥。
他給病人一些冷開水，讓他們去洗眼睛，叫他們在觸摸眼睛之前洗洗手。
克列克發覺病人們十分正確地執行着大夫的吩咐，他很放心，自道位京裏派下來的醫師要對麥藉加松鄉。過了三個星期，當病人們的眼睛都像鷹一般地明亮起來的時候，宋巴痕就返回京城去了。

「再見，鄉長先生。」他告別了，「要是來夏黃鄉的結膜炎重又傳染起來的話，本人很樂意再度上貴鄉來幫一個時期的忙。」
克列克有幾個禮拜從早到晚都在兜着：「這布達佩斯不要臉的流氓，他卑鄙地欺騙了麥藉加松人哪。麥東里，在夢中他都在咕咕嚕嚕地哭呢。」

可是到了深秋的時候，他卻向鄉自治機關建議：把原先一條叫做「牛道」的道路改為「主治醫師宋巴痕路」了。事情是這樣：回到布達佩斯之後，宋巴痕安心想從麥藉加松的結膜炎上弄到一點油水。他一連串地寫了一些論文，述及「基沙道一結膜炎之巢」對於整個匈牙利之莫大的危害。當他寫這些文章時，只不過想搞到幾筆稿費罷了。那知道得到另外一些收穫。政府「為了他對於根絕結膜炎所作的貢獻」而獎以法蘭克獎章。

而為了叫麥藉加松能抵禦那業已發現的結膜炎的猛烈波濤起見，匈牙利政府撥發了一千二百萬元，以資重建被焚的醫院。

(三七、七、斯蕭譯於阿厘)

孝履以 超 蔣良 適 琴 主編

小說月刊

第三期 (九月一日出版)

郭沫若：神泉回憶錄
茅盾：理想主義者的失敗(短篇)
紺弩：在新加坡上岸(短篇)
以羣：路(短篇)

都茹：龍頭山下(中篇)
夏衍譯：農民老李(短篇)

周而復：白求恩大夫(長篇)

巴人：「詩意」的破壞作用(小說散步)
適夷：虛偽的對象(小說散步)

無咎：讀「引力」(小說批評)

每期發售港幣二元。預定全年十二期，暫收港幣十五元，半年六元。

(國外定戶，另加郵費，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優待〕預定三期收國幣五百五十萬元，六期收一千萬元內，九月十五日截止，逾期改訂新價。所有款項請逕寄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前進書局。

前進書局總經理

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

觀察社為恢復發行

「觀察華北航空版」啓事

一、「觀察」自五卷一期起，繼續發行「華北航空版」，由潘俠風君承辦。
二、關於「觀察華北航空版」一切對外賬目往還，俱由潘俠風君負責，與「觀察社」無涉。
三、潘俠風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不得以「觀察社」名義作任何活動。

觀察

·分五角一份每·

日四月九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總·

期二第



卷五第

論政府大捕學生 從幾個世運選手拒絕回 國說起

特稿連載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美國通信

紅帽子在美國

外論選譯

文明在生死之間

哀思

最完整的人格

紀錄

燕京被搜在場談話

陸志韋

北平大拘捕(北平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南京大拘捕(南京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關中搶糧戰(西安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鄧錫候遲不赴任的原因

(成都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何其芳的轉變

文藝

沈宗澂

趙超構

潘光旦

張東蓀

段連城

Arnold Toynbee

李廣田

發行所：觀覽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九一二號
電話：(02)262432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平寄：每月一元八角，三個月四元九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掛號：每月一元九角，三個月五元，半年九元，全年十七元。
 航空：每月二元二角，三個月六元六角，全年十二元。
 郵費：國內每月一元，國外每月一元五角。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每行每日五角，長期刊登另議。

定戶注意：
 如欲訂閱，請向本報或各埠代售處接洽。
 本報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九一二號。



警察與法律

編者先生：最近有兩件事情牽涉到法治問題，事情雖小，涵義甚大。

第一件是南京人報載某總司令的公子駕車擦破警察崗亭。警察向前警告他說：「如此開車是危險的，壓死人怎麼辦？」

總司令公子回答：「就壓死你也不算回事。」結果警察不知其為誰人，將總司令、夫人、公子、汽車，一併帶局，但結果反到受了警察的處分。而且廳長黃珍吾親自道歉，總司令方纔離開回家。消息發表後，警察廳備該主管區所長查明何以洩漏的原因，該所長坐在人報館非要知道來源不可。黃珍吾且在警校紀念週希望警員執行職務要對對方身份，這件事如果真是如報上所謂那樣一般無二，實在是有辱警察使命，違反法治的精神，助長惡勢力的威風。

第一，駕車不慎，就該處分，擦破崗亭就該賠償，無執照駕車，不免有草菅人命之嫌。總司令的公子與平民應同受法律的管制，不能因身份而扭曲法律的秩序。代表國家執行法紀，維持社會公共的警察是該公子竟然認為壓死崗亭亦無所謂，如此藐視執行國家秩序的代表，實屬目無法紀。總司令既然在場，理應管束他的兒子，遵守法律。另一方面說，警員如果出言不遜，自應受出言不遜的責罰，但絕不能因警員的應對不當，而抹殺其公子駕車不穩的錯誤。黃廳長出面道歉，也許是警員曾語留犯總司令而道歉，但對他主管職責所在，亦應堅決處理，何以竟毫無下文？而且還要嚴守秘密，如此下去，一個國家的警察制度，如何能夠健全？照這樣做法，人民之間分了高下，特殊階級可以違警而無所謂，人民如何能夠心悅誠服？所以事情雖小，影響實大。我們的監察機構，對於這種事件，正應查他一個水落石出。如果是報端錯誤，亦應讓人民知道，以免誤會。如果這報導正確，更應追究各人應負的責任，分別依法治理。

第二件是報載漢口的風化事件。報上說當警察行抵該縣時，外籍人士執槍拒絕現場拍照，警察人數過少，即未拍照。如果真是這樣，又是一件有辱警察使命，有辱國體的大事。又據何能因入獄不敵，警員就該勒令繳械才對，拒絕拍照，根本不予的責任，應存國家至上，責任至上的決心。而這種持槍威脅警士的人，無論古今中外，均是格殺勿論的。漢口警察竟敢輕放過，其中一部份原因據說是若干太太跪求的結果。這種罪犯乃屬刑事範圍，警察應是無權放過，且必須予以逮捕的。而且推事可以提起公訴，目前中國已無治外法權存在，外國公民在中國應受我國法律制裁。革了幾十年的命，好容易取消了不平等條約，而輕輕地就被警察送還了，未免有些荒謬。這事的影響也很大，牽涉到警政與治外的權益問題，損了國家的體面與主權，如何能輕輕放過？一般人似都注視着外僑的感觸，忽略了自已執法的懦弱，而不加予責備，也許是怕萬一引起外交問題，又要受上輩的處分；也許是國際知識不夠，看見洋大人先短了牛軋。總而言之警察當局到場的處置是有損警察職責的。

丁三 八月廿二日 南京

秋風！

編者先生：在這秋風送爽的日子裏，北平，遺坐「文化」古城，又發生了空前未有的逮捕「匪諜學生」的事件，一次兩次的黑名單，接二連三的包圍、傳訊、扣押和逼供，把一座像靜水似的古城，攪得波瀾

萬丈，人人自危，政府好像是要和整個的青年們為敵似的，不惜任何手段加以迫害，大有非斬盡殺絕不休之勢。而外面所得到的消息，又都是流一色官方報導，要想從重重包圍裏透出一點真實的消息，是很困難的。下面是一封從滬編的信，由清華寄到北平城內的。這個寫信者是一個機械系的學生，平日很少參加各種活動，對於政治問題也很少興趣，所以他的話我覺得是能代表這些沒有色彩，沒有背景的同學們的情緒的。

為了使社會人士對這次事件有一個正確的看法，我想只有把這封信寄給擁有廣大讀者且敢言的一觀察。現在抄錄如下，希望先生把他披露出來：

G M 八月二十四日 北平

G M……沒有告別，沒有達到常去你家度週末的計劃，我就回清華園來了。到校時間外軍警很多，再三檢查、檢查，才放我進學校。進得團來，好像一切都變了，每個同學都緊張得要死。黑名單是一次一次的公佈，聽說還有「不公佈」的名單，隨時可抓，生命安全都失了保障所以同學們人人自危。再加上門禁森嚴、買菜、吃飯，都成了問題。教授家就有好幾天沒能買菜的，清華園成了恐怖世界。

校牆外軍警重重，圍得水洩不通，隨時都可以衝進來逮捕搜查。校門、校牆，一點尊嚴也沒有了！聽宋宋說，日本人進清華園時也沒有這麼偉大的場面！錢先生夫婦深夜伴著我們的糾察隊在西院道上巡邏、精神真值得佩服。院牆外就是軍警，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監視着。這樣壓迫，本來大部份同學這兩個月以來都厭倦活

下不堪，聊聊天，再不就是游水打球。當局却以為是好時機到了，跑來大捕一匪諜，重新把全部學生激動了起來。現在連平日最中立，對外事不聞不問的同學，也都不得不為維護同學和自己的安全而行動

起來了！許多平日只問資本，想在將來建設的時候做一個小螺絲釘的，也都動了起來；當然，是現實或酷教訓了他們，在工廠基地還在打仗的時候，螺絲釘是沒用的。

至於那些名單上的人物，有的是華了業離校他去了的，有的是已經走了的，一般「左傾」份子，早就跑了，剩下來多半是一些理事會的事務們，平日搞搞福利，是幾個「知名之士」，就讓特務們抄上名單報了賬。其實他們頂多有一點不滿的情緒，若只憑「情緒」定罪，什麼「憲法」真該倒過來寫！現在他們上了名單，無立足地了，不得不拋棄一切，走上梁山。一逼上梁山——這句話，現在意義最深刻！寫到這裏，外面同學嚷着叫集合，說軍警衝進來了，要逮捕，同學們很慌亂！天哪！對無辜青年們這樣迫害，還成什麼國家！不罵了……

樊弘先生更正

編者先生：手教敬悉，至以為謝。弟異常難過，因為今天發現政府的發鈔總額，在拙文中，有一可笑之錯誤，請依王五部長之談話，予以改正。弟云發鈔總額為兩千（誤寫成百）萬億，只用六億點七金元券，即可收回。但據王五部長稱，「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僅需二億金元券，即可全部收回。」（中央社南京二十日電）王氏為部長，當然以他的話為最可靠。事關重要，千乞代為更正，毋任感荷。

弟樊弘啓 八月二十七日

歡迎讀者直接定閱

編者先生：在道秋風送爽的日子裏，北平，遺坐「文化」古城，又發生了空前未有的逮捕「匪諜學生」的事件，一次兩次的黑名單，接二連三的包圍、傳訊、扣押和逼供，把一座像靜水似的古城，攪得波瀾

萬丈，人人自危，政府好像是要和整個的青年們為敵似的，不惜任何手段加以迫害，大有非斬盡殺絕不休之勢。而外面所得到的消息，又都是流一色官方報導，要想從重重包圍裏透出一點真實的消息，是很困難的。下面是一封從滬編的信，由清華寄到北平城內的。這個寫信者是一個機械系的學生，平日很少參加各種活動，對於政治問題也很少興趣，所以他的話我覺得是能代表這些沒有色彩，沒有背景的同學們的情緒的。

為了使社會人士對這次事件有一個正確的看法，我想只有把這封信寄給擁有廣大讀者且敢言的一觀察。現在抄錄如下，希望先生把他披露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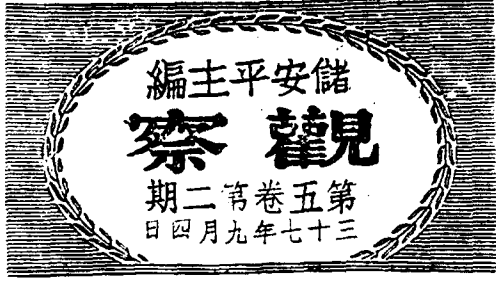
G M 八月二十四日 北平

G M……沒有告別，沒有達到常去你家度週末的計劃，我就回清華園來了。到校時間外軍警很多，再三檢查、檢查，才放我進學校。進得團來，好像一切都變了，每個同學都緊張得要死。黑名單是一次一次的公佈，聽說還有「不公佈」的名單，隨時可抓，生命安全都失了保障所以同學們人人自危。再加上門禁森嚴、買菜、吃飯，都成了問題。教授家就有好幾天沒能買菜的，清華園成了恐怖世界。

校牆外軍警重重，圍得水洩不通，隨時都可以衝進來逮捕搜查。校門、校牆，一點尊嚴也沒有了！聽宋宋說，日本人進清華園時也沒有這麼偉大的場面！錢先生夫婦深夜伴著我們的糾察隊在西院道上巡邏、精神真值得佩服。院牆外就是軍警，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監視着。這樣壓迫，本來大部份同學這兩個月以來都厭倦活

本刊傳統

一、本報無不刊發各種新說
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
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
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
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
的文字，其體裁論見，並不表
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
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趙超構：上海新民報主筆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段連城：
李廣田：清華大學教授
沈宗瀚：清華大學學生

論政府大捕學生

趙超構

「八一九」是個緊張的日子，在那天，幣制改革了，金圓券代替了法幣；同一天，各大都市開始拘傳「匪諜嫌疑」的學生。從南京、北平開始，跟着重慶、漢口、杭州、上海各地的特種刑庭也紛紛傳訊學生。到現在為止，南京北平兩地所要傳訊的名單業已發表，南京是一百七十九人，北平是二百五十人；其他各地，只知道上海已傳訊了六十三人，重慶傳訊了三十六人，杭州傳訊了三人，究竟還要傳訊多少人，未見官方正式發表。

這一次「拘」「傳」學生，選定了金圓券出世的日子開始行動，我以為不是無意的偶合。利用全國人聚精會神於緊張的經濟生活的劇變關頭，拘傳學生，因此得以掩蓋了這個行動的刺激性，在人心的比重上，在新聞的編排上，金圓券的發行和金圓券發行以後的發展已使這些學生的命運受不到人們應有的注意。同時政府當局也會正式表示，「改革幣制」與「肅清匪諜」是截亂時期安定後方的兩大「必需措置」，既然兩者是有相關的，而幣制改革在目前顯然是順應人心的，因此，也可將逮捕學生的刺激性轉嫁一部份給金圓券頭上去。正如抬價的「奸商」是一般市民所痛恨的，一方面捉抬價商人，一方面捉學生，使人覺得政府決不會是於彼而非於此，一定捉得有些道理的了。

不僅這個日子選得巧妙，在手續上，這次行動也較為完備。學生所受的，是特種刑庭正式簽發的傳票和拘票，這使得有些為人師者也力勸學生不可不自動投案。為了上述的兩點，一般人以至文化界對於這一批被捕學生，似乎沒有像過去那樣關心，做師長的對這次事件，心裏當然難過，但也覺得無可奈何。除了希望法庭的迅速偵審，公平處理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意見了。但是，我不認為這就是定案，為國家着想，為青年着想，不能說就沒有其他的看法。

我覺得，在交戰中，潛伏間諜是必然的，間諜利用機會掀風作浪，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贊成當局者將間諜看如此偉大，以為他們真有單獨操縱青年鼓動學潮的力量。在此次拘傳學生的前幾天，中央社公佈了一個文件，認定每一次的學潮都是「匪諜」領導。這使人馬上發生一個感覺：為什麼這些潛伏的匪諜，在如此不方便的情形中，能發生這樣大的領導作用？一個學校，校內有師長的管教，校外有治安機關的協助，為甚麼還領導不起青年來？事實的情形應當是如此的：過去政府施政的失敗是事實，社會上許多不公平是事實，大多數人民的窮苦不安是事實，青年學生為了現實的刺激，不能安心求學，以至於不滿現狀，要求改革，有所批評，有所表示，也都是事實。

理性一點看，學生們的言論行動可以解釋為對政府對政治的表示，自然可以說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可是，政治性的表示正就等於政黨的行動。與青年學生抱同情，甚至同情青年學生的，也不完全是共產份子。例如反扶日運動，共產份子可能順水推舟，參加在表面，但是青年學生舉行這個運動自有其純潔的一方面，未見得完全是「異黨」操縱起來的；同時，與青年學生抱同樣態度的，同情反扶日運動的，有他們的師長先賢，有工商文化界無黨派的人士，也有從前的參政員和現任的立法委員等等，這是一種頗為普遍的心理反應，能說青年們是完全受了「異黨」的利用麼？

要清算歷史的學潮，必須將學生本身的政治行動和政黨行動區別清楚。就任何觀點看，學生批評政治是好現象，國民黨訓政二十年，其目的就在訓練人民能够參加政治，監督政府，學生有知識，有熱情，如果還不能有政治覺悟，還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興趣麼？假如多數公民都能像現在的青年學生關心政治，勇於批評，豈不是訓政的大成功？豈不是國民黨對國家的大貢獻？

這樣說，並不是空話，歷史可以作證：民國以來的學生運動，在發生的時候固然都給當時的政府以煩擾，事後看來總是功多於過。五四運動是一例，抗戰前夕的學運又是一例。這兩年的學生運動，目前看來不順眼，但安知將來國民黨的革

新和未來政府的進步，不是這些學生叫喊出來的呢？中國的人民是沒有聲音的，除了青年學生，還有什麼人最能代表多數人民的利害？

因此，我們誠懇的希望，在處理過去以及以後的學生運動時，對於學生的政治表示有較寬大的看法，對於「匪諜」的活動有較嚴格的解釋，我們雖然不能很具體的說出先兩者的絕對界線，但是執政者能出於愛護學生的觀點，而不是出於暴燥的心理狀態，將每一次客觀的事實，在法律上作嚴格的解釋，將批評政府與武力顛覆政府的行動作精確的分別，我相信這一次被捕的學生中，必有很多不必要的。固然，偵訊之後，還得偵查，審判之前，誰也不知道那一個是罪有應得那一個是冤枉的，可是我們既無寬恕賠償制度，這些被傳訊的在時間和自由兩方面的損失已是無可補償的了。

站在文化界的觀點，這種大規模的拘捕學生，對於每一個無黨派的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都發生威脅的作用。往常發生這種事情，照例各校教授、雜誌、報紙以及文化界人士總有一些反應，而這一次事情發生已經旬日，除北大師院兩校教授多人宣言抗議以外，尚未見有人起而批評。批評得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一件事物到了無人批評的程度，即可以反映壓力的份量。順着壓力的聲音必然強大，抵抗壓力的聲音必然微弱，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相信全國文化界人士對此都無感想，對於一個有決死的勇氣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言論是絕對自由的，但我們是普通人，普通人為恐怖心所驅，不能不卑怯，不能不吞吞吐吐，因此我覺得從此以後，言論自由真成了理想了，文化界即不成為政治的奴隸，恐怕也將是政治的順民了。

這是很可怕的现象，這現象表示文化澈底被征服了，再也難得有獨立的批評與見解了。政府當局將聽不到反對自己的聲音。第一次歐戰時，工黨領袖麥

從幾個世運選手拒絕返國說起

潘光旦

八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載有十五日的倫敦廣播消息一則，說：參加世界運動會的「鐵幕」國家的游泳選手五人，拒絕返歸本國。他們業已獲得英國內政部的允許，可以在英國覓一技之棲。(五人的姓名年歲從略)，消息又說：五人現正居住倫敦的秘書寓所。預料當有其它國籍選手要求在英國居住，包括南斯拉夫、波蘭選手在內。又說：匈牙利選手庫維克曾說，如果他返回匈牙利，前途將無自由運動可言。匈牙利的三個選手都還沒有結婚，他們也沒有把「亡命」到英國的計劃告知在布達佩斯的家屬。這些消息的來源是十五日的星期電訊報，據廣播說，到廣播的時刻為止，英國內政部拒絕證實或否認電訊報的這一消息。

我假定這報導是確實的，因而才有下文的許多話。少數的幾個人從甲地方

克唐納為「反戰演說，蘇萊斤為國賊，然而英國官吏並不以為他反對國策即是敵探，也沒有因此限制他的活動。這是英國的民主。我們正在做效英美的民主憲政，但是麥克唐納的勇氣與英國政府的寬容精神並不存在。只要「為匪張目」四個字，便可以封住全國人民的嘴巴。我們知道，民主之可貴，法治之可愛，乃在於能讓一般普通的人都敢於隨便發表他的議論，而不必有待乎特別有勇氣的人出來說話。獨立自由的知識份子，在目前已微弱得可憐，而這一次逮捕學生的行動，無疑的又加灑了一片恐怖的黑影。這對於民主憲政的前途，是佳兆還是惡兆？我想執政者自己也是能明白的！

為了減輕這次被捕學生的損害，迅速的偵審是必要的；延長羈押不僅使學生多受不必要的痛苦，也將影響法庭的威信。為了消除此事所引起的恐怖空氣，審判應當力求公開。

審判公開是為了保證公平裁判而樹立的司法原則。其意義是承認人民對司法權的行使有監視之權，同時亦是維持法院本身威信的最好方法。

英美式的民主觀念，是否認階級對立的事實的，因此，國家和法院，是以公正的第三者自任，對各階層的人民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自居的。即使被審判者是信仰階級鬥爭的「匪諜」，他們的供詞或許會詆毀現在的政府，或許有煽動的言詞，但是，法院正好讓他們的政治意見宣達出來，讓檢察官與辯護人的陳述辨論公開出來，訴諸民衆的批判。

公開審判，一般人可以知道審判是無私的，並沒有偏袒政府；公開審判，可以用事實來證明法院是獨立的第三者，不受外力的干涉與影響。公開審判，可以讓一班人了解全部案件的事實，而免於揣測懷疑。為了法庭的威信，對此次被捕學生的公開審判是絕對必要的。

轉移到乙地方，或暫時居住，或比較永久的占籍，初看是一件很尋常的事，並不值得加以討論。但如稍作仔細的推尋，我們便不難發見這種人事上的異動並不簡單。不要說五個人的異動，就是一個人的，都有它的來路去跡，而來蹤的所由構成，背景裏總有一大堆的人與物的因素，而去跡所至，前途也不免引起又一大堆的對人與對物的影響。這就顯然的很不單純了。

所謂仔細推尋，所謂人與物的因素，和對人對物的影響，其實等於說我們想對於下面的幾個題目，多涉取幾分認識，或覓取一些解答。一是從事異動的人是怎樣的一種人。二是甲地方有些甚麼情形，引他們非離開不可。三是乙地方又有些甚麼情形，足以吸引他們。四是他們離開以後，甲地方會蒙受些甚麼利害。五是他們居留以後，乙地方會蒙受些甚麼利害。對於異動者本人的利害

我們擱過不提，我們假定，應利避害，最後總是每一個人的事，總得由每一個人自己來辨擇與抉擇，這是常識，初不必是功利主義派的教條。五個世選選手拒絕回國究屬有些甚麼意義，我們就先就這五方面來作一觀察。

第一，這五個人是所謂選手，是體育家。既稱選手，在人的品性，在人的某一方面必有超越尋常之處。這五個選手在世界運動會裏奪過甚麼錦標，贏了多少分數，破過何種紀錄，我沒有加以查攷，但在其本國的體育界裏，以至於全世界的體育界裏，他們是佼佼錚錚之輩，總是不成問題的。不但如此，生物學與心理學又告訴我們兩點，一是他們的所以成爲佼佼錚錚，一半固然由於訓練修養，一半也未始不由於遺傳的素質，而後者尤屬基本，如果不先有它，訓練是徒然的。換言之，體育家自有其成爲體育家的那塊料。二是體力不能離開其它的身心品性而獨立，體力的優越表示其它的身心品性，一部分以至於全部，也多少要比常人高出一籌。這又是屬於原料一方面的話，其它品性的是否也獲得充分的發展，當然要看後天的修養訓練而定，未可概論。總之，這五個人的品質是在中等以上，並且可能超過中等的水平很多；他們決不是添一個不多，減一個不爲少的普通人。

第二，五個選手的本國究屬有些甚麼情形使他們不肯回去，我們不大知道。匈牙利與捷克據說都是『鐵幕』後面的國家。既在幕後，內情自然不容易知道。匈牙利的選手庫維克說，如果回到本國，前途將無自由運動可言。這話也不清楚。甚麼是自由運動？不能自由參加國際或其它比賽麼？只能有團體操練而不能有個別競賽麼？這個人的自我訓練，跑跑跳跳，也都不被容許麼？因爲不甚知道幕後的情形，庫維克的話所引起的這一類問題我們都無從答覆。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鄉土之愛是人之常情，國家之愛更是近代人的一大特點。除非麻木不仁，除非喪心病狂，除非環境中有種種情形，使他萬分無奈，一個人是決不肯輕去其鄉的，更不肯隨意把國籍放棄，而甘心亡命的。研究品性的學者固然說到有的人有流浪的傾向，別人安土重遷，而他們却非流浪不可，但這種人爲數實屬甚少，並且在每一度流浪的行爲發生之初，環境中多少也得有一些推迎與阻的刺激。五個選手沒有強烈的流浪慾，我們不得而知，他們都是游泳專家，與流浪兩字的原義有些接近，是不錯的，但這顯然不能有所證明。他們想在英國覓一枝之棲，目前雖然亡命，日久總望能在一個比較固定的地方安居樂業，成爲這地方所屬的國家的國民，大概是一個更近情的推論。換言之，他們大概不是甘心於流浪而以亡命爲有趣的人。他們有到選手的體格與健康，編以身心品性相互關聯之論，可知麻木不仁與喪心病狂的兩個可能性大概是更不在話下。然則問題的發生顯然不在五個人的本身，而在他們所處的環境，環境中必有種種情形，平時使他們留既不耐，走又不能，而一旦遇有可以遠走高飛的機會，便毫不猶豫的抓住不放，及其既已遠走高飛，也便不再作回返樊籠之想。這番的世選會很清楚的不是這樣的一個機會。記得在世選會開會以前，報紙上說到東歐至少有一個國家不準備送選手出場，還附帶說了些政治主義上

道不同不相爲謀的理由；無論其理由如何，足見這種機會總是極難得的。我說問題在環境，而不在人，當然也只是是一個大體的說法，其實人總還是問題所由發生的一大泉源。這五個人至少犯一個毛病，就是，渴愛自由，不甘束縛，否則，他們還不是和本國其它選手一樣，於散會之後，乖乖的回國了麼？

第三，五個選手所從出的國家的情形，我們雖不大知道，其所進入的國家的情形，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人格的自由充屬是甚麼一回事？有些甚麼了不起的意義？我們在這裏可以不問。但自十三世紀初年以來，主張這個，與維護這個，最有力量，最稱一貫，而也最有成績的，我們不能不推英國。一百二十年以來，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激盪之中，在爲勞苦大眾謀取生活福利的種種努力裏，一面居然避免了暴力與流血的革命，一面，到目前爲止，對於人格的各別而自由的發展，始終能繼續予以保證，也惟有英國做得最爲差強人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工黨政府的孤詣苦心，勵精圖治，尤其是昭昭在人耳目。同時我們也得承認無論人格自由之論有無道理，有多大道理，任何民族人口中間總有一部分渴愛自由的分子；他們願爲此努力，爲此犧牲，有的從自我修養入手，有的就環境改造出力，如果際遇太惡劣，至於無從措手，則不惜去而之它，根本另尋一個人與環境得以調適的新局面，所謂調適的重心所寄當然還是其本人人格的自由發展。五個拒絕返國的世選選手，上文說過，可能就是這種分子。他們的得以到達英國，固然是由於世選的機會，而由於一己的自由抉擇，但既已到達，可能很快的就感覺到地兩宜，流連忘返，何況其父母之邦又可能有些情形教他們不得不裹足的呢？

第四第五兩點無須多說。此種人事異動，此種含有幾分選擇性的移民行動，對於移出的國家或地域總是一個損失，而於移入的國家或地域總有幾分裨益。這是人口品質論者的一個通論。五個游泳選手的拒絕返國，如果長久拒絕，又如果真在英國落籍，長養子孫，終於成爲英國人口中的一些成分，這一筆實際間的得失賬目，是很清楚的，如果加上前途可能增益的繁利息，此賬目前雖小，將來或許發展得很大。

這現象，從十九世紀末年以來，我們有了一個名稱，叫政治選擇。一種政治而能保留人才，培育人才，吸引人才，增加人才的質量，是正面的選擇；反之，如果驅逐人才，殺戮人才，或無形中埋沒或毀滅人才，便是反面的選擇。繁育與毀滅的正反選擇是絕對的，吸引與驅逐的正反選擇則是相對的，因爲甲國家甲地方雖蒙損失，乙國家乙地方却有收穫。在國家以至於鄉土分野依然很清楚的今日，相對的選擇還有它的重大的意義。它同時代表着三樣東西：一、它是政治良窳的一個果實；二、它是民心向背的一個表證；三、它也未始不是政治所由更趨改進或更趨腐敗的一個根本因素。這現象表面上是政治的、社會的、底子裏却是民族的、生物的。政治選擇的名稱雖有了四五十年，人口異動的所以爲此種選擇的一個部門，雖也有人不時提到，但據我所知，仔細的探討

還沒有人做過，大概就因為這樣一個題目所牽涉到的方面比較多，從事的人必須瞭解政治，熟悉史地，更須有充分的生物學的素養，善於運用選擇論的眼光，才能下手。近二三十年來，國人喜歡講民族主義；政治選擇應該該是民族主義中的一個核心部分，却似乎根本沒有被提到，不能不說是一大掛漏。

任何團體生活總有兩筆賬，一筆人賬，一筆物賬。例如辦學校，註冊費的是人賬，會計、出納、事務管的是物賬。政治也復如此。兩筆賬的目的也可以相比，把兩都求一個收支平衡，而去年來，更希望收入要比支出略為大些。物賬管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但其重要性是誰都知道的。人賬則不然。戶口或人口應該有一筆賬，固然大家也知道；但人口數量與品質兩方面，品質的養成又有教育與遺傳兩重因素，則論者往往僅見其一而未見其二。唯其如此，人口的移徙，如果牽涉到的數量不大，就極容易被忽略過去。即如這次的五個游泳選手，如果問題發生在平時，而不恰好在此世運方針結束之後，不要說五個，就是五十個，怕也不會有人注意及之。

其實不必等期人口論者或選擇論者出來作精密的研究，歷史上攤着的這一筆收支賬自己已經足夠清楚。即以英國，因為歷來政治情形比較良好，大體上說，它所招徠進去的人要比放逐出去的人為多，不過不能太多，因為三島的面積畢竟有限。但是它也吃過虧。十七世紀初年以後，當英國國教和政治發生密切聯繫那一個時代裏，威約所至，曾經逼走過不少的自由分子，而受其實惠，從而立與標新，別開基業，又轉而與祖國為難，轉而向祖國宣告革命獨立的，就是今日的美國。其它國家中此種人口分子去就的例子更無不一而足，尤其是其在交通比較利便的近代，亞力士及第三時代的帝俄，希特勒全盛時期的德國，殺戮以外，都逼走過不少的人，後者還包括愛恩斯坦一流的碩彥在內，而當時受惠的大部分是美國，小部分是英法等國。中國人雖若比較安土重遷，自由的說法以前也沒有人喊出，但一種自在發展的企求，一種安居樂業，多少想支配環境而不太受環境支配的願望，也始終有它的力量，致一部分人口，轉輾移徙，去此就彼，甚至於轉移到中國政治風力所不能到達的海外。詩經詠頌，孟子子美太王，想來當時都有相當的事實依據，決不是一派情傷現實或憤憤往古的空言。降至後代，數量最大而流漂至今未替的一個實例便是五季之世，吳越一頁的保境安民政策所引起的一番向心的口口移動。太湖、錢塘江、新安江、流域的所以成爲一個人才與文物的中心，其基礎的大部分便是在這時候奠定的。它如南唐、吳、蜀，在同時期內，也曾從別處吸引得一些優秀的人口過去，但只靠一兩個比較開明的政治領袖，而沒有一個長期的保安政策，其招徠成效究屬不大，並且也不易維持。

普通的人口移徙，我們這裏不談。它所引起的往往只是一些因數量上的變動而發生的經濟問題：例如勞力缺乏或勞力過剩以及分配的重新調整等，這些雖也有它們的重要，不在本文的範圍以內。上文一再說到品質，說到選擇，說到人才。我們不妨再問一下，何以見得某一種的移民，初不論人數的多寡，是

品質較好的呢，是經過選擇的呢，是不妨僑爲人才的呢？或者換一種問法，在甚麼一些條件之下發生的口口移動所引起的问题才不是數量的，而也是品質的呢？五個選手，既然是選手，問題比較簡單，我們無須多事推測，上文已經說過。但其它的例子未必如此。他們的品質如何，我們只有推論的一法。推論又有兩途。一是事後由他們以至於他們的子孫在新環境裏所作的貢獻來推論，而這是需要相當長的時期的，我們姑且不談。二是就其由事光的條件來推論。這我以爲可以有三個。

一是他們的移徙必須是自動的，是自己抉擇的，即使其間不能完全沒有外力的影響，有如天災人禍，但決不能完全由於強制。捨棄舊環境，參加新環境，不是輕易的事，這其間需要眼光，意志，毅力，吃苦耐勞的精神，隨機應變的能力；這些雖屬蓋人而有，分量往往大有不齊，大抵自動者的分量必比較多，所以易於自然流露，而被動者則比較少，若無外緣的強制，可能便苟安一世，始終不在此行爲上表現出來。

第二個條件和第一個相爲表裏，就是政治環境必須充分承認遷徙與居住的自由。沒有了這個，一個人，無論自動的志力多麼大，最多也只能以逃亡替代遷徙，以窩藏替代居住了。我們從上文的討論裏可以看到，遷徙與居住自由的一大原則關涉之多，意義之大，要在我們平時的瞭解之上，即，在一般的自由與便利之外，更牽連到個性發展上民族優生的問題。除非一個人真有如上文所與便利的特性，流浪慾，以流浪爲生活，爲遷徙而遷徙，否則他的目的總離不了開基拓業，長壽子孫。

第三個條件也是屬於環境的，而一半也牽涉到政治，其它一半則爲文化的。就是，統一之中，我們要維持一些分化，大同之中，我們要培植一些小異。一種逐漸擴大的一統與大同之局，最後大到天下同一家之限度，是誰都企求的。但我們並不希望國家與地域的分別完全取消，文化與制度的格局通體一樣。我們且認爲在不妨和平相處的原則之下，地方色彩應當儘量的保留與培養，惟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提高羣居生活的興趣，保障分工合作的機能，轉而充實一統與大同的意義。而說到我們的題目，遷徙與居住自由的原則也才不至於無的放矢。在一切雷同，凡百一致的局面之內，根本就無用不着遷徙，不見異，即不思遷，連有流浪慾的人怕也不免癡癡下來，還談甚麼自由不自由。

從五個選手拒絕返國的例子看來，這三個條件之中，目下最成問題的是第二個。國際間的移民一向是不很自由的；種族與宗教的阻礙最古老，其次是國族，是很近代的一個，其阻力不在種族與宗教之下，到了當代，我們又添了一個，就是政治意識。所謂「鐵幕」後的國家，「鐵幕」所障礙的，顯然不止是消息的內外傳遞，而是人口的自由出入。這條件一不成問題，其餘的兩個也就發生困難。遷徙既不可能，一個人自動的能力雖大，也就無從施展。五人者的得以離開本國，和「我選取自由」一書的作者克拉克佛貞固的得以選取自由一樣，都仰仗一些特殊的機會，普通情形之下是很不可能的。目下流行的各派政治

意固然全都希望世界大同一統；有的派則目前雖不容許人民自由遷徙，為的是怕意識未臻固定之至，初則見異思遷，終則慮遠慮異，從而阻礙大同一統的來臨，但一旦真正大同統一之後，這自由是必然要恢復的。不過，到那時候，問題是，上文已經說過，我們還會有遷徙的刺激與需要麼？人同既同到了意識，統一既一到了思想，普天之下，不再有喬不與幽谷之分，地方色彩，可能只限於吃辣吃辣一類口味之事，我們還從從做甚？

總之，我們爲了五個世運選手拒絕歸國一事嘔吐了道半天，用意所在，無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中)

張東蓀

§四。我在上文已說過了，中國的統治階級是由一種有遊離性的人們組成的。這些人多少少有流氓的性質。讀者千萬不要以為流氓是只限於無產者。中國的富人亦有流氓性的。所以假定我們不把流氓當作一個惡意的名辭，而取中立的意義，則可說中國有兩種流氓，那一種無產流氓，另一種有產流氓。中國的統治階級雖則內部可以起很大的變化，分爲相反的兩組，而仍不外乎這一類的人。統治階級總是以集團的形式來出現。在朝的是既得政權的集團，而每當其末季却另有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每一個集團內有文有武，有貧有富，即有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正好像戲班一樣，其中各種角色俱全。其中貧的面貌是爲了打自己的出路，但富的人亦只是散去已有的財，另想發更大的財。所以我們必須明白：統治階級的成立固然是由於人類組織上必須有統治關係。換言之，即必須要有政治。好像無政治，人即不能生活。其實這只是一套理論。實際上並不是那麼一回事。這些人們起來把自己造成統治者却大部分在於謀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並不是專爲了被治者而求治。乃反是爲了治者而始有政治。在這裏治者與被治者之分並不是政治性，而反是屬於經濟性。因此統治集團的心目所想的只有兩件事。即如何維持所擁有的政權與求獲得的時候如何去搶。只有在維持其既得政權的打算下，可能多多少少對於被治的人的利益有所顧慮。但決不是爲老百姓着想，乃依然是替自己打算。所以中國歷史上統治關係的建立是以經濟上的封建式剝削爲其基礎。封建式的剝削是由於勞力，而與資本主義下的剝削不同，因爲後者是以資本而取得利潤。在個人主義被解放出來以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不會有的。所有的只是這種以勞力欺人壓人的剝削。統治階級的人們即建立其生活基礎於這樣的剝削之上。他們的奮鬥完全是爲了取得這樣的生活。此處所說雖是關於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情形，然在目前却有一個活榜樣，就是今天國民黨的政權。

我們明白了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則我們便可知統治階級的人物是如何構成的了。誠如最近一個論者所說，他們是退無可守，進必以戰。所以在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總是處心積慮於如何維持其執政

非要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朋友們瞭解兩點。從小處說，他們應知人口的去留直接間接總是他們政績的一個結果，一些表示，他們是有責任的。四郊多壘，猶不免爲卿大夫之辱，何況治下的善良百姓一個一個的溜了呢？二是從大處說，優良人口的流亡與來歸更是民族興衰，文化進退，地方榮替之所繫，今日的堯，可能是兩三代以後的千里；能存心及此，前途積極的成就雖不可必，至少他們可以避免爲鴛鴦，爲淵駭魚。

的地位，因爲如果一旦失去了其地位，則其生活便無着落了。他們爲了政治生命來掙扎，其實力是爲了經濟利益來掙扎。這種掙扎有你死我活的性質，決不能像英美民主國家的兩黨輪替秉政一樣就是爲此。兩黨輪替或合作只是見於憲政軌道敷設以後，而憲政軌道的成立却與個人主義的文化與工業化的社會有密切關係。在個人主義未被解放出來以前，在工業化未有端倪以前，只有個人的升沈與進退，決不會有政治集團的交替。因爲把勞力作爲一元的決定性，將政治與經濟打成一片，這正是封建社會的特徵。資本主義是二元的，在經濟上操縱力是資本，在政治上運用力是權力。縱使二者可以互相影響。然而總則封建社會的一元性有些不同。在一個統治集團內，時間一長，自會有內部人事的新陳代謝，個人的升沈進退當然不成問題。這些不是我所要討論的；我今只強調一點：即在這樣封建社會，人們的幹政治主要的還只是求生活。所以俗語有升官發財的話，乃是實情。須知他們不能只限於解決生活在官職的任期內，尤必預謀將來卸官後的生活基礎。兼以中國傳統的辦法，統治者爲了容易駕御其部下計，不要有固定的官俸制度。所以在封建社會與專制政治，貪污是其內含的必然性。在此只有程度上大小的區別而已。然而終必愈趨愈甚。一個統治集團最後會被人家革了命，亦就是由此而出。

§五。我在上文說，中國歷史上所有革命都未能把生產力的拘束解放開來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封功臣；另一個是殺功臣。封功臣是酬庸，因爲大家一齊來打天下於政權，一旦得到了當然要大家分肥，國民黨於北伐成功以後，下令以黨員儘先作官，便是這種歷史上傳下來的作風。所以當其打天下搶政權的時候總是滿口的平民罪，迨其成功，却爲了這些革命同人的出路，不能不再轉過頭來向老百姓榨壓，不然這些人的生活成了大問題。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換朝代都有這樣的一個嚴重問題。古人早已說過，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這就是說，得天下要靠着一批有流氓性，造反性的人，而治天下却又另需要一批人。果爾則對於前一批人如何安置呢？爲了安置這一批人，使他們得到滿

意的報酬，那只有犧牲本來無抵抗力的老百姓。不但市民代罪終成爲百分之二二分兌現，而即經濟結構亦永遠不會更開拓一步。於是換朝代乃成爲週期性的了。中國歷史上「君」與「臣」及「民」是三個絕不相同的階級。民是純粹的被治者，幾乎就是奴隸。臣並不是完全被壓迫者，雖則有時亦受君主的奴役。有時臣能危及君，所以君不能不對這些人有顧忌，尤其是換朝代的前後。我說這一番話雖則是講中國的歷史，但我相信這個歷史的餘毒或病根迄今並未去得乾淨。實在是我們當前的問題。要而言之，當一個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腐敗得萬分的時候，這個統治集團即變爲革命的對象，因爲它把生產力再發展的要求阻斷了，但是既革命以後，這些新興的職業性的革命人物亦會變爲阻礙生產力再發展的東西。所以問題就在於此。

不過中國自辛亥以後，外國的一套把戲進來了，憲法啊，選舉啊，政黨啊，這些東西出現於表面，原有的皇帝、宰相等等作廢了。表面上換了一套衣服，而實質却並沒有真正澈底改變。至少亦得說是一套新制度嵌在舊的歷史餘殘上。在這樣的情形下更加重所謂「失調」(Maladjustment)。歷史的餘殘勢力把新制度沖到完全走了樣子。成了一個雜七雜八的東西。我們先就政黨一點而言。不論是民國元年的政黨方式，抑或是民國七年以後的政黨方式，黨員總是有爲了生活才來入黨。姑舉一小事作反面的說明。例如一個教員，苟其他自己對於本行有十分把握，不怕失業，同時亦不想升爲校長，則他決不入黨。可見入黨的人總是因為沒有社會職能上的崗位，或即有而十分不可靠，於是乃藉黨打出路。所以結怨不是幹政治，不是替老百姓做事，乃只是爲了自己。根據這個情形，中國政界上人們的言行不一致乃是先天註定的。換言之，即根本上言行是不會一致的。但言行變到完全無絲毫的一致以後，所以維繫社會之道將盡喪失，其結果只有訴諸武力。這乃是演變到後來所必至之境界。而革命的要求便在這裏潛滋生了。週期性的換朝代式的革命即從此成立。

§六。既然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放在我們面前，則著者所以要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解除生產力束縛的破壞工作必須嚴格恪守其限度。其先必須有一個社會診斷。真要檢查得出病在何處，即真正被桎梏的地方在何處。然後開刀，恰如其量，不多不少。即破除只可限於那個被桎梏的地方，千萬不可太過。如果事前沒有詳細精密的診斷，而專憑碰運去看嘗試一下，結果不但會碰釘子，並且一個社會、民族的事，是和一個人不同，一次失敗再來嘗試便須又隔數十年。

「紅帽子」在美國

記「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

(美國通訊)

段連城

我所以特別提出這個分際問題的緣故，就是有見於專依黨權由歷史上情性所反的遊離分子爲革命動力決不會摸出這樣的分際。老實說，在這種傳統的辦法情形下，這一批人是決不會做到恰合分際，因爲合乎分際而不太過，乃是與他們的利益相違反。他們的主要目的還是自己在經濟上生活方面求出路。而真正爲了解除生產力的桎梏却有時只須要丟掉那一些障礙爲止。障礙有時亦可能不太多。所以僅僅如此做是不能對於他們的問題有所裨助的。這裏便有一個問題，乃是歷史上所有的革命皆會遭遇的一種矛盾，即從革命的動力上說，必須訴諸感情的衝動。類乎發狂那樣。而從指導革命來說，却又必須得冷靜的理智。辨別分際是理智的事。掀起大波瀾則非有感情不可。二者實難得有一個恰好的契合。平心論之，革命本是理智的事。無如專靠理智，不能把革命煽起。故掀起革命與訴諸感情，但感情一起即不易控制。這是一件最艱難的工作，不可以輕浮的態度對付之。所以歷史上的革命幾乎無一不是犧牲太大而代價不足償其十分之一。換言之，即成就太少而浪費太多。法國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口，其成就對於人類實在抵不上。俄國大革命死的人數更可吃驚。當時如以現在的局勢爲藍圖而從事製造，恐怕這些死亡都是不必要的。即不死這們多人亦可達到今日這樣的目的。

原來人類的慾望，就普通人而言，有三種，比較上最爲基本的。三種是男女之慾、物質享受之慾、與權力支配之慾。在社會騷亂的時候，這些慾望都會有變態出現。例如在俄國革命的當時，所謂「一杯水」是確有其事，後來不久即經列寧的大聲急呼的反對而始絕迹了。本書不談這一點，故不往下再說。所夢說的只限於物質慾與權力慾。這兩個慾望的增長是資本主義的放任經濟與非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有關。在於任經濟上，人們偏於向物質慾方面去發洩。即獨佔性企業的大資本家往往要操縱政府亦依然是想更得較多的利益。一旦改爲統制，則人們的物質慾總會受到限制。於是其慾望的發洩便自然偏向到權力方面去了。往往在政府有加重其權力的需要時，即在大權政府時，政府內部極容易爲權力之爭起衝突，生磨擦。這就是物質慾受限制時有時反使權力慾增高。換言之，即二者消長不是正比例的。雖然往往在初期還能向外發展，不致於內部自起權力之爭，迨到後來擴張到了相當程度或停止了，却不免要有種種問題引起衝突。這一點似乎爲謀國者所應注意。

根據上述的種種，我們在歷史先例上可以取得下列的教訓：凡是一個革命，總包含兩個階段，一是破壞舊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壞舊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對於建立新的之障礙。換言之，即問題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舊的，而反在於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內部困難。

四個月前某天，華盛頓星報的主筆召見一個探訪醫院 閉除他。事後，華盛頓記者公會發表聲明，認爲相借共產主義，問他是否相信共產主義。這箇年輕人，相信自己 主義，是一個「公正而充份」的開除理由，因爲那種人已 經「不再有任何價值」。在美國，沾着一點紅顏色的，就是生員在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家裏，這直說是。主筆先生很誠懇地告訴他，就報館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但是

是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

因此，在政治鬥爭中，「紅帽子」遂成爲一個很厲害的武器。進步黨領袖華萊士，如今已讓政客們及「輿論界」塗得遍體皆紅；故總統羅斯福，被人罵做「共產黨」，也是屢見不鮮；就是杜魯門先生，在南方「白人優越」論者的口中，也是讓共產黨「牽着鼻子走」。在一片「獵紅」聲中，最是有聲有色的，莫過衆議院的「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了（後文簡稱非美會）。與該會並肩工作的，是參議院一個行政費用審查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前者主席是詹奈·杜馬氏（J. Parnell Thomas），後者主席是荷馬·傅格生（Homer Ferguson）實地執行調查的，是美國特務機構「聯邦調查局」。

公審女間諜

最近杜魯門總統召開特別國會，這兩個委員會，遂也開始工作。一時「紅帽」亂飛，牽涉卸任重要政府官員，消息驚動全國。首先是報紙傳說，謂有一個金髮的妙齡美女，曾任蘇聯間諜，現在自首招供，揭破共產黨情報網。七月三十日，伊利莎白·貝特蘭（Elizabeth Bentley）小姐出庭了。頭髮、肥胖，雖然她富麗堂皇，回答年齡，顯然是四十來歲了。旁聽席上，禁不住一陣失望的微微顫動。她沒有具體地講出任何驚心動魄的間諜故事，供詞中却牽扯了三十個前任政府官員，說他們直接或間接地供給她政治及軍事情報。她的職務，是一個小組聯絡員。在這三十人中，有前任國軍署副署長懷特（Harry White），及羅斯福親信顧問居里（Lanolin Curtis）。居里戰時曾兩度率領代表團到中國，在一時代一週刊刊出他的一張照片，背後還懸着蔣主席親筆題贈的照片。居里的答覆說他從來沒有認識過一個共產黨人；懷特則氣得直呼「荒唐」。這位自首間諜員小姐，似乎拿不出具體的證明。

其次要緊的，是商務部要員雷明頓（William Reinington）。雷明頓在戰時生產局，貝特蘭曾在戰時常與他會面於公園或街角，拿到許多有關飛機生產的資料，並探悉美國在遠東子彈，與超級空中堡壘。雷之供詞，則謂貝以新聞記者及研究工作之資格出現，收集資料，他並沒有給她任何不可爲其他記者知道的消息。他之所以間或與貝小姐會晤於街角或公園者，無非「年經浪漫」而已。貝小姐竟也無辭反駁。

於是，非美會不得不推出另一張王牌。這假一改過自新的共產黨，是原任共黨機關報紐約「每日工人報」總編輯的白登（Louis Budenz）。他出庭作證，謂蘇聯第

五縱隊任職美國政府者，數可以千計。他說他無法具體證明貝小姐的供詞，因爲雖然他自己也參加過地下工作，但是共產黨的情報，機密到「左手不知右手在做什麼事」。不過，他充分相信貝的話是真的。次日，庭上又出現了另一個「悔過」的共黨間諜，他是「一時代」週刊的高級編輯張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他叫出的一串共黨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更是驚人。

第一個，是前國務院要角赫士（Alger Hiss），在舊金山會談時，擔任過美國代表團副團長，並曾陪同羅斯福參加馬尼拉、雅爾達等重要會議。據張伯斯稱，赫士在戰前就擔任一個共黨情報小組的首腦，主要工作，是幫助共黨人員「滲透」入各政府機構，以便收集情報，供給蘇聯。張氏當時，屬於赫士小組。當一九三七年後脫離共黨時，曾力勸赫士自新，赫士甚爲動搖，痛哭流涕，但結果還是不肯回頭。這一段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兩天以後，赫士自動出庭作證，宣誓以後，却說他根本不認識張伯斯其人。張伯斯也當庭宣誓，硬說他認識赫士，只可惜也拿不出任何確切證明而已。

在這幾乎是斷斷續續的時候，非美會的負責人又大放空氣，說找到一個「神祕」證人，可使全部間諜案水落石出。兩三天來，多方渲染，只是不見其人。據發稿此刻的廣播新聞，道「神祕」證人，也無非是另一個「自新」的共黨通訊員，由華盛頓傳遞情報到紐約。他即使出庭，大約也是亂掉幾頂「紅帽子」而已。非美會諸公，反正「獵紅」任務已達，也不會斤斤計較證據何在，真像如何了。翻看非美會的十年歷史，危言聳聽，報紙紙製造大標題，本是其一貫作風。

大破好萊塢

這委員會創立於一九三八年，由馬丁·戴氏（Martin Dies）主持。初意是調查納粹黨徒及共產黨在美的反叛行動。馬丁是一個好砲手，他以宣稱當年好萊塢星秀蘭鄧波兒有共黨嫌疑而名聲遠播。馬丁死，杜馬氏繼位，青出於藍，每年都有大砲。一九四一，他說美國軍中處處是間諜；一九四二，他說政府官員，都服用「不務正業」的女孩子「做秘密」；一九四六，他說田納西州的原子彈工廠，操縱在「美國以外」的人手中。每次他都大呼調查，說得驚人聽聞，但照例是既無證據，也無下文。在非美會的一大串絕作中，最精彩的，當推去年十月的大破好萊塢了。

杜馬先生，一聲吶喊，說共產黨控制了美國電影事業，在晉蘇聯作宣傳。霎時間傳來了大批好萊塢名星。在衆議院會廳室中，只能容納三百人的旁聽席，擠得水泄不通。

在場有一百二十個記者，三十個攝影機，六個新聞電影攝影機，及一架無線電傳真攝影機。在強烈的水銀燈及攝影機光下，不少人帶起了黑太陽鏡。因爲牽涉的多是男明星，旁聽席上差不多是女人。當演「魂斷藍橋」的小生羅勃泰勒發言時，旁聽席上歡呼與掌聲不停，杜馬氏敲動了一隻維持秩序的木槌。三個禮拜的審查，熱鬧非凡，震動全國。但杜馬氏並沒有找出什麼共產黨控制好萊塢的有力證據。審查終結之前，他雖大吹大擂，謂將公佈一批好萊塢出品，替共產黨作宣傳的影片，結果毫無下文。

「獵紅騎士」杜馬氏

「非美行動」，鬧得如此滿城風雨，然則究竟何謂「其美」？美國法律，並無註釋。答案恐怕只好由杜馬先生處找尋，因爲照理他應該是最正牌的「美國主義」（Americanism）者了。他曾經說：「美國主義，就是保守主義。一切激進份子，都是「非美」。因此除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外，他更把「新政者」也放入「非美」項下；同時更發明了「同路人」（Yellow Traveler）及「淺紅派」（Baron Pink），以包羅所有不保守的政治組織。

正統「美國主義」者的杜馬氏，是一個死硬派的共和黨徒。家裏並非家門，但早年在華爾街一混到一碗飯吃，遂培養起對老吧們的忠實。他最近得意之中，告訴一個記者，說他在學校「從來不是一個好學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校裏有一個備戰演講會，中途有幾個左翼學生反對。「你知道我怎麼辦？」杜馬氏驕傲地說：「我邀集一批人，把那幾個傢伙頭髮剃光；手在一個全是癩癩的池裏裏」。他頓了一頓說：「我在「一哩路外，就可以嗅到一個共產黨徒的味道」。

最近杜魯門提出了保障黑人的「人權法案」，南方主張「白人優越」的密西蘇里會三瓦會（Ku Klux Klan），大肆活躍。幾百門徒相率，身起白袍，披着白面紗，舉高燃燒着的十字架，發表宣言說：「要是人權法案通過，街上淌着血流成渠」。這個會不但在提倡種族優越論，而且在組織及行動上，都與納粹黨有密切連繫。他們反對黑人、猶太人、羅馬正教以及一切來自東南歐的美國人，至於共產主義，更不用說了。在非美調查會中，也有個「法西斯調查組」，最近作了一個報告，說三瓦會是一連地的美國組織，當然不是「非美」。

維持「民主」牌招

當非美會在火舌「紅帽子」的時候，美國共產黨最近

却在最近公佈舉行全黨代表大會，制定政綱政策，宣佈支持華萊士的進步黨。這個似乎矛盾的現象，顯示出美國政客們要維持「民主」招牌的苦衷。他們既仇視一切進步的份子，但同時又覺得在這樣一個號稱信仰自由的國家裏，不能遂願某種主義或學說不合法。所以美國共產黨，至論上說，現在依舊是一個合法的政黨。不過美國一般人，對共產一字，多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疑忌與敬視，政客們針對這一點，盡力在每個共產黨員或左翼份子，以至於一切改革派頭上，加一頂鮮明的「紅帽子」，使他們在社會中困難甚至於無法生存。在這一點上，非美會有過很重要的貢獻。

在美國的選舉中，每個人投票時，至親如夫婦，也得站在三尺以外。因為憲法會經明定秘密投票，以便人人可以不受環境影響，自由選擇他的政治信仰。既如此，非美會在大庭廣眾中，全國新聞界前，盤詰個人的政治意見，是否合法，本極明顯。所以過去許多被傳詢的人，對非美會「你會否做過共產黨」的問題，都依法拒不回答。結果却反加以「蔑視國會」罪，送交司法機關懲處。今年五月，非美會的兩員德特孟德 (Karl Mundt) 及傑生 (Richard Nixon) 曾提出一個反共法案，要求所有共產黨政治機構及「外國組織」的負責人與會員公開登記。這個合

法化「紅帽子」的法律，雖經衆院通過，終因與「民主」招牌抵觸太甚，而在參院擱淺。

杜魯門與「紅魚」

七月二十七日，杜魯門召開特別國會，討論物價及房荒，這消息一直是報紙的大標題。五天以後，非美會開會，搶去了華盛頓消息的一大半。兩三天內，非美會竟變成頭號大標題了。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憤怒地說：「反美會的調查，無非是一條紅魚，來分散公眾對物價與房荒的注意」。這話指出了非美會的另一政治目的。在這大選的前夕，杜魯門預備了大批新色彩很濃厚的提議，交給國會討論，要想法子好低層大眾。共和黨製造的這「紅魚」，不但搶去了他的生意，同時暴露了民主黨政府，如何讓共產份子與蘇聯間諜「滲透」；美國的「安全」，如何在受威脅。

此外，非美會之選定這時候上演新戲，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打擊華萊士的進步黨。在這一次被牽涉上的前任政府官吏中，有好幾個是華萊士新黨中的要角，更有許多是前商務部內華氏的舊部。因此竟有人提議要調查華萊士。本來，在今天的美國，並沒有多少真正的共產黨（美共黨員數目，據該黨最近全會宣稱，也只有六萬人）。況且共

產黨在美國社會中，也起大作用。最近，十二個共產領袖，已因一圖謀暴力推翻美國政府而被拘到候審。所以「華爾街」真正的隱憂，是一切反共的自由主義者；而非美會的目的，也即是拿着一頂「紅帽子」的法寶，使他們嚇若寒蟻。

至於一般的美國老百姓呢？在戰後繁榮的今天，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歡喜熱鬧是他們的的天性。報紙上，廣播裏，聽說電影名星是共產黨，大官也是蘇聯間諜，倒也緊張刺激。究竟這些事是什麼涵義呢？他們很少功夫去想。去年底，當政府開始公務員「忠實調查」(Loyalty Check) 的時候，一個南方的女人，因為「Check」另有一個涵義是一支票，遂以為政府在發「忠實支票」。趕快寫封信給政府，說她戰時從軍，任婦女輔助隊員，服務熱心，請勿忘「Give me a Loyalty Check」。當聯邦調查局的人來找她時，她大呼：「擁護民主，我不知什麼是共產主義，我以為是錢！」

人人都擁護「民主」，究竟美國的「民主」是什麼？替紐約時報撰文的一個作家，匆匆去訪問非美會主席杜馬氏。問他什麼是共產主義，他說：「無產階級獨裁，奴役人民，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他說：「我想差不多」；什麼是民主？他想了想說：「民主嗎？反正每個人都知道」。誠然，反正每個人都知道！ (八月七日寄)

文明在生死之間

Civilisation on Trial The Listener July 15 1948

Arnold Toynbee

現代西洋文明正在被考驗！這也許是一個新鮮的觀念，也是一個新鮮的觀念。「文明」一詞對我們大多數人看來正是指和那些曾被考驗的東西相反的東西。大戰之前——至少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我們常認為文明是美如黃金，安如磐石的。我們祖宗們可能曾歷盡艱辛締造我們的文明，但是我們却覺得並無喪失道家傳寶物的危險。

我想，對我們覺得並無喪失道家傳寶物的危險是很自然的。和我年齡相若的一輩英國人，在一九一四年前是大的，對於現代西洋文明確是認為不必懷疑的。我們在那時沒有文明會被考驗的想法——我們那時並不懷疑這文明而發現它的缺點。就是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個文明已在被考驗的觀念在很多人心中是含覺得驚異的。無論如何，我們的文明可能遭遇災難的野覺現在似乎已經在滋養了。我去年春天曾在美國住了三個月，在那裏我發覺這個問

題已進入一般人民的心頭，這對於一個歐洲來的旅客當然是一個很深的印象。在我們看來美國人現在正站在權力、財富、和繁榮的塔尖。但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却可能比我們更為不安和恐懼，雖則我們英國人所住的地方才是大西洋更不安全的一面。

美國人比我們更為志忑不安是因為他們的失望比我們更大。美國人渡海遷移到新大陸，原是想和歷史對峙，而現在歷史却追趕了他們，而且已經趕上了他們。歷史不閉玩笑的，因為它的對面裏陳列着骷髏——不祇是一付，可能已有二十付。它們是文明的骷髏，在過去遭受了災難的遺體。當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的前途不覺得有錯失時，這些尸首不啻使我們不安；現在它們確已引起了我們懼然之感，我們的自信已變可怕的禍患，驚人的罪過和冷酷的殘忍所打擊，這些就在我們這一代，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眼

前發生。我們驚疑這些可怕的經驗究竟是什麼意思：它們是否指出我們自己的文明將和歷史樹裏的那些骷髏同其歸宿？

我們想得到的那最初被毀的文明是希臘和羅馬。它的衰亡和崩潰和我們特別親切，因為我們自己的文明就在它的廢墟上長成的。羅馬帝國的興亡陳跡，我們會重演這一套麼？羅馬帝國滅亡時曾遭過些什麼？如果我們回頭看看羅馬帝國的滅亡，和希臘羅馬文明的解體，可以見到幾條線索：物質上生活程度的跌落，這一點我們現在已經感受到了；理性主義的降低——退回到愚昧和迷信，行為標準的下降，法律和秩序的式微——退回到野蠻程度。

就那些必須承受痛苦經驗的人說，我想，物質上生活程度的跌落是最容易應付。在羅馬的末期，財產成了負擔——並不是他們不喜歡享受，好過惡勞原是人性之常，

而是因為代價太高。財產所有者在羅馬末期所付的代價是極日常生活各項細節所受到的管制。我們這一代和道世界，在這方面也已經有相當的經驗，但是羅馬末期的情形比了現在却還要嚴重，嚴重到人們寧願受極大的犧牲，設法逃避這種管制。注意精神生活的人把財產分給了窮人，進入空門做和尚或是做隱士；積極性的人逃到遠處的野蠻人裏去自求出路。最後，希臘羅馬文明整個複雜的物質結構崩潰時，大多數的人反而感覺到喘了一口氣。

還可怕的事倒並不是物質享受的喪失；生活簡單化了也減少了許多複雜文明的煩惱。可怕的不是物質的崩潰而是道德的崩潰：愚昧，迷信，無法，殘忍的勝利，克服了希臘文明在它的日子所建立下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文明崩潰時可怕的事，我相信，我們現在所長懷的也就是道德退化到野蠻程度的危險。我們已受到警告：在西洋的中心地點，就在這一代，我們已遭受到德國純粹的道德災禍。如果西洋有一個大國會屈服於此，很明顯的西洋的道德標準已經不夠穩固了。德國可以發生的事，誰能保證不發生在其他的其他地方呢？道德的破壞才是文明陸沈中的真正悲劇。

但是我們是否需要想像自己曾有相似遭遇？這要看希臘羅馬文明的陸沈是一件孤立的和非常的事端呢，還是自然秩序中有規律的事例。當我們在報上看到火車出軌或是某某夫夫火的新聞，我們並不會因之預想自己的房子今夜也會失火，或是明天自己所乘坐的火車也會出軌，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是意外。如果這類事情每隔一天就會在我們的街上或鐵路路上發生的話，我們也不會這樣坦然了。所以關於希臘羅馬文明的陸沈這件事我們第一要問的是：這件社會的災難是不是歷史上的例外？歷史上還有類似的情形麼？這問題的答案，我怕，並不是愉快的。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裏去重翻一遍歷史，我們確可以找到不少同樣的例子。

最完整的人格

哀念 朱自清先生

佩弦先生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七天了。在這七天之內，時時聽到有人在談論佩弦先生，也看到不少紀念佩弦先生的文字。至於我自己呢，却一直在沉默中，漫說要我自己

我們首先提及希臘和羅馬，因為我們對於這段歷史是最熟悉的。我已說過，我們自己的文明是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上長成的。希臘羅馬文明同樣的長成在另一早期文明的廢墟上。這早期文明是 Minoan 文明，它很早就滅亡了，連它繼承者的希臘都不再記得它。但是在上世紀的末年，被一位英國的考古學家 Sir Arthur Evans 在克利脫島上發掘了出來。我們還不能理解 Minoan 的文字，但是考古學家却重新發現了這個文明。他們告訴我們這個文明和後來的希臘羅馬文明一般也有過一個興亡的故事。

這裏不過是兩個早期的例子，我們來看看世界的其他部分，同樣的例子還多着。以遠東說，這是個在最近以前還是和我們不發生太大關係的區域。在這區域裏却有類似的歷史。中國的古代文明也有它羅馬的軌跡。在二世紀的時候他們的大帝國瓦解了，比了羅馬帝國的瓦解早二百年。如果在已死已葬的文明以外再加上那些雖則還活着但已無可否認的在式微中的文明，這類例子我還可以列舉二十個。依我所可以看得到的說，我們還不能確認其已經式微了的祇有西洋現代文明。

如果這些是事實的話，我們現有的處境是很奇異的。我們好像是站在一間房裏，這房裏躺着許多尸體，就是那些還沒有死的人也已病得很深。這唯一還能站着和還能觀察四周的人，並明白了這些尸體生前所犯的病症，他也看見那些病人正犯着這些病症，而且可能跟着要走上死路了。他必然會懷疑他自己是誰惟一的例外。他是否也遭遇到同一運命？也許他已經表示了致命的癱瘓。所以他開始檢查自己，當着溫度表不斷的看自己是不是在發燒。他恐懼了，他即使不死在瘟疫裏也可能會死在恐懼裏。這是，我願意說，西洋當前多數人的心理狀態。

我們既已試過這自己，也就不能住在這裏了。我們不能以一個個別來滿足自己，這一個個別和死的問題！我們必須設法推測這些歷史前例對於目前情況有什麼暗示。我們自己的文明是無救了嗎？我立刻將給你個人我的答案。我並不相信任何文明的滅亡是運命裏注定的，我也不相信它們都犯了無可挽救的病症。所以我們不必斷定我們是無

救了，低着頭，讓運命的刀在階頭台上落向我們的頭項。如果我們果真這樣束手無策，我們的頭是該這樣被切斷的。你們可以質問我，你不是告訴了我們二十個文明已經滅亡了嗎？現在不是將輪到我們了嗎？我們會是惟一的例外麼？不是的，我的答案並不如此。我可以給你說出兩個理由。第一是二十個例子並不能構成一個原則，第二是人事中太多不易預知的因素，隨時可以改變它的前途。我們自覺當前的危機就是一個足以自救的心理因素。假如我們不垂頭喪氣，等待死亡，而奮發起來，這就可以轉換我們的前途了。

喪命於戰爭中的文明

讓我們看看那些滅亡了的文明怎麼會死的，然後看我們是否能避免這種致命的錯失。我相信它們都是喪命於戰爭的。這些文明的歷史中，都發生過地方政治集團間日形嚴重的戰爭，雖則這些戰爭所殺死的文明在最後的一期常能結束戰爭，但是隨着戰爭而起的却是更深的病症。它們是以取消地方政治集團的方式來結束戰爭的，取消地方政治集團的方式是征服，一個強權把所有的競爭者都擊敗了，推行和平——羅馬帝國在希臘世界所強加的和平是一個我們最熟悉的例子，同樣性質的和平在同一的方法中在中國推行過。羅馬式和平的弱點是時間太遲和代價太大。在交戰集團沒有打到筋疲力盡時，戰爭是停不下来的；而且停下來時，社會的損害已經大到不易復元了，因之這種和平不能持久。它不過是延遲一個完整的文明的死期罷了，並不能救它的生命。

我們現代文明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是：我們是否將用羅馬的舊方法來結束戰爭？我們能否不從力竭停戰的和平中去制止戰爭？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曾不斷尋求以同意和合作來團結世界以致和平的道路，想用以代替暴力和征服的舊路。如果我們能有所成就，那就是以新的各種一新百。這是我們對於文明陸沈沈沈的解答。認為人類歷史對這危險閉上眼睛，而向這危險時也讓我們不要手足無措。我們得在我所建議的自救之道上去應付它。我們並沒有注定了滅亡，運命在我們手上，一切在自己。

李廣田

在別人的談話中，以及在別人的文字中，大都提到佩弦先生是一個最完整的人。我覺得這話很對，但可惜說得太籠統。我願意抑制自己的感情，試論佩弦先生的為人。

只覺得自己是廣沒有爆發的火山，「其實，朱先生自己又何嘗不是一樣。關於中國當前的情形，他在「論吃飯」中接着說：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就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行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末禮義法度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這了吃飯的更怎麼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於匱乏的自由」呢？於是寫出一飢餓事大，讀這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

只讀過朱先生前一期作品的人，或者只看到了朱先生性行事間的某一方面的人，可能不相信這是朱先生的話，然而這確是朱先生說的，而且說得那麼好，那麼切實，那麼勇壯，這自然是時代使然，然而這卻正是主觀的力，主觀的正義感和自覺心，也就是朱先生的至情和對於真理的愛好。至於他對於今天的文學的意見，那就更其明快而顯然。朱先生並不是歷史家，然而近年來所寫的文字中却大都有一個歷史的觀點，不論是談語文的，談文學思潮的，或是談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歷史的演述，從簡要的演述中，揭發出歷史的真象，然後就自然地得出結論，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當前的任務。在「新詩雜話」的第一篇「新詩的進步」中，他承認「從新詩運動的開始，就有着社會主義傾向的詩。」「語文零拾」中有一篇「歷史在戰鬥中」，他推崇雜文，說「時代的路向漸漸分明，集體的要求漸漸強大，現實的力量漸漸逼緊，於是雜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支燕子。」在「標準與尺度」中有一篇「文學的標準與尺度」一文，說「社會主義」是今天的尺度，「文學終於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的。」又說「特種階級垮台以後才見到廣度。從前有所謂雅俗之分，現在也還有低級趣味，就是沒高度深度，普及與同時也是一提高，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在「論雅俗共賞」一書中有「論詩」一文，他說，「一則詩是羣衆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羣衆，他也是羣衆的代言人。」

「一則詩要能夠表達出大家的憤恨，喜愛，需要，和願望，……則詩要與羣衆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與工作，……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成，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正是期滿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這一切，只說明一件事，就是：朱先生說話的立場乃是人民的立場，正如他在「論雅俗共賞」的序裏所說的，而最急切的目的則為新的「民主」文化，新的「民主」文學。為人民，爭民主，這是今天的真理，這也就是朱先生近年來所寫文字中的主要內容。

第三，佩弦先生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若說朱先生是有幽默感也未嘗不可，無乃「幽默」兩個字已經被幽默專家們發用得不辨真面目，所以我很不願意這兩個字來為幽默而幽默，而朱先生則不然。他自有至情，可並一天到晚翻轉倒，他愛真理，也並不逢人說教，他嚴肅而認真，却絕不板起鐵面孔，叫人不敢親近，只感到苦痛無味。他是極有風趣的，他的風趣之可愛可貴，正因為他的有至情，愛真理，嚴肅而認真。三十一年我到了昆明，在大街上遇到第一個熟人就是朱先生，假如不是他老遠地脫帽打招呼，我簡直不敢認他，因為他穿了一件奇奇怪怪的大衣，後來才知道那是趕馬的人所披的毛氈，樣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顏色卻像水牛皮。我當時只是想笑，然而不好意思，他却很得意地告訴我一個大消息：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中國的抗戰已成了世界大戰的一環，前途十分樂觀。以後我在街上時時注意，却不見有第二個人是肯於或敢於穿這種怪大衣的。有一次在西南聯大的廣場上開文藝晚會，幾千聽眾都隨便地坐在草地上。朱先生的講題是一五四以來的散文，他說，「甚麼是散文呢？像諸位這樣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坐法了。」他自不笑，全場上却哄然大笑起來，是到處充滿了風趣。在散文集「你我」中，有一篇「看花」，中間有這樣一段：

「至於領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後的事；夏天的早晨，我們那地方有鄉下的姑娘在各處街巷，沿門叫着一賣一賣的。一賣一賣的不是甚麼高貴品，但我喜歡那白而帶黃的顏色和那肥肥的個兒，正和那些買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韻味。梔子花的香，濃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樂意的。我這樣便愛起花來了。也許有人會問，「你愛的不是花罷？」這一個我自己其實也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論了。」（十九年四月）

「也許有人會問，其實沒有誰問，只是作者自己在體會那種情意味了。在同集中還有一談抽煙，「抽煙」一等等，都是同樣富有風趣的作品。這類文字看起來容易，作起也相當吃力，即如「談抽煙」，據朱先生自序中說，才八百字却花了兩個下午，所以這風趣的形成也還是出於嚴肅認真。近年來所寫的文字大都是非常沉重的，譬如前一期文字那麼嚴肅，然而其中也還是充滿着風趣，像前一期「論雅俗共賞」一書中的一論學生的酸氣，「論老實話」一等等，都在嚴肅中見出一幽默，——這裏我居然又用了一個幽默一兩個字，我的意思是說真正的幽默，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痛苦者同情，悲心與正義感所感到的風趣。三十六年二月，他的「新詩雜話」出版了，這本書的編定在三十三

年十月，書稿交出後便石沉大海，中間一度傳說稿子已經被書店失竊了，朱先生常常提到這件事，現出非常傷心的神色，以為這本書再也不會與世人相見了，不料事隔三年有餘，竟突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在目錄後的空白上題道：

「盼望了三年多，擔心了三年多，今天總算見到這本書了！辛辛苦苦寫出的這些隨筆，總算沒有丟向東海大洋！真是高興！一天裏翻了足有十來遍，改了一些錯字。我不諱言我一愛不釋手」。一選這相遇，適我願兮！一說是一做詩自珍一也罷，一紙情情深一也罷，我認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晚記。」

在這段短短的題字裏一連用了四個驚嘆號，第一行上邊畫了一個「一」的閉閉，最後一行下邊畫了一個「佩弦」的符號，大概太高興，高興得手忙腳亂，第二個圖章竟然倒置了。

有至情，愛真理，有風趣，這就是朱先生之所以為朱先生，這就是朱先生的人格之所以被稱為最完整的人格之所在，這也就是為甚麼，當朱先生生活着的時候，無處不贏得人的敬愛，而當他的死耗傳出之後，無人不感到痛與惋惜。也許有人會問：至情、真理、風趣三者，何者較重要，何者為次要呢？我不知道這問題有無意義，也不知道這問題怎麼回答，因為朱先生的人格是整然的一體，我們不好把它分解開作比較。讀前一期散文的人最容易感到他的至情，常和他接近的朋友最容易瞭解他的風趣，而覺得他平易近人，而近年來，在時代的風暴中，在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嚴肅的工作「的對照中，最近以見不出朱先生是真理的擁護者。朱先生總在不斷地進步中，他不但迎着時代向前走，他也領導青年向前走，然而，無可如何，他的體力，他的健康却一天一天地向後退了，他終於退向病牀，退向死亡；現在，朱先生，我們的領導人，我們的同伴，我們可敬愛的先生和朋友，却剩下了一把骨灰了；這又豈止是個人的損失，豈止是少數人的損失，豈止是文藝界或學術界的損失而已呢！假如中國真正一勝利一過，假如中國沒有內戰也沒有「一劫亂」，假如中國已經民主，已經和平，假如朱先生生活得好，生活得如意，他何至於這樣地死去。假如朱先生體力好，假如朱先生能夠得到天壽，朱先生對於新文學、新文化、新社會的貢獻將是無限的，這由他過去的成績可以證明，由他近年的轉變與進步更可以證明。朱先生在過去盡了他的力，在今天也盡了他的力，如果他活到將來，在新的社會中，將更有他的大用。然而，朱先生竟這樣地死去了！從我去年夏天來到清華大學之後，就看見朱先生的書案玻璃下壓着兩句詩，是朱

紀錄

三十七年八月廿一日下午四時為警憲在燕京校內搜查學生事對在場的學生教職員跟警憲說話

陸志韋

這樣的情景，在燕大的歷史上還是頭一回。從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些相像的，那是三十年二月八日上午十點鐘的集案。所不同的是仇敵，是日本人，今天來的是我們的同胞。是同胞，將來共患難的日子多着哩！

八月十九日，本校接到北平高等特種刑罰法庭的拘票，要逮捕燕大的學生，一共十七名。還有因為一危等凶犯一案子要傳去訊問的，一共有十四名。其中有吳其進一名，是本校畢業生，在訓導院服務已經二年了。其餘的三十人之中，有的已經畢業離校，有的早已退學，有的暑假不在校，有的雖然是准許留校的，可是假期之內，住宿的流動性相當的大。所有拘票傳單，實在無法送達。被傳的吳其進既然是本校職員，我即通知他趕快回學校來。不料當天下午他就在東校門護送不問情由逮捕了，送北平市警察局第六分局了。那天晚上，本校設法把吳其進從第六分局保釋，送傳到。

從十八日晚上起，學校護送警憲包圍了。學生員工都不許出入。食糧斷絕。同時，學校方面兩次檢查宿舍跟校場上其他各處，名單上的三十人之中，並無一人在校。我們就根據事實，報告第六分局跟這一同員查視查燕大的林團長，他是二百〇八師的。直到今天十二點鐘為止，地方當局依然不能完全信任學校的報告，以為非進來搜查不可。他們在職務上，不能不有此一舉。這是大家應當了解的。實在負責的責任的，並不是來搜查的人。軍警搜查學校，在民主國家是非常的事件。

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林團長來學校，跟我商量搜查的手續。他態度十分客氣。他說是為執行公事來的。各位，我的處境的困難，就不說，你們也能明瞭的。拘票上傳票上的學生，早已不在這裏了。受搜查的全部是跟這事件絕無關係的人，可是學校說話已經不能見信於人。我們沒有力量拒絕搜查。我在學校行政的立場上，並且不能對於非常時期的特種法令表示什麼意見。我當然可以用種種推辭，把這件事拖一些時

候。可是我不願意借外勢，也不願意求人，打官話。我知道你們不要我給這事，照我的估計，這搜查的手續，早晚不能避免。我並不怕事，我出入生，是為中華民族經過患難的。我為你們選擇了對於你們最少損失的一種方式，就是說，開了條件，讓警憲進學校來搜查。我要是做錯了，我個人負責。我對我的同事負責，特別是對西露的教職員。因為用民主的眼光來看，今天你們會看見看不慣的事情。我做中國人，只有慚愧。召集學生，也由於我個人負責。你們要守紀律，有話事後再說。林團長跟我約定的條件是這樣的：

- (一) 軍隊不開進學校，徒手的警憲可以進來三四十人（註：來的一共六十九人，我不得不拒絕了二十幾個人，請原諒）
- (二) 只查人。不查物件。（註：後來發現有人在宿舍翻着學生的查籍，不得不阻止他。）
- (三) 只查名單上的三十人，不查別人。凡是屬於本案件的人，不論有無嫌疑，今天絕不能讓帶走。關於這一點，我用我自己的性命來担保。
- (四) 學校絕不會同警憲來搜查學生。警憲要進來，其勢我們不能攔阻他們。我可以把學校的地圍借給他們，派校警領路。其餘一切，全都由警憲負責。中西教職員，要是有不放心的，你們可以跟在後面觀察觀察，將來有個見證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們去，你們自己負責。（註：學生自治會要求我讓他們派人監視；我拒絕了。）

我知道警憲一定會遵守這些條件的。現在請在場的中西教職員一概退席。凡是在暑假畢業，秋季留校服務的學生，也可以退席。學生請不走動，讓警憲查看你們的身分證。

（註：林團長也說了幾句話，態度極可欽佩。學生態度謙和莊重。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問，搜查之後，包圍線是否立刻解除？林團長答應在十五分鐘之內，撤去軍警。後來校西門南門，果然立時解警，東門延遲了兩小時。據我所知道的，林團長無法負責。）

先生自己的筆迹，下面寄着近人句一三個字，到八月三日宋先生火葬之後，我從城外廣濟寺冒雨回到濟寧，陪宋先生的兩個公子回到先生的寓所，看見先生的草履和手杖還留在過道的櫃上，我已經心先生尚未離開他的書房，走進書房，我又看見宋先生書案上那兩個句詩：

一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到黃昏。

從這兩句詩，也略可以窺見先生近年來的心境。假如人生五十也可以算作夕陽無限的話，先生的夕陽晚景真可謂一無憾好一切給盡了！黃昏餘暉漸逝，突然降臨的漫夜就沁一切給盡了！

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深夜，濟寧園。

附宋日清先生著作目錄

- 一、蹤跡（三十三年十二月亞東版）
- 二、背影（十七年十月開明版）
- 三、歐遊雜記（二十三年九月開明版）
- 四、你我（二十五年商務版）
- 五、倫敦雜記（三十二年四月開明版）
- 六、經典與時談（三十五年五月文光書店版）
- 七、詩言志辨（三十六年八月開明版）
- 八、新詩雜話（三十六年十二月作家書店版）
- 九、標準與尺度（三十七年四月文光書店版）
- 十、語文零拾（三十七年五月風琴社版）
- 十一、論雅俗共賞（三十七年五月風琴社版）
- 十二、續讀指導舉隅（三十七年三月商務版）
- 十三、略讀指導舉隅（三十七年一月商務版）
- 十四、國文教學（三十四年四月開明版）
- 十五、語文影（尚未出版者一種）

改用金同券訂閱辦法

茅盾等上編

小說月刊

零售每期 一元

訂閱三期 二元五角

訂閱六期 四元五角

（該辦法即日施行）

歡迎國內讀者直接訂閱

優待國內同行直接現批。

訂購處：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

前進書局

南京大拘捕

嚴冬

(觀察南京通信)

一在成年政府學潮繼續得憤憤不揚的政府官員們看來，暑假七八兩個月的大致風平浪靜，是最令人寬慰而輕省的。特別是今年暑假，經過四、五、六三個月連續的驚風浪浪之後，尤其顯得平靜，除了北平偶然發生了一次「七五事件」外，一般的說，幾乎會與「無事之日」無異。

是八月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的記載，但同日該報的社論却說：「這種安靜是表面的，而且是暫時的。在這裏面和暫時時的安靜背後，正醞釀着巨大的狂風暴雨。」

一巨大的狂風暴雨——真的興來了，八月十八日行政院對各地行政機關頒發了一致底清議，安定後方秩序的命令，同時中央社發表了長約萬餘言的「嚴冬之鑑」，中央日報著論大聲疾呼「肅清共匪間諜」，其言又曰：「在暑假期間，共黨賊黨間諜學生，正全力從事組織部署，準備於秋季以後大舉行動。在北平，彼等以某某二三大

學為據點，組織半武裝性質之聯防，著重於困難操作將義軍，分散其注意力，使之腹背受敵。在南京一帶，製造事件，或流血慘案，遂引起國際不良之觀感，阻止美援。在內地，建立蘇維埃據點，遂援共黨匪徒之軍事攻勢，必要時轉而為發動後方暴動之中心。該報認為「清除潛伏於社會上各業各處的共匪間諜，問題比較單純，進行亦比較易於着手。然而根據過去經驗，清除潛伏於學校中之共匪間諜學生，則問題比較複雜，進行比較棘手。」

行政院於通令各地清議後，特種刑子後，首即派特種刑事法庭已發出傳票一百四十七份，並拘訊一潛伏各學校各階層及潛伏各學校之匪諜之舉等一百七十九人。

中統局和保衛局每天開會商，討論一些捕人的技術問題。

據說在八月十七日的上午，首都衛戍總司令召集了憲兵司令部和警察總署等機關的主管人開會，在這個會上，決定了在南京的兩百多個大中學校學生的命運。為了先傳後拘還是乾脆不用發出傳票就直接捕人的問題，他們曾花很多時間推敲。因為昆明已經有過學生聚眾在一起拒捕的經驗，他們最後決定了在原則上先傳後拘，同時進行秘密逮捕的雙管齊下的辦法，並且決定在捕人的名單上，先公佈被捕人的名單。

這個辦法，在他們看來有兩點效果：第一，表示他們是在依法行事，使大多數黑名單上沒有名字的學生用不着害怕；因而聚眾拒捕，將榜上有名的學生孤立起來，讓他們名正言順地去傳去捕。第二，實際上，不僅是公佈了姓名的學生要被捕，就是沒有公佈姓名的學生和各個階層的人民也同樣可以逮捕，公佈了姓名的固然跑不掉，因為早在公

佈姓名之前就被監視住了，沒有公佈姓名的同樣也跑不掉，因為他們也同樣被監視着。

這種半公開的大規模的逮捕，是從八月十七日下午開始的。掛短槍的特殊人物，在當天下午起包圍了中大、金大、劇專、師專、樂專、音樂學院等校。中大某同學在成賢街被架走了，某校同學搭一路江南京汽車由山西路向新街口時，也被架走。公共汽車為此停駛二分鐘。當天晚上，中大一共逮捕了二十七位同學。

在大逮捕的羅網下，政府利刃特別指向中大。十八日下午，該校接到了特種刑庭的傳票，接到的一共是九十二位同學。整個白天和晚上，中大被恐怖的氣氛籠罩着，被戴上「職業革命黨」帽子的同學，馬上就受到另一批職業學生的監視，行動完全失去自由。校外的特務人員也進校內來了，特務員眼地從宿舍搜到圖書館，從大禮堂搜到大操場，甚至女廁所和他們認為可以藏人的牆壁角落裏，每一塊地方都沒有逃過他們的視線。八月十九日是還可怕的一天，當着很多人的面前，一個已經向中大訓導

處聲明明天準時到庭的同學，在烈日曝曬之下，被兩支手槍對着背脊帶走了。另外一位同學，則因為他在院裏裏刷收了一件自己洗的衣服，回宿舍，也被一個特務帶走，「你想收拾行李逃走嗎？」說着就用槍力戳了錢下。其他的，如哲學系三六級學生史壽華、經濟系三六級學生沈善初二人，上午十一時分別在碑亭巷珠江路口被架走，歷史系四年級女生袁旭霞，下午一時在文昌橋宿舍門口小竹林教室用飯時，被架人架去吉普車而去；機械系趙世恩、航空系李之敏二人，亦在珠江路口被拘，先入東區警局，旋解送衛戍部。

金大方面，接得特刑庭傳票三張，包括了吳至美、楊錦湖等十二個人的名字，這一消息傳來，該校立刻充滿了緊張的空氣，大家竊着眉尖，交頭接耳，不知將有什麼樣的災禍降臨。據該校一後接快報消息：「王斌在十八日下午二時，由家返校途中被捕，梁孟賢在十九日下午六時半，於西橋餐廳同校，被人架走。金大異校留校學生，獲悉十二人將被特刑庭傳

訊後，曾在北大樓集會討論，並邀請范濂裏訓導長表示意見，他說：「一特別刑庭傳訊學生係政治問題，校方不能負責，但希望同學準時出庭。」(第二天(二十日)，該校召開緊急訓導會議，校長陳裕光，訓導長范濂裏及各院院長袁伯樞等十餘人均出席，決議案未公佈。

劇專被傳訊三人，祇股登翼在校，他是理論編劇組四年級學生，去年曾任學生自治會主席。據該校同學說：「股登翼是十八日下午三時許接到傳票的，當即簽字蓋章收下，晚飯後，股同學在校內散步，突告失蹤。一乘專被傳訊的計陳壽等四人。邊被傳，於二十五日赴特刑庭報到。語專學生章宿昇，住中山東路復慶電科行內，十九日被東區警局傳訊未歸，家屬頗為焦灼。音樂院被傳訊學生九人，祇葉傳瀚等六人在校，於十九日上午十時，乘特刑庭派往之專車，由該校訓導長王漢音率領前往特刑庭報到應訊。關於檢察官問些什麼？據他們說：「一沒有問什麼，是私人談話方式，先從我們的生活、家庭生活

談起，再談到學校生活，問問學費的經濟來源及對現政府的看法，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我們因為都是音樂的，對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所以都沒有關於政治問題的答覆。一檢察官問我對現政府的看法，我說：「現在貪污舞弊這樣多，是叫人不滿意的。」

截至八月二十五日為止，連同自己到庭應訊的，中大一校已經被捕了六十多位同學，加上其他各校被捕傳訊的同學，聽說已有百餘人。少部份被認為嫌疑較輕的，允許保釋候傳，被拘押在特別刑庭的至少在七十人以上。

關於捕人的情形，一大學評論「有這樣的報導：『最初綁人總部在距學校較遠而僻靜的地方，後來漸漸移至鬧區，最後，「特工人員們率性壞到學校的門口去「工作」。……被綁的學生多是一句話不問，架上吉普車就走，因此張三被誤為李四的也有，同名不同名被綁的也有，等到這些錯誤被發覺時，被綁的人早已驅得一魂飛天外』，但亦無可如何。據說，被綁去的學生多數都送到奉天(一)八月二十九日南京」

關中搶糧戰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太原戰事結束後，緊接着又上演了關中搶糧戰。八月七日，涇渭關東會戰結束後的第三日，彭德懷又帶着一、二、三、四、六等五個縱隊，由黃龍山出來了，這五個縱隊雖經軍方宣傳已消滅了三分之二，經過三個月的整補，又復元了。在關東之戰結束後，胡宗南將軍曾對京滬記者發表過，三個月後共軍會再來，果然不出所料，又來了！

這次共軍發動太原的戰事，用的兵力相當大。原駐晉南的新八縱、十三縱都調到晉中去了，彭德懷的二、三兩縱隊由禹門東渡到晉南，胡宗南的戰心在太原，胡宗南的大軍也不得不轉移一部分到別的戰場去。第卅師(原來守臨汾的部隊，指揮官魯崇義係西北軍孫連仲的舊部，戰鬥力很強)空運援并，另外第XX師奉命由陝邊境出盧氏進擊豫西，負有收復洛陽的任務。這兩個師一調，陝境的防守力量當然空虛了。胡宗南

看準了這一點，所以在共軍尚未發動攻勢前，先下手為強，派了一個師進擊黃龍山區，並且收復了郃陽隴城兩據點。這一行動，只能解釋為以攻為守，因為一個師的兵力決不可能肅清黃龍山。太原之圍尚未解除，正設法維持難解之時，晉南的共軍二、三縱隊又悄悄回到陝境，而且會合一、四縱隊，避開晉南地區的國軍，暫擊郃城北郊楊家凹一帶國軍第卅六師的陣地。卅六師是關東的擊戰中打得最出色的一支部隊，彭德懷很吃了他一點虧。這次寇家路狹又碰上了，共軍運用了優秀兵力，包圍了卅六師的兩個團，據官方發表，一個團於消滅三倍以上。兩軍方面也承認國軍小有損失，比起宜川之役來，這次國軍的損失是不算太大。共軍消滅了郃城北郊的守軍後，指道郃城，城內的守軍為了避免再被一吃一掉，未經大戰，自動撤離，克復郃陽，郃城的那一支國軍，陷於完全孤立狀態中，不得

不向西南方向撤退。在陝南商縣一帶整補訓練的前劉鄩廿九軍的部隊，也抽到第一線。共軍佔了澄城後，並未積極南下，而從事於將糧食運到晉南。雖然有一支隊伍向成(陽)同(關)支線攻擊，但也只是牽制國軍的兵力，使國軍不敢調離同官白水這一帶煤礦區。官方早判斷共軍一定會南下到關中平原來搶糧，所以政府也曾下令鄰近共區的各縣餘糧必須於收割後一月內搶運到後方來，由軍隊任保護。命令歸命令，事實歸事實，關中金黃的麥粒，終於引來共軍的攻擊。國軍雖然集結了兩個師左右的兵力向澄城反擊，可是共軍為了掩護物資的東運，堅強地抗拒國軍的反攻，兩個多月期間的行動，截止至收獲運的行動，截止至者屬稱時止，郃城尚未收復。日後澄城可能重歸國軍掌握，但多稅已隨風而逝矣。這次關中之戰，僅僅是一種試探性之戰，或稱之為物試探戰，因為共軍沒有擴大攻擊的範圍，也沒有與

國軍作正面的大戰，共軍主力又轉移到山區。這次戰役直接引發的原因是關中防務空虛，更大的原因是因為陝北共區今年歉收特甚，共方在陝北普遍發動救災運動，他將晉南的糧食運來陝北濟荒。這些糧食，只有從關中取得補償，從晉南運糧到陝北，再從關中搶糧運晉南。這一轉運間，間接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成功。陝北的人民吃到共方發放的糧食，當然會感激；晉南人民看到共軍從陝西運回糧食，直覺上感覺到是減輕他們的負擔。

總統渡陝後的若干決定，只有胡宗南出兵河南一項兌了現。補充並擴編馬軍軍兌現了一部份，其他人事上的決定仍是懸案。張治中任西北軍政長官已是修訂案，最重要的軍事指揮系統還沒有得一個決定。馬步芳的部隊駐屯地區也沒有解決。馬鴻逵所部仍在三邊，眼看著榆林可能成為共軍的攻擊目標。現在榆林的防守部隊系統很複雜，有胡宗南的三個團，有陝

今日之韓國

潘公昭 著

每冊金圓二角一元

韓國位於中美蘇三大強國之間，戰後南北兩部分別在美蘇佔領之下。中韓在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超過其他國家的密切關係。本書把韓國的自然環境，歷史沿革，民族生活，政治黨派，解放運動，社會現象，文化學術，作扼要而正確的介紹，要研究戰後新興之韓國者，不可不讀本書。卅二開本三百四十餘面。

今日的外景	潘公昭著	一元九角二分
今日的美國	潘公昭著	一元〇八分
今日之印度	潘公昭著	二元九角六分
今日之台灣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六分
今日之台灣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六分
今日之台灣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六分
今日之台灣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六分

(券圓金)

上海(18)中正路五三七號 電話七四四八七

中國竹亭公司發行

歡迎選購 歡迎批發

西保安團，有馬鴻逵的騎兵編為一部份。劉鄩司令，可是只是一個光桿司令，手中無一兵。郭氏本人這次在西安逗留了很長的日子，結果得到胡宗南的同意，獲得指揮榆林各軍位軍隊的權力，並解決了武器問題。至於糧食，要靠他作家的幫忙了，因為接濟榆林的糧食只有依賴綏遠。

最近胡宗南派他的秘書長趙龍文(胡的智囊團領袖，曾任糧食部次長)到北平向傅作義請教總體戰的問題，這在胡將軍個人，是破天荒之舉，因為打仗的事

，胡將軍是很少向人求教的；尤其是打共產黨，胡將軍更是年資經驗俱足。現在反而向傅作義請教，這表示他能接受過去教訓來集思廣益以觀戰。除此之外，另一重要任務據說是商討華北與西北軍事聯繫上的問題，尤其是晉南的戰局與政局。卅師空運到太原後，胡將軍的指揮權已進入華北，老將軍的盤地，傅作義不好意思去管，可又不能不管，現在由胡將軍代傅作義去管，在胡將軍面子上，較為過得去。因為胡胡之間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這一既成事實，胡傅之間當然應該有一交代。(八月廿八日)

實創主陝，搶軍從董氏可似乎是高升了一部，可是政治比軍事難，陝省府人事經過一個多月的折衝和暗鬥明爭才發表。這一個多月，中實創是精疲力竭，為人事創傷腦筋。改組後的省政府，到底是不是比前任的好，尙待事實證明。不過董劍對此主席，實在是沒有大興趣，就任之後，攬之不得，棄之不能，攬之不得，棄之不能，攬之不得，棄之不能，攬之不得，棄之不能。

鄧錫侯遲不赴任的原因

觀察讀者投書

(觀察成都通信) 六月廿一日，當鄧錫侯回到成都的那一天，在鳳凰山機場歡迎他的盛況，是在王陸基的迎駕來川上。他的僚屬們都成了示威性的壯大的行列，向他致敬致敬，他在軍隊中已經動得下老淚盈眶，這幅畫面，確是夠動人的。之後，他就身著征服，在黃昏的春熙路上，或柳暗花明的望江樓邊，一狀頗開逸一的散起步來了。四川年年不斷的米潮、學潮、水災、饑命似的徵稅徵兵、以及永無止息的政治上的明爭暗鬥，逼得他丟掉官場的寶座；然而如今，災荒依然，賦稅加重，他卻用不著再操心，而學生們也不再向他請願示威；一打官司三錢公一，於是，他竟到了錦江之畔，做個自由業的主人來。他這幾年後，便在那竹筍三個月後，概日的一度莊一內，上麻布大褂，輪扁運風，沉思冥想，而沉溺於自獲的寧靜中。

然而，一個存於於官場中的人物，是永遠得不到安息的。政治上而感實力缺乏，深恐有負鄉人期望，將候中央兵力撥定後，方能定期赴任云云。

其實，這也是不足為奇的；王陸基及其省府委員，早在七月裏就曾經致電一邀送一過他出川一舉一。鄧錫侯原也是以一圓前一見解的，他何嘗不知道前途的險惡，但為了保住本身的地位，為了他的部屬向他要飯碗，如果眼前是一付枷鎖，他也無法一滑脫一的。

因此，鄧錫侯是憂鬱的。

八月十日，在成都市政府、市參會等機關發動的一省垣各界歡迎鄧錫侯先生榮任川陝甘綏靖主任大會一，原訂就在這天舉行，但結果空音流產。這倒盛會的一籌備已久，軍事會議，連成都市的大百貨商店如寶光通、國貨公司都破例的捐了幾千元，共集感，似乎成都人對他這位新任主任，已很很神而予的了，但在八日報聞突然刊出了大國軍兵運期赴任而停止的消息。理由是：一、敵方人士鼓動；二、中央任命鄧錫侯為該主任，用意在乎守衛該土而阻礙殘匪，但以遲未交撥兵力

關係，以致鄧氏心有餘而感實力缺乏，深恐有負鄉人期望，將候中央兵力撥定後，方能定期赴任云云。

其實，這也是不足為奇的；王陸基及其省府委員，早在七月裏就曾經致電一邀送一過他出川一舉一。鄧錫侯原也是以一圓前一見解的，他何嘗不知道前途的險惡，但為了保住本身的地位，為了他的部屬向他要飯碗，如果眼前是一付枷鎖，他也無法一滑脫一的。

因此，鄧錫侯是憂鬱的。

八月十日，在成都市政府、市參會等機關發動的一省垣各界歡迎鄧錫侯先生榮任川陝甘綏靖主任大會一，原訂就在這天舉行，但結果空音流產。這倒盛會的一籌備已久，軍事會議，連成都市的大百貨商店如寶光通、國貨公司都破例的捐了幾千元，共集感，似乎成都人對他這位新任主任，已很很神而予的了，但在八日報聞突然刊出了大國軍兵運期赴任而停止的消息。理由是：一、敵方人士鼓動；二、中央任命鄧錫侯為該主任，用意在乎守衛該土而阻礙殘匪，但以遲未交撥兵力

陝西二十二縣，甘肅四縣。但談到實力，在鄧氏的心裏，就是一個隱憂，目前他僅有黃陸一師人，據可靠消息：這一師人現有兵力僅一萬另兩營，其餘一團正在整訓中。從前鄧錫侯曾調羅廣文部給他指揮，因羅的第十師調離川，都是征調的川丁，以川民保四川，自然比較理想。殊不知羅所轄的三萬員兵，已於日前被胡宗南帶走一萬，方靖撥了五千，剩下的也不過是老弱殘兵而已，再就是羅黃兩部的械彈，也都成舊不堪了。

鄧在那次茶會上，也就對當時局勢公開發示：「目前我看共匪竄川不外第一由白河安順一線入川，第二則由通南巴彝路。目前彭德懷雖有五六萬人在北地，但胡宗南大軍尚有十餘萬人駐紮，決可防禦。目前所需要是請求中央警備隊及陸軍兩部的實力，為適應形勢戰，在邊區內，本人當盡力治理，惟解決條件，要有充實的武力。」

至於王陸基，當他登上了川主席寶座以後，就把一拒阻於川外一的重担，完全推在鄧錫侯頭上。在那次茶會上

王陸基也出席致詞：「當康省主席鄧錫侯在蓉時，本人與鄧先生三人曾實地度會談，當時鄧先生即對川省軍事與鄧先生對康省人也就過，還算所請在川省警備隊，若鄧先生為總指揮，本人願與鄧先生共同治理。」對於四川他則強調說：「中央一貫是重視四川，四川以前是根據地，以後也是第三世界大戰的根據地。」

關於鄧王到三人會談的內容，外面傳說很多；據說有一次鄧錫侯請了王陸基、劉文輝二人吃飯，鄧在席間曾向王說，鄧出川與共匪之戰，把自已已經整齊的軍隊，抽離成都供給中央了，但當他此次來川去主持席之時，在康一帶却備受冷眼，令他萬分失望。如今共匪以川日急，有名無實，一旦失職，被俘陣亡，誠恐益甚，不逞理想的。故請求王劉二人與他通力合作，以求川康口保。否則他就不能赴漢中赴任。當時鄧錫侯正有走起避，而王陸基正在走起避，似乎一無動於中。

如果鄧錫侯是因為辦理四川軍務不力而卸任，則王陸基上當即是中央要對四川加緊征兵徵糧的壓力表現。七月間中央向川省征糧征兵，共達一千八百萬石，已佔全國征糧總額三分之一，一部份則由川省負責，其餘則由川省負責。同時，因川省失守，川省征兵，於是高喊一川省自保一的口號，一度掀起征兵狂波。據七月十六日中央軍校所辦的黃埔日報所載：「王主席見情勢不妙，念及主席見我希冀諸位冷靜一點，并我懇請諸位注意，我派有張某到川尋找足留有名名單。」王陸基這二一說，議員們就吓得不敢再問了。當日的黃埔日報，曾以一警告地方主義一為題的社評，公開發對一地方主義一加以抨擊。但是，地方主義到了那條一尾巴」？想來只有王本人明白。不過，川康軍人，尤其是鄧錫侯首領的川康軍人的榜樣。苦悶是難以隱飾的事實。尤其是七月裏，被相繼死亡失蹤的彭德懷，最大，川中政界莫不有人人自危之感。按康郭二人，都是川中將領

力而卸任，則王陸基上當即是中央要對四川加緊征兵徵糧的壓力表現。七月間中央向川省征糧征兵，共達一千八百萬石，已佔全國征糧總額三分之一，一部份則由川省負責，其餘則由川省負責。同時，因川省失守，川省征兵，於是高喊一川省自保一的口號，一度掀起征兵狂波。據七月十六日中央軍校所辦的黃埔日報所載：「王主席見情勢不妙，念及主席見我希冀諸位冷靜一點，并我懇請諸位注意，我派有張某到川尋找足留有名名單。」王陸基這二一說，議員們就吓得不敢再問了。當日的黃埔日報，曾以一警告地方主義一為題的社評，公開發對一地方主義一加以抨擊。但是，地方主義到了那條一尾巴」？想來只有王本人明白。不過，川康軍人，尤其是鄧錫侯首領的川康軍人的榜樣。苦悶是難以隱飾的事實。尤其是七月裏，被相繼死亡失蹤的彭德懷，最大，川中政界莫不有人人自危之感。按康郭二人，都是川中將領

力而卸任，則王陸基上當即是中央要對四川加緊征兵徵糧的壓力表現。七月間中央向川省征糧征兵，共達一千八百萬石，已佔全國征糧總額三分之一，一部份則由川省負責，其餘則由川省負責。同時，因川省失守，川省征兵，於是高喊一川省自保一的口號，一度掀起征兵狂波。據七月十六日中央軍校所辦的黃埔日報所載：「王主席見情勢不妙，念及主席見我希冀諸位冷靜一點，并我懇請諸位注意，我派有張某到川尋找足留有名名單。」王陸基這二一說，議員們就吓得不敢再問了。當日的黃埔日報，曾以一警告地方主義一為題的社評，公開發對一地方主義一加以抨擊。但是，地方主義到了那條一尾巴」？想來只有王本人明白。不過，川康軍人，尤其是鄧錫侯首領的川康軍人的榜樣。苦悶是難以隱飾的事實。尤其是七月裏，被相繼死亡失蹤的彭德懷，最大，川中政界莫不有人人自危之感。按康郭二人，都是川中將領

力而卸任，則王陸基上當即是中央要對四川加緊征兵徵糧的壓力表現。七月間中央向川省征糧征兵，共達一千八百萬石，已佔全國征糧總額三分之一，一部份則由川省負責，其餘則由川省負責。同時，因川省失守，川省征兵，於是高喊一川省自保一的口號，一度掀起征兵狂波。據七月十六日中央軍校所辦的黃埔日報所載：「王主席見情勢不妙，念及主席見我希冀諸位冷靜一點，并我懇請諸位注意，我派有張某到川尋找足留有名名單。」王陸基這二一說，議員們就吓得不敢再問了。當日的黃埔日報，曾以一警告地方主義一為題的社評，公開發對一地方主義一加以抨擊。但是，地方主義到了那條一尾巴」？想來只有王本人明白。不過，川康軍人，尤其是鄧錫侯首領的川康軍人的榜樣。苦悶是難以隱飾的事實。尤其是七月裏，被相繼死亡失蹤的彭德懷，最大，川中政界莫不有人人自危之感。按康郭二人，都是川中將領



何其芳的轉變

沈宗澂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現實生活無形中就決定了作品的內容，而作品的內容又影響到作品的形式，成功的文學作品沒有不是從作者自己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一個過慣優裕生活，從來不懂得貧窮的人，決不會歌詠勞動飢渴，終身流離顛沛的人，筆下也不會有歌舞閒逸出現。對於生活中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根本便不易了解，假若硬要憑想像強寫出來，寫出的東西一定是浮泛的。所以非得生活中有些什麼，才能寫些什麼；生活改變了，寫作一定會自然的跟隨着改變。若干年來的民族解放戰爭使這個時代進入空前嚴重的階段，每一個人都受到現實的苦難。文學家比一般人更為敏感，當現實的鞭子打來，首先打醒了他們的幻夢，於是他們的生活開始改變了；於是我們看到當代的文學家一個一個的不再如過去一樣，在他們孤獨的房間中離棄着身邊瑣事，抒寫着個人傷感的遺囑，而慢慢的走出了他們的斗室，發現了自己以外還有如此廣大的人民，幻想以外還有血淋淋的世界；於是他們的打寫有了具體的對象，開始反映着這個新的生活了。這個大轉變是從個人到羣衆，從傷感到憤怒。何其芳過去曾是極端的抒寫個人的詩人，或者散文家，現在却成了最能徹底走向羣衆的一個。但何其芳的轉變比一般人來得艱難，因為他是在封建型的古老的大家庭裏長大的，深受過舊社會制度毒害的青年。從舊社會到新社會，中間並不是沒有相通的道路，但這個距離太大了。並且何其芳作了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的代表，從過去跨越現在而大步邁向未來，走上了知識份子應該走的路。

他最早的詩收在「漢園集」裏，最早的散文收在「夢錄」裏，另一部份詩文收在「刻刻」裏，以後陸續出版的詩集有「預言」，「夜歌」；文集有「憶日」和「星火集」。從「夢錄」到「星火集」，前後的寫法迥然不同，不但我們奇怪「夢錄」的作者能寫出「星火集

一的文章，就是作者自己，對於這個事實也不無懷疑，覺得應該解釋一下。由華北戰場回到延安，他寫了一篇文章，解釋自己的轉變。他說雖然在這裏也碰見很多很多他那樣的知識青年，他和他們一樣的忙着工作和學習，但是需要特別解釋自己一下，因為曾經寫過「夢錄」。（「星火集」九七頁）他從許多早年過到的小事情上找到轉變的源頭，新思想就在這些小事情上開始萌芽。

一天，走過北平一條街，一個十二三歲的賣報的小孩用可憐的聲音叫賣着，這聲音感動了他。他想到這小孩和家裏的小弟弟一樣的年幼，為什麼却在街頭求乞似的叫喚着；他想到人類不應該這樣自私自利，不能因為這小孩不是自己的弟弟，便毫不顧忌的走了過去。他拿出一塊錢，買了一份報。他又遭過過一段不幸的愛情，發現了不幸的根源是社會太不合理，在不合理的社會裏難以有圓滿的愛情。大學畢業後，到天津一個中學裏去教書，早晨看着開人的子弟坐汽車來上學，黃昏着着遠遠的燈火，放工回家的女工沿着都市中流出來的污水走過，他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罪惡。五二八學生運動中，學生們熱烈的開着會，呼着口號，那熱情像燃燒着的火光，照亮了他生活的陰暗。在山東萊陽，看見無數人轉轉於飢餓死亡之中，他忘記了個人的哀樂。一些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帶着農具從鄰縣逃來作收麥時的零工，晚上露宿在石橋上。冬天，他到了青島，一排一排的別墅都空着，鎖着，他明顯的感到這個對比所代表的意義。他的新思想於是成熟了，清楚的感到必須放棄個人主義，走向人羣，走向鬥爭，運用文字成為武器，將低迴隱忍變成火辣辣的反抗的聲響。抗戰起來了，他決心回到四川的家鄉去作啓蒙工作，但那裏在軍閥官僚的統治下，思想文化落後使他不能順利的展開工作，他決定離開，因為他還需要工作，需要鼓動和撫慰。他到了成都，教點書，寫些雜文，而且發行了一個小刊物。他的文章抨擊當地濃厚的醜惡空氣與妓女和虐待兒童的封建思想，以及知識份子向上爬的人生觀。但是他並沒有找到同情他的伙伴，這又使他感到寂寞和悲哀。他開始走向一個新環境，找到快樂和光明，正如他那「一個平常的故鄉」告訴我們的：「在這裏，當我帶着熱情和理想談話着人類和未來，再也不會有人暗暗的嘲笑。在這裏，我這個思想遲鈍而感情脆弱的人從環境，從人，從工作學習了許多許多，有了從來不曾有的迅速的進步，完全告別了我過去的那種不健康，不快樂的思想，而且像一個小輪船在一個巨大的機械裏和其他無數的齒輪一樣快活的規律的旋轉着，旋轉着，我已經消失在它們裏面。」（「星火集」二〇頁）

這種解釋是這樣粗淺的，現在若干已經日趨末薄的文人，未嘗不時時遇到這類沖激，却不見到有所感觸，更不見得因此而起來改造自己。這只是偶然的原因，不是必然的原因；只是原因的部分，不是原因的全體。僅僅是一點感觸似乎並不足促成何其芳的轉變，一定還有另外一些理由潛存在事實的背後。

「星火集」裏，作者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他投身實際戰鬥完全由於一種寫作上的企圖——寫報告文學的企圖。他說：「是的，我應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我應該到前線去，即使我不能拿着武器和兵士們站在一起射擊敵人，我也應該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一〇九頁」）又說：「成了這樣一個打了敗仗的個人主義的散兵游勇，我才想到去投奔一枝奇戰了十餘年的大軍。這決心還帶着一種寫作上的企圖。我當時打算寫心寫報告。」（「二〇〇頁」）這種企圖同時也就是推他轉變的一個巨大的動力，使他不得不放棄個人主義的辯護，向着羣衆走去。

何其芳的文體是獨特的。新文學運動打倒了舊有的文體，新的却未能馬上建立，各人摸索着各人的道路，各人試驗着各人的技巧，或者移植外國的寫作方法，或者在陳舊中發掘新的材料。何其芳就在這個繁雜的場面中樹起了他獨特的旗幟。『夢錄』雖然只是十六篇短文，八十多頁的小書，却風靡一時，成為當時散文的經典。獨特的文體奠定了他一時的成功，也正因惑了他以後的發展。

『夢錄』裏的文章完全是作者離飾幻想的東西，幾乎沒有一篇是客觀的，像『夢後』、『獨語』、『哀歌』這些題目本身就是虛無飄渺的帶着夢幻的色彩。其中也寫到一些外界的景物，但這些景物當被作者的幻想附麗以後便現出了奇異的色彩，並不是一般人眼中所能看到的形象；其中也描寫着一些簡短的故事，但這些故事乃是為了解釋自己，是給自己製造的玩具，我們看不出這些故事對於別人還有什麼意義。這種文章是極端的向著作者內心發展的。何其芳的散文之路，無疑的，太窄狹了，以至使他走進了牛角角。在他寫作的過程中，這種文體對於他所表現出的阻力，第一是筆下跟蹤，其次是題材貧乏，最後終於寫不出來了。

『刻意集』中有兩篇更四解釋他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後話』和『夢中道路』。在『夢中道路』裏他說：「我喜歡那種鐘錶，那種彩色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我喜歡讀一些舊人的絕句，那聲如一笑，一揮手，縱然表達着意思，但我欣賞的却是姿態。一他極力的追求顏色，精緻



前夕！

編者先生：華北學生反對特別刑庭成立不過兩個月，政府終於擱出這張王牌，以「職業學生」為罪狀，化非法為合法，不問證據，大肆拘捕，繼之教訓以「開除」令各校，遂使政治干涉教育益形表面化！

平津兩地拘傳名單總額四百餘人，有的先公佈名單然後「傳訊」，有的於深夜逕入學校或家宅拘傳，而天津四無特別刑庭之設，所以不得不暫在警備司令部拘押，暫歸軍法偵審。邇來當局為此，時而提前戒嚴，時而加強檢查，防戒逾恆，為對付幾個學生，亦可謂大費苦心了。

有人批評當局此項是背水一戰，其結果則是「逼上梁山」。據非正式估計，列入名單或其他因懼怕而逃避者，已不下五百人，（因時有二三批名單之傳聞）這批人大都是自治會新舊理事，或平素愛說話有正義感的人，原先倒不見得「為匪作倀」，而今却迫而「被匪利用」。如果照他們的作事能力言，牛欄各校精華，假如全數逃入「匪區」，想個中可能會起不太小的作用，政府苦心孤詣造就這一批人才，竟而落得此種結果，亦大可悲！

我是名額金榜的一個。不錯，我作過自治會理事，但這算犯案嗎？相反的，全校百分之七十的同學在選舉上圍上我的名字，我卻認為是莫大光榮。我參加過社團教育非停留在孤單的課本上學習不可嗎？啊，我參加過抗暴、反內戰、反迫簽簽名和遊行行列，我先不論本身的正義感衝動，我們僅就這幾次運動之是否富有進步性和真理價值來衡量，一個現代青年還會熱

觀無感嗎？

是的，我是一個超過廿歲的青年，我有理智分辨是非善惡，我既不會誘致他人，更不願受他人鼓惑（如果當局說我受騙而不覺，那我認為就不值一駁了）我認識時代趨向，我看清社會罪惡，我更關心人民疾苦和國家前途，在自由平等真諦下，我有權力思想，我更有權利表示！

然而現在完了，差一年即將畢業的學校，已被迫離開，我試走走過知已同學和親戚的家，甚至企求找一件小事暫時苟安，但現實的答覆是不可能！他們都因報紙上公佈過我的尊名而不敢收留。我徘徊，我徬徨，但終於找出了我唯一的道路——不是找出，是迫使走上這條路！身受和感覺到的事實，遠過於任何書本上的理論！

雖然，感情挽繫着我對現實的幻想，理性愛憎着傳聞中物質的痛苦，然而這些基於個人觀點而出發的意識，終將隨現實的考驗而被拋棄，巴金說：『我珍貴我的痛苦，因為痛苦是我的力量，痛苦是我的驕傲；』是的，我願以今天起開始一個痛苦的嘗試，並且奮情的，毫無忌憚的馳騁在廣大華北平原上！

林冲於天津、時在冀中行前夕

巴黎來函

編者先生：勝利以來，國內諸事失軌，各地學生運動屢有所聞。尤以最近北平昆明兩地發生流血事件，海外僑胞聞訊之下，不勝痛心憤懣。青年學生為一國之柱，我國八年抗戰，瘡痍滿目，百廢待興，尤宜愛惜培植，學生運動在中華建國史上向佔重要地位，五四運動，一二九學生運動等對民族前途均有不可磨滅之功績。今自民國卅五年之抗戰美軍暴行，廿六年夏之反饑餓反內戰，以至最近之反美扶日運動，均係發揚前人一貫精神，以全民族之生存為前提，實堪敬佩。吾人僑居海外，不能親身參加，惟深知國內師生雖處境

困苦，尤能領導民衆，抵抗暴力，主持正義。鑒察棉力，發起大規模之募捐運動以為國內學運之支援。茲宜首如左：

- 一、對全國困苦鬥爭之師生致敬
- 二、對政府之措施提出抗議
- 三、對全國同胞呼籲一致為學運支援

旅法華僑團體支援國內學運聯合會啓
一九四八年八月廿日 巴黎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投考大學的學生，在上海我曾先後考過四五個學校，其中一個是英士大學。近見報載：英大本學期在上海南昌等三地招考錄取總額，僅一百六十名，因為教育部要分發青年軍二百餘名。但上海等三地投考英大者，約在萬人左右。學校所能容納的名額和學生投考的名額一比，本已少得可憐，現在還要將一部分名額分與特殊青年，真是不平之至。

胡英民 八月廿九日 南京

考生控訴

編者先生：此次北方三校在漢招生，清華僅錄取廿五名。考生既如此之多，落榜者竟有特殊優異之學生。如今後不能設法多收幾名學生，則真令青年失望。武大目前尚未放榜，聞僅可能錄取四百人。并據外間一般傳說，青年軍將有二百名保證者。果爾，則考者辛辛苦苦，真無代價。大學實非收容所，政府焉得如此做法？無怪青年憤懣。

閔思彥 八月廿七日 武昌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從老遠的南方跑到杭州來投考國立藝專。到杭後，距離考試的時間還有幾十天，我就借住在他們學校裏，在自治會所主辦的投考同學服務社補習繪畫；（他們學校裏還有一個服務團體所謂研習會，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及青年軍同學辦的。）在這幾十天裏，我一直埋頭學習，所以進步很快，從老師同學和教授的口中說起來，成績要算投考者中最好的了！考試過後，自信各科成績都取得相當不錯，可是發榜了，榜上竟沒有我的名字。

後來從某些教授的口中傳出了一部份的真相，這一次取錄新生完全是由該校校長汪日章一人圈定，而他圈定的標準是根據研習會平日對投考者調查放棄。所謂招生委員會原定下午三時開會，汪校長五時四十分才來，將他圈定的名單讀了一下了事，有教授提出要對成績，他却說：『我已對好了，馬上就要吃晚飯，不必耽擱時間！』

我壓抑了自己的感情，和另外的幾個落榜者去見汪校長，要求查看成績，如果及格的話，就給予試讀或旁聽。汪校長當即承認我們的成績很好，不過思想有問題，而且說要進來是可以的，只是要我們去要求青年軍和青年團的同學担保，並且他還說：『這真是國民黨新辦的學校，國立學校，就是國民黨辦的學校，我們一切都得服從國民黨！』

再說：我們這批落榜者大都是家境貧寒，歸家的路途遙遠，想盡了辦法才籌得來杭投考的旅費，而現在家中的匯款尚未到，只好再在這裏借住幾天。可是在廿四日的半夜，則聽得竟一行數人氣勢兇兇地來到宿舍，迫令我們馬上遷出，在此深夜，又下着大雨，許多同學竟被捲起被子趕了出來！

編者先生：寫到這裏我真要流下淚來，我不知道這是人間還是地獄！汪氏身為專科學校校長，到底是辦教育呢？還是摧殘教育！是教育青年呢？還是迫害青年！所謂學術自由在那裏？黨派退出學校又作何解釋？

投考藝專落榜者 八月廿六日 杭州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從老遠的南方跑到杭州來投考國立藝專。到杭後，距離考試的時間還有幾十天，我就借住在他們學校裏，在自治會所主辦的投考同學服務社補習繪畫；（他們學校裏還有一個服務團體所謂研習會，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及青年軍同學辦的。）在這幾十天裏，我一直埋頭學習，所以進步很快，從老師同學和教授的口中說起來，成績要算投考者中最好的了！考試過後，自信各科成績都取得相當不錯，可是發榜了，榜上竟沒有我的名字。

後來從某些教授的口中傳出了一部份的真相，這一次取錄新生完全是由該校校長汪日章一人圈定，而他圈定的標準是根據研習會平日對投考者調查放棄。所謂招生委員會原定下午三時開會，汪校長五時四十分才來，將他圈定的名單讀了一下了事，有教授提出要對成績，他却說：『我已對好了，馬上就要吃晚飯，不必耽擱時間！』

我壓抑了自己的感情，和另外的幾個落榜者去見汪校長，要求查看成績，如果及格的話，就給予試讀或旁聽。汪校長當即承認我們的成績很好，不過思想有問題，而且說要進來是可以的，只是要我們去要求青年軍和青年團的同學担保，並且他還說：『這真是國民黨新辦的學校，國立學校，就是國民黨辦的學校，我們一切都得服從國民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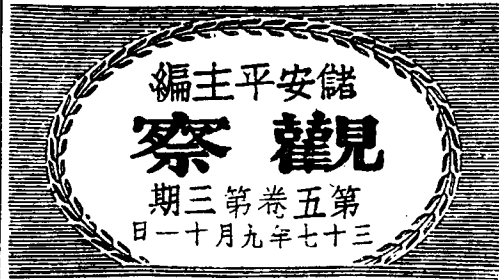
再說：我們這批落榜者大都是家境貧寒，歸家的路途遙遠，想盡了辦法才籌得來杭投考的旅費，而現在家中的匯款尚未到，只好再在這裏借住幾天。可是在廿四日的半夜，則聽得竟一行數人氣勢兇兇地來到宿舍，迫令我們馬上遷出，在此深夜，又下着大雨，許多同學竟被捲起被子趕了出來！

編者先生：寫到這裏我真要流下淚來，我不知道這是人間還是地獄！汪氏身為專科學校校長，到底是辦教育呢？還是摧殘教育！是教育青年呢？還是迫害青年！所謂學術自由在那裏？黨派退出學校又作何解釋？

投考藝專落榜者 八月廿六日 杭州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對社會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徐道鄰：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何水信：
曹璽發：

國法與校章之間

樓邦彥

一個問題，一件事，總是有好多方面的，這好多方面的重疊性程度，却未必以是否受人注意而為定。譬如最近政府當局在各地拘傳大批學生一事來說，政府自然把它看做在悲劇期間為消除「匪諜」的必要措施，但在不滿意政府這種措施的人們看來，它是一個法律問題，它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它也是一個有關教育的問題。我在此姑以一個研究公法的從事教育工作者的地位，來探討這件並不能算小的事情，提出一個或許尚未為人十分注意的國法與校章之間的問題。本文的目的祇是在把問題提出來，我自己尚未有肯定的結論，不過希望大家對這問題來作一番思考而已。我相信在每一個從事教育工作者的眼光中，政府此次的措施，無論就規模或方式來說，確實是空前的。它比澆水龍，非刑拷打，或竟致用達姆彈槍殺，都要嚴重，因為它不但抹煞了人權，而且摧殘了整個的教育。

根據報載消息，各地憲警當局對於被拘傳的學生都是採取直接的行動，到學校執行搜捕的，其唯一的例外就是北京大學。明眼人一定會看得很清楚，在中國的社會裏，並處於現實的情勢下，這裏面當然包含着很多複雜微妙的因素，我們姑且不在此贅述。不過我們略有所聞，北大所受到外面的壓力也並不小，其演變的結果，可能是因為情勢的迫切，學校方面鑄下了一個因小失大的錯誤。我想用下面所抄的幾段文字來加說明。

八月二十二日，北大出了佈字第二十八號的一個佈告，其原文，除略去學生的姓名外，如下：「這次特種刑事法庭先後傳訊本校學生……等四十八人，我們已經屢次表示，希望他們自行到案，必要時願聘學校人員陪同到庭，並由學校代請法律顧問。現在已經到庭經過訊問回的已有好幾位。我們現在很誠懇的希望尚未到案的同學，務必認清當前的環境，顧念自己的前途，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以前到訓導處報到，由本校派員陪往特種刑事法庭。經過詢問後當即由本校設法具保。其過期不報到者，學校一律停止其學籍。此佈。」

翌日晚，胡適校長致函北平警備部陳總司令，表明學校的態度，其原文如下：「繼承先生：此次特種刑事法庭傳訊的北平學生五十人，除×××，×××並無其人外，共四十八人。此四十八人已經本校負責高級人員詳細調查，結果如下：(一)已赴法庭報到者六人……(二)即赴法庭報到者一人……(三)已經本校於七月二十一日榜示開除學籍者三人……(四)確知已經離校南下者七人……(五)已經離校者二人……(六)已經畢業在外就業或實習者四人……(七)不在宿舍者二十五人……以上調查之結果，均由本校訓導長等以書面向我負責報告……我們現在正查明凡確在北平而避不到案之本平學生，均一律停止其學籍，決不許其註冊，亦決不許其滯居學校內活動。我很誠懇的盼望先生與貴部同人相信我的報告與保證。弟胡適敬上。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

二十四日，北平憲警當局的負責大員親赴北大訪問胡適校長，並在各院巡視一番；跟着就是陳繼承總司令的覆函如下：「適之先生：收到先生二十三日的信，關於特種刑庭傳拘學生的事，治安機關有協助執行的責任。先生負責保證貴校被拘傳的除到案的以外，已無他人在校，我們當然相信，並據憲警負責人報告，他們已進校看過，調查的結果與先生調查的一樣。我們希望凡確知不在北平的學生，請學校方面轉知他們從速到當地法庭投案，否則也一樣開除學籍。如果他們或他們的同黨再在學校活動，負有司法警察任務的憲警將根據職權隨時到學校逮捕。這是該先向先生聲明。敬祝健康。陳繼承敬上。八月二十四日。」

別的先不說，我願大家注意一個國法與校章的關係的問題。胡適校長的信內說：「我們現在正查明凡確在北平而避不到案之本平學生，均一律停止其學籍，決不許其註冊，亦決不許其滯居學校內活動」；陳繼承總司令的信內也說：「我們希望凡確知不在北平的學生，請學校方面轉知他們從速到當地法庭投案，否則也一樣開除學籍」。固然，嚴格地說

，「停止學籍與「開除」學籍是學校對於學生的不同性質的處分，而兩封信的不同用詞也自然各有用意，我倒並非要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我所要指出的是北大所創下的一個違背教育原則的先例，這就是說，學生的學籍問題為校外政府機關的決定所支配，這豈非教育的獨立性受到了打擊麼？最近又據報載，教育部訓令各校當局，凡被特種刑事法庭拘傳指控的學生，學校當局應即一律將其開除學籍。這與北大的最近措施是否有因果關係，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無論如何，我敢說，這無疑是教育與政治重又打成一片的開端。

國法人人皆應遵守，這是任何法治國家的一個不變的法則。一個人除掉是國民外，又可能是社團的組成份子，或學校的學生，那麼他不但受國法的約束，他又受他所屬的社團規約的約束，或受他就職的學校校章的約束。如同國家具有它的特性，社團與學校也具有它們的特性；兩者容或有共同的地方，然而我們不能忽略了它們互相不一致之處。學生品行不端，固然可以同時抵觸國法並違犯校章，然而抵觸國法與違犯校章未必總是一致的。某一學生的行為為抵觸了國法，却未必同時違犯了校章，同樣的，他的行為違犯了校章，也未必同時抵觸了國法。試舉幾個淺顯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同時抵觸國法並違犯校章。假使某一學生做了搶奪強盜的行為，那麼他不但抵觸了國家的刑律而應受處罰，而且學校也可以考慮他的品行已經不端到應受處分（記過或開除學籍）的程度。這個時候，國法與校章可以說是一致了。

第二個例子是抵觸國法而未違犯校章。其較輕者如某一學生因違警（如妨害安寧，妨害交通……等）而受國法（違警罰法）的制裁，學校則儘可以不考慮他的應否受處分的問題。其較嚴重者如某一學生做了妨害名譽或侵佔的行為，那麼他雖然抵觸了國家的刑律而應受處罰，學校仍可以認為他的品行並未不端到非受處分不可的程度。這是國法與校章不一致的一種情形。

第三個例子是違犯校章而未抵觸國法。假使某一學生功課欠佳或不斷無故缺課，學校當然可以依據校章加以處分，這處分或許竟然是開除學籍，但是他並未抵觸任何國法，在理論上他依舊可以是一個良好的國民。這是國法與校章

不一致的又一種情形。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國法與校章完全是兩回事。不但抵觸國法不一定違犯校章，或違犯校章不一定抵觸國法，就是同時抵觸國法並違犯校章，學校對於行為者的學生的處分，並非由於他受了國法的制裁。唯其是這樣，教育才不致與政治打成一片，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獨立性也才可以維持。

我不反對學校光明正大地理阻止惡警當局隨時到學校逮捕學生，但是真正到了無理可講，無保障可講的時候，我不主張學校為了維護表面上不被意警便入學校的清白的理由，竟然濫用正直的校章去迷迭法律上或許成問題的國法的執行。無鑿地，我們人人都應守法，但這究竟是一個應該有相當保留的理論，因為我們尚應認清這個亂糟糟時代的現實。當今之時，政府要我們遵守的法不一定個個都是好法（好法就是大家所要的法），而且法的執行也不一定條件都合乎正義的條件（因為我們尚未建立健全的人民控制政府的制度）。處在這樣的環境中，祇要客觀的情形允許，尤其是對於政治性的問題，學校應該極力保持中立的地位；庶幾它能常常超越時代去注視較遠的景象，這才不負教育對於國家的使命與貢獻。政府如果決意不顧時代的要求，從而破壞學校的獨立地位，抹煞教育對於國家的可能貢獻，那麼政府祇能自食其果，自負其責。這樣的政府已經走上了極權之路，若再有維護學校清白之念，那簡直是狂妄的想法。

說到現實，未免牽涉得太廣，可是對於正確的概念，我們却不能避免而不加加以認識。國民與學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身分，國法與校章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約束，井水與河水不能兩相混雜。國法與校章之間橫着一道鴻溝，違犯國民仍舊可以是一個優秀的學生，犯規的學生也仍舊可以是一個良好的國民。國家與學校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生活，受制於兩種不同的規範。正好像兒子做了抵觸國法的行為，政府不能強制改變父親同他的關係，政府又怎能因為學生抵觸了國法，而強制改變學校同他的關係？

我不敢說以上是我肯定的結論，可是我總覺得「國法與校章之間」應該是

卅七年九月二日北平。

論現行法律教育制度

徐道鄰

談起現在我國的法律教育，恐怕一般人都是在搖頭。茲擬開整個教育環境及個別學校的特殊情形不論，專就法律教育的制度方面，略為檢討如下：

一、分組問題

現行的分組制度，係根據教育部卅四年十月六日公布之法律學系科目表。其說明中第二項，謂凡設備欠缺或不便分組者，可採混合制。足見教育部的理

想，是要分組的。而其分組凡四：（一）司法組，（二）行政法學組，（三）國際法學組，（四）理論法學組。

法律教育之分組，其理論當否，姑不具論，然此制度之實際作用何在，則殊難使人體會。若云依組分班乎？則如司法組有學生九十名（以高考及就業關係，目前司法組學生佔多數），國際法學組有學生八名，而其共同科目，至少有一百一十三個學分（法學院必修科目至少五十學分，各組共同必修課目至

少六十三學分)。在此同樣科目授課時，將必使九十人為一班，而其他八人為一班乎？若云依組限定教員名額：則如甲校祇設兩組，而學生甚多，每年級皆開雙班或三班，（如全校為七百人）乙校設有三組，而學生甚少，每班不過二十人（如全校為二百人），然則乙校教員，應較甲校仍多三分之一乎（如甲校十二人，則乙校應為十八人）？若云依分組性質以聘請教員：則不設國際法學組者，可以不聘國際法教員不開國際法，不設理論法學組者，可以不聘法理學教員不聘法理學乎？

再就學生方面說，這四個組，雖同屬於法律學，而其學術性質，工作環境，實相去甚遠，學生們才進大學，對法律學本身為何物，尙未十分明瞭，而即欲其選擇分組，不亦難乎？（四五歲小孩，囁着身體不舒服要看病，而要他指定腸胃科，神經科，分泌科，豈非笑話？）且大學教育，本為學術研究，設備、師資及環境，在在足以左右學生們研究的興趣。今如司法法組學生提出一國際法論文，或理論法學組學生提出一訴訟法論文，在學校方面將不予審查乎，抑使之轉組乎？抑根本不理會分組問題乎？

惟一看出來的分組作用，就是各組的科目表，而此表則又大成問題。例如司法組的必修科目，無土地法及勞工法，請問律師法官遇見了這種案子怎麼辦？司政法學組的必修科目無訴訟法，請問不懂行政救濟的，算不算行政法學專家，政學過訴訟法的人，能不能懂得行政救濟？理論法學組的必修科目，第一項是商事法，而中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西洋法制史，反屬選修，誠不知此中奧理所在！又有許多科目，開下來很好看，而現在中國能教授這些科目的有幾個人？如所謂比較行政法、國際行政法、比較憲法、立法原理、比較法學緒論、比較民法等等，請問在歐美先進的國家，那個大學裏，經常的開過這幾門功課？在那個大學裏，這幾門是某種考試的必修課程？

我以為法學分組，祇有在一種情形之下，是有意義和必需。就是在學生提出畢業論文後口試時，可以依其所屬組的不同，而對他們考試科目的要求，分別的予以提高或減低。不過各組的科目，還須詳細斟酌。而我以為司法法組內的民法刑法，不妨分開，而法史學則似應另成一組。

二、公共科目問題

在法律系必修科目中，有所謂法學院共同必修科目，（教育部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頒布，三十三年八月修訂）計有三民主義、倫理學、國文、外國文、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哲學概論、理則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普通心理學等十二門科目，總計至少五十二個學分（事實上為選就教師排課，學分超出此數甚多）。這些科目，有的為補充中學時代的欠缺，有的是學法律者比較上應有的常識，其用意未嘗不佳，但是事實上，教員和學生，都認為它們是些次要科目，認為它們是些『苛捐雜稅』，學生們多數照例缺課，教員們大半無精打采，到了學期終了，學生得學分，教員支薪水，耗費的是時間人力和物力。

學校、教員和學生方面，為這十二門科目的負擔，和學生實際的收穫，這一個比例的惡劣，凡是法律系的教員和學生間，實是盡人皆知。

我的意見：這十二門科目，最好一律改為選修，而由學生們任選二門，最好在第二三學年裏面去修，學生自知用功，教員自然起勁，這樣上課才有意義。否則根本不必開課，而定作考試課目，指定教員作讀書指導，我保險學期考試的試卷成績，不會比現在差，而學生的功課表上，不致於像現在這麼擠，以剝奪了學生們自修的時間，而免得教員和學生，在課堂上受罪！

三、主要法律科目問題

法律教育中民法刑法的重要，是不須詳說的。但是看一看我們的科目表，在四個整個學年裏，民法最多不過佔二十六個學分，可能祇是十九個學分；刑法最多不過佔十二個學分，可能祇是八個學分。換言之，一個法律系的學生，學校對他的要求，和供給他學習的機會，債權總論和世界通史，是完全一樣的，刑法總論和哲學概論或什麼心理學，是相差不多。就制度上而言，法學生讀四年的法律學，對於民法法的下過的功夫，不過是各上過一次課，和參加過一次學期考試而已。學校既不作比其他科目更切實更深刻的要求，也不給他們可以作更切實更深刻的研究和設備。請大家想一想，法律中的民法和刑法，是不是讀過一次講和參加過一次期考，就可以算『學會』了？學工的學生，總要到工廠實習，學醫的要到病房，學科學的要到實驗室，以考驗其對學理了解如何，而學法律的學生，對於他們作基礎的民法，祇是上過一次課而已，天下寧有是理？

我在同濟法學院裏，為曾經聽過了民法的學生，開過一次講習班，是請薛祖光先生主講的。算是選修科目，可是要經過薛先生口試認可後才許參加。有些學生，原來自以為已『通』民法的，旁聽了幾次之後，方知道過去根本沒有摸着門。這個講習班收穫很好，很多學生要求多開些這類的講習班。（本來在德國和瑞士的大學裏，上課根本沒有考試，只有在參加司法官考試和博士考試時，要提出至少五個參加過這類講習班的證明文件。）

四、國文和外國文問題

現在一般大學畢業生，無論什麼學科，除非家庭環境特殊，論國文：一個個文字欠通，字體惡劣，白字連篇，典故亂用。論外國文：則既不能說，又不能看，更不能寫。佔去小學中學裏多少時間，消耗了青年多少精神氣力學來的，一點外國文，經過了大學四五年的教育，而終於歸於正統。尤其國文的不佳，使學生到了社會裏，處處吃虧碰壁。這個缺點和危機，法學院的同學們，沒有一個不深切了解的。

我認為在學校方面，在大學生四五年的讀書期間，應該經常的給他們繼續補習國文和外國文的機會。我在同濟法學院裏，每班次皆有國文班，德文班和英文班。不但是定為選修科目由學生自由參加，並且還有考試成績好即計算學

分，成績不及格即不算學分的優待。一律用小班次，每十餘人成一班，習國文的每個人皆要作文，習外國文的每個人皆要說話。學生參加的興趣，和實際學習的收穫，令人相當滿意。

以上四個制度上的問題，想大家一般都會感覺得到的。今天我特把經驗所得，在學期就要開始的時候，寫出來供大家的參考，並請大家指教。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

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

潘光旦

婦女運動，自從一七九二年英國高爾斯東克夫脫女士 (Mary Wollstonecraft) 發表她的「女權宣言」以後，到如今可以說有過兩個時期，而前途可能的進入第三個時期。第一個可以叫做抗戰時期。好比宗教革命以後，新的耶穌教派對舊的天主教稱為抗戰教一樣。第二個時期可以叫做解放時期；抗戰相當成功以後，女子在社會與文化裏得以自由活動，至少，實際上雖然有種種限制，法律上的種種限制早就幾乎完全不再存在。我們目前就在這時期裏。這兩個時期先後都曾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但也產生了不少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婦女自身的，也有關於社會一般的，例如家庭組織的動搖與子女教育的欠缺等。要運動的結果不但使婦女問題自能比較長久的不再成為問題，並且使全般社會與民族不再蒙受不良的影響，而發生新問題，我認爲我們應當進一步的導引它，控制它，以入於第三個時期，我這裏稱它爲位育的時期。

在前兩個時期裏，我們對於婦女問題有過四個不同的論點，兩個屬於抗戰時期，兩個屬於解放時期。屬於前者的，(一)是與男子抗衡；(二)是對家庭革命；屬於後者的，(三)是爭個人人格；(四)是應社會需求。在第三個時期裏，我們應當有的新論點是(五)促進女性健康。此外可能還有別的，不過有此五個，似已足夠概括了。這五個論點也可以說是建築在三種不同的自覺上的，一二的基礎是「女子也是人」的自覺；三四的基礎是「每一個女子也是一個個人」的自覺；非等到大部份的女子，至少是受過教育的女子，有「女子屬於女性，與男性根本上有些不同」的自覺，那第五個論點就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也不會有發人深省與解決問題的力量。

第一個論點，與男子抗衡，顯然是最早期的。在父系以至於父權的社會裏，一半因爲積習，一半也未始不由於自然的趨勢，一種重男輕女的局面是極容易養成的。我說積習，是誰都知道的；我說自然的趨勢，怕就有人不能同意。其實這種趨勢是最明顯的。除陽兩性的分化原是一個有機演化的事實，並在人類登場以前，便有過極悠久的歷史。性的基本功能原在生育，而一經分化，兩性對於生育的責任便有輕重懸殊的分別，這是表面上誰都看得見的；看不見的是，爲了適應此種不同的責任，兩性在一般的生理上也就發生了根本的差別，就最基本的形體作用而論，陽性是諸多於代，陰性是代多於附；在後者，唯其代多，所以能負起艱苦的生育責任；在前者，唯其附多，所以才會有種種社會活動與文化事業的表現；也可以說，唯其附多，唯其於生育之外，尚有多量的餘力，才終於造成了父權的社會，造成了一種近乎男子獨佔的局面。我所謂自然的趨勢就是這一番演化的經過。我認爲研究婦女問題時，我們於積習之外，必須承認這一層自然演化的過程；積習固然不健全，特別是對於女子，理應改革，就女子一方面而言，更理應抗議，但自然的趨勢却是抗變不來的事。近人一部分關於婦女運動的著作，往往不明此理，以爲女子社會地位的低落，以至於女子體格的弱小，全都出於男子的侵佔與壓迫，並且好像是完全出乎男子有計劃的安排；例如，德人凡爾丁 (Vaering) 夫婦所著「男女特性比較論」和陳東原所著

「中國婦女生活史」都犯這個毛病，凡爾丁一書且有意歪曲事實來替婦女運動張目的嫌疑。

不過，上文已經提到，重男輕女的積習是應當革除的。男女有本性上的不同，是不錯的，在社會生活裏男女大體上會趨於分工，也是不錯的，然而雙方都是人，都具有人的性格，誰都不是誰的工具，不是附屬品，終究是一個更大的事實。婦女運動所以成爲一種抗議的運動，在這一點上是絕對的有理由的。運動發軔期間的「女權宣言」最有力的根據也就是這個理由。

家庭革命的論點在中國比較發達，甚至於畸形的發達。中國女子，除了妻子的地位而外，幾乎沒有別的地位可言。當抗戰的初期，這論點也是很有理由的。男子於做丈夫做父親而外，又有許多家庭以外的身份與活動，何以女子於做妻子做母親而外便沒有？而同是家庭的一員，同是建築成家庭的兩塊基石，何以男子可以多妻，何以女子要特別佔優勢？都是一些極值得提出質問的問題。再就性的一個題目而言。何以男子可以多妻，何以提出離婚，可以有家庭以外的性的自由？而女子比較沒有？同一性的道德，又何以適用於男子的標準比適用於女子的要特別寬大？守節、守貞、一生不二的德操何以單單的責成女子，而不責成男子？不說別的題目，單單這一個性的題目已經足夠成爲革命的理由，教女子搦竿而起。

女子的所以成爲家庭的動物，馴至家庭而外，更沒有其他活動的範圍與餘地，這其間也是一半由於積習，而一半由於自然的趨勢；積習應當改正，而自然的趨勢又是無可如何之事。女子因爲性生理的不同於男子，春機發陳(舊稱春機發動，今就中國舊有之醫學文獻酌改)以後，有月經的運行，結婚以後，又有懷妊、生育、哺乳一大串的生物的任務，而此種任務，前後又不止一串而止，在生育力比較強大的女子，從結婚至月經停止，二三十年之間，可以完全沒有間歇；而當月經將絕未絕的少數年份裏，生理心理又大都需要一些休息與調攝的時間——這些，合併起來，就不免大大的緊縮了女子向外活動的範圍，比起男子來，教她不得不安於一種比較靜止的生涯，而這種緊縮的範圍與靜止的場合，不用說，就是家庭了。這就是自然趨勢的說法。這種自然的趨勢，有的固然可以不理會，例如月經，有的可以阻止使不發生，例如孕育哺乳；不過過分不理會與阻止的結果，小之可以影響女子個人的健康，大之可以危及種族的生命。換言之，就是非理會而與以發生的機會不可，至少大多數的女子，爲了個人與種族的安全計，非順適此種自然的趨勢不可。其少數不能順適的勢不免被擠於自然演化的洪流之外，而歸於淘汰。

所論家庭革命的論點，到比可以分成兩部分說。一是對此種自然趨勢的革命，一是對積習的革命。我們根據上文的議論，可知對於前者的革命是徒然的；對於前者，我們所能做到的是一些調適的努力，這種努力目前還極少，大約要上文所提到的第三個時期充分來到以後才有希望。不過對於積習的革命不是徒勞的。男權社會的演成，父權家庭的產出，一面雖依據自然趨勢，一面也未始不由於我們過分利用這種自然的趨勢，這種過分激進的

地方，就是我所稱的放習了。「易經」稱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大體上是對的，但若一方一味的始，一方一味的成，即一方一味的利於進取，一方一味的安於保守，那自然的趨勢便有變本加厲的危險。兩性的相與，本是一種互予所稱的不同而和之局，變本加厲的結果是增加不同到一個有害於和的程度。這種危險無疑的是要加以消弭的。

與男子抗衡，對家庭革命，都是消極的論點。一到爭取女子個人的人格與適應社會的需求，就比較積極了。前兩個論點所已使婦女運動收穫到的東西，是很籠統的，就是爭得了女子一般的人格。到此，所爭的便進一步而為每一個女子的個性化。在抗戰時期裏，運用了最初兩個論點來從事運動，那從事的人無須太多，只要少數有魄力有見解的男子會登高一呼，據理力爭，便不難取得社會與文化的同情與承認。甚至於明白物理的男子也會替婦女仗義執言，來增加運動的聲勢，促進運動的成功，例如英國的穆勒約翰之流。到此，形勢也復一變，一方面、參加的女子必須大量的增加，一方面，男子不能再越俎代謀、即在旁邊打幾聲鑼鼓，那效力也有限制。更重要的一層是，第一時期可以用議論取勝，到此便不能不用事實證明，第一時期裏，只要有人鳴金擊鼓，到此便非切實作戰不可了。換言之，到此，必須有比較大量的女子分別的把自己所有的本領拿出來，為的是要證明，凡屬男子所有的能力，她們也有，男子所能勝任的事業，她們也能勝任。

這第二期的運動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是相當的成功。第一步，教育機會的爭取，可以說還是屬於第一時期的努力，但第二步，教育機會的利用，與第三步，教育結果的運用，却完全是屬於這第二時期的。這些，都不能不說是相當的如願以償的。教育機會的利用，無論在為女子專設的學校裏，或在男女共讀的學校裏，已經充分的證明女子和男子同樣的有個性，此種個性同樣的有發展的可能與必要。智力測驗如此證明，各種特殊才能的測驗，以及各種學科的成績，大體上也證明如此；至於教育結果的運用更事實勝於雄辯的證明這一點。歷年以來，婦女從事於家庭以外的職業的人數，一天大似一天，延用的女子職業的門類，也一天多似一天；如果女子的個性不夠發達，不足以利用一切教育的機會，對於各種職業不足以勝任愉快，這種日增月盛的光景，是不會發生的。至於一部分的職業，例如教育、醫事衛生、社會工作，女子參加的人數往往超越男子之上，工作的效率也往往比男子為高，更證明了以前那種近於禁錮的政策是一個歷史上的錯誤。

上文這一段話事實上已經把個人人格與社會需求的兩個論點兼提並顯，似乎無須再分別的加以討論。不過，社會需要的一個論點好比家庭革命的論點一樣，在中國似乎是特別的有力量，而其原因也正復相同。就是，以前家庭的禁錮越嚴，今日向社會尋求解放的動力自越不可遏制。壓抑於內的「潛能」越多，則發揮在外的「動能」越大，原是一層單純的力學的原理。所以二三十年來，社會服務的呼聲，在中國婦女運動裏，也有很大的地位。女子之所以爭取教育機會，為此；女子於完成教育之後，遲遲不肯結婚，也為此；有的女子，到了結婚的前夕，為此不得不和未來的丈夫約法三章，在婚禮席上致詞，為此不免作一些公開的申明，說她對於服務的意志決不因婚姻而動搖，對於服務的勞績，當亦不因婚姻而減色。一種信誓旦旦的態度與辭氣，在這種場合上應當為婚姻關係而發的，她們却為社會服務而發，真是得未曾有，令人肅然起敬。自從抗戰以來，因為社會上人力不敷分配，這點自更見得振振有詞，發人深省。

不過，這是一個很大的「不過」，在這種論點之下，社會與文化雖有時多少佔了一些便宜，這種便宜並不是絕對的，即有一方佔便宜，有另一方要吃虧，這另一方是誰呢？不是別的，就是女子自己。女子所吃的虧是從三個不同的方向來的。一可以說是由於力不從

心。在第一時期裏，她的努力只限於心思的一方面，所費的往往祇是一些口舌與筆墨的工夫，當時的問題比較簡單。到了第二時期，這種努力便不限於心思的一方面，而牽涉到體力一方面。論心思才智，男女大體上是平均的；在智力的變異性一層上，男女可能有些不同，但在平時的社會生活裏，這種不同也並沒有多大的實際影響；但體力的高下有殊，至少適合於男子體力的許多工作與活動未必適合於女子的體力，却是一大事實；實際的體力不能應付，而多年來婦女運動所已養成的意志非救她應付不可，結果便非吃虧不可了。這一層，凡屬在男女共同工作的場合裏，例如學校、工廠、商店等，已經積聚了不少的材

料，可資證明。女子所吃的第二種虧是由於情緒生活受忽略而來的。男女的性別不同，性情緒也不同，而一般的情緒也就不同。女子善感，女子多愁善病，原是一個極古老的觀察，近代性心理學家也說，「女子往往用情緒來解釋理智」。近代的教育是誰都承認只重理智而不問情緒的，這種教育，即就女子而言，已經是極不相宜，而自第二期的婦女運動以來，女子所爭得的教育恰好就是這套遺留下來的一套，結果的比男子還要不健全，自是可想而知。性心理學家的結論是，由於這種教育，「一種不和諧不調協的趨向便會發生，甚至使人格受局部的損傷或全部的破碎」（詳拙譯露理士性的教育，頁七八）。至於獨身，遲婚，不生或生育過遲種種現象的發生，使性的生活以及母愛的傾向不能有適當的發展與滿足，轉而影響到一般生活的健康，便是女子所吃的第三方面的虧了。

綜台三方面說，婦女運動的結果，特別到了第二時期，就女子自身說，是以解放、獨立、自由、平等一類的虛名換得了生理與心理健康遭受嚴重的威脅的實際。其原因固不止一端，其主因所在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一舍己從人。「從人」，指的是運動的目標端在「忠實」男子，不惜以男子的標準為標準，惟恐自己的活動範圍受了限制，以致趕不上男子的那般寬大。中國的婦女運動從開始的時候便反對所謂「三從四德」，那是很有理由的，不過從「從父，從夫，從子」的三從換取了「從男」的一從，儘管「從」字的解釋略有廣狹的不同以及主動與被動的分別，在明眼人看來，不免覺得收條條究竟有限。至於「舍己」，指的是婦女運動始終忽略了女子的本性，或完全把這種本性遺忘了，即或不忘記，又往往在剛復自用的認為無足重輕，甚或以為完全屬於後天獲得的品格，而並不是真正的本性。關於這一層，目前的篇幅不容許我作比較詳細的解釋，我姑且再引性心理學家露理士的一段比較長的結論，以示此種本性的存在，而不容漠視。露氏說，「當務之急，在要讓大家都知道女子有女子的特殊需要，好比男子有男子的特殊需要一樣。要是不能顧到這種特殊需要，而強其接受適用於男子的一些原則限制，則不特對於女子自身有害，對於社會生活全般也是毫無益處。我們對於男子也可以說同樣的話，總之，男女之間，無論在學校裏或社會上，我們應則希望他們能共同工作，相輔相成，但彼此所由達到生活的鵲的路徑，終究因天性的不同而有歧異，鵲的能否到達，即應能否遵循天性的法則為動。我們在這裏要牢記住的一點是，女子之於男子，不但體魄比較短小，組織比較細膩，並且她們生活的重心又極容易受一種富有節奏的性的波浪所震動搖，這種重心易受顛簸的現象，在男子可以說完全沒有；而在女子，却幾於無時無刻不受它的支配。所以名為同是圓顛方趾，而實則女子的生活，好比一座持平的戲子，動不動便不能保持均勢的危險——無論大腦也罷，或神經系統的全部也罷，或肌肉部分也罷，只要受一些有分量的壓迫，便要比男子容易引起嚴重的紛亂。上文所謂特殊的需要，與此種需要的不能不體貼在此。」（拙譯性的教育，頁七四—七五。）這一番話事實上就等於上文「吃虧」之論

的一個綜合的敘述，而於情緒生活的最易吃虧一層，說得尤其切實。討論到此，我們至少在理論上已經進入婦女運動應有的第三個時期，就是以女子自身

的健康為唯一的論點的時期。至於如何使理論演成實際，我們在這裏只能作一些原則上的提示，詳細的節目終必有待於女子的自覺與自求多福的努力。第一個極單純的原則是，我們一面對於男重女輕、男外女內一類變本加厲的積習應竭力破除，一面對於上文所再三論說的自然的趨勢，包括生物學上兩性分化的基本事實，却仍宜充分的尊重，橫加抹殺，或熟視無睹，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第二、既承認生物的性分化，便不能承認社會的分工；這分工當然不是絕對的，好比分化原不是絕對的一樣。男女同是人類，男女都有個性的變異，是雖異而間的一方面；男有男性，女有女性，而個性的變異又往往因性別而互有不同的表現，又是雖同而異的一方面；所謂分化的不絕對在此。如何對於分化的同異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下)

張東蓀

§七 我在書中曾強調有這些事情是與理論無關的。上述的這些革命內部自己造出來的困難亦是與理論不相干。以慾望而論，按照社會主義的正軌來說，本來是把勞動時間縮短，每人只做二三小時，餘下來的生活即可從事于「移升」(sublimation 舊譯昇華)。或從事于音樂，或繪畫，或科學研究。這便是一方面杜塞了物質慾的畸形發展，解放了勞動的苦痛，俾得在他方面向文化有一個昇華作用。這是最高尚的理想，亦是最合理的辦法。無如現實人生尚不能一躍而跨。所以在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權力慾的偏向以及其鬥爭的尖銳化是不能由社會主義的理論負責任的。我在書中再三提及理論與現實之間必須有個銜接的具體辦法或制度。上述這些弊病都是出於沒有覓得一個適當的銜接辦法。或可說在銜接的中間制度上有了漏洞，出了毛病。所以我要奉勸今天前進的人士，連青年們在內，與其空彈高調的理想，反不如切切實實，負責任地去研究這個銜接的媒介辦法，務使其無流弊或少流弊。

產業最高度發展的國家尚沒有這樣的變化，情形究竟如何，我們無法斷斷。我們今天所見的只是一些產業落後的國家。上述的種種困難却和產業落後有密切關係。據我個人的想法，倘使產業落後的國家是以增加生產總量使一班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為第一要著，則對於物質慾當然是要加以限制的，不過必須有其分際。例如造房子用美國木料，衣服用美國的玻璃紗。諸如此類是要絕對禁止的。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必須保持國際出入的平衡。至于中國土產的綢緞，雖然高貴講究，却不須加以制裁。又如浴盆與抽水馬桶，劉緒貽先生以為錦上添花，我則以為只要不是外國貨，而為中國自製，即無反對必要。所以有人主張一律把生活拉平，大家只許穿布衣住茅棚，這是一種不通的議論。

我相信對於物質慾的差等不完全作絕對的打擊與禁阻，則權力慾的偏向的激發自會有相當的緩和與減低。因為在物質享受方面保留有相當的差等，乃是對於生產工作的努力之一種獎勵。當然除此以外尚可有名譽的獎勵。不過須知專靠名譽的獎勵是不行的，必須有實質的方面相輔而行。人們以自己的努力取得其相當的報酬，在精神上是一種快愉。僅僅空的名譽不足相抵。這正是宜洩

之間，從而安排青年男女的教育，分配成年男女在社會上的作業，以及對於家庭子女的責任，執者宜乎共通，執者宜乎維持均勢，執者宜乎稍分實主，執者宜乎由一方稍專責成——這便是所謂不絕對的社會分工了。男女的分化還有一種不絕對的所在，就是一部分男子有女子的性格，而一部分的女子有男子的性格，或更大一部分的男子間或有些女性的表現，雖非通例，為數亦不太小；對於這些，我們在分工的局面中，也宜乎預為之地。總之，我們的目的，是使每一個人能得到他的適性的位置，而無礙於健康的地位，為女子思想如此，為男子思想也未嘗不如此。到此，不特婦女運動到達一個比較所謂理想的時期，就是家庭、社會、文化、民族的生活也就轉進一個更和諧更光明的境界。

其物質慾望之道。所以我們應得明白人們有慾望，並不可怕，而可怕的只是慾望在社會結構上不能協調。犧牲他人以滿足自己，其關鍵還是由于不把整個兒社會推向發展之途以進。倘能改向發展，則各人皆可有所事。各人有事可做，各人滿足其不害他人的自己慾望，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目的。社會主義並不主張抑止慾望與克制慾望，而却要使人的慾望轉向。轉到向四方八面去發展。所以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否就看其能否使人的慾望由于向各方面的發展而獲得免去衝突到協調。倘使不了解此意，只知一味提倡經濟平等主義，這便是把物質慾堵住了，而任其趨于權力慾。因為不走向發展則只有加強控制。以控制代替發展便只有把大家都驅得走向權力的競爭，以致在權力方面鬥爭便起了尖銳化。權力上有一爭端，外來勢力的引誘便極容易進來，以致歷史上有所謂「反叛」事件層出不已。這却不可太單純，只責那些所謂反叛者，而應了解這樣的制度本身不無毛病。如果在權力慾方面再想加以堵塞，則應知既實行有計劃性的經濟，必須要有集權的政治，這就十二分困難了。換言之，即在經濟方面既要控制，則在政治方面自然容易使人們發揮其支配慾。原來支配慾是對人的，而物質慾却至少包有對物的成分在後。一個社會不能動員極大多數人對於物質方面努力去開拓，則終難免于偏向到往著支配人的方面去擠。所以提倡全民增產，向着自然界去開發，實在是一個轉化慾望的好方法。

§八 關於權力慾的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我們應得對於論壇上有人以為經濟平等與政治自由不能兩全的顧慮加以正視。事實上亦確是有一些問題。老實說，杜絕了一部分人發揮其不正常的物質慾，這固是好事，然而同時却讓另一部分人滋長了其支配慾，這乃仍是二五等子一十，其失維均了。所以我在上文說，一個革命往往在于其過程即自己製造了，孕育了一些內在的困難，迨至成功，反而大暴發起來。這些可以變為將來困難的因素必須在事前都得到。歷史上的所有的救濟之法即是把政治建立于輿論上。換言之，即以輿論來監督政治。在此處的問題是如何乃成為完全自由的輿論，勢必把報紙、印刷所、與廣播電台等宣傳工具完全許人民自由使用，不為政府或在朝的政黨所壟斷。(共公集

會與公開演說不必說了。主要的點還不僅在於使人民自由發表意見或主張，乃尤在乎使人民知各種事實的真相。我相信只要報道是真實的，人們的判斷大約不致相去太遠。一切主張上的不同大抵是出於以不同的報道為根據。故封閉消息與製造新聞是自由之大敵。同時却又必配合有政治機構而能發揮這個精神的。當然必須有代議制度。代議制度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此點已早為一班學者所公認，似乎無用多說了。問題不在有無代議制度，而在于要甚麼樣子的代議制度。像土耳其那樣，故意在議會製造一個反對黨，這雖是效法英國，當然可有一些監督之用，然而却仍未直迫問題的中心。因為倘使執政的黨是以搞政治與謀生活連成一片，好像中國那樣，則反對的黨亦必想如法泡製。其結果不是為了搶政權，打得落花流水，便是大家協議分贓。所以問題的真正中心不在一黨與多黨之分，即不在有無反對黨。倘使幹政治的永遠是那一些游離性或半游離性，流氓性或半流氓性的人們，多黨聯合固不免墮入于分贓，一黨包辦其結果亦必演為黨內派系紛爭。我敢說不在有無反對黨，却不包含以為一黨反而好些。總之，問題是在另一方面。

我以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最好是：于代議制度下實行職業代表，所謂職業代表，我的意思和普通所說的是有一些不同。普通只注重其產生，例如運輸業推選代表可選出會在交通界的官僚。不儘此也，且被推以後即不能再回到本行業，例如大學教授團體推出代表，參加立法行政，而這個代表即從此在政治上混下去了，不再回到學校教書。因此我主張必須使這些參與議會與政府機關的人們另有其本業，只在開會時或任職時幹政治，開會完了，任職期滿，依然退到本行。在本職業中必須把他的地位保留在那裏。大學教授好辦，可以請假一年或二三年。工廠裏的技師或農場中的農人亦必須如此辦。農人亦得能退下來自己還是種田。最怕的是工人的代表一旦做成就，那從此不再是工人了。農人的代表雖本是農人，怕一做代表，即脫離農業界。這樣乃是因活動政治而造成人民的游離性。由游離性便又造成流氓性。告成工人出身的流氓，與農人出身的流氓，以前雖是工農，以後却並不是工農。這種再不能回到本業的人們只好從此以後在政治上鬼混，將其生活基礎不能不建立于政治活動上。對於我所说的救濟法，或有人顧慮到人數太多，不易辦到。其實我所说的只限於行政上政務官與議會的代表，雖有各級，人數並不多，至於事務官即可做為一種職業，有保障，可能終身任了，當然不在此範圍以內，要行此法同時在物質方面又必須施行全體人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對於疾病，子女撫育，養老等等都不感到經濟的威脅。恐怕非如此不足以真正實現民主政治。凡辦不到如此的，我以為為多或少總有一些假民主成分在內。本書以體裁所格，對於這些點子，不能詳細論述，現在所說只是輪廓而已。要而言之，創造一個新文明，創造一個新社會，是不會憑空來的，依然與舊的相接觸。不但人民還是那些人民；即從事於創造新的革命陣營中人們其血管中亦必多或少潛含有舊的渣滓或毒素，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我奉勸大家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這却決不

包含動人只在旁邊說風涼話，不可誤會。）不但在社會方面有舊的東西因襲下來，滲透於新的之中，即思想亦會變為出亂子的根原。所以思想方面的澄清亦是十分重要的。

§九 所要補充的已將說完，雖則尚有零零碎碎幾點，以其太小，即不一提到了。寫至此，承上海友人寄世紀評論第四卷第五期書評上所載夏炎德先生對於我此書之批評。夏先生對我深加獎讚，使我除感謝外，彌增慚愧。就中頗有引伸之處，這些地方正是我應該補充上去的。好在夏先生的意思亦是他早已蓄在肚子裏的，並非看了拙書而始有。我二人既得到一個共鳴，則我便不辭掠美，把他的話抄在下面即等於我的話：

「張東蓀先生新寫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對於時下大家盲目的這兩大主義作了極透關的解釋，在觀念混亂的中國，這種書是絕對地需要。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近代思想的兩種主潮，誰都應該有明確的認識。不過愈是普通性的問題，愈容易被誤解曲解，而正確的解釋乃愈見其需要。」

我認為本書最可貴的地方在把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併為一論，而且指明它在根本是異名同實的東西，這一點實看到了近代史的內層，著者覺得深有把握，纔下了這個斷案，確是一大手筆！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可以根據歷史用我自己的話來加以補充說明。

讀者不提，且從十八世紀的民主運動說起，法蘭西大革命是一個大規模的民主革命運動。所有的平民在反動勢力的淫威之下，受了了壓迫的苦痛，遂羣起喊出反專制、反迫害與反特權的口號，對準特權階級（君主、貴族、僧侶）革起命來。這裏面不祇是市民身分的資本家（即工商業者），還有工人與農民的羣衆，智識階級更在裏面起着領導作用，可說是民主戰線的大聯合。他們的旗幟是爭自由，爭平等，爭人權，不但要求民主，實際還要求生活，蓋自由、平等與人權非但為民主的必要條件，同時只有這幾點爭到手大家生活纔有保障。在那次混合性的大革命中，市民階級或工農羣衆各盡多少力？爭民主或爭生活（社會主義之起點）各佔多少分？實在不易分明的。因此某些歷史家咬定法國革命單是政治革命或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實忽視了革命的複雜成分。固然後來的事實，資產階級吃到革命的果實，而無產階級不曾有份，是大家所知道的，但却不能即此錯判那次革命的性質。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與英國改革，民主只成功了初步範圍僅及政治，因產業革命後新的生產工具歸資產主掌握，真正享到民主權利的只有他們，勞工們反受他們壓迫。於是很多人竟把民主制度撥給資本家，把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偶合當作正常聯繫，而把勞工階級爭政權等生活的社會主義，反當作與民主不同甚至相反的運動。事情之背離真理無有過於此者。另外有人因見社會主義注重經濟，故認為社會主義就是經濟的民主主義，這所犯者的錯誤較小，而也須加以指出。因為社會主義不限於經濟方面，正如其主義不限於政治方面一樣，所以把法國革命當作民主革命，把俄國革命當作社會革命，截然分出界限，是割裂了歷史的整個性與民主革命的權權性，實際上他們所謂社會革命只是民主革命更擴大更深入的運動。歐文（Owen）、勃勒（Blanc）、馬克思與韋伯（Webb）的努力並不與虛假、服爾德（Voltaire）、孟德斯鳩與韋伯（Jefferson）相反。倒是在進一步做前人未做到的工作，他們是同一民主主義洪流中的前浪與後浪。這個根本點如果確定了，那本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歧異論、對立論以至民主

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與獨裁主義的必然聯繫論，這一切錯着歷史，觀念混雜的謬誤理論，便可一掃而空。而因此種謬誤認識的不良影響，足使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互相傾軋而得分家，以至妨礙真正歷史任務的推進，故從理論上予以矯正，於實踐上有很大的用處。

惟其通透了一部歷史，東萊先生始終沒有提出公式化的論調。譬如，為建立一個新社會制度，究用和平革命或暴力革命，完全要看環境來決定，事前很難預先確定，像考茨基 (Kautsky) 的反對用暴力或托洛茨基 (Trotsky) 的為暴力辯護都是呆板的公式論。倒是著者說得妥切：一切不幸都由革命者與反革命者雙方相煎而成，有很多感情相激的成分。我相信要是當年沙皇不用放逐與虛殺的政策，說不定布爾什維克黨人也不至用恐怖手段。就近的說，政治協商會議要是成功，就沒有這一次的自相殺戮。這些地方，不是理論，而是命運！

東萊先生說「理想雖百分之百的美滿高尚，實不及其中的一分能拉到地上的之為可貴。」(頁三三)這是因為看到新制產生之不易；接着又說「但一拉下地來却無不使理想打折或變顏色。」這是在慨歎理想與實踐之難得一致。他看到馬克思的原意想實行世界革命，而到斯大林手裏却成了「一國社會主義」。這一點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斯大林未嘗不想實行世界革命，只是自書本國基礎未固，國事從事，必連本國這點基礎都要被毀，所以一方面加緊作國內經濟的建設，同時對外一再揚言蘇聯的社會主義不是為輸出，以祛除資本主義列強的疑忌，但一待羽翼豐滿，仍是要進行世界革命，所以第三國際的工作始終在那裏進行，後來形式上雖解散，而變相的組織仍存在，工作比以前更變本加厲，這是斯大林比托洛茨基更現實的地方。問題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權始終跳不出莫斯科的掌心，而斯大林處處表現其「祖國至上」的現實作風，將共產主義塗上了濃厚的國族主義色彩以後，共產主義屬手段還是目的，外間不無疑慮，即令贊同共產主義者也不甘全受異國的支配。斯大林的現實做法，在剛頭是有效的，在以後反而成為共產主義推廣的障礙。因而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盧森堡 (Luxemburg) 女士堅持共產國際不應完全受蘇聯的支配的主張不行，就共產主義本身講也未必不是一種損失。

馬克思主義乃四方文明的產物，而蘇聯制度在斯大林指導下却有顯著的東方性格，要將這種制度轉輸到四方或蘇聯以外的其他地區，而不能尊重各國環境與利益，定會感到格格不入。故東方的四方的協調折衷，實是今日社會主義的重要課題。

綜觀全書，著者以華生治學的心得，對世局又那麼關心，內容確有許多獨到的地方。尤其可貴的是討論政治經濟的問題內不挾黨派偏見，保持純正學者的態度，實他所當首。裏面有許多主張與我平日所想的非常相合，其著作先問世，衷心殊感欣慰，

印度獨立一年

First Year of Independence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on, August 14, 1948

英國離印度剛十二個月，對此我們大家至少都應當引以為慰的。如果我們(英國)那時不離開印度，我們現在會捲入了一個同時對回教和印度教戰爭的戰爭。想再度控

制印度是不可能的了。這種企圖不是我們的人力物力所能支持的，而且日夜會引起我們良心上的不安。我們居然及時抽身，能在友誼的氣氛裏分手，使很多惡意的預言成

為虛妄。即使現在這廣大的土地上發生着一切可怕的事，內戰、饑荒、和暴亂，讓我們不要因之悔恨我們的決定，印度和巴基斯坦終究會自己解決他們的困難的。印度的生

並不期然而然地夾入了些自己要說的詞，對於著者亦頗增其企仰之儀。以他對於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淵博的學識，配得上稱道。當然以這種論說並不是主張「通儒政治」，我讀畢東萊先生原書還沒有發見這樣的主張。

東萊先生所說的中關於蘇聯，我有一點頗藉此一提。即我以為其就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而言，不涉及其國際關係，蘇聯的制度固然是一個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但今天東歐和北歐各國，所實行的所謂新民主，亦是一種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決不是這種新民主只是達到蘇聯制度的過渡辦法。將來還必須變到蘇聯那樣，方可再進於社會主義。這却是一個大誤會。必須把這個誤會廓清，則東萊先生所說的糾纏在理論一方面可以免除。這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所以附帶論之。

最後我還要作一個附言，即等於跋。關於體例有一些說明。第一，原書有一附錄，是「廣獄生活簡史」，現在既把補綴加進去了，勢必將附錄刪除。惟原序仍敘明有此附錄，以排版的緣故，不願將序文再改置讀者諒之。第二，是書中未曾提到英國的溫和性社會主義的實驗，似乎應有一個解釋。最近曾昭振先生來信，即以為這是美中不足。不過我個人亦有一個見解。我以為就人類而汎言之，英國的辦法當然是最好的。我決不似有些時流論客一樣，抱着偏見。只因英國人有其特殊的民族性，而這個民族的性格却和中國比較上相遠一些。本來俄國美法德以及東歐各國，辦一國亦都有其民族的特性。中國本來不應該純粹取法於那一國。因為凡是一個改革總是由其本國的內部自身需要來決定，不應該向任何國看齊。不過却可把他國所實行的拿來作為鏡鑑。尤其是他國實行而失敗的試驗更具有教訓的意義。就是因為從正面不如從反面獲益為多。人家已經試驗過，證明其不行，我們不必再來試一番。本來政治經濟社會的施設是常有嘗試性的，誰也沒有絕對把握，最需要的是發見過失立即改正，誰能改得愈徹底愈迅速，誰則能成功。千萬不可怕傷自己的尊嚴，拒絕歷史給人的教訓。所以本書不談英國的辦法，其原因即在此。施復亮先生亦曾作文介紹拙書，指出我此書特別富有教育的意義。施先生的盛意自是可感。他的話大約想係指這些地方而言。我只希望今天關心或與則整個中國命運的人，不論成年或青年，都能將其固有的反覆思考能力發揮出來，以驚人的胸襟以迎接這個世界大變局。倘我這個希望不為非常，諸位先生定能較我有更大的貢獻，便此希望不致落空。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日補寫完畢

命被英國統治所剷割已經有兩百年了。他們的經濟和人口問題，他們的社會分化被英國的征服加深了嚴重性。英國在印度所做的那些好的事情，不但沒有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反而促進了人口比生產增加更快的基本病症。兩百年來所積聚的問題遲早必須應付的。如果那些有能力，有覺悟但是政治上缺乏經驗的人才集中他們的注意在趕走英國統治的事業上，他們將沒有餘力來應付這些基本的問題。

獨立以來的一年已經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成績。這片廣袤的大陸上並沒有像有些人所預言的成為巴爾幹第二。幾百個小邦中祇有兩個，喀什米爾和海達拉巴（Kashmir, Hyderabad），沒有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我們可以認為新憲法並不能令人滿意，他們的人民也還沒有從經濟剝削中得到解放。但是 Patel, Menon 和 Mounbatten 在政治上的成就實在已超過了十二個月以前所敢逆料的程度。這一片大陸祇分成了兩個單位，並沒成為了幾百個分裂的邦國。

在獨立紀念日，這是我們可以稱道的成就。我們還可以加上一點，雖則在旁遮普（Punjab）發生過可怕的屠殺事件，大體上在這轉變和分裂的過程中，並沒有像一般預料的那樣流血。除了比預料為好之外，我們必須承認前途是黯淡的，和歐洲一樣的黯淡。印國的衝突阻礙了社會改良和經濟提高的計劃。依我們看來，印度決定要包括喀什米爾是不智的。他既然同意了巴基斯坦的獨立，聰明的話，就不必爭這地方，因為巴基斯坦早就把這地方打算在自己的版圖裏；從自然地理說，它也是屬於北部區域的。但是印度對這地方却不肯放鬆，甘地和尼赫魯從沒有希望過印國的自治。他們自然歡迎回教黨所擁護的，又主張社會改革的首相，像 Sheikh Abdullah 加自己的集團。巴基斯坦所採取的行動也完全錯誤，它放鬆部落的戰士越過邊界，起初還是偷偷地幹，現在却明目張胆的進取正式軍隊去進行侵略了。結果，印回兩個自治領不宜而戰，把本來可用來作其他有益事業的人力物力，浪費在這種戰爭裏。印度在道戰爭裏每星期至少要費十萬磅。印度的人民

慶祝着他們擊敗巴基斯坦的消息，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這種勝利是不重要的，因為如果他們繼續和好戰的回教遊牧民族在山地裏打仗，對方可以維持遊擊性的抵抗，一直不會有結束的時候。我們祇有希望印回兩邦能在聯合國協助之下早些獲得和解。

為印度着想，還有一個理由需要早些解決喀什米爾的糾紛。海達拉巴的 Nizamat 族已經兩度和德里當局同意了合理的解決方案，但是又藉端不肯履行條件。印度對它的封鎖並不能使它屈服。對於印度說，在他腹部的那個相當大的區域在經濟上斷了交流是很大的損失。如果他專門對付 Nizamat，不放心於喀什米爾，他不致把問題拖延得這樣久，以致情形日趨複雜。現在 Nizamat 的力圖因為極端派組織了突擊隊而增加了，巴基斯坦更用了空運輸入軍備，邊界上種族和社會的衝突正在蔓延中。原來的和談已因極端派的得勢而停頓。如果印度軍隊衝入 Nizamat 的領域，海達拉巴之內的印回就可能發生仇殺，於是印度境內的印度教徒就會屠殺回教徒，巴基斯坦境內的回教徒也會屠殺起印度教徒來了。

這種亂局到現在還沒有發生的原因是雙方領袖明白印回戰爭的結果雙方都不會得到勝利，祇是給共產主義發展的機會罷了。在馬德拉斯（Madras）和海達拉巴的邊境上已有兩個地方，共產黨在進行不公的土地主權分配。很多非共黨的觀察者，包括許多外籍人士，都同意：一旦這種戰爭發生了，共產黨的興趣並不是那個宗教取得優勢，而是農民從貧窮和剝削中得到解放。

甘地的被刺從多方面看來都是一件印度的災難。溫和的影響被取消了，和平的焦點被移去了。但是甘地太偏重宗教對社會問題並不夠注重。他最後的一年甚至支持物價管制，對物價問題最反動的商業集團。結果極壞：物價上升，囤積和投機加強了社會的不平。社會沒有力量。它沒有健全的機構，以致他們的領袖尼赫魯進一步的右傾，支持着他一生所標榜的信仰相反的政策。印度政

府很快的跌入了金融勢力的手掌裏；它對於極右派已無法對抗，甚至不像會對謀刺甘地的反動組織採取嚴厲的手段了。甘地謀殺案的進展沒有多少人能感到滿意。這反動團體中有一個主要的領袖名字叫 Savakar，他被槍擊了。在審問時，發現了現在物資部長 Mukerjee，他在任前曾向 Savakar 請求他的准許。這件事實的發覺，却也沒有影響物資部長地位，足見政府將對極右派加以嚴厲的預料是不正確了。相反的，政府的壓力却指向左派。不但印度很多地方已經拘捕共產黨員，而且正在援引公共安全法的第四款，凡是批評政府的出版物將加以封禁。大量的使用警察力量也已經引起司法官的反對，尤其是孟加羅和孟買的首席法官官曾加以嚴重的指斥。他們抗議警察不經審判拘捕人民，甚至把法院認為無罪的人再度拘捕。自由主義者和公正人士已經督覺政府在防共的名義下在設法確立反動的商業集團和極端主義者的勢力。

一位有經驗的英國駐印記者曾報導說：

我和其他的朋友們愈來愈覺得今天的印度和俄國小說中所描寫革命前夕的情形太相像了。一樣的失望，一樣的議論紛紛，一樣的無恥的發財，一樣的滿嘴是官僚，一樣的大眾爭着向政府真贗。更一樣的是共產黨，不論怎樣禁止和壓迫，日見壯大。官方的工會被人所厭惡而譏笑，共產黨所控制的全印工會却成了印度工人真正的組織。

這個比較當然有過火之處，印度和巴基斯坦快到共產革命的邊緣的說法還嫌太早。這種可能祇會發生在世界戰爭或印回戰爭裏。巴基斯坦在經濟上還是個封建王國，除了在西北邊境上開始有一些革命的情緒。另一方面看，右派的勢力却在長大，他們不但要壓迫暴力革命，甚至和平的改革都不肯放鬆的。而且三萬萬的印度農民還在半原始的生活中，他們的韌性和惰性之強真不易估計。比宗教分歧更深的社會衝突難着解決的時候似乎還遠，其間可能還有無數的血與淚。以目前的情形說，印度需要一個不依賴莫斯科的社會革命黨，能為人權的保障，印回和平，和社會解放而奮鬥。（觀察特約譯者譯）

知識·生活·宇宙

人類認識宇宙的動機

愈是在原始的社會裏，人類知識活動與生活的關係，

愈是直接緊密。因為在此種社會裏：一方面，人類的的生活，乃是一種與自然界以及異族不斷劇烈鬥爭的過程，人類沒有閒情逸致去追求與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知識；另一方面

面，當時的文化基礎薄弱，人們利用已有文字與語言等，尚難創造與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抽象知識。因此原始人類的知識活動，大都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而起的。比如破風

劉緒貽

尼西亞人，(Polynesians)住在海島上，靠打漁過活，爲了航海時定向的緣故，產生了對於星底方位的知識；新西蘭毛利人 (Maori) 對於星底的知識，也是由其對於農業的關係而來。亥斯基摩人 (Eskimo) 住在冰天雪地裏，遷徙無常，其所儲藏的食物，到了冬天，往往爲冰雪掩蓋，不便尋覓，所以他們在夏天的時候，對於其居住地域的地理知識，必定盡量搜集，以免在積雪之中迷失了方向，生活受到威脅。這樣的例子在原始文化中所在皆是，所以人類學家路威 (R.H. Lowie) 認爲：原始人類對於知識的興趣是實際的，而不是抽象的；他們僅僅是爲了滿足當前的生活需要，才尋求知識。(見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第十八章)

兒童，愈是幼小的兒童，對於知識的興趣，愈像原始人類一樣。他們之所以尋求知識，也是因爲知識可以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並促進生活上的滿足。比如蜂可以整人是一種知識，小孩子有了這種知識，便可以避免蜂螫的痛苦；排灌有一定的時間與地點，小孩子有了這一種知識，便可以少受大人的責罰；一個熱識大人心理的小孩子，其生活比較一個對於大人心理茫無所知的小孩子，往往要從心所欲些。所以我們說，小孩子的尋求知識，也是爲了要生活得舒服些，至少是要生活得下去。

從原始人類與幼兒來看人類的知識活動，我們可以瞭解，人類知識活動的起源，乃是人類要求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實際生活問題的結果。和猩猩爲了要吃它拿不着的香蕉，於是學得了接竿竿、疊箱子的知識一樣。(人類學家和動物心理學家爲了研究動物的智力，把香蕉放在黑猩猩拿不着的地方，但同時放上幾個木箱子，或幾根竿竿，把箱子疊起或把竿竿接起，便可以取得香蕉。結果證明，黑猩猩有利用此種工具以取得香蕉的智力。) 黑猩猩把木箱疊起，把竿竿接起，可以得到吃香蕉的滿足。人類爲了解決生活問題所得到的各種知識，也一樣的增加人類生活的滿足與安全；而且，此種知識愈豐富，人類生活的滿足與安全愈增加。所以人類爲了增加生活的滿足與安全，乃不斷的擴張其知識活動。後來，由於文化的進展，到了社會財富足以養活一批專門以知識活動爲業的人時，這種知識活動的擴張範圍愈大，就是一些與生活無直接關係的知識，也成了人類追求的對象。這種擴張範圍的速度愈快，知識與生活的關係愈間接。當這種範圍的擴張到了無限的時間與空間時，我們平常便把這種範圍叫做宇宙。如果用一種特殊的方法或觀點去尋求這種範圍，便是哲學家們所謂的宇宙觀或宇宙論。在知識生活發達的文化裏，大

都有這種以宇宙爲其知識活動的對象的知識份子。

兩種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

如前所說，人類社會中既然有專門以知識活動爲業，而不必顧慮到衣、食、住、行等實際生活問題的人，這些人從事於知識活動，對於與生活無直接關係的知識，自然更容易發生興趣；也容易盡量擴張其活動範圍，而直接以宇宙爲對象。不過，這種直接以宇宙爲對象，或說是直接從宇宙整體或本體下手的知識活動，其所用方法，大都是直覺的，因而吞棗的，因此，其所得結果，往往與宇宙實際不符，也與生活無關，或關係異常微弱。這話怎麼說呢？通常我們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是個無限大的東西，包括一切事物。對着這個無限大的東西，個人的時間、精力、與智慧，簡直是無限的渺小，和無限的短暫。我們要想用這種無限渺小和短暫去瞭解那個無限的空間與時間，簡直是不可能。如果我們一定要企圖去瞭解，只有把宇宙分成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片然後各人竭盡平生精力，將這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片，澈底瞭解清楚，等到積年累月，從事瞭解這種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片的的人到了無限多的時候，則瞭解這種無限小的一點點一天。這是科學家尋求宇宙的步驟，是從宇宙的各部份以認識宇宙的全體。不過，這裏也許有的人要問，宇宙雖大，雖然包羅萬象，但究竟其中有些共同的原理原則，或者共同的基礎，這些原理原則或基礎，無微不至，藏在宇宙的各部份，我們只要從宇宙某部份裏面尋出這些原理原則或基礎，便可以推想出整個宇宙的原理原則或基礎，用不着心勞力拙的去研究萬事萬物了。但是，即使如此，尋求萬事萬物的原理原則或基礎，也不能用直覺的方法。比如目前我們知道構成生命的本物質是細胞，這是生物學家實事求是的研究過無數生物的構造的結果。從前王守仁不動手去「格」竹子，欲想坐在竹林下，用向心觀照的方法，找出竹子的「理」來，然後再用竹子的「理」，加上用同樣方法找出的其他事物的「理」，以求宇宙的基本原理，無怪乎他從開始便要失敗。何況，如果我們僅從研究竹子知道生命的基本物質是細胞，而不研究其他生物，我們也不敢說構成所有生命的本物質是細胞呢？所以尋求宇宙的原理原則或基礎，除了不能用直覺的方法以外，還得要從萬事萬物下手。

用上述那種方法去認識宇宙，自然是一條迷途而復原的路，所以有些聰明過火的有知識份子，便愛採用一種直覺的方法。這些人，也覺得個人的時間、精力、與智慧有限，決無了解宇宙萬象的能力，如果去尋求，只有一副癡癡，轉陸沉(陸九齡語)的份兒。可是他們却又不甘心自認渺小，在尋求宇宙的全體知識活動中做一小小卒，做一個螺釘；硬要一步登天，一手把宇宙抓住，看個清楚，看個底細。既然事實上不可能，他們便只好利用想像(因爲想像是自由的)在腦海中自己製造出一個宇宙或宇宙的本體。這個宇宙或宇宙的本體製造成功以後，他們便以爲是「頓悟」了，是「一旦豁然貫通，表裏精粗無不俱到」；換言之，人們只要向心觀照，一個渾融圓通的整個宇宙，或一個清楚明晰的宇宙本體，便會從直覺裏跳到眼前，如此，人們便可以停止一切知識活動，安安靜靜的去「自得其樂」了。這真是一種澈底的知識上的個人主義，在揭穿以後，知識份子應該認爲是虛偽的。

上面兩種尋求宇宙的知識活動的不同，如果我們用魯公移山的故事來說明，更易了解。一座很大的山，要用一個人或幾個人把它移走，自然是不可能。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意識到了這種不可能，不願意動手去作，却靜坐下來，在腦海裏直覺的想出一套觀念，以爲只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山便可以移走了，當然不會成爲事實。而且，假如有志移山的人，大家都用這種方法，則無論多少人費多少時間，這山永遠也沒有被移走的可能。反之，雖然我們覺得我們一個人或幾個人不能把山移走，但却不氣餒，馬上動手去挑土，能移多少算多少，如果在山脚的同時代人和後來的人，都感覺到山的阻礙，有志把它移去，這座山才可有慢慢移走的可能。自然，這是一條悠遠的路，何時走完或能否走完都是問題，但既然沒有其他的捷徑，我們如果要真正把山移走，也只有效法愚公，忍耐着，忍耐着，走這條悠遠的，但却可靠的，路。移山如此，認識宇宙或宇宙本體更是如此。嚴格的說，世界上是不會有奇蹟的。用直覺的方法找出來的宇宙，只是奧羅華先生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一文裏所謂的「漆黑一團」。換句話說，用直覺的方法認識宇宙，我們永遠也不能認識宇宙。如我們前面所分析，人類認識宇宙的動機，乃是人類要求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最後結果，既然用直覺的方法以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終歸不能認識宇宙，則此種知識活動的結果，自然不能幫助人類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實際的生活問題。所以許多哲學家們，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紀的以及受古代和中世紀傳統影響的哲學家們，其所找出的宇宙或宇宙本體，除了可以供少數有知識份子作思遊遊戲或便之一心安理得以外，對於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大衆的實際生活問題，往往是毫無作用，

中國傳統的認識宇宙的知識

活動

毫無關係的。

根據上述觀點來檢討我們傳統的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我認爲我們是偏於直覺一方面的。自然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能逐一檢討我們知識生活歷史中各種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只能大體上加以說明。據馮友蘭先生的意見，先秦時代，中國似乎有兩種宇宙系統：一種是用五行講的，一種是用陰陽八卦講的。（見所著中國哲學史第一、二、三、四、五章第二節）用五行講宇宙系統的人如關尹、司馬遷說他：「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爲赤縣神州者九，……於是釋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卷七十四）用陰陽八卦講宇宙系統的書如「周易」，書中說：「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坤爲地，爲母……震爲雷……巽爲木，爲風……坎爲水……爲月……離爲火……爲日……艮爲山……兌爲澤……」（傳九，四部叢刊本，三至四頁。）

這兩種天人合一的宇宙系統，到了「淮南鴻烈」中，已合爲一很有系統的宇宙論。（參閱「慎真訓」「天文訓」「精神訓」等。）講述這種宇宙論的人，一般稱爲陰陽家。陰陽家對兩漢人，尤其是西漢人的思想是極有影響的；也可以說，兩漢，尤其是西漢的讀書人，都多少是個陰陽家。馮友蘭先生說：「陰陽家以五行，四方，四時，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數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間架。又以陰陽流行於其間，使此間架活動變化，而生萬物。」（中國哲學史第二篇第二章第二節）兩漢以後，用陰陽五行之說講宇宙系統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宋儒中的周敦頤和邵康節。（兩人俱受道士陳搏影響）周敦頤著「太極書說」，謂「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有生，而變化無窮焉。」邵康節著「皇極經世」，完全以「象」之學說的宇宙系統，其學大半來自自釋者中的易學，也受了佛學中俱舍宗的影響，我們爲了節省篇幅起見，不再引述了。

上面我們徵引的各種宇宙系統，就其本身而言，也未嘗不能自圓其說。只是這些宇宙系統，我們可以看出，都是個人從直覺中悟出來的，從自然科學的觀點看，我們即使熟透這些宇宙系統的知識，宇宙對於我們，仍是奧秘難先生所說的漆黑一團。我們不能以之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大衆實際的生活問題。

除了陰陽家以外，道家 and 受道家影響的儒家，也用直覺的方法來認識宇宙和本體。比如老子和莊子，都認爲「道」就是宇宙，（因道是「至大無外」的）也就是宇宙的本體。（因道可以爲「天下之母」）到了魏、晉士人口裏，「道」字又變成「無」字，然而意思沒有什麼大改變。宋儒論道，又明顯的提出「理」「氣」二字。大體上說，理是宇宙，（理即吾心，宇宙亦即吾心）氣是宇宙的本體。（讀者如對這問題有興趣，可參閱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一書。這本書的觀點我們是不贊同的，不過它對於宋代理學的解釋很清楚，爲了明瞭宋代理學，這是一本很可以參考的書。）自然，這裏包含的哲學問題，還不是這樣簡單，不過我們此地所注意的，只在說明道家、理學家等這些對宇宙和本體的概念，也都是從直覺中悟出來的，而不是多數人實事求是的找出來的。從這些概念中去了解宇宙，宇宙對我們仍然是個漆黑一團，仍然與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無關。此外，我們已說明白，在理學家之中，朱熹的一流是認爲他們自己是從宇宙的各部份以認識宇宙的全體的。因爲他們主張格物致知，即從萬事萬物之理以明天理，好像是很科學的，但是，他們格物的過程，即認識萬事萬物的過程，仍然是直覺的，所以用他們的方法去認識一個人、一顆樹、一個麻雀；用化學和礦治學的方法去認識一顆礦石，我們可以得到許多與生活有關的知識，如果換上朱熹的方法，一個人、一顆樹、一個麻雀、一顆礦石，對於我們，仍然會是個漆黑一團，與生活無關。

由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如果用我們傳統的知識活動去認識宇宙，我們得到的關於宇宙的知識，不獨與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大衆的實際生活問題無關，也與宇宙的實際不符。可怕的是，目前我們的知識活動，仍然有形無形的深受這種傳統的影響。我們仍然覺得，自大得很，不肯從小處着眼，實際動手去尋求宇宙的奧秘，仍然愛用直覺的方法去「捉摸」宇宙的理。（近人有把這種「理」稱爲「新理」的，從我們上述觀點看，實在看不出什麼新的地方。）我們如果不從這個迷團之中解放出來，將永遠沒有認識宇宙的一天，只好像我們的祖先一樣，對於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往往束手無策，老留在漆黑一團裏過阿Q式的日子。

三十七年九月二日於珞珈山

（上接第十九頁）

專門人才都一樣失業呢！現在很多人喜歡讀工科，以爲它的出路好，我也這樣想，所以讀工了。你現在報考工學院，也是這樣想吧？但是你回頭來看我們民族的新工業，內受戰亂的摧毀，外遭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蒙受重大的打擊，已給望塵的拍不起頭！那我們又有什麼出路？「岳周民說」的熱起來了，掏出手帕在揩汗，又繼續說：「工業不發達，則與其相關的交通、商業、科學等種種事業也難於發達，我們這批知識份子的出路也就因此成了問題！」方國秋靜靜聽他表兄說了這些話，不禁歎了一口氣。他突地站了起來，憤憤地說：

「說起來，一切還是歸罪於戰爭！我們青年的命運就給戰爭斷送了！目前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都是戰爭造成的！」

「是的。本來不合理的事是先有不合理的人；戰火是幾個人弄起來的！他們是說以戰爭解決問題……」岳周民說到這裏，忽然方國秋急忙的搶着說：

「單憑武力能解決問題？眼見得愈戰愈烈！雙方猛烈的炮火下，自己的鄉土變成焦土！自己的同胞血肉橫飛！國家動盪殘危，社會問題叢生，就不知他們得到了甚麼？但人民是再不能熬下去了……」方國秋正面紅耳赤的說着，忽然他的姑母走進房來，很溫和的笑着說：

「你們兩人談論甚麼問題，說的那樣熱烈，我在樓下叫喊都沒聽見……吃飯去吧。」

方國秋和岳周民都沒回答，兩人相視苦笑了一下，就跟着下了樓來。

廿七、八、廿、於廣州

范漢傑與遼西戰場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錦州通信)

范漢傑到遼西重鎮錦州，有半年的時光了。他不時來往於錦州、葫蘆港、秦皇島等地，整軍經武，支撐着冀東的半壁山河。集結兵力，機警謹慎，不妄動，不貪功，得無大過。對外以秦葫兩港作氣孔，對內以錦州、錦西、葫蘆港三角地區為基地，另置

後方總部於秦皇島，控制遼東地區。南依華北戰區，北以大凌河為界，沿河設防，以備共軍南顧，遙領遼河省主席，事實並不過問省政，僅祇照顧一下熱東流亡的縣府和地方法部。這就是所謂冀熱遼邊區，和他的統帥半年來的大致情形。

遼西共軍的實力究竟有多少？雖能有正確的估計。單就野戰部隊的番號，就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四個縱隊，此外就是軍區部隊和地方部隊。放在錦州路中間地區，監視着大凌河，與國軍主力對峙的部隊是蕭才芳的第九縱隊，據說還有一個獨立師。蕭才芳原任冀東軍區司令員，所以

該縱隊所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三個師，即由冀東軍之九、十、十一等三個旅改編而成，兵員補充亦多來自冀東。軍調時期，安平事件之共軍方面主角曾雍新，現任二十五師長。他們現在分駐大虎山、北鎮、溝幫子、閻陽驛等地整補。

由四兩軍區部隊改編成立的第七縱隊，司令員是鄧華，五月間在阜新一帶，現有已從遼西調往遼北的消息。第八及第十一兩縱隊今年暑期，一度調入關內，與國軍在冀東作戰。第八縱隊是由冀察熱遼軍區部隊改編成立。第八縱隊司令員是殷舒權，所轄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三個師，即由該軍區之十三、十六、十八等旅改編而成。曾與國軍在楊家仗子、吳城、柞中、朝陽等地作過戰。兵源補充地在冀東盧龍、遷安、遵化等地。

第十一縱隊由冀東熱遼之獨一，獨二，獨三等師，改編為該縱隊之三十一師、三十二師、三十三師。司令員是歐陽嘉祥，與第八縱隊到冀東作戰以後，又同冀東軍管區，現在都集中在長城線上整補。

以遼西共軍現有的兵力看，沒有力量撼動兵力集結的錦州。不過范漢傑的防地是關內外濱海地區的一個長條，很容易被共軍切斷聯絡。綏中、興城等地防禦力非常的單薄，看情形范漢傑對於鐵路交通並不過份重視，將一切的希望寄托於秦葫兩港的滬上。北寧路關內段也因防護力量不足，時常遭受破壞，昌黎二次失守時，共軍第八縱隊將交督隊解決，當時范本人到那裏視察，剛離開兩三點鐘，昌黎就被攻陷了，共軍進城到處在尋他。可以說是相當的危險。范的老母去冬在故鄉廣東大埔被綁去，現在還沒有消息。他為了要做北方的長城，華北東北間的破綻，既不能南歸救母，只有提高警覺，嚴防共軍的綁架，所以他在昌黎並未編離。共軍在昌黎捉到了一個貌似范漢傑的士兵，在城內喧嚷一番已經活捉住范漢傑而

退去。范氏無論在前方在後方，行蹤是相當的祕密的，穿一身與士兵相同的軍裝，不經於接見記者，不願出現於公共集會。

華北剿匪與冀熱遼邊區總部的防地原來以深河為界，後來因為李朝兵團自山東調來，冀熱遼邊區的防地又擴展到唐山。在新夾縫中的唐山，上一次險些被共軍攻入。因為當時那裏的守軍只有工兵一個營，共軍要是不急於吃掉阻滯團和在任各莊受圍，很容易將那個華工礦中心予以破壞摧毀。曹澗及任各莊遲延了共軍進攻唐山的時間，援軍分自南北趕來，唐山轉危為安。但在共軍為了解壓遼西，切斷國軍關內外交通，對於北寧路及其東地區，始終是不願放鬆一步的。一個月以前他集中在這個地區的部隊，有最榮耀的三、四縱隊和二縱隊的第四旅，東北共軍的第八第十一兩縱隊，連同地方部隊估計在十萬人左右。國軍為了剪除這一個大的威脅，由李文統率華北戰區的六十二、

九十二、及十六三個軍組成一強大兵團，與范漢傑呼應，展開了冀東掃蕩。將深河以西的秦榮二、三、四縱隊壓迫得退往冀察熱邊境上去。將深河以東的林彪第八及第十一縱隊壓迫至長城線上。在國軍推進以前，共軍的兵力部署，是以秦榮各縱隊攻深河以西地區，第八縱隊及第十一縱隊之一部攻深河以東至留守營之昌黎地區，第十一縱隊攻留守營以東秦皇島地區。

冀東國軍掃蕩，雖然沒有打上升共軍的主力，但是由於共軍的西撤北撤，局勢顯然較前安定。冀東局勢的安定，是有大助於遼西戰場的。李文與范漢傑過去同在胡宗南麾下，一打仗還是親弟兄，李文軍是助了范漢傑一臂之力。六十二軍和九十二軍現在担負着深河以西的防務。

當瀋陽國軍潘裕昆襲取遼陽的時候，盛傳國軍將打通瀋陽至營口的水上交通。遼西國軍據說當時也確實做如此準備。可是國軍在全局上是注重南線的，北線上是一掃一與一掃一的局面。因此自山東增援到冀熱遼戰區的李朝兵團，又調往華中的蚌埠了。這樣以來，海陸

攻取營口的事情就糊了，遼西還得在繼續一掃一，一掃一。

李朝兵團第八軍自秦葫兩港南調以後，關漢鵬的第五十四軍接防了葫蘆港。以清軍九十三軍盧濟泉部警備錦州，並向西北伸出一隻手去握住義州，做為前哨陣地。范漢傑總司令自新編的部隊也有兩個軍，新九軍在錦州，新五軍在山海關一帶。因為訓練未久，裝備也較差，戰鬥力遠不如五十四軍。要求開展以國軍現有的兵力也絕談不到。

遼西戰場同整個的東北局勢一樣，由於共軍大部分兵力都從事增產整補，所以始終沒有大戰。這一個沉寂局面，也一定會在秋季打開。目前國軍依仗天塹的大凌河，夏秋水漲期間，共軍不能越河南下，國軍也無力渡河北攻。但是秋收以後，冰凍期也會接着就來了。從事增產整補的東北共軍，會履冰渡大凌河，來攻錦州。當然國軍如果有力打通瀋陽路，也是在秋收封河時期。

錦州、錦西、葫蘆港三角地區是國軍必守的地區，他寧可不要真城綏中，不要通關內的鐵路交通線，也要堅守三角地帶，守住海口，牽制東北共軍，這為支

應瀋陽。葫蘆港海上交通以外，范漢傑正徵集大批民工趕修加強錦州及秦葫兩港的飛機場。準備萬一海上陸上交通有了問題，再以空運救急。

錦州及遼西地區在東北的重要性的，早已超過瀋陽及長春，在錦州苦守的范漢傑，咬緊牙關，集結兵力，銳意整補，希望將來有一個挽救東北危局的機會，或者能夠給東北辦理善後的機會。大凌河冰封的時候，就是遼西戰場得到大的攻敵的時候。范漢傑自己想必也是如此的想法和準備的。

本期專論瀋陽光且先生一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一文，照本刊編制，應排小五號字，但現排了六號字，因為這稿子還是編者在北平時寄遞付排的，那時我們打算仍出十六號字，俾可多容納一點字數。其後編者返滬，看到讀者來函，於是決定出二十號字，先仍排小五號字。潘先生此文已用六號字排好，水能改排，所以祇好仍用六號字刊出。此說明。(讀者)

編後

本期專論瀋陽光且先生一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一文，照本刊編制，應排小五號字，但現排了六號字，因為這稿子還是編者在北平時寄遞付排的，那時我們打算仍出十六號字，俾可多容納一點字數。其後編者返滬，看到讀者來函，於是決定出二十號字，先仍排小五號字。潘先生此文已用六號字排好，水能改排，所以祇好仍用六號字刊出。此說明。(讀者)

半年來新疆情形綜合報導

觀察特約記者

沉寂中的半年

(觀察進化通信)

半年來新疆局面相當沉寂，所以很少寫通訊報告國人，這沉寂的原因：(一)伊、塔、阿三區和政府仍然保持和平對峙，彼此都未發動軍事攻勢，而談判恢復，又因雙方的距離太遠，無從實現。(二)地方民族的大多數，所關心的還是和平與生活保障，政治宣傳不足以鼓舞起他們來參與實際鬥爭，因之各地少有糾紛與較大事故。(三)政府確在開放政權，雖然民選的專員、縣長等未必盡按民主方式及這些官吏未必真能代表民意，但較之中國其他省份，却進步得多。(四)駐新疆軍雖為伊方及民族主義者所反對，但這些國軍却在極力謀求與人民合作，處處避免和民衝突。(五)新疆當局對蘇聯力求親善，在各方面都避免與蘇聯的接觸。

這不僅是說伊、塔、阿三區依然特殊化，就是政府控制的區內，民族間的關係依舊裂痕深重，地方人民對政府依舊未肯信任。譬如文化工作，有新疆省政府的宣傳委員會，有西北文化建設協會，有新疆日報。他們的種種文化活動雖多半以地方民族為對象，甚至派遠文化巡迴工作隊，工作於南北疆，但是地方民族中的知識份子決不與之合作，一般人民也只是於各種集會中，湊湊熱鬧，根本上對各項宣傳，等閒視之。又如經濟工作，技術輔導團工作尙未展開，去年成立的新疆建設委員會，只於各地成立分會而已；西北民生實業公司也不過運少許物資到新，其他若農牧貸款、商業貸款、建設貸款，獲得實益的仍不是廣大人民。內地的物價波動，影響於新疆者雖不太重，但最近一月來經濟界已呈現不安，新疆省商業銀行已開始向當局要求停止內地銀行在新疆作營業活動(中央銀行除外)。尤其重要的是，歷次赴內地觀光及出席國代或其他會議的代表們，對內地政治、社會、經濟等現象，統無好感，對中國前途與國家的信心都非常悲觀與淡薄，影響所及，至少地方民族中的首要，已在打自己的算盤。同時美國派武官赴新，對新疆之漸伸觸手與對新疆民族主義分子的接觸也足以引起蘇聯的警覺。因之，我們不能由於表面的沉寂體已經解決，實則這不過是未來前途的醞釀期罷了。

伊方最近的情況

情況

伊方方面，自從其參加政府的人士撤離迪化後，從未宣佈他們將與政府展開鬥爭、脫離中國，他們致張浩中氏的答信，一封已由政府公開發表，另一封由政府發表其要內容，伊方自稱仍不願放棄和平，但堅持更易省主席、開釋被押回教團體所有人員、組織南疆民族保安部隊等為恢復和談的先決條件。

但在伊方所控制的區域內，則絕不用中國的一切典章制度，他們仍是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用回教的紀年。一年來他們在增強生產，充實自己的力量。伊方本是農產區，富源頗豐，經過一番努力，生產已漸達事變前水準，據云：中亞人民有一大批移來此間，協助生產工作。阿山方面，去歲烏斯滿督率兵攻入承化，但不久即為來路不明之部隊擊退，事後哈薩克人民被殘殺者頗多，地方蕭條，可是中亞人民陸續移入，外蒙人民與軍隊已進駐布爾津，金礦恢復開採。

因為哈薩克人多數不同情伊方，他們在伊、塔、阿三區內曾數次發動武裝暴動，未逃出者，頗受壓迫，他們的牧地與農田有的已為其他民族及新移入者佔據。伊方道一年來的肅清工作也相當利害，因為他們的消息對敵得極嚴，不易獲得真象。

現在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阿加合江，維族人。他們的軍隊組織，最高者為總司令部，總司令是伊斯拉克江，也是維族人，駐在烏蘇。參謀長馬加諾夫，外籍，副司令哈因諾克，均駐伊寧。在總司令部指揮下，有兩個步兵團，三個騎兵團，一個步兵訓練團，分駐於伊寧、塔城境內，阿山方面均係外蒙軍，不由總司令部指揮。每個步兵團多少不等，大約一個步兵團有一千六七百人，騎兵團有一千餘人，團以下為連，沒有營的建制，武器配備，不若充實。他們駐在瑪納斯河西岸的，有時也偷著過河，與國軍小有接觸，即行退還。地方人民的兵源，除了就地地方民中徵拔和由中亞的柯爾克孜人補充外，過去曾誘引政府區內的維族青年逃往伊寧從軍，去歲逃往者不少。

政府方面

政府方面，維漢首領在過去一年中，表面上和中央派遣的人員合作表現，而思想的分歧，並未融化，本年七月一日維方首領主辦的曙光報(維文)上曾為紀念和平條款簽字二週年，發表一篇社論，中有：「和平條款是新疆和平的保障，但並未全部實現；現在政府又給新疆人民頒佈許多法令，使人民陷入不安與恐怖狀態，他們又想逃與革命精神，……或許又實現對民族壓迫，將來有一天炸彈或許爆發的。」

新疆民族間的隔閡，有十年的歷史根基，非一朝的政策更改所能消除，回教民族在第一次大戰時曾有汎土爾運動，即結合全世界回教民族成立一聯合國家，這個運動帝德曾利用過，並因利用而支持過，不過民族的組成，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領土為主要條件之一，散處東亞的回教人民多無此種條件，惟有中亞，如新疆等地，信奉回教的民族在數量佔絕對多數，在語言上也多數屬於阿拉伯語系，他們進行民族大聯合是非常方便的。中央在最近二年來，對新疆問題雖有較深認識，對新疆地方民族處處委曲求全，可是國事如此，欲求控制，已不可能，縱然是在政府中工作的維族人，也在憤恨回教聯合國家的遺囑，他們知道在目前就離中國是不利的，可是他們卻不斷在追求那還景，想一步一步地來實現那還景，這不止是過去歷史束縛他們太緊及宗教信仰等關係，就是當前環境也使他們自覺少數民族在多數民族統治的國家內，有許多地方是妨礙其呼吸自由的，最近省府秘密長文於某項會議內述及他一生從事民族解放的經過，他担保新疆不脫

看一角糜爛的內地

方朗

戰爭烽火遍地，內地糜爛日深，如果不諱疾忌醫，這膏肓的病症應當讓人知道。

這裏，內地的一角，四川渠縣，位於嘉陵江支流渠江與川鄂公路的交點。人口七十萬。年產蔗糖、菸草、黃花、白芍、米糧之類甚豐，號稱一等縣。地當大巴山防線的邊沿，南距傳聞中的中共華西總指揮部所在地的華壁山僅百餘里，現已劃入九十七師方靖的轄區。

在抗戰期中，敵機曾光顧過三次，全城焚毀，至今還破爛不堪。市民誰都還留着當年火燒那天、血肉狼藉的深刻印象。但這印象是在一天一天的淡了，現實生活的刺激與壓榨，有增無減地迫使着人民走向窮困、痛苦、以至死亡，這不比數年前偶爾的空襲更可怕嗎？

這在行憲前三年多，這裏便開始了民選。由政府任人民費了若干周折才登記准了的公職候選人中，公布三五個人的保長、鄉鎮長、鄉鎮民代表或參議員的候選人名單，讓少數的人

去圈選。除在公布名單前預備候選人得向民政科長進貨而外，選舉時則操縱於地方派系的領袖和土劣袍哥之手，油大鈔票之後繼之以武力，參加選舉的鄉鎮民代表或參議員在前幾天就失去自由，分別的被各派系拘禁起來，直到用槍桿送入會場之後。今年年初縣署普選的國代和立委的選舉，全縣三十餘萬選民無法拘禁，但競選人以大量的法幣委託派系領袖組織選舉

托辣斯(郭錫侯公子)在本縣就花了十二億，而且還許下一個縣長、兩個局長和一個中學校長的位置。結果得票十六萬張，校長已免了現任局長在監獄中，可惜王主席上台後情況已無甚希望了。

現在縣長劉炳中是一位青年的政校畢業生，但這已是第三任。前任在開縣，共軍將劉伯承的故鄉，他說劉伯承在開共產，他的哥哥還在大做其生意，為保不先拿自己哥哥的命，他為政平穩，以運用地

方派系鬥爭坐收漁人之利為原則。更由於縣政府的日常行政與人民並無密切的關係，所以一般對當局的抱怨還難得聽見。最為人民所痛恨的是地方法院、稅捐稽徵處、田糧管理處和縣銀行，尤其是地方法院，真可謂怨聲載道，有口皆碑。它是一黑漆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隨你民事刑事，動輒一拖便是一年半載。直達員和院裏的各級太太都是法院的「後門」

不走後門的人永遠也休想打贏官司，傳票或判決書的送達費起碼勒索一二斗米錢(老量，每斗至少二百萬元)，遠遠還得按路程加倍。一個在禁的盜案囚犯被從監獄提到法院服役，因為想早些脫法，自己又窮，於是向法院局投遞他提供一位較為富有的鄰居同謀，弄得那位被認者傾家蕩產！

四鄉有錢無勢的地主隨時可能被抽繳糧，有戀無戀全在陰陽博士術生院長一句話，陰性反映或陽性反映，博士院長是知道如何運用的，那怕就是真正吸毒的烟

犯。其實，檢察處的檢察官×××夫婦就是兩副大鑼，烟燈成天點着，常去的訪客都可以編在燈邊閒談。前次，因為和警察局長發生誤會，警局派人去捕捉×××，院中法警奉令抵抗，衝突大起，雙方各有三、五人受傷，法院被搞，烟更無法無天的事：看守所長×××利用權勢誘姦女犯成孕，因為怕事情暴露，乃暗請衛生院長賄賂，服藥不見效，便在一個深夜施手術，嬰兒切成數塊取出，血流不止，一命嗚呼！第二天，事情曝了出來，全城轟動，但等到屍親控案時，證據烟沒，屍首已腐爛得無法驗傷而

已所長僅於撤職之後才轉移管轄為名逃路得否無蹤跡，施手術的陰陽博士當然更遠遁法外。這種事尚且幹得出來，平常的案子豈能放鬆貪贓枉法的機會？所以有人說，有事實打官司，進了地方法院就會地方去完(法字去，院字去)。至於稅捐處，上上下下把持稅收，

據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据萬分由縣府再三派丁四出追收時，絕不繳歸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級公教員工的薪津款不知拖到何時方可領得？目前稅捐處還保留了已被裁撤將近一年的六位分區主任及其所屬職員數十人，他們都是地方法系的有力分子，取滑不丁。每區轄十餘鄉鎮，稅捐十之七八就握在他們的手裏。縣銀行呢？更在一個公開的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上自經理下至行員，無一人不懂得甚麼叫銀行。一個帶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了三年多會計主任便由窮光蛋變為家藏黃金二百餘兩的富翁。田賦糧食管理處和人民的關係更密切，更是吸吮人民血汗的大本營。每年徵購期內的遍地怨聲不必詳說，只看大家爭奪各鄉徵購辦事處主任的激烈，就知道其中的甜頭。一個主任和他的屬員不僅和稅捐處分區主任及其屬員同樣祿項領薪收據而實際並不領薪，事前的活動至少得許幾五十石穀子。處長一缺自然更肥，一年的田賦超收多了的竟達七千餘石之多，而暗中浮漲又從來無人清理。

離中國，但代新舊人民爭，更是行政工作推動的要求自由平等內外一致。建設廳長伊敏在同一會議上也說，應該給新入民以當兵機會，這不但可減除內地軍隊駐新所需要的人員負擔，同時也可免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他又說，外來軍隊對當地人民如不信任，是很容易發生不良後果的。

以上所述可以略見在政府中工作的地方民族首領們的思想。至於漢人方面，政府中的主要工作人員對地方民族確在力謀合作，並極力在爭取安定時局，推行各項工作，然而半年以來，各方之配合仍不見佳，新疆的生活程度與西北其他各地比雖不高，但一般公教人員仍感苦惱，貪污風氣與敷衍心理仍未肅清，半年來貪污案件會牽涉到省長與高級官吏，盛世才時期所遺留下的各種活動資財，已被盜賣、浪費罄盡。說整肅人事關係妨礙了整肅；講突擊、敷衍心理洩散了突擊。除了軍屯工人在迪化收糧頗大外，其他庶政，多無出色。而地方民族間的派系之

前一月哈薩克的一英雄「烏斯滿赴省，對政府表示「無話可說」，哈薩克人是地方民族中對政府觀感較好的，但他們去年入承化，損失頗重，認為政府不支援他們，同時這些草莽英雄們，自願願高，不但政府不能控制他們，就是他們本身間也因地方鄉土等觀念，不能合作，到今天倒成了政府最難處理的問題。

上月宋總司令內調，西北行轅副主任飛迪，接理警備總司令，陶氏為人謙和，在西北多年，有婆婆之稱，對地方民族當能和平相處，我們預料，相對的和平還能維持下去。至於和伊方關係，政府將於民選省長工作完結後，再來和伊方談判，最近前國府委員鮑爾漢迪，有人推測，或係獲選競選，因為鮑爾漢迪獲選為省長，伊方可能同意，但哈爾前途，鮑氏恐無成功希望。

週末

與密理根教授的一席談

何永佳

(遊美雜記之四)

與密理根教授的一席談

以研究光學及宇宙線而得諾貝爾獎金從而知名全世界的密理根教授 (Professor Robert Millikan)，是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主管加州理工學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 Inst.)，住在美國平均個人財產最多的一個城鎮 Pasadena，儼為無冕之王。其長子 (Glenn Millikan) 在哈佛大學時與筆者同學，前年遊山滑跌慘死，久欲致唁，今乃得機會當面為之。在加州理工學院之教職員飯廳內，密理根教授夫婦，關於遠東事項，詢問甚詳。此科學泰斗，料不到其對於時事感覺如許興趣。其時正值蒲立德 (Bulletin) 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關於中國之報告書」(Report on China)，又值蘇聯駐聯合國代表 Vishinsky 在聯合國大會提議制裁一戰販 (War Morer) 的時候，這位老頭子科學家竟也戰戰兢兢起來，大有欲滅共產黨人而朝食之氣概。這老頭子的理由無非是：在資本主義自由企圖制度下，生產可大大擴充，其令到人體衣食之能力，大過任何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下的制度。談到蘇聯代表在聯合國指撥「一戰販」，密老頭兒認為蘇聯故意搗亂，誰也知道美國不是個好戰好侵略的國家，假如美國之中有一個是「一戰販」的話，那只能夠是那探行獨裁制，和戰大槓都由一人而不由國會控制的國家。由一戰販一談到華萊士，密老頭兒說那為一笑話 (Joke)，以為口頭上討好蘇聯就可以使那些共產黨改變心腸，他直不知共產黨是何種動物，你證他一寸他僅進一尺，且目目的，不擇手段，不講信義，不講友情，行見華萊士道這人上個大當：這是密教授對於美國進步黨黨魁之一種看法。發言時兩手發抖，聲音高過尋常，其太太在旁說道：「親愛的！請稍安無躁，這裏並無共產黨！」

參觀荷里活華納 (Warner Brothers)

電影製片場

荷里活 (編者按：何先生文中的「荷里活」，就是通常人所知的好萊塢。) 的電影名聞天下，然到他們那裏要參觀製片場，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從前有個美國學生，他的父親就是做電影事業的，他死後留有妻室，我以為

她總有辦法向她丈夫的電影界朋友一說，便可以讓我進去參觀。那知她說參觀幾乎不可能，因為製片場覺得不勝其煩，扮演人亦覺得不勝其擾，於是決意拒絕所有私人參觀之請求。

但電影公司究竟不能抹殺一切社會關係，因為荷里活一間大公司的介紹，我終於被允入華納 (Warner Brothers) 製片場看看。電影事業，本質即於美國東部，早年明星如 Mary Pickford 等都在紐約兩河之一名 Fort Lee 上演，今美國的製片公司差不多通通搬至荷里活，其故有二：一為美國西部尤其加利亞省，天氣溫和，一年四季悉如春，製片工作，不致於因天氣關係而中斷。二為地皮較東部為便宜，而製片公司需要廣大場所，Warner Brothers 之招待員告我，他們的製片場佔地二萬英畝。為甚麼要那麼多地方呢？因為製片場是世界的縮影，他不但樣的要佈置着五大洲的景像，從沙漠到森林，且要縱的陳列着時代的眞影，從紀元前的希臘到廿世紀的蘇聯。我所看見的有十五世紀英國小城的佈景，十七世紀法國鄉村的佈景，十八至二十世紀美國城鎮的佈景，其中有家庭，有野境，有畫景，有夜景，有月境，有雪境 (以白沙當雪)……，皆做得維妙維肖，製片公司不用出門一步而各樣各樣的景一應俱全。

製片場內的戲台，不一而足，一條街道上總有好幾個。進去裏面都是黑幕遮住日光，裏面只用電燈，開關如意，攝影者把鏡頭插準着在黑暗中電光滿身的演員，旁邊之導演人說聲 Shoot 即已攝入鏡頭裏去。一部影片，在銀幕上系來像天衣無縫，其實都是，一點一點湊起來的，其中連演員所說的話都有一個一個的好，用打字機打好在紙上，在攝影機旁坐着一個女的照着去唸叫演員喃喃跟說的。演員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導演者指揮，然不是一切隨導演者的好惡喜惡，導演者與演員同受着所謂 Call Sheet 的束縛，但導演人 (Director) 的話為最後的定章。

看起來再機械沒有了。一部影片猶如一部汽車，分功細到毫末，每人都有一份事做，但每人所做的事都很細微，一部影片即如一部汽車同在 assembly-line 上出世。至於電影明星，我們沒有見着很多，他們都不肯隨便

見客以免妨害工作。這女藝員只得了 Bette Davies, L. H. Hagen, B. 的遊行題字。總括說來，明星的真人沒有在銀幕上那樣漂亮。

汽車旅店 (Motel)

美國每五人有一架汽車。美國的長老告我，美國之有平民買得起的汽車不過五十年的事，但在這五十年前，汽車使美國社會起了空前的變化。譬如說，五十年前美國沒有幾條好馬路，但因為有了汽車，好路就來了，原因是人要政府造點好路好讓其汽車行走。又譬如：沒有汽車以前，沒有汽車廠 (Garage) 這個東西，現在美國有四百萬人靠汽車廠，靠修理汽車食飯。汽車使美國做鞋的生意，都不如沒有汽車之前，因為坐汽車的人多了，鞋鞋就用得少了。

至於汽車旅店 (motel, 從 motor hotel 二字合併而來) 還是這次我來美國頭一次看見的，前兩次都未曾見過。這個東西可說完全是汽車時代的產物。美國汽車路如此之好，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自駕汽車旅行，這些人多半帶了妻兒男女及衣服日用品，這些東西通通堆在車子裏。他已經開了一天車，入夜要投宿，他不斷投往一戰販大旅館，坐電梯到幾層樓上，車裏的東西又要搬上搬落。他只要找個地方，車子可以停在他臥房門口，行李不用搬進搬出，他要用甚麼，開門出來拿就是了，他要一小小臥室，夠他與家人過一夜，在雨浴下洗一個澡，明朝清清爽爽人向未起床前，他就可以開自己的車繼續他的旅程，不必再等候算賬那類的麻煩，因為租錢先一晚已付清了。一汽車旅店一正是這麼一個地方，他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所以遍地皆是。顯然地，這種旅店需要廣闊的地方，而美國西部地皮比東部便宜，故一汽車旅店一以在西方為較發達。八月廿五日在紐約

觀察社為發行

一觀察台灣航空版「啓事」

一、「觀察」自五卷三期起，發行「台灣航空版」，由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會浩然君承辦。關於「觀察台灣航空版」一切對外賬目往還，俱由台灣航空版承辦人負責，與「觀察社」無涉。
二、台灣航空版承辦人除印行並推銷「觀察台灣航空版」外，不得以「觀察社」名義作任何活動。



投考

會豐發

「方國秋！——」
「有。一個大約十八九歲的青年應了一聲，連忙伸手到窗口接到一張准考證，頭上落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也不掏出手巾來擦一擦，就急急地擠了出來。」

「國秋！」
方國秋正走上十幾步，忽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叫他的名字。他仰起頭，向着身旁二行隊伍中尋覓，看見對面的行列中有一個人正在笑着看他，原來是他這次在家回來投考的同學陳原。

「哦，是陳原兄。」方國秋擠了過去與他握手說。
「你也是今天來報名的嗎？怎麼這麼快辦好？」

「是的。」方國秋苦笑着說。「你說快嗎？我差不多等了二個鐘頭呢！你看，天氣這末熱，擠在人堆裏那末久，就弄的我滿身臭汗了。不錯，老張老李他們幾個呢？沒有來嗎？」

「他們托我代報，真麻煩！你看，我前面還有這末長陣人，又是雙行，等到甚麼時候啊！」陳原擡起眉頭說，「國秋，你准考證是幾號了？」

方國秋拿起手中的准考證看着，只見上面印着一報名號數第〇〇八七六五「字樣，隨說道：
「是八千七百六十五號。」

「呀！那末將近九千人？你看現在還有這許多人等着，截止日期是二十號，還有兩天呢！為甚麼竟會這麼多人報考？」陳原驚訝地說。

「其實這並不奇怪，我相信只要是公立校院都一樣會這樣擁擠的。私校收費那末重，誰不想往公立學校投考？聽說很多私校讀了一年的學生，還來參加新生入學考試，願意在公立學校從頭唸起。」

「那麼錄取成分是很少的了。」陳原說着，忽見前面的人在蠕動，中間留了一個空，他慌亂地步上前去，回頭對方國秋說：「你回去好了。」

「好！」方國秋應了一聲，隨也跟上一步說：「如有

等到我坐坐坐坐坐。」

「好的，我們早就想到你這談話，住在那邊太苦悶了！」

「怎麼？」方國秋不禁奇怪地問。

「唉！幾個人住在人家店舖裏，多麼不方便？要讀一點書都不能夠。雖然是自己的同鄉，但是他們是做絕絕的人，甚麼都……是嗎？那兒比得上你住在自己親姑母的家裏，多溫暖，又有表哥指教一切。這次我們一夥兒從鄉下出來，就是你最幸福。」陳原笑着說。

「那兒話，其實我精神上也不痛快。出了門來總有許多不慣的地方，那兒會比家中來得溫暖？陳原，改天見罷，我得走了。」

「好，再見。」

「再見。」

方國秋回轉身來走着，只見報名的人越來越多了；行列一直接長下去。他們個個都睜大眼睛看他，似乎很羨慕他這樣快辦妥手續似的。

× × × × ×

天氣非常炎熱，××大學新生入學考試，假座校中大禮堂為第一試場，但是擠上了七八百名的考生，室中就如蒸籠一般的灼熱。然而這是最後一科的理化試驗，大家都低頭盡心解答，雖然汗流浹背，可是誰也沒有功夫放下手來扇涼一下。

方國秋坐在靠西窗的一個位子上，西照的太陽正猛烈的從窗口射了進來，曬得他眼花目眩，頭昏腦脹，週身發熱。他正苦思着第三條的化學和第五條的物理兩個難問題，抓不到一些要領。他想起昨天上午第一課考的數學，也有一條代數及一條三角無法解答出來，心中十分焦灼，他的眼睛瞪住試卷出神。

「請你出去吧！」靜靜的試場裏，忽傳來這一句話。方國秋猛地抬起頭來，但是在他左面二丈多遠的地方站着一個監考官，手中捧着一本厚厚裝訂起來的報名單，眼睛直瞪着他面前坐着一個青年。

「甚麼？」那個青年很惶恐地低聲的問。

「周平生是你嗎？你看這照片像嗎？」那監考官指着報名單上的照片說。

「……」那青年沒有話說。祇忙慌的收拾了文具，站起身來，向着那監考官怒目看了一下就回身走了。全場跟着嗡嗡地響了起來。這時，忽然在講台上有一個四十多歲年紀的監考官，手中拿了一張大蒲扇，拚命搖了幾下叫道：

「諸位，請不要鬧！時間快到了。」他停了停又說道：「我這考試是力求嚴格的，惟願諸君會合理，機會公平。這要應和和和和和，這是我所希望，發見有些考生不遵守考場規則，我當即暗中記起來了，他們的考卷是要取銷的……」他不多說，好像自負其責，惟於會派費考生的買賣時間似的。

方國秋看了這幕趣劇，回頭仍在思索那兩個問題。可是腦中有如一張白紙，一點思路都沒有，心裏越發煩亂起來，只得把把好的答案重閱了一遍，補充了幾個字；索性不管那兩題，收起了筆墨，把卷子交上去。

他從講台下下來，看見身旁那些考生的試卷上，也留了很長的空白，他不覺苦笑一下。忽然他瞥見陳原也正在他面前，他不敢跟他招呼，匆匆地出了試場，來到門外的一棵大榕樹下面，頓覺通身涼快，胸中悶氣全消，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 × × × ×

方國秋從擁擠的公共汽車裏跳了下來，又弄的滿身大汗了。他急急地奔回他姑母家中，直走上樓，到他表兄岳周民的房裏。

「秋弟，怎麼弄成這樣子？快解衣罷！」岳周民坐在書桌前看書，回頭笑着對國秋說。

「擠成這樣子呀！在試場裏宿，公共汽車裏更是擠！」方國秋一邊脫去外衣一邊說。

「哈哈！現在本是擠的社會呀！一周民笑了起來。

「這是好現象嗎？老實說，這是紛亂，是糟的表現！」國秋氣憤地說，把外衣向牀上一丟。

「不錯。我們不說這些了。我問你，今天又考得如何呢？」

「民哥，還不是一樣嗎？今天的理化纔做了三題，又有兩題像昨天的數學一樣，深奧的令人莫測其妙，無從着手，一個字也解答不出來。真想不到題目會難到如此！」方國秋坐在牀沿上說。

「其實要做到入學易畢業難纔是合理的！而現在是恰得其反。不過依目前實際情形看來，入學試題之難，也是不得已的，尤其是公立學校，招收名額有限，而幾千幾萬人投考，當然要把標準提高一點！」岳周民很正經的說。一問題就在這一大批考不取的青年！私校讀不起的，就業更難；我們都是沒有專門學識的高中生，連當小學教員都不夠資格！」方國秋哭喪着臉說。

「你說專門嗎？你知道現在有多少大學畢業的

(下接第13頁)

文化生生活出版

● 三十週年紀念全部圖書大廉價七十天 ●

原價期間
任特辦法：

一、廉價期間自九月十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外埠以郵費為憑。

二、廉價期間本版各書一律六折發售。

三、優待同行基本讀者照廉價另給九折。

贈書啓事

凡於本年九月五日以前所參加之基本讀者，本社特贈送巴金新著「靜夜」的悲劇一册。並另有贈券券寄上，憑券贈書。如有基本讀者於本月二十六日前尚未收到該項贈券券者，請即來函索取，當即寄贈。

九月份初版新書

譯文叢書

包法利夫人

福樓拜著 李健吾譯

「包法利夫人」是福樓拜「現實主義」打定天下的第一部傑作。他一出現，法國帝國政府就控告作者傷風敗俗，嚴懲宗教。但是外省婦女同情他的女主人公，讀過這部小說都哭了。女性的尊嚴第一次在這裏覺醒，馬克思的女兒把他譯成英文。歐洲文壇整個被這部傑作震動，易卜生寫「傀儡家庭」，哈代寫「還鄉」，於是現實主義風靡了全世界。

李健吾先生譯筆忠實流暢，「情感教育」可以證明。「包法利夫人」稍有疑難的地方，都有詳細註解，當時轟動歐洲的新狀和辭彙狀，全部譯出做為附錄。

定價 G.Y. 1.50

巴金著 · 散文集

靜夜的悲劇

這是作者的
一本散文集。
裏面有三篇作
者自己喜歡的
文章。那是盧
騷和他弟子們
的故事。據作
者自己說：「
我至今還相信
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不錯。」

定價 G.Y. 0.10

擴大徵求基本讀者

凡於廉價期間向本社直接購書者，無論多少，均作為基本讀者，給正式收據，並發給憑券，以便憑券領取贈書。

基本讀者參加辦法

- 一、基本讀者須一次預交金圓五角，本社於款收到後，即照本收據，正式立戶。
- 二、購本版書七五折，外版書刊八折。（七期及技術實用書除外）
- 三、凡本埠讀者交款立戶，其所交款項可即作購書之用；（外埠亦同）
- 四、來函務請註明郵局匯下，郵票代洋十元，函寄現鈔遺失，責任由寄款人自負。
- 五、本社新書發售特價時，基本讀者另有優待。

● 寄售章詳目書 ●

· 世界文學名著一覽 ·

- 獵人日記（屠格涅夫） 歐濟之譯 二·七五
- 冰島漁夫（羅遜） 黎烈文譯 一·三五
- 文藝·戲劇·生活（丹欽柯） 焦菊隱譯 二·一五
- 柔蜜歐與曲麗葉（莎士比亞） 曹馬譯 一·四五
- 春潮（屠格涅夫） 李林譯 二·三〇
- 懸崖（阿察洛夫） 李健吾譯 三·二五
- 簡·愛（勃朗特） 黎烈文譯 一·二〇
- 兩兄弟（莫泊桑） 焦菊隱譯 三·四五
- 娜娜（左拉） 高植譯 三·〇〇
- 復活（托爾斯泰） 許天虹譯 六·五〇
- 大衛·高柏菲爾（迭更斯） 朱雲譯 三·六〇
- 凱旋門（雷馬克） 黎烈文譯 一·八〇
- 伊爾的美神（梅里美） 巴金譯 一·二〇
- 快樂王子集（王爾德） 文穎譯 一·一五
- 鴉人（朵思托也夫斯基） 盛澄華譯 一·二〇
- 地櫃（紀德） 汝龍譯 二·九〇
- 亞瑪（庫普林） 李健吾譯 一·一五
- 莫洛博士島（威爾斯） 李健吾譯 四·五〇
- 情感教育（福樓拜） 雷迅譯 二·七五
- 死魂靈（果戈理） 雷迅譯 二·〇〇
- 密爾格拉得（果戈理） 以上均按金圓定價發售。

本社 辛巴 西班牙的曙光
代售 門金 繪編 定價：金圓五角

觀察

· 分五角一份每 · 日八十月九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四第 卷五第



專論
評全國學生被捕事
張羣訪日之行
改革幣制已屆成敗關頭

張志讓
方秋葦
劉大中

外論選譯
被牽着線的獨立國——菲列賓

William Winter

生活與文化
社會出路與人類前途

李中巖

觀察通訊

閩局將動(福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閩錫山治下的山西 觀察讀者投寄
透視川西平原的農村
與農地(成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浙大學生被捕詳記
(杭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欄

老成持重——英國政治風度

Kingsley Martin

文藝

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

宗白華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二號內一號

電話：(02) 23431

郵政掛號：59071

北平府右街李蘭老

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

十五號

台北館前路八

訂閱價目

三個月：元八角

六個月：元六角

一年：元四角

航空掛號：元八角

航空掛號：元六角

航空掛號：元四角

航空掛號：元二角

航空掛號：元一角

航空掛號：元五分

航空掛號：元二分

航空掛號：元一分

航空掛號：元五分

航空掛號：元二分

航空掛號：元一分



七五事件的·道· 德的·法律的責任

侯庭督

七五事件調查報告書總算發表了，政府的處理辦法，迄未見諸明文。繼之而來的，却是傳作義自請處分，北平各人民團體聯電總統，謂七五事件罪在奸匪，不應處分軍警長官。生在這個「民主」的國度裏，就是囉吧也要講話了。

七五事件調查報告書，無論從文字裏，從筆調上，我們已經看出，很多都是勉強、掩飾的。無怪會命調查的秦次長德純，受刺後回京後要辭職了。

關於七五事件的責任：

第一：我們來問教育部。教育部既公佈在天津劫難中臨大，何以無準備？乃東北學生蜂擁而至，踴躍台，住城洞，無衣無食。東北學生經過共區時候，共產黨就說，如果政府不管你們，你們再回來。教育部這種不管的態度，無異給共產黨送學生。據行政院李惟果部長向來京請願學生說，在立法院李惟果部長向來京請願學生說，在立法院李惟果部長向來京請願學生說，已撥兩千四百位，專為救濟東北學生，這筆款子教育部何時領到的？交誰負責辦理？都該查個明白。教育部事不關己，事後派員赴平，向各方推卸責任。誰實為之？執令致之？七五事件，教育部該負大部份政治責任。

第二：丁履進參議員在北平參議會提出的「救濟東北來平學生緊急辦法案」，我們實在不敢苟同。學生受軍訓，停發東北國立學校經費，這不是救濟東北學生而是摧殘東北教育。丁參議員應該知道，東北是思想鬥爭的劇烈的戰場，爭取青年之不暇，這種提案，是為淵驅魚，把青年逼

到共區去。據說丁參議員在新聞界工作，七五事件發生後，大肆渲染，中傷東北學生，都出了參議員之手。若然，我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七五事件，丁參議員應負道德上全部責任。

第三：學生搗毀參議會，是一種暴動行為，姑無論其為何種暴動，軍警當局何以不在暴動行為時，投捕肇事的一反動份子，而在到了許宅以後，學生行將解散之際，開槍殺人？據目擊者說，學生在參議會時，警兵十九團梅慶鳳團長被擊受傷，惟恐惡警開槍，大聲疾呼：「我寧肯被打死，也不准開槍。」陳繼承，白世維，趙昌言等人，較之梅團長慚愧無地矣。在任何場合，軍警對徒手羣衆開槍都是長性的表現。七五事件，陳繼承，白世維，趙昌言等，應負殺人的法律責任。

傅作義總司令上書自請處分，我們非常同情。以過於負責的傅氏，這種表示，絕非任袒部屬的姿態。西安事變蔣委員長回京後尚自請處分；以傅氏精練華北軍政，七五事件竟在北平發生，傅氏不能毫無責任。中央予傅氏以處分，也是給傅氏心靈上一個安慰。

至於北平各團體聯電總統為嚴事軍警長官緩頰，真有些莫名其妙了。原電有云：「軍警帶槍應付緊急局勢，藉以保護一百八十萬市民之安全及東交民巷中外觀瞻所繫之地區，實為事理之當然。即因防止暴動而發生意外，在法律上並不負任何責任，此亦各國之通例。」各國火山噴火則有之，未聞有軍警大規模屠殺徒手學生之一道例！

八名東北學生靜悄悄的與世長辭了，十九名受傷的，也可能變成殘廢。他們度過十四年孤臣孽子的生活，雖然逃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刀尖，終於在民主時代低下頭來。死者不能復生了，在東北三千萬人心中深深的留了一個烙印。
(編者按：立法委員侯庭督先生

投來此文，原冀在專論欄發表，因為本期專論三篇均已編好，並且這三篇都有時間性，不能移刊下期，侯先生此文字數比較短，所以移在讀者投書欄內刊出。)

痛斥編者

編者先生：讀貴刊四卷廿四期「觀察第四卷報告書」後，有涉及本人等的事。先生云：「又如同濟大學一慶室裏，倒有四人來訂閱四份『半價本』。照我們的意見，假如他們經濟寬裕，便應各訂普通本，假如經濟困難，便應四人合訂一份半價本。但是現在社會上有便宜貨便大家搶，既不尊重舉辦人的原意，也不顧到是否剝奪了他的權利，這種情形都使我們傷心。」現在有幾點，我們不得不申辯的：

(一) 蓋先生不知同濟宿舍的情形，大的五六十人一間，小的也是十餘人一室，若在數十人共同的寢室，訂閱貴刊半價本四份而過份，殊使我們不解。假如某學校設備完善，每人住宿舍一間，且設備而四位清潔同學訂四份，先生認為合理。這種「契約求劍」的辦法，也難令人苟同。

(二) 「半價本」的目的，是便利窮困的同學，我們家鄉既在共區，經濟來源早斷，若先生硬以此刺奪我們的「權利」，也是貴刊創設「半價本」的初衷嗎？
(三) 我們竭力籌措訂閱，實因我們愛嗜貴刊，不但是按期瀏覽，而且極欲保留，或轉贈內地諸清寒的朋友。若說四人可以合訂共閱，那又何苦。同學處既可借閱普通本，閱覽室亦可任情涉獵，先生何不說「窮人就該死，窮人也不能合訂。」
(四) 先生說「一便宜貨，便大家搶」，我們很客觀的講句，到底拈到多少便宜？當時普通訂戶有八折優待，且優先寄出，遺失後且可補寄，紙張好，印刷清楚，反過來說，「半價本」既無折扣，又須最後付郵，遺失後且「恕不補寄」。紙張

印刷模糊是事實，名為半價，其實又佔到多少的一光！，這這年頭，有良心的到底有多少！，若你們不按期寄出，而又聲明「遺失不補」，這問題就複雜了。我們之間就有好兩期未收着，大概是「共需有誤」吧！你們一定說這是一願忠者上鉤，又那能怪我一「婁子牙」？
上海的一廣告術一相當的發達，五光十色，離奇怪狀，豈能言喻。貴刊的「半價」號召，也不過是離奇中更離奇的一個騙局而已。先生見到市上「買一件送一件」的「大性機」？這與「半價」，又有何區別呢？

總之，現在社會上唯窮人才「沒有一道理，罵窮人也最為簡單，因既不希望從窮人身上賺錢，實屬自不必顧慮，也不必窮人打算，「媚富驕貧」，雖為世人之常情，真不料我們觀察編輯先生也是如此，真使我們傷心！我們於悲憤之餘，不得不對編輯先生的一閉門造車「一信口雌黃」的言論予以駁斥，若先生尚能顧及貴刊一向的信譽和立場，請賜予披諒，公諸社會，讓大眾評理吧！不過，這也看先生的度量如何？也可以說是一嚴真的考驗——唐突的地方，尚請海涵。

四半價本訂戶謹上於同濟大學
八月十日
萬好後，我們又不想寄，覺得未免給先生太累了。今天想想，還是付郵的好，我們認為辦報的人，也不能隨便便的斥責人家，因報紙的編輯也要有私德。
九月十日

(編者按：這四位半價定戶把編者罵得痛快之至。我對於這四位同學，能夠在氣憤之餘，寫了信而未立刻付郵，這種寬恕的風度，十分欣賞。他們的說話得有條有理。編者被罵得無地自容。我們希望這四位同學將來學校畢業後，也能鼓起熱情來為社會服務，並有度量忍受社會的不公道的斥責。)

本刊傳統

一、本刊對於一切社會問題，均持獨立之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之見。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之意見。自發文實。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編主平安儲
察 觀
期四第卷五第
日八十月九年七十

本期作者

- 張志讓：復旦大學教授
- 方秋華：亞洲世紀月刊主編
- 劉大中：清華大學教授
- 李中巖：前成都西南新聞
- 日報主筆
-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評全國學生被捕事

張志讓

最近各地陸續有拘捕學生，偵查審判之事。始於北平南京，漸及上海以及其他各地。此事無論就國家、教育、社會或學生的立其來，都是異常重大。社會人士，凡有所見，都應極力發抒。筆者曾在北平、上海、及戰時西南大後方長期任教，所見學生甚多，得有良好印象，今睹此重大事件發生，尤不能默爾無言！

一年餘來範圍較大的所謂學潮或學生運動，始於前年冬間的沈崇事件，終於今夏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事件。其中凡屬普遍性的事件，莫不瀰漫全國，且擴大至於社會各界。其僅於一校有關的事件，亦均引起全校性的行動表現。這在滬上及他地報紙均有記載，不難覆按。且政府既均一律稱之為「學潮」，則顧名思義，其均為多數人之集體行動，已不待言。如此廣大的運動，當然是大多數學生自發的活動，要說它是由少數人操縱，或為外力所利用，誰能相信！

況則假定一種集體行動確係由於少數人的操縱，亦並不因此就可斷定其為壞的行動，更不可因此就斷定其為違法行動。要評判每一學生運動的是非，必先就其主張與目的予以評判。如其主張與目的並非不對，則縱有少數人操縱其他，這運動仍舊是對的。而這少數人既非操縱任何不當之事，其操縱的行為亦即並無過失可言。所以我們如果對於學生運動，不隨其主張之當否，一律冠以操縱利用之名，因而即斷為不當而且違法，這種邏輯決難成立。譬如孔子令「小子鳴鼓而攻之」是，即可謂孔子係在操縱其弟子，因而應受懲處？又如一校少數學生提倡讀書運動，一呼百應，蔚成風氣，是否亦可謂其操縱多數學生，因而違法？再如三五信教學生，邀集多數同學，說教勸善，羣起信之，舉行禮拜，是否亦可謂其操縱多數學生，因而違法？其本身並無所圖好，其對象完全要看其所提倡之事的正與目的是好是壞而定。

然政府對於學生運動則不然，向來僅有禁止、取締、或以實力制止的舉動，而很少對其主張作正面的批判，即如沈崇事件之運動遍及全國，歷時甚久，而政府當時並無一言以論其主張之是非。反對美蔣扶植日本運動為學生最後一次的學潮，亦為一年餘以來最大的學潮。如這一學潮並無不當，則一年餘以來的學潮係以一顯然正當的學潮結束，政府論理不先不後，恰在此時大批逮捕學生。如這一學潮確有不當，則政府自始即應就其主張與目的指出其錯誤之處。而事實上則政府即至今日亦尚無一言及此。如此而欲入人於罪，其何足以服天下人之心！

政府如真確信某一學潮係由少數人操縱、煽惑、製造而成，多數人僅因受其欺騙而盲從，則消弭之法甚為簡易，祇須以真理對付枉理，以正論對付邪論，將少數人的欺騙揭穿，使多數人恍然大悟，其事即可立時平息。然政府從未從事於此。政府從不採取辯難與說服的方法，從不與學生講理。不講理而用力或者足以對付個人，但決不足以應付多數的學生。因為尋常不講理而用力是缺乏自信之表現，特足以使對方疑我為無理，反而益堅其自信之心。以此對付學潮，非但不能減少其益衆，而反足以使其增加。試觀一年餘以來的學潮，參加的人數愈來愈多，即一吐證，何況學校，無論公立私立，都是為國家教育青年而設，青年都是為受教而來。若對其行動主張之是非，始終不與講理，而最後遂欲入之於罪，如被人譏為不教而誅，又將何以自解？

最近各地逮捕學生，並非在學校多事之時，而却在平靜無事之日。此時大多數學生都因暑假回校，留校學生甚少。列名拘捕的學生當然多數散處各地，不在校內。何以逮捕之事，早不在暑假開始以前，尤其是學潮方盛之時舉行，遲不在學期開始、大多數學生回校之後舉行，而偏在此時舉行？究竟為何原因，自應無從臆測，然却有一原因，顯然呈現於外，就是免避免激起多數學生的憤感與行動。可是如果多數學生真是受了煽惑，則使其目睹少數煽惑之人就逮，正是促其醒悟的最好方法。政府偏備選擇多數學生不能目睹之時前往拘捕，顯然是為恐發生事端。由此更可知少數煽惑，多數盲從之說實難成立。

還有我們不應該忘却的，就是學生既為國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權，受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按凡在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

一般國家之內，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皆應有不背此旨之法律，為其根據。行使此等權力，如無犯罪法條可據，固不合法，即有此種法條可據，亦尚須先問其內容是否不背憲法；如其內容與憲法保障人權之旨不合，則縱經立法機關通過，具有法律形式，亦仍必因其違憲而失去效力。這是一般行憲國家的原則。過去學潮或學生運動中一切共見共聞的行動與言論，未見有可適用「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之例；如將此條例解釋為可以適用，則非犯解釋錯誤之病，即該條例在違憲範圍之內，與保障人身自由之旨相背。

一般民主國家不僅認為審問處罰須有犯罪法條可據，且必須由有權審問處罰的機關為之。有權審訊處罰的機關就是法院。有些憲法且明白規定非法院不得審問處罰。再進一步研究：何謂法院？是否任何司法機構，只須稱之為「法院」，即可認為法院，還是必須是經常設置的法院，始可認為法院？王世杰先生於其所著「比較憲法」一書內有言云：「凡對任何犯罪案件或犯罪人，於法定範圍處罰機關以外，設立臨時或特別法院，以行使審問處罰之權者，也構成侵犯人身自由的行為。各國憲法對於這種法院，亦往往以明文禁止。」云云。前立法院通過法律，設立特種刑事法庭，然其立法所據之憲法條文明明僅載：「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所謂「各級法院」當然係指法律編制中經常設置之各級法院。若對臨時事項設立臨時法院，自不在此條所

張羣訪日之行

前任行政院長張羣以私人資格，於八月廿一日離滬飛日訪問，九月十三日載與而歸。張氏此行，除其夫人外，另有外交部顧問邵毓麟。張氏行前聲明並無官方任何特殊使命，預計行程至多三週，即可返遊日本。現綜計張氏訪日時，計為二十三日，如非南真電催，尙擬由南真一行。誠如外報所說，「張羣此次訪日為麥克阿瑟元帥最珍視之「上賓」，其與麥帥四次的會見，接踵而談，實為盟國任何政治家外交家訪日之外所未獲得的優遇。麥帥好友澳外長伊瓦特，在日所未得到的殊榮，張羣獲之；盟總從未予盟國政治家的特殊款待，張羣受之。日人對張羣的尊敬，日本政府對張羣的禮貌，更可以從他們一雙對利的眼光看出。

張氏是載興歸來了。不用判斷而自知，張氏此次的觀察旅行，對麥帥、對日本、是印象良好，收穫豐富。今而後，他在國內政治上的聲望，將有新的增強，他對政府提供的日本問題意見，必將成為最權威的意見。我們正和多數的人羣一樣，以驚異的眼光，注視着張氏的飛去和他的飛來，不過心所謂危，不敢放言，爰就張氏訪日之行，述述如左：

今天的日本，在麥帥的專斷管制之下，情勢是萬分微妙的。麥帥對於日本

定立法權範圍之內。以此審理學潮中的活動，亦與人身自由之保障不合。人身自由之保障尚不僅要求逮捕、拘禁、審問、處罰。須由有權的機關為之，且尚要求須依法定程序為之。依法定程序，檢察官須「知有犯罪嫌疑」，始得「偵查犯人」，始得「偵查被告」。如並未知有犯罪嫌疑，則不得發發傳票。拘提被告，應用拘票，而拘票則非有拘提理由，不得發發。若僅發傳票而未發拘票，即不得拘提。於傳票加誓「隨時到案」而即實行拘提以去者，實屬於法無據。搜索應用搜索票，且其搜索票必須載明應搜索之處所。各地官廳違反以上各種及其他法定程序之處頗多，亦係侵犯人權。

以上係從事實、道理、教育和法律之各種觀點，評論全國各地大批逮捕學生之事。據此論及一般愛護青年之意，筆者認為中央及各地有關機關應迅予恢復被捕學生自由，並使渠等完成其學業。

一面筆者對於各有關學校、法學家尤其是律師、社會人士、及政府，還有幾點希望。對有關學校官，希望各校當局以視學生如子弟的心情，盡一切可能的力量，設法恢復被捕學生的自由與學業。對於法學家尤其是律師，希望他們本其探求是非和重視公道之素志，為盡研究辯護之力。對於平時重視學生運動的社會各界人士，希望各盡心力，以求是非之得大白於天下。對於政府，希望觀察社會各界為學生被捕而發生的各種呼聲，並勿以此各種呼籲為有礙。

方秋葦

——東亞的遠大抱負，早經浦立憲說得清楚。今年三月，麥帥致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書簡中說：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對世界政策的一環，援歐比援華為優先這事是不妥當的；因而麥帥強調：要實行中國國內的改革，必須先使其內戰停止。中國內戰如何停止呢？不待麥帥的說明，浦立德周以德諸人已公開提出美國武力援華、以及麥帥為援華負責人的主張。據說這個建議深為美國共和黨若干權要同意，因而南京政府人士對於杜威即將上台後的「大東亞」形勢，閃爍着黃金似的希望。在這希望的光輝下，陳立夫在美訪訪訪威，不謀而合的，這與張羣的訪日，自然會使人聯想着一幕雙管齊下的進行曲。

由於這些事家所包含的意義，中外對於張氏的訪日，發生了許多的揣測和謠傳。首先法國新聞社於八月十二日傳說張氏訪日的任務有三：（一）建立中日韓三國同盟；（二）與麥克阿瑟商討援華以共事宜，然後再與美國國務院商討更具體的步驟；（三）安排蔣蔣兩氏會晤事宜。這個傳說的可靠性如何，無人能加估量，而日本報紙的穿鑿附會，實在比法新社的報道有聲有色。日本報紙一口咬定張羣的訪日訪麥，是為了中日韓三國同盟而來。直到八月廿六日邵毓麟在東京發表談話否認，這一連串的謠言纔暫時吹過。常識令人瞭解若干的事物，一切事實的演變和發展，是有其來龍去脈的。

凡明悉日本現狀的人，皆知麥帥制下的日本，是限制私人旅行的，凡無公務的外國人，無論在任何情形下不得在日本境內逗留，或自由旅行日本全境，即美國人亦不能例外。在此種封鎖和限制的情況下，張氏能以「私人資格」到日本「觀察旅行」，不可謂非空前的破例。其次，張氏在國內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日本問題的理解，素為美日人士所熟知，日本人認為他是「蔣大總統的心腹」（東京時事新報）、「最有資格交換中日友好意見之人士」（東洋經濟），並且張氏同麥帥的私誼甚篤，一九四五年張氏由美返國路過日本時，其受麥帥優厚的款待，三年未敢或忘，而麥帥在寂寞的客居中又無時不翹盼老友的重遊。澳外長伊瓦特多次的訪日，至少有一半的行程是接受麥帥邀約的。八月廿一日，張軍抵達東京羽田機場，當即發表聲明說：此行純係私人旅行，並感謝一九四五年由美返國過日時麥帥優厚的款待。足徵張麥私誼之厚，三年如一日。因而張氏在日所獲的「殊榮」，豈偶然？想昔日張儀蘇秦遊說列國所得的款待，恐怕也不過如斯而已。

事實是在不偶然的情態下發展，一切的揣測和臆斷，並非無根之花。現在，我們且看張軍氏在日廿三天「觀察旅行」的動態：

張軍一行三人是八月廿一日下午抵達東京的，除九月一日到大阪、京都、奈都等地遊覽五日外，在東京逗留的時日為最多。在東京，與麥帥有四次會見：第一次、時間為八月廿二日（星期日），麥帥夫婦破例招待張氏，張並轉送蔣總統致麥帥私人函件。第二次、時間為八月卅一日，即張氏遊大阪行前之一日。本次會談歷二小時，內容未公佈，與張氏接近之人士仍一如往昔之保持緘默。第三次、時間為九月八日，會談兩小時半。張氏除與麥帥談及此次遊歷日本所得之各項印象外，並探討不能公開之問題。第四次、時間為九月十日，即返國前最後一次晤談，內容未公佈。

張氏與麥帥每作一次晤談，日本內閣總理蘆田均（民主黨領袖）必訪張氏交換意見一次，對中日問題作深切的懇談。不僅蘆田曾與張氏作多次晤談，即自由民主黨的幣原重喜郎、民主黨的犬養健等國民協同黨幹事長三木武夫、社會黨幹事長片山哲等，先後與張氏作兩次以上的晤見。他如學院教授、退休的外交家如有田川越等，均被邀見。京都之遊，與關西財界人物和美國第一軍團司令施溫作深切會談，意義更為重大。張氏在日除與盟軍人員聯合關係首腦部以及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之代表會見外，並多次出席「日華文化協會」、「東邦研究會」和日本文化界的招待會，發表有關中日問題之演講，尤其隨行前在中國駐日代表團的記者招待會（九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席上發表「告日本國民書」，並由日本廣播協會錄音，向日本全國轉播，甚為日人所重視。這篇演講並未對日本的「和平民主」現狀表示滿意，他希望日人努力「思想革命」和「心理建設」，張氏最後強調三點：第一、日本的復興必須從經濟的和民主化着手，中國輿論希望日本復興的計劃與努力，應該免於戰前的錯誤與失敗的教訓；第二、日本的復興如無其他國家特別是近鄰的中國合作與援助

，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第三、關於中日兩國的未來關係，兩國人民都將希望從一個新的基礎出發，來樹立兩國的百年大計。中國對日決不報復態度；日本朝野希望早日締結和約，深信中國亦必本其早日召開和會之一貫主張，繼續與有國家協議。據法新社的解釋，張軍這番演講，對於日本和平民主之功大為失望，因為若干戰武主義復活的事跡，說明日本如不經再教育的階段，很難真正步入和平民主的前程。假如法新社的解釋不差，張軍不應對日本失望，而應對麥帥失望！

日人對於張軍的重視，非自今天始；不過今天重視張氏之行，意義格外深切。自從南京發布張軍訪日新聞後，日人即報以歡聲，發出許多評論，寄予無限的希望。八月十四日到九月一日，為日本報紙討論張軍訪日最高潮的時期，日本政府人物與張軍深入交換中日問題的意見，自八月廿五日下午張軍蘆田談話起，至栗柄越夫（經濟安定部長）九月九日訪張談日本經濟復興不威脅中國的問題止，其間很少產生「協調」或「一致」之見地，充分表現日人氣量的狹小，政府主持人的毫無政治家風度，斤斤計較現狀而不追求未來。我們局外人看得清楚，未知張軍氏有否警惕？

先看日本報紙的態度。日本報紙對於張氏訪日，最初確感惶惑與騷動，在張軍蘆田會談之後，居然裝起強硬的態度來。茲摘引各報社論如下：
 「希望中國前行政院長張軍訪日之行，能有助於祛除中日間之誤解，尤其是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之恐懼心理。吾人自承對和平民主之努力，尚嫌不足，但日本人民對和平民主之熱忱，已為舉國一致之情緒。吾希望張氏探討日本經濟復興計劃，並不危害中國，而若干中國人士之誤解，似屬過慮。張氏對日本的認識甚為透闢，渠可能使中國方面祛除對日之誤解。」
 （八月十四日東京世界日報社評）

「美國援日與援華有同等重要，中日經濟關係密切，應彼此呼應相通！蔣大總統的心腹，對日本有深切理解的張軍氏，近將訪日，目的在將日本的真實情形，向中國民眾傳達，以祛除中國若干人對日之恐懼，及美國對日政策認識的不安。」（八月十四日東京時事新報社評）
 「中國目前所最恐懼者，為日本恢復遠東強國地位而威脅中國之安全，尤以美國援助日本，中國之愛懼日甚。實則日本經濟之迅速復興，並不威脅中國。」（八月十六日東京新報社評）

「日華兩國現在正走着非常困難的路，貿易等交流固不必說，即使思想的交流也不能順利地實現。這樣，勢所必然地，我們對中國的關心每易成為稀薄，以致除於中國人對日本復興所抱的不安與誤解，也沒有特別去努力加以解消。我們對張前院長的來訪特別期待著的，最重要的是能充分冷靜地認識日本的真實姿態與國際地位。如業所知，中國對過去的敵國日本，也將容許其保有相當程度的工業水準。日本停戰未久，雖說已愈

遠地民主化了，在政治及經濟中，也還未把封建的成份完全清算，但是不信道事足以阻止我們走向民主主義。中國人所担心的「地下政府」業已組織之類，完全是由於誤解所造成。……如果日華兩國以友愛的精神，再度鞏固邦交，而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則在東亞也一定會造成永久的和平與安全。這樣說來，一切稱應從日華兩國精神上的了解出發。張前院長對於日本現狀的指摘，我們願意告訴中國有識之士，我們自己對這點也將深自反省。」（九月一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評）

日本報紙一致不滿中國人民的「反扶日」，認為中國對日本復興恐懼與不安，係基於「誤解」「錯誤」，及「精神上的了解」不夠，祇要把這種心理祛除，互相從「神」上的了解出發，才能真正「以友愛的精神，再度鞏固邦交，而保障和平與安全。」這一幅面孔，忘去了自己是戰敗國投降國的身份，毫無悔意，毫無良知，其氣量之狹小，睚眦之怨必報，躍然紙上。才其無恥的，是大阪華僑創辦的「國際新聞」，八月廿四日社評竟指中國知識份子的「反美運動」，障礙了中日邦交，並且是「對於現在最需與美國援助中國停止內戰的問題，因此「而可能使中日兩國人民回復為亞洲的盟邦，並為全亞洲的和平與福祉而築成中日合作的鞏固基礎。」這簡直不像中國人民應該說的話，而是日本反動派所說的話。

其次，再看日本政府當局的態度。現階段的日本政府，由保守勢力的政黨執政，蔭田均即為保守勢力的中堅代表。八月廿五日張蔭田會見時，張氏對於日本奮力之復活表示恐懼，蔭田立即答覆此種奮力理已不復存在。廿八日張氏出席「日華文化協會」招待會，宣稱：「日本必須剷除其軍國主義，不備思想必須革新，心理亦須已變，藉可成爲一和平民主的國家，否則則永不能獲得盟國之同情與合作。」九月三日到京都，同關西工業界談話，張氏發表相

同的見地。日本政府認係張氏的「誤解」，故對張氏的談話並不表示滿意。九月一日朝日新聞的社評，相當代表政府的意識。總之，日政府對張蔭田的訪日，初寄予無限的希望，後來這希望又漸趨淡薄，因為張氏的日本觀並不完全符合蔭田的理想。蔭田同張蔭田雖然有相當的距離，片山同張蔭田的談話似乎較為接近。實在說來，張蔭田此次所接觸的日本人士，多是保守勢力或財閥附屬的人物，份子複雜，水準不高。開明進步的人士，張氏未予接觸，甚至社會黨內派均未單獨接見，要之，同這一羣時代的渣滓談「和平民主建設」，當然是無從談起的。張蔭田應該謝絕麥帥，因為麥帥管制的「民主化日本」的政界人物，正是這一幅面貌。

那麼，張蔭田訪日究有什麼收穫呢？事實上，他可能滿載而歸的是：第一、麥帥這次對於張蔭田的來訪，的確以無限好感，破例以私人函件一封，在禮貌上，麥帥可能以回函一件，請託張氏以私人資格轉達。第二、麥帥四次會談內容，自然無從得知，但張氏靈活運用，以及臨時的應變，可能對下列幾項問題表示關切：（一）日本現在備用的過剩軍火，將作如何運用？或是否作為「賠償物」？（二）美國對日單獨媾和，中國將在什麼條件下對日媾和？（三）中國撤去軍事與未來東亞形勢的關係；（四）中日經濟合作問題，特別是中日貿易如何圓滿的問題。這幾項問題的任何一樁，如果獲得解決，都是此行的收穫。如所周知，張蔭田這次的訪日，實是訪麥。張蔭田對於日本政府及各政，是抱試探的態度，而其真正的任務，是對麥帥和未來美國的遠東政策，抱著黃金似的希望。這次的政治旅行，意識上是很重大的，情緒上則是悲喜互見，矛盾又纏綿，困惑是我們的政治家。我們且看張蔭田回國後，除了向「中國政府提出完全及非常可靠之報告」（合衆社社）外，又將如何向中國人民交代此行的所見！

改革幣制已屆成敗關頭

——政府應立下決心去停放封存——並應立即發行物價指數債券——

劉大中

幣制改革已經過了兩個星期，物價得到了暫時的穩定。但是在最近的三四天內，市面上銀根鬆弛已經到了表面化的程度，物價已顯反漲趨勢。有許多物品已經漲到限價的水準；更有少數物品的價格，因為政府禁止超過限價的登載，報紙只能用空格去代表。在這種險象叢生的狀態下，政府並沒有拿出我們一向所主張的「停放封存」辦法來；不但如此，政府反而在增資的辦法上，對行

幣制改革現在已到成敗的關頭。這次若再失敗，我們在文化界服務的寒士一般公教人員，以及一切靠月薪度日的平民大眾，就要赤貧絕境。對於這一次改革法案的全盤檢討，筆者已在「新陞週刊」第十六期著文討論；鑒於現在形勢的危險，我們不能不就其主要的成敗，再作呼籲。

本文共分三節。第一節說明以往十數日內暫時穩定的原因，及其不可靠性。第二節討論目前病源之所在。在第三節中，我們把應付目前危險狀態的緊急

辦法，具體的提出來。

一 以往暫時的穩定及其不可靠性

過去十幾天中的小康局面，絕不容樂觀。實際上，這種暫時的穩定，完全是建築在下列這三個脆弱的基礎上面；而在這幾天內，這三個基礎已顯出不穩的徵象：

(一)「警察力量」的震蕩：

在過去這十幾天內，政府對於基本的禍源不過加以皮毛的管制，反置全力於市場和限價的檢查和監督。這種被動軍警憲和特派「督導」大員到各處監督的辦法，我們統稱之為「警察力量」。凡是指揮用「警察力量」去推行一種政策的，結果總難成功；對於經濟方面的事務尤其如此。

在起初時，商人還摸不着頭緒，不敢妄動，政府的監察也特別嚴，所以一般物價都未超過限價。但是，銀根的鬆動和利率的降低是物價「看長」最可靠的信號，利之所在，商人們豈能經久按兵不動，這就是近幾天來報紙上「空格」物價出現的原因。超過限價的情形加多以後，政府有多少警察能去個別監督？

(二) 人民心理反應的影響：

金圓券的發行，正在物價急劇上增之後，人民望治心切，對於這一新耳目的新幣自然樂於接受。加以八月二十及二十一兩日銀錢美休戰，以及國家行局暫時停止貸款，銀根因之抽緊，物價得到幾天的平波，人民隨時以現幣爭購物資的風氣一時大熾，現鈔流動的速率因而大減。

但是，人民多少年來被政府財政政策逼出來的爭購物資習慣，萬不是用一個類似「障眼法」的設施所能消除的。報紙上「空格」物價增多以後，一般人民為保護他們辛苦所得的價值，就必又會使現鈔流通的速率加快起來。

(三) 國行收購金鈔價格的提商：

黃金美鈔（和後期中的銀元）的黑市價格，以往是物價漲跌的先鋒。這一次改幣時所定的金鈔收購價格，一般的說，較當時的黑市價格為高，因此在這幾天內，往國行兌換的人相當的踴躍，金鈔黑市因而大減。物價漲勢中失去了這樣一個急先鋒，對於維持小康局面不無小補。但是，黃金美鈔是人民過去用來保護他們財富價值的工具之一。在報上「空格」價格越來越多的時候，金鈔黑市是否又會出現呢？是否已經出現呢？在當局施行「打耳」政策之下，報紙不敢對金鈔黑市是否業已出現，但是當局自己心裏應當是明白的。

這三個脆弱的穩定基礎，受不住現實力量的沖擊，已顯搖搖欲墜之勢。這努力量來自何處，我們在下節中討論。

二 目前禍源之所在

戰事的繼續，自然是經濟不能穩定的基本原因。但是假如戰費能由賦稅收

入來支付，負擔落在有錢人的身上，物價並沒有上漲的必然性，至少不會像過去漲的那樣快。政府現時雖沒有足夠的勇氣和够高的行政效率去執行高度累進所得稅，但是對於增加稅收的重要性自然也是明白的。根據過去的经验，政府知道，在物價繼續上漲的過程中，開支一天一天的與物價同比例增加，但是稅收却遠遠的落在後面（例如五月份應收的稅，到七月份才齊，已經值不到三分之一了）。這樣的下去，總有一天，稅收完全不值什麼，開支全靠發行；所以政府這次才有毅然改幣的決心。

這次政府改革幣制的基本理論是很簡單的。據王雲五氏估計，在幣制改革以後，政府的總支出約為三十六億金圓，稅收在按戰前標準調整以後約為二十五億，赤字約為十一億。出售美援物資應可抵補赤字的一半左右，所餘的數量不大，即或不能完全用公債去支付，困難也還不太嚴重。問題是：稅率按戰前標準調整後，是帶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才能真正徵收到手的（兩個月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但是支出却不能等待。假如在調整稅收所需的期內，物價繼續增加，開支的數目也必與物價等比增加，一切豈不都成泡影？

在調整稅收所需的兩個月內，物價是否繼續增加，最主要的還是要看政府紙幣的發行，在同期內是否增加。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簡單：在稅收正在調整而未有增加以前，政府仍將依靠發行紙幣去應付支出，支出既不能收改幣前減少，紙幣增發的速率自然也就與改幣前相同。不但如此，金、鈔、銀元的兌換，實際上使金圓券發行的增加速率，超過舊日法幣增發的速率以上。據政府自己說，法幣的發行總數用六千萬美元即可全部收回；而在改幣後的一週內，政府已允入價值二千七百萬美元的金鈔銀元（中央社八月三十日電）；換言之，在這一週內，通貨的發行總數已因兌換金、鈔、銀元增加了幾將一半，因例行的收支不抵而增發的數量還並不在內，這是何等危險的事！在這樣紙幣增發的沖擊力量之下，上節中所說的那三個脆弱的穩定基礎，如何能保持得住？

三 緊急的應付辦法

在金圓券大量增發的沖擊之下，一般平民的經濟生命已如一髮千鈞，人民有種要求政府立即執行下列三種辦法，直到稅收能增加到預期中的數量時為止。其實，政府在發行金圓券之初，若能就這三種辦法，現時的情況當不如此嚴重；當時若能這樣去作，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避免，還是無意的疏忽，都是人民所不能原宥的。

(甲) 停止全體行莊的放款，封凍所有存款。

任何有經濟經驗的人都知道，決定物價低低的因素有下列四種：（一）紙幣發行的數量；（二）紙幣流通的速率；（三）銀錢業信用項的數量；（四）銀錢業信用項流通的速率。如上節所說，第一項現在正在大加增加。對於第二項，任何人都沒有什麼辦法能去「管制」它。政府對於第一、二兩項既無控制的能力，若再不停止行莊放款和封凍存款，用以抵銷第一項因素的增加，物價

如何會能不漲？這樣簡單的一個算術，還能有人不懂麼？
 尤其在政府現時極力抑低利率的政策下，行莊的放款對囤積商人已不啻是最大的引誘，何況各行莊選正在卑躬屈節，一反過去驕傲的態度，四下裏「哀求」商人動用一些款項呢？

放款停止後，存款必須加以封凍，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假設張三與某行莊很有交情，在某行莊帳上有一筆存款（實際上完全是某行莊本身的款項，或是與張三共有的）。這個行莊用張三的圖章簽發一張支票。注意，這在名義上是提取存款，而不是行莊放款；但誰又知道這不是某行莊借與李四去購貨囤積的？

「停放封存」對於工商業自然是極「不方便」的。但是這正是壓迫奸商出爾的不一體方。對於工業的正當需要，政府可用（乙）條辦法去應付。

（乙）恢復購貨貸款，同時嚴格檢查工廠倉庫：
 現在上海倉庫的檢查，似還僅限於銀行倉庫和普通貨棧。這在第一次實行時，可能確已有效。筆風聞現在已有許多商人把存貨搬運到熟識的工廠裏

被牽着線的獨立國——菲列賓

I depend on you — With Strings The Nation, July 24, 1948

William Winter

七月四日菲列賓國開始它第三個艱苦的年頭，經濟

和政治全都深深的繫住着美國。這個民國事實上並不是獨立的；它政治上的獨立是虛假的，因為它經濟上的獨立是不可能的。

兩年前這新國家誕生時，菲列賓的人民曾希望復得全部主權，現在他們失望了。他們需要美國的援助，他們很快明白援助背後有着牢籠他們的線，線牽在人家手上，獨立被扼住了。

當日本佔領菲島的時候，美國政府許諾「協助菲島恢復戰爭的破壞」，但是善後法案的六〇一款却有以下的規定：

「在兩國總統沒有簽定有關美菲商業的行政協定之前不得有五百元以上的支付。」

這規定的意義是說，在得到足以重建任何工廠或商店的個別匯款前，菲列賓的辦法必須加以修改，保證美國商人的特權，——就是和菲列賓人有同等的權利。因為美國總統祇能在菲列賓接受了被稱為 B-1, B-2 的商業法案的規定之後才有權和菲總統簽定行政協定。這法案又規定了必須有一部寫進菲列賓憲法之內才算有效，這規定是毫不

去了。政府自應同時檢查工廠內的存貨。對於工廠正當的資金需要，按下列原則由中央銀行直接貸放：

一、工廠存貨逾限者，不得申請貸款。

二、對於債到貸限的工廠，按下列方法辦理：
 1. 恢復去年年底實行的購貨貸款；貸款到期時，由政府收購其成品，在市場上拋售。或：
 2. 由工廠直接售與躉售商人，但須呈報所售數量及價值（同時由政府檢查該廠與該商之倉庫存貨），用為政府徵收該廠及該商營業稅及所得稅的參考。

（丙）發行物價指數債券：
 為吸收行莊以外的遊資，政府應即發行物價指數債券。在改革幣制以後，發行物價指數債券之利是遠過於弊的。關於發行這種債券的辦法和好處，蔣頌傑和李崇淮先生等以前都曾著詳細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三十七年九月六日於清華園

含糊的，商業法案中有下列的話：

「美國總統無權締結此種行政協定，除非非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去修改菲列賓憲法，使三四一款的規定成為菲列賓的法律。」

就是這樣，每個菲列賓人都看得到的。他們可能長縮，抱怨這有力量的山姆大叔乘人之急；在許諾援助復興的時候並沒有這種有損菲列賓主權的提示。原來的諸君昭昭在人耳目，當它被短波無線電廣播到各地藏在屋頂、樹林、和巖穴裏的收音機時，菲列賓人民多麼高興。它曾振作抗日的士氣。現在，可是，援助是有條件的了。菲列賓人民可以發怒，堅持主權完整，不聽從華盛頓的命令起草他們的憲法，而美國的法律却是冷酷的，不遷就的。

Beil 商業法案第三四一款，就是要列入菲列賓憲法的那一款，規定了菲列賓人所稱「同等待遇」。大多數的美國人可能從沒有聽見過「同等待遇」的說法，更沒有念過 B-1 提案，但是菲列賓的每一個地方都在研究這三四四十一款。這條款是這樣：

「菲列賓的農業、森林、公有地區的礦地、水利、礦產、煤、煤田及其他礦油，一切供給動力的來源

及其他自然資源，以及公共事業，如果開放給任何人去利用及開發時，必須同樣開放給美國公民及一切美國公民，直接或間接，所控制的各種企業公司。」

去年三月十一日是投票修改憲法的日期，看菲列賓人民是否接受美國國會的命令。在這日期之前的好幾個月，菲總統羅哈斯為了要履行「採取必要步驟去修改菲列賓憲法」，曾經從北部的呂宋島走到南部的明大商島，勸導他的人民接受「同等待遇」，而且向他們保證，雖則美國大企業家有此武斷的要求，但是對於美國友人是不必畏懼的。羅哈斯的演說是由一個美國海軍軍官起草、編輯、至少也是由他核准的。他的官職是美國駐菲大使館的新聞聯絡員。當時的美國大使是 McNutt，他讓這位軍官擔任這個職務，允許他住在總統府裏，使他能常在總統的左右。

像其他的美國記者一般，當時我曾設法向美國讀者報導這件事。但是沒有任何通信社或是報紙願意發表我們的報導。美國記者聯合會要求召回住在總統府裏的那位海軍軍官，但是這消息也沒有發表。也許美國祇有少數大商人、大工業家和油商對此有興趣，菲列賓人却對他十分注意。我聽見有人稱他作「馬爾閣爾」（總統府的名稱）的拉斯

爾丁(帝俄時代的俄臣)一，也有人稱他作「英國的山下」——山下是文是日——非列賓征服者。

不論怎樣，美國所指定的「同等待遇」的條款列入非列賓憲法裏了，從此美國工業可以拾取這特權的收益了。Westinghouse 持有非列賓工廠的大批股票，和製造燈泡的計劃。Westinghouse 也已訂了建築水電廠的契約。Levir Brothers 已收買了馬尼刺肥皂精煉廠，非列賓是世界上最大的椰子產地之一，椰子油是肥皂的重要原料。Standard Oil 和 Socony-Vacuum 正在談判佔有 Cebu 的油權。

非列賓對美國大企業的吸引力是很多的。首先是非列賓的稅率比美國低。公司稅在非列賓是百分之十二，在美國是百分之三十八。私人的所得稅，在非列賓是從百分之三起至百分之六十，在美國是從百分之二十起至百分之九十一。一個已婚的男子還可以有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免稅額。

第二、工資成本較低。第三、因為靠近原料出產地，運輸費用可以減少。此外，非列賓還有大量美金存款，在目前兩國間輸入和輸出量差不多相抵。

美國資本高高興興的西流到馬尼刺來，但是非列賓人却高聲的反對。他們認為商業法案裏的規定是壓迫性的，非列賓在美國並不能享受同樣的權利，表示了他們的屈辱。而且美國每年祇准一百個非列賓人入境，而美國人來非列賓的每年却有一千二百個人的居留，有五百個人可以永久居留。現在阻礙已經解除，美國投資者可以大搖大擺的跨過太平洋，而非列賓的經濟的依賴性也從此完成。

社會出路與人類前途

李中嚴

一

時代的苦難愈來愈增大了，一個現代人身上所受的壓迫壓榨，也是愈來愈緊迫沉重。人類幾千年來歷史上殘餘下來的惡毒毒瘤，拖延累積至今天這一代人的身上來一個總爆發。現代人不僅身受了歷史上一切的折磨和苦難，而且我們承繼歷史下來的道德道路，也是已走到它的末途的了，這便是現代人的危機，這條道路接不接得過去，不僅關係着這一代人的命運，而且關係着將來人類億萬代的命運。因此一個現代人面臨這時代的苦難、壓榨、和壓迫，不但不該逃避，而且不應叫苦，惟有運用我們祖先遺留給我們的智慧、沉毅、和理性，面迎這現實的困難去謀解

了。美國是他們最大的買客，工業的供給者，以及他們財富的蓄水池。非列賓的「貝索」官價值半個美金，實際上却祇值一角六分。

因為經濟上的依賴性，這個幼稚的民國小心地避免一切和華盛頓不合的外交政策。在重要的國際爭執上，我們可以包庇非列賓是站在美國一面的。在舊金山台議時，我曾問過一個非列賓代表，為什麼他投票贊成一個他早先曾表示反對過的案件。他很溫和的問答說：「這有什麼呢，美國國務院贊成這案件的。」我又問他：「是不是國務院要你投票贊成的麼？」他說：「當然不是的。你們不相信我們知道我們的麵包是那一面擦上黃油的麼？」

在內政上非列賓的領袖們並不是永遠跟美國的暗示走的。例如，他們對於「非好」就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勝利之初，杜魯門總統召號警判和刑罰和日本合作的「國賊」。他的要求簡直是被忽視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國在 Leyte 登岸不久，第一次審「非奸」是在 Tacloban, Leyte 的首都。被審的是該省偽組織的省長。解放軍的省長是該省遊擊隊的領袖，他說如果把「非奸」放了，他的遊擊隊會找他算帳的。現在那位偽省長已經出獄，在家裏照舊的享受他沒有拘束的生活。名義上他是保釋的，但是他並不再提去審判了。新省長現在却已是國防部長。

非列賓的知識份子對於縱容非奸的新態度大為不滿。但是這個國家需要經驗的領袖，而大部有能力的在戰時都和日本合作過的。而且非列賓的小農，他們佔着選民決，別無他途！

當前的苦難正是人類的一大惡劫。我們國家，繼八年慘苦的戰爭後，又接上三年來的內戰，經濟的惡劣，已使絕對多數的人民瀕於「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凄慘境況；而人心思危，社會極其動盪不安，一切的倫理，秩序，和道義都快蕩然無存了。社會的中樞神經已陷於癱瘓死狀，社會也踏上支離破碎的解體局面。而腐化無能的政治，又正在不斷的製造惡感，擴大和加重國人的苦痛。眼下一切，無不徵兆着我們國家已迎向一個總奔潰的悲慘危局；我們再舉目看看世界，殺機充盈，正是密雲欲雨，陰雷兩天，散佈出濃烈的火藥臭味，世界的危機已成劍拔

的大部分，祇知道一些舊名字，選舉時就舉那些名字熟的人。新名字很不容易進入他們的耳朵。報紙銷路很小，收音機既貴又少。一與政府合作是一個新鮮的美國名字，他們是很容易忘記和原諒非奸的。事實上是如此，於萊已認爲可能是下屆總統了——這是日本所指定的總統，他會順從東京的訓令簽字在對美國的宣戰書上。

下屆選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舉行，非奸的罪名將不被注意了。一般的輿論却集中在勞萊的第三黨。到現在勞萊還沒有加入自由黨或國民黨，但是他却已開始獲得美國的支持，因為他宣佈反共。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國會記錄裏有米里蘇他州的議員 Hagan 說過下面一段話：

「很多有關勞萊的不正確和錯誤的報告曾流入美國。……共產主義的種子已播到全世界，非列賓也在裏面。……如果勞萊這樣能幹的領袖被罷黜，真是對非列賓最大的損失。在最近的將來民主的公子會需要一切有力量的朋友去打擊在非列賓蔓延的共產勢力。」

勞萊是戰前有名的人物，現在如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即使不是官方的——兩個政黨都拉攏他。自由黨的領袖，現任總統奎禮諾，已經和他有接洽，國民黨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勞萊至今還是超然兩黨，和朋友說他將從兩黨吸收選票，獨立競選。他可能會勝利的。

不論選舉的結果如何，官方對美國的態度是不會變的。如果勞萊當選，他向美宣戰的故事將被寬容，認爲是被逼出此的；對於非列賓人民這種做法可以認爲是聽得進去的。(觀察特約譯者譯)

二

今日之危難，非僅乎少數國家；今日的痛苦亦非僅乎少數的個人。今日世界上的國家，沒有一個不在這苦難的泥淖裏掙扎，世界上亦難找到一個人，確是平心靜氣，高枕無憂的。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人，皆有其良心難言的痛苦和煩惱，不過各自的遭遇不同，等差有異而已，然皆不能免於此磨難人類的劫數。此一劫數之責任當從追以往數千年歷史的人類生活及近代人的一切造作行爲。人類幾千

原來對於「人生態度」一直是微存往迷離的歧途上，人與人間關係，缺乏正確認識，彼此間相生相養之道，更是從來沒有好好弄過，大家在意識上先不清楚，對此也不重視，因而近代物質文明的社會中，人類是還使用着原始粗野蠻的野性去發展。人類的「社會」雖已組成了幾千年，但人類對「社會生活」是還沒有真正知道過的。幾千年的人類，在「人生態度」上既是模糊不清，自不會有共同的信仰和認識的基礎，因而人類方寸間，難於得到協調一致而免不了矛盾發生了。這「內在的矛盾」發而為「外在的衝突」，所以全部人類歷史上充滿了芸芸眾生千戈倥傯的悲慘痛苦現象；而且在一個模糊的人生態度兼之充滿了矛盾下，一切的制度文化也形同虛想而沒有基礎，其本身便先佔不穩，安能求其造福利於人？所以制度文化常常被利用和製造了來做罪惡的幫兇，近代人的流氓、犧牲、奮鬥、革命，幾乎全部是為着同制度文化掙扎而付出的。原是美滿幸福社會中的內容的制度文化，在今日社會裏，則只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今日人類的苦痛磨折，世界的危難不安，皆出於人類先對「人生態度」的沒有知識，再縱使制度文化的為禍。「制度文化」乃是在「人生態度」下的產物，追本溯源，當先對全部人生有重新檢討之需要。

吾人欲解脫現代的苦難，創造未來人類永久幸福，不單該用力於制度文化的改變上，尤其該用力於人生途程以及支配人類生活的意識的改變上。今後人類有無前途，社會有無出路，當視人類對於「人生」有沒有一個澈底的醒悟和認識，是否建立得起一個新的健全正確的一「人生態度」，人類在「觀念上」一「信仰上」一能否求得共同的基礎；人與人間的關係，彼此相生相養之道，是否能得到一個合理的協調，此關係人類社會的命運，至大且巨，今後人類是合作互助以求共存，或是矛盾衝突以求共滅，這就是其分途轉路的重要關鍵了。

覺醒過去，追求將來，重新建立健全正確的「人生態度」，乃是非常偉大而有利益的工作，只有從這條路線努力，才能替人類打出一塊新天地，帶來人類理想中的完美社會。筆者認為有幾點，是吾人作此偉大工作時，必須認識和看重的，茲提出於後：

(一) 生存是目的 人是以「生存」為目的的，依此，我們並不反對「人為生活而生活」。「創造事業」一「服務天下」，是人生的目的，與「生存」一「生活」之目的並行不悖。人類追求的目的既是生存，所以「社會」一定要「容」人生存，人與人間也要互「容」生存。這種「容」

乃是包括了自己的利害在內，因而其表現出來的精神，應該是「互助」與「合作」而不是「恩惠」與「施捨」。生存一既是人類的目的，每個人必要去爭取，而這種爭取又必須是親自參加。大家的目的既一致，所有參加的力量自然可以匯合起來，便是「共謀生存」了。社會便是人類「共謀生存」的組織表現，因而如果社會中有人失掉了「生存」(被社會迫害而失掉了的)，或者「生存」受到了威脅，社會便失掉了它組織起來的意義。因此，個人要親自參加力量到社會去幫助「共謀生存」，而社會對個人則應絕對保障其「生存」。

(二) 個人是社會的「主」 人追求生存，全體人的目的既一致後，便趨於結合力量以共謀生存，社會便是以實現共謀生存之目的而組織起來的。所以社會只是為達成人類求生存的工具，不過這工具是永久性的而已。社會好像是一死的舞台，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好像舞台上裝飾的死的舞片和道具，而全部舞台的重心、目的，及其所以能在人們心目中活起來，完全是靠了戲角的「存在」及其「表演」。人是社會的主人，也就是舞台上的戲角。在此，我們已明瞭社會是以人為「主」。至於社會上人羣的結合，原是基於共同的需要，立於平等的地位，所以人與人間，應該只有分工合作的事實，而無主從的關係。每一個人皆是社會的主人，而又立於平等自由的份上相互合作。至於社會的文化制度，乃是人結合起來共謀生存的技术，所以人實際是文化制度的主人而非其奴隸。因此，倘若任何文化制度，其表現出來的事實是阻礙和違反了「共謀生存」的目的，則人絕對有權更換和要求改造這文化制度。

(三) 人的覺醒便是社會出路 社會及其文化制度既是以人為「主」，則社會及其文化制度本無危害於人的可能，社會及其文化制度之所以危害及人，造成人類的痛苦，這是以人為「主」的身份而縱容起它們來的，正是所謂「倒阿授柄」。因為這樣，所以原是能支配控制社會文化制度的「主」的人，現在反而站在社會文化制度面前戰戰兢兢，恐懼不安了。今後社會的出路，只有「人」的自覺覺醒，重新作社會及其文化制度的「主」。但我們要求這個覺醒是全體的人而不是部份的人，全體的人力量才是集中，「主」才作得了；而部份的人的覺醒，必然是與部份的覺醒對立起來，力量不但不集中，而且是在互相矛盾抵觸，「主」便作不成，而且配就就職業的倒在社會和文化制度面前了。覺醒既然要全體的人力量，接則一社會中已覺醒的份子自然要幫助未覺醒者的力量，援一下手，這仍不是施恩，而是為了自身的利害；而未覺醒

者既不能離羣離社會而另謀生存，自然便應該在環境劇變和別人援手下早覺醒過來，加入力量去共同爭取「主」的地位，否則不僅誤己而且是誤人了！

(四) 天下國家是人類永久幸福的基礎 其實「天下國家」與「國家」，甚而更小的社會組織，皆是人類因求生存之目的相問後結合起來「共謀生存」的組織。人類既能因求生存之便，由散居村落而演變為部落和民族國家，當亦必能因求生存之便利而早謀進入天下國家的，只因爲犯了愚昧的自私偏狹的錯誤，看不遠，想不開，而自困於民族國家的小小天地裏。一部世界史上，糾纏不清的戰亂痛苦，十九皆是由於這種愚昧造成的。今後人類要追求得永久和平幸福，唯有進入到天下國家的大天地裏去。天下國家既是為全體人類共同需要，而其利害關係又是一致，所以其內容應該包括全世界的人種民族在內。所以已經健全了的民族，應該援手於落在後面的其他民族，使大家能達成一個水準，這不僅是爲了全人類的利益，也是爲了自身的利益。是天堂，要能大家挽手進去！

上列四點，筆者認為應是新的「人生態度」中的內容，在我人重新估價人生和準備將來時，是該予以參攷和重視的。今日人類選做者制度文化的奴隸，彼此間相互「尊重」一「生存」，也不互「容」一「生存」，愚昧可憐的衝殺在自私狹小的天地裏以求共同毀滅，這成現世的許多悲慘痛苦。吾人必須於今日揭出「生存」之目的，以求人類的相「容」一和相「安」於生存；大家要能重新再從社會和制度文化的「主人」；向一個更大的天地裏去「共謀生存」。必須有這樣的醒悟，必須有這樣的「人生態度」，人類共同來合作努力，當前的苦難始能解除消除，社會才能衝開死滅的封鎖，找到一條出路，人類也才能擺脫慘痛的野獸，走上光明幸福的人生路。

如果我們不愚昧，不盲視，也不自欺欺人，我們就可以坦白承認，人類以往的和現在的痛苦煩惱，幾乎全是由於自己的招惹，自己把人間變成地獄而投身其中去受煎熬磨難。倘若現代人不有一翻猛烈的覺悟，不能翻然改觀，另找出路，仍跌落在舊歷史的軌跡裏，人類不但繼續受著痛苦，而且痛苦一定是感演愈烈，愈往下愈悲慘，更不要說求解脫了。

痛苦既然是人類自己去找尋來的，那麼當不會像一會定一那樣的悲觀和不可救藥了。只要人類肯付出真正的誠意求免脫彼此的痛苦，不再因循糊塗(下接第十九頁)

四

痛苦既然是人類自己去找尋來的，那麼當不會像一會定一那樣的悲觀和不可救藥了。只要人類肯付出真正的誠意求免脫彼此的痛苦，不再因循糊塗(下接第十九頁)

閩局將動

觀察讀者投寄

「急流勇退」

(觀察福州通信)

九月九日劉建緒主席突然發表一篇「治閩七年

感想」的談話，在平靜的福建政壇投下一塊巨石。聲明中在略述福建這七年來在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革兩方面的成就外，就說：

「中國社會問題復雜萬端，凡百改革，非可一蹴而就。本省以保農社為核心組織，使農民從組織中獲得增加生產與改善生活之力量，最後取得耕地所有權。所採政策，實至正確。甚望全省人士合力推行，則農民多受一分實惠，地方即多得一分祥和，福建前途，或可賴以避幾分元氣，為復興建設之用。」

「閩民勇於進取，人才尤衆，吾人每憶及鄭成功之開闢海疆，林則徐之焚禁鴉片，黃花崗諸先烈之慷慨赴義，概不勝嚮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後繼者自有人在，特無由顯露耳。本人久已建議中央提

前完成地方自治，今年復再三表示還政地方之願望，深盼其在最近實現，俾今後省政更獲理想之進步。

「蓋昔沈文瀾撫蘇而清漕風，應民困，左文襄駐閩而設船廠，左海軍，二公遺澤至今獨存，我願學而未能焉。今主義未行，禍亂仍亟，本人既賦身軀，無論何時何地，必貫徹其誠，在革命戰線上，與福建同胞共為戰友。」

一位現任的主席，既未面對着強大的政敵和激烈的攻擊，又未獲得中央批准辭職，就發表這樣告別式的談話，這甚至引起了驚異。據說新聞處長李由農會動他收回談話稿，說：「簡直是臨別贈言呀！」劉的答覆是：「正是如此。我決心走了。」

於是省府機關報「福建時報」在同日刊出一篇「劉主席治閩七年」的社論，在談頌之餘，即讚美劉氏的一念流勇退。這四個字頗值得玩味。

劉建緒其人

劉建緒的生平，在國內許多讀者似熟悉而又並不熟悉，因而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傳說，例如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裏說他是CC，有些小報又說他是政學系，其實都不是。他是夾縫裏鑽出來的人物，面面都圓到。他是保定三期砲科畢業，與顧祝同白崇禧同期同學，北伐前是唐生智部下的團長，北伐時升任師長，克復漢陽有功，以後一帆風順，終於何應欽為四路軍總指揮，帶着湘軍出省追趕宗毛到滇康邊界，又折回新東，在東戰場做了六年副將。福建主席的交換條件，便是把唐生智何鍵一脈相傳的四路軍交給中央。

但只兩三年功夫，憑着他的虛心下氣，攻政學習，劉在福建人印象中完全變了。講業務與法令，他比應處長熟悉，講地方情況，他比市縣長清楚。從前演說要帶稿子，後來是滔滔不絕，一講幾個鐘頭，見解也頗超脫。例如他對「訓政」的看法就與別人不同，他說：

「國父在建國大綱第八條中規定：『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會經訓練考試及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既言協助人民，自以人民為主體，而政府所派人員為客體；政府所派人員只是去協助去指導，不是去代替；上去政府更只負指導與考核的責任，不可侵越人民應有的權利。……國父遺囑中所謂『喚起民眾

「一語，我經過這幾年來實際工作的體驗，覺得所指的，主要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固非喚起民眾不能成功，而籌備地方自治的過程，實即喚起民眾的過程。」

劉之所以能如此進步，另一個原因是他肯自我檢討，甚至肯公開認錯。福建省政府差不多每年有一次政務巡察和行政會議，每半年有一次後討會，每次到都有一種萬言的講評，指出各機關的缺點和錯誤，有時更展開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討論。這些講評輯成兩本「從政檢討」，其材料之豐富，內容之深刻，或在吳鼎昌的「花船鬧筆」之上，研究地方政治者是很可參攷的，但正因為是一位省主席的演講集，反倒沒有人注意了。

改良主義的幻滅

基於他在政治上的認識，他也招攬了些人，(但觀察四卷二十二期上的一篇通信中所說的黎烈文王西庶却不是他延攬的，許欽文施登存更與他無干)試行了些改革，而陳儀手裏留下的人材和學校工廠

遺囑中所謂「喚起民眾

度，他都盡力維護。但他這種作風有些人看不順眼，而他的秘書長程星齡又是一位天真的大砲，憑空得罪一些人。三十三年贛州福州失陷時，程建緒將省府由將近二千人縮到四百人，這辦法雖然被證明有效，却招來衆怒，與他有一次大獸。此後劉便默然，直到前年才又提出保農社的辦法。

保農社是以佃農和自耕農為主體，以保為單位而組織的合作社，全保耕地統由保農社按土地法規定的條件向地主租來，分配給佃戶耕種，並逐年扣除押租。地主如出賣土地，保農社有優先購買權。這種辦法是承認地主的土地權而實際上剝奪了他的耕地支配權，而又把農民運動與合作組織融合為一。在中共看來，這當然是以土地改革的美名來煽動農民，保持地方治安的，但在國民黨所提的各種土改方案中，保農社倒是比較合理，比較進步的，因為他還能把土地改革與農民運動聯繫起來，還真正分一點實惠給農民，因此此在福建也多少有了點成效，凡組織保農社的地方，農民都懂得用團結的力量去爭取土地法

給他們的權利。但這種改良主義的辦法在現實中還是行不通，首先是官僚政治的作祟。劉雖然年年檢討，年年批判，而結果只他個人和很少數的幹部有了進步，大多數仍是等因奉此一套。主管此事的政政局和社會處，又都是CC的專利品，他們的理論與劉更是兩樣。至於各縣縣長，有的連土地法都沒有見過，他們天天在應付土家劣紳，有幾個想到農民呢？

即使沒有政治上的糾紛，劉的改良主義也是要碰釘子的，而在今年又黑霧裏殺出一個李達，更叫劉冷了心。

大砲連謀

今年國大前後，各省都有自治的要求，而漸漸地都成了事實。劉記者執筆時為止，長江以南各省，只屬閩台康滇六省未動，台粵是去年才動的，桂廣滇都有其特殊性，於是實際上只有福建。以前福建人不大提閩人治閩的話，是阿狗提不出人來，但江西的胡家鳳發表之後，却給了福建很大的鼓勵。胡不過是長班子的人，他可做主席與胡同輩的楊蔭為什麼不

同輩的楊蔭為什麼不

可以；如果楊德純夠資格，則福建與楊同等或資格高於他的就大有人在。於是閩人治閩之說也就被省議會放在四

不過劉在這時却下了決心，他不動聲色地暗中托張羅程潛疏通，請求辭職，後來又托省署長唐繼堯向蔣總統密陳困難，都未獲准。於是劉便直接電請辭職了，在第二次辭呈延遲不復之際，又發表這告別式的聲明。

由來不同福建的閩南籍立委連謙開砲。連是戴雨農的高級幹部，自觀甚高，回閩後一連向劉推荐了八個縣長，加知劉一個也不應酬。那以現任省府秘書長張翰儀老氣橫秋，各方都不滿意，中間又夾着CC與軍權之爭，於是連謙便獲得一部分軍求，曾於五月間由省參議會駐會委員出面，公請劉到縣長丁超五公館吃飯，席間連謙本打算大放一砲，但是丁超五和一部分省參願不以為然，只得草草收場，幾句應酬話了事。連謙看見在福州放砲不方便，就到台灣上海南京去放，頗得一般閩人喝彩。但劉走了之後，繼任者是誰呢？這就意見分歧了，當

連謙最後提出張貞時，掌聲就稀落下去。連謙從此變成了潮濕的爆竹。

鷄肋可乘

正面攻擊劉的，却

和各省比較起來，福建的政治情勢單純得多，而劉和地方的感情也可說得上融洽。在連謙放砲之後，一部分閩籍立委且向中央懇請劉立監委且向中央慰問過他，中央也對他表示信任。所以劉的很多幹部頗想他再幹下去，福建的文化界更是如此。

因為劉對文化界和學生青年感情還好，同豐米店一案就是一例。今年六月福建學院學生和同豐米店吵架，被憲兵打傷兩個，事後保安司令部備函一面之詞，發表新聞，把責任完全推給學生，對學生挨打却一字不提，引起了學生的激憤。這件事平心說雙方都有點責任，而保安部的錯誤，不過是事前防範不周，事後配違新

聞失實而已，還在中國官場算不了一回事，劉却派省委陳培德調解，除接受學生條件外，並登報三天向學生道歉，責備保安部不是，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省政府向學生道歉，在國內也是少見的。除了文化教育界以外，福州一般人民也不希望他走，因為在他任內，福州年年有貧戶米吃。

可是劉却認為反正還主席拖不好久，不如自動辭職，反來得漂亮。劉最感痛苦的，是因派別鬥爭使他不能推行自己的改良政策，又不能引用優秀的幹部。在他的地位，不能不面面敷衍，可是政治慾望是無窮的，面面敷衍，就面面不討好。劉個人實在厭於這種無謂的應酬和鬥爭。加以在財政上，閩省府收入不及紹興一縣，中央的補助又不痛快，近來薪水常常拖欠，辦公費每一單位只合得金圓五角。省主席在現行省制下除了替中央看守省政府以外，可說就是地方派系踢來踢去的皮球，都想利用的工具，都想爭奪的對象。劉氏實在嘗夠了鷄肋的味道。

在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事委會即聚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為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衢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曾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

是擔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在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員，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籍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為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幾個候補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事委會即聚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為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衢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曾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是擔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在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員，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籍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為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幾個候補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事委會即聚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為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衢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曾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是擔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在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員，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籍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為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幾個候補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事委會即聚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為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衢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曾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是擔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在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員，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籍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為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幾個候補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事委會即聚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為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衢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曾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是擔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在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員，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籍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為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幾個候補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事委會即聚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為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衢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曾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是擔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在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員，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籍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為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幾個候補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事委會即聚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為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衢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曾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是擔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在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員，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籍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為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幾個候補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事委會即聚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為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衢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曾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是擔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在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員，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籍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為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幾個候補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久便來了閩變。閩變後陳儀幹了七年多，初期的整頓吏治，平靖地方，與辦學校工廠是很有成績的，後來卻誤用統制經濟而失敗。劉的客觀條件不如陳，沒有財權也沒有軍事權，自然建設不出什麼成績來。可是劉的風度開明，處事平穩，又遠非陳氏所及。他的幹部也沒有驕氣，不敢為非作歹。所以福建這七年保安團隊從十一團減到五團，地方却相安無事。現在閩粵邊境已無警報，劉自己已做下去能否再保持現狀，已不易言。換一個人來，首先就要應付人事問題，什麼民主，什麼土地改革，恐怕都難免不亂。那時局勢難免不亂。中央過去之不準劉辭職者，大約也是為此。

現在閩局已成必動之勢，為了繼任者的決定，也許還要拖個把月。劉現在正做閩南人撤退的工作，省府因預算不敷，已決定各機關人員自請遣散者一律按年資發給遣散費，這就是為湖南籍的小公務員們發遣散費的意思。湖南籍的縣長也開始有兩個調省，而代以本縣人。新任者來了如何安插幹部就是大問題。福建人事制度頗嚴密，職員都有保障，非有過失不撤的。每個新任處長都只能帶一兩個秘書和庶務。現在閩南人撤出的缺因預算限制都不能再撤，而留任的又不能隨便撤換。軍是這個問題就會使新任棘手了。

（九月十日）

編後

這一期的通訊都是讀者投來的，這說明兩點：一、我們取稿向無成見，祇要稿子好，很結實，這也可以說：一個刊物的內容，需要讀者共同支持，才能充實。所以我們以最大的誠意，希望各地讀者踴躍惠稿，共同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本刊每期的最後一次發稿時間是星期一上午，一切有時間性的文章，希能在本週一期刊出者，均請設法使我們能在星期一上午收到。過了這個時間收到的稿子，就要屬到下一星期的一期才能刊出了。

「閩人治閩」

透視川西的農地與農村 小莊

(觀察成都通信)

號稱「天府之國」的川西平原，的確是富庶的。它有着二千公頃以上廣無荒歉的良田，年產約一萬五千萬石的稻穀，這巨大的產量，是多麼令人驚嘆！

一、土地的轉變與集中

筆者生長在川西平原，茲就川西平原土地的高度集中中，與農村真實情形，作一個概括的報導：

一、土地的

今天四川農地集中

八年對日抗戰及三年來的「亂戰」，四川，皆為糧食供應的主要基地。從三十年開始征實地，四川每年征購穀額數，均居全國首位。而中央直接間接在市場收購的米糧，尚無法統計。據有關機關的報告：四川歷年供應軍糧，最高紀錄曾佔全國總額的二分之一，最低亦為四分之一，而今年川糧配額為二千四百八十萬市石，已打破空前紀錄。可見內禍蔓延，川民負担有加無已！

然而我們放眼看看這「肥沃」的川西平原的農村吧，農村經濟已整個破產，土地高度集中，農民在地主的壓榨下，掙扎在死亡的邊沿。今天到處聞着米荒，匪亂，農民逼於生活而自殺，游離、陰霾密佈着慘淡的農村，愈來愈暗無天日了。

年來川西經濟

對川西農地的調查統計：在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川西平原新農地戶數佔地主總戶數百分之七十一，佔田百分之八十七。以地主的身份論，軍閥地主佔百分之二，佔田百分之四十八。官僚地主佔百分之二十四，佔田百分之十九。其他新地主（指豪劣、商人及自由職業者）戶數佔百分之五十五，佔田僅百分之二。其中新舊地主變遷與集中得最厲害的，要算大邑縣（劉文輝與劉湘的故鄉）新地主戶數佔百分之八十八，佔田僅百分之九十九，其中軍閥地主佔百分之六十六，佔了百分之三三的戶數，每月平均佔田三千畝，最高達三萬畝。官僚地主戶數佔百分之四十七，佔田百分之三十三，平均每月佔田一百畝，最高者達八千畝。舊地主則剩了百分之十二，僅保留土地百分之二。崇慶縣新地主戶數佔百分之五十七，佔田百分之八十六。其中軍閥地主佔百分之二。六十七，最高者達一萬五千畝。官僚地主佔百分之五十七，佔田百分之五十七。所有了，其意即指那縣地將全部為非那縣人士，許多人失去了土地，從小地主或自耕農的地

土地已全握在外縣大地

主手中。崇慶縣以四萬二千畝里，南北長數十里的田地，竟大部份為某姓一家所有。

二、悲慘的農村

今天饑饉環繞着農村，雖然素以水利發達，物產豐饒而稱為天府之國底金關的川西平原，每畝最高產量租額如下表：

千畝。官僚地主戶數佔百分之十，佔田百分之十一，最高者一千畝。舊地主戶數佔百分之四十六，佔田僅百分之三十三。灌縣新地主戶數佔百分之七十四，佔田百分之七十七。其中軍閥地主佔百分之〇。七的戶數，佔田百分之二十一。官僚地主戶數為百分之十五，佔田亦百分之十五。其他新地主戶數合佔百分之五十八，佔田百分之四十一。

抗戰期中川西平原土地轉變的情形，目前尚難找到可靠的統計數字，但據戰時金陵大學調查華陽彭縣農村經濟的結果，自民國二十六年秋至三十年，華陽縣實田者，軍政界佔百分之三十四，商人佔百分之二十八，舊地主亦佔百分之十五。彭縣實田者，舊地主佔百分之六十七，地主兼商人佔百分之十四。此處應注意者，所謂「舊地主」，大部份即是田地集中者，軍閥和官僚地主。而彭縣人士更對調查者稱：「經過幾年，那縣的土地全部為非那縣人士，許多人失去了土地，從小地主或自耕農的地

位，降而為牛自耕農或佃農，佃農增加，佃佃愈烈，於是地租愈奇。佃農常得不償失，食不飽，衣不暖，如遭地主逼迫，便常造成慘不忍聞的悲劇，如游離、自殺等等。

根據上述，可見川西農地在加速地轉移與集中中，在少數人手中，這十的土地，其中半數以上掌握於軍閥，其次為官僚、士劣、豪紳。這種現象無怪乎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使大多數人過着餓餓的日子。而從抗戰勝利一直到今天，土地的集中還在加速地進行，而集中的對象，仍然是軍閥官僚等。

因為川西平原，水利修明，歲無荒歉，而在農業社會的私有制度中，土地本是穩固可靠的投資對象，軍閥官僚們，以搜刮民脂民膏得來的財富，及幾度的發橫財、勝利財、甚至內戰財……於是大量收購土地，以為子孫「萬世基業」。無以戰亂不息，民不聊生，農村高利貸，更成為軍閥、官僚、士劣等剝削農人逼賣土地的最可靠的手段。所以今天川西農地是不斷地在繼續轉變與集中。

甲、租佃關係：川西平原土地皆產稻，地租是以次穀為主的實物地租。每畝產量和租額如下表：

土地等級	每畝最高產量	租額	百分率
上田	二、三石	一、八石	七八、三五
中田	一、七石	一、五石	七五
次中田	一、七石	一、三石	七六、四七
下田	一、七石	一、三石	七六、四七

根據上述，可知農民所納租額高至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他們自己所得，僅佔最高產量百分之二十五，還要包括生產費用。所以一個耕種小塊土地的佃農，如要將這產品的

工作部份：

項目	數量	折合實物數(白米)
耕地人工	一五工	〇〇、三五
耕地畜力	一五工	〇〇、三五
插秧	一四工	〇〇、四九石
轉秧	一四工	〇〇、四九石
打穀	一六工	〇〇、二五石
打穀	一六工	〇〇、四八石

(內食伙食)

肥料部份：

秧青	二五〇斤	〇〇、一五石
麻枯	二〇〇斤	〇〇、六六七石
廩枯	二〇〇斤	〇〇、五八三石
廩粉	二〇〇斤	〇〇、六六七石

種籽部份：

穀種	三斗	〇〇、一三三石
穀種	三斗	〇〇、一三三石

總計

三斗	〇〇、一三三石
三斗	〇〇、一三三石

浙大學生被捕詳記

SY

(觀察杭州通信)

浙大在上學期「三子三事件」了了之後，整整一學期對外是沒有什麼糾紛，甚至席捲全國的「反美扶日」愛國運動，也只在校內舉行過一些民意測驗、座談會、討論會和擴大舉行「七七」紀念會之類，並沒有擴展到校外去。這是再上學期的「三子三事件」長時期地把同學們弄得身心疲勞之故。動極思靜，人之常情，這也足以證明學生運動是自發的，純潔的，絕對不是任何「職業學生」所能煽動和操縱的。

但是，由於思想不自由，學術不獨立，即使是校內的糾紛，只要一方面有政治背景，外間的政治勢力，總要連繫着橫加干涉，不守皂白地給另一方面戴上一頂紅帽子，也不問是非，校方便把學生們的合理要求一概抹殺，上學期末的一文院革新運動和三位青年軍同志要向一陸軍總部領手續費，減浙大一和私營同學引起公憤，發生衝突，他們勢孤，便勾結外力，

好幾天弄得浙大風聲鶴唳，寢食難安，完全陷於紛亂和恐怖狀態。結果，校方為息事寧人，硬閉除了發聲聲報負責，人劉萬向，被私營的同學倒受到兩個大過處的處分。兩次校內糾紛都是在外力壓迫下不了了之的，而「青年軍事件」，甚至所說其中一位自己用玻璃劃破了臉，還去法院告了一狀，告的又儘是有關「思想」和「反動言行」的罪名，至今還留下一條政治性的尾巴。

大考之前，聽說有人從某議長的公館看到杭州共四十二人的黑名單，捕法是在暑期中校外綁架，其中最大多數當然是浙大學生。於是榜上有名的人，大家不聲不響，爲了避禍，大敢一完便一走了之，一個也沒有留。暑假算是平靜的過了一個半月。這中間，純潔熱情的留校同學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開辦包括高中初中員工子弟小學和識字班，人數超過一千多人的暑期學校；一件是動員了一百多人在赤日炎下辦理收生服務，解決下辦理收生服務，解決

決了從不同地方在不同時間到達的幾千個放生的住食問題，和其他有關升學考試的一切服務。前者得到校方的許可和贊助，後者曾收到放生上百封從各地來的感謝信，也幫助校方減少了許多麻煩。得到十分許多的讚許。由於浙大同學「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吹吹噓噓的虛張聲勢，雖然做得相當圓滿，倒也沒有引起旁人過分的難耐。但暑期留校的小型自治會組織也表現了這型高的組織能力和工作熱忱，於是有了自治會秘書長顧熙輝被青年部杭州夏令會毆打的事件。

青年部夏令會設建國中學，據說是一個「輔導青年研究學術」的「學術機關」。負責人「一藝術家」一學者「一杭州國立藝專汪日章校長。不過這些受訓的青年，清一色的全是京滬杭各大專學校的黨團員和教部保送入學也當然是黨團員的青年軍學生。這樣便似乎終有點期南京爲「五二〇」紀念會後學生向青年部索閱被捕同學和浙大的「一文院革新運動」，中央日報曾大聲疾呼「中國國民黨人苟稍有自尊感，稍有天賦自衛之本能，何若及早振臂而起，與共匪鬥爭」職業學生決死一鬥。一中宜部發言人也公開號召國民黨黨員與「職業學生」決一死戰。人們會從這方面去想，有的便就心着下學期的學校將更多事。

顧熙輝去建國中學招拂他剛畢業建國的妹妹和另一女同學到上海致大學，拿了東西剛走出大門，幾條彪形大漢迎面撞來喝問「是不是浙大學生」。顧答稱「是」。於是拳腳交加，拖入院內，許多人圍上來，吼着「打死他，打死他！」「浙大學生都死他！」但爲了要弄問「浙大共匪」活動情形，打得遍體鱗傷後，反兩臂，蒙着眼睛，由汪日章主任親自帶上樓去，審問中也不斷被周圍的大漢們連帶打問的是一「浙大共匪活動的情形」，還寫好了一份「口供」逼着顧熙輝蓋手印。這樣的私刑

就要到來，但都自問沒有什麼，心安理得，新秋無窮旅行團按期出發了，留下沒去的，也都坦然自若，靜待開學。不料廿一日晚上深夜四點鐘左右，人們在睡夢中發哭喊救命之聲驚醒起來，才知道軍警入校捕人，已捕去吳大信等三個同學。據當時目擊的人說：進來的軍警和便衣帶手槍的共二百多，斷絕交遊，包圍衣服兩齋，是一位穿雨衣戴雨帽的人帶路指引，用鋼筆寫着兩排名字的紙片上大約「十個人」的姓名，還有一包照片。有一個廬室被問到四個人，都不在，每個人的舖位即在黑漆漆中，他們也都熟悉，甚至被問的同室無關的人的姓名舖位也都十分熟悉。被捕三人中，姓施的一個同學是當夜去趕早車回家的，到門口給軍警攔住，說他這時起身走是「職業學生」聞風逃走的。方和吳是在寢室抓去的，吳還在櫃子裏，只穿着背心短褲，睡夢中便被拖起就走，還是他叫喊救命，才驚醒其餘的人，才使得這次捕人的範圍沒自擴大。軍警匆匆撤出學校，登上四五輛卡車開走了。

這事過後，自治會開始營救工作，謁見竺校長。校長說前幾天教育都有命令到校，說軍警可以入校捕人，不准干涉並不准保釋，正準備商討付辦法，不料竟突如其來，傳訊不經訊導處送訊，進入學校也不通知校方，是不合理的。

當天下午，施方二同學回來了，本來是「無罪釋放」了，却也要「罪輕保釋」。據他們說，他們被問的是參加「五二〇」罷課沒有，參加暑期補習學校的工作和收生服務沒有，參加「反對張其鈞」的「一文院革新運動」沒有？他們是那那些人？因爲他們都沒有參加上述工作，才「具保釋回」。而吳大信則說「案情複雜」，收押入獄，當然是事實上說他參加收生服務和暑期補習校工作，偵訊結果，又說得向他化名吳慎民和香港什麼人通氣的信，中間還提出一些假名中間，說他定是這些人中間的一重要分子。現在特別庭已經正式起訴，看樣子即將審訊，並依此定讞。先抓人後找「證據」，且要根據此「證據」判罪，這或許就是今天「特種刑庭」之所以爲「特種」刑庭罷。(下接十六頁)

週末

老成重持

英國政治風度

Kingsley Martin

在 Court 的客廳裏，勞合喬治曾要我以英威政治演說家的妙評。他說：「這是溫斯頓（邱吉爾），下院成了戲院。你引頸而聽，佳句如珠玉般從嘴角下滾。多完全的藝術！多渾熟的光芒！你會向自己說，沒有別人會想得這種意象，這種實際的文采。太好了。於是他坐下了。幕落下，戲演過。你歡呼。但是你卻沒有被他的話所說服。鮑爾溫却不然。每一句話他所說的全是平淡無奇。沒有名言，沒有詼諧，沒有警句。慢慢的，穩穩的說着平凡的話。但是他却近人。當他說完了，你和他同意。」

我常思索這段話。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這一段期間當首相的不是邱吉爾，不是勞合喬治，而是鮑爾溫。祇有在危急的戰爭年頭，國家纔需要勞合喬治和邱吉爾所有的才能。這兩個叱咤風雲的人物所缺的，邱吉爾雖有如許的年齡和功績還是缺的，是羅馬人所謂 *Gravitas*，我們可以譯作「持重」。

在英威，和古羅馬一般，持重和伶俐是不常在在一起的。我不願說聰明人永遠沈不住氣；老成可以持重，修養可以克服輕佻（蕭伯納謹慎着避免這危險。）而且，才能是變易的。我想到克里浦斯，他的精幹、虔誠、和正直最後贏得了無可動搖的地位。不多年前，當可記得，多少人曾貶損他是個伶俐和危險的寄生，現在要來，未免可怪了。

有一種困難普通人不常能克服的就是要成一個善於談話的人。張口、談話、會把一個意志強烈的刻繡出來。這些會使朋友們喜歡他，但是這些也必然奪去他的持重。對一個問題面面都考慮到的能力，固然是有創造性的思想所必需的，但是對於政治家却是致命的。貝爾福（Balfour），他的才智出人頂頂，正是個典型；他從不能說出權威性的話，因為他的敏銳和平衝溢是了瑣瑣，不是堅定。

Walter Elliot 屬於當今最會談話的人物，但是他是在保守黨的高級幹事裏還是見容於對有餘，持重不足。在這類事情上，英國的政治素質是移動得很慢的。當少年的狄斯累利（Disraeli）初入下院，充分準備好了，登壇發表的處女演說，原想一鳴驚人，結果却贏得滿堂輕侮的嘲笑。當時看來此公的政治生涯將從此斷送了。他灰心之餘去請教一位聰明的朋友，這位朋友和他說，他如果想恢復去請教，既有獲得相當的選票。狄斯累利領會了，抑制了他豐沃的才華，慢慢的，他捨棄了怪癖的排演，純潔他的天

才在演說裏流露出他非常的作風，終於壓倒華僑。但是在他做到首相和封侯之前，還刻上一持重二字。另一方面，格蘭斯東（Gladstone，狄氏的政治對手）却莊嚴、豪邁，有時在演說裏却含糊到無法明白，即在他二十年華，已經宛如老成的重臣了。

如果你想在政治裏出頭，你最好把你的聰明藏在桶底。我們這一代沒有比凱恩斯公爵（Lord Keynes）更聰明了；我平生所見人物中沒有遇到過像他一樣具有敏捷而完善的頭腦的。他在經濟學、文學和藝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在一生中曾看到曾被經濟學者所譏笑的意念終於變成了英美官方的常識。但是他在政治場合裏始終沒有成功過。他不但不是個有成就的政治家，甚至不是個有成就的談判使者，原因是在他的思想太快，他的優越感太顯著。像許多思想家一般，當他辯對對方沒有話時，他覺得勝利了。他永遠沒有學得勞合喬治所說政治辯論要說得服

普通通審官方算成功的格言。他能在一些英美的商人面前娓娓談理，沒有半點漏洞，會讓在表面的一致上結束了。但是他聽衆裏重要的人物，腦子固然大不靈活，但是却坐在極力的位置裏，一路走回來，凱恩斯的智力喪失了作用。「這傢伙，他們會說，」太聰明了。他在想我們的花樣，轉我們的念頭。我想不出怎樣回答他，但是我一直知道他是不對勁的」。英國美價的條件就是美國商人給凱恩斯爵士的答覆。

口才伶俐祇能說得人啞口無言；持重却能改變人家的成見。所謂心誠悅服。叫你辯論時聽人一言的並不是個壞教師。你得避免那跟在光芒背後的抄抄；你的對手，在辯論時你時覺得高興，更在看到你不知他的舉來給他的歡呼裏得到溫暖，一陣過後，會引起內疚；聽衆回來想想，也會覺得對你不起。很多政治上的勝利是從謙虛得來，在至是是從默然得來的。

英國政治要得重的素質，在 Lytton Sturteley 所著戈登將軍傳裏有關 Lord Haldane 的話中，有過很好的描寫。倣見 *Eminent Victorians* 一書。在公務上，在私事裏也差不多，哈丁頓爵士的決定是有非常的重量。不論上下，英國人民對他有一致的尊重；這真是一個可貴的人。他的性格確是他本國人所喜愛的。他不單是誠實；他的成就是英國式的誠實——這種誠實是很自然的屬於一個活潑的模本，一

個英國人應當是這樣的模本。他們從哈丁頓爵士身上看到最近於他們所心愛的素質——公平誠實，實於常識——這些是他們一直希望用來表示自己的素質；在他們高興的時候，他們覺得這些就是自己的性格。他們自己即使有短處，不要緊，這裏還有個哈丁頓爵士，他是從不自私的，他是從不緊張的，他也從沒有幻想的。他們所知道的哈丁頓爵士剛好合在這格局裏，加上的。是他們所知道的愛慕和尊敬。他的喜歡野外運動給他們安全之感。他們愛他因為他不在乎。他們愛他因為他厭惡嚴厲的傷感。最重要的，他們愛他因為他是單純的。他們最大的安慰是哈丁頓爵士在這方面是完全可靠的，就是在任何情形之下，他永遠不會露鋒芒，不會弄花巧，不會給人驚異，不會惹人注目，也不會顯得高深莫測。他們坐着，聽他的演說，他也不激動人的平鋪直敘，平正穩健；無限的單調所包圍，所支持下，聽衆感到他們的信賴最後得到了保障。

如果這些是在舊有政黨中產生信任的素質，在工黨的黨案裏發生重疊的條件並沒有多大差異。我們聽見過多少次工黨演說家在充滿革命情緒的羣衆前，用着熱情和數亂的長篇大論贏得聽衆狂熱的歡呼！我們又看見過多少次那些端莊、遲鈍和有名的人物為羣衆所愛好，為的是他從不說一句出於意料的話，為了他從小到老，四十多年，老是在運動裏；他用了最無聊的話來答覆質問，而得到絕大多數的擁護擊敗他頑強的對手。這真的持重是否祇是指正投票的支持？有時，無疑的這是一種秘密。但是用這說法去看像 Arthur Henderson 那種老大哥式工黨人物，他未免是膚淺的批評，低估了他的領袖影響。至於貝文的記錄和政策，意見又大有出入。他的聲譽的確有他手創的運輸工會的支持。但是沒有一個人，看到這粗大的身材直立的觀感，和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對於哈丁頓爵士的觀感是相似的。他代表了十足的英國工會主義的利益和成見。正和可以保證哈丁頓爵士會說出有關財產及愛爾蘭問題大家預料得到的話一般，貝文，不論他怎樣做，講到費族、黨人和效忠工黨運動時，他總是代表勞動階級的正統派。這裏我們聽着「道事的根源了。政治根據共同的和無定成見和財產地位把人民結集成團體；向着這無底的和無定形的成見和傳統所凝結成的團體，那些尖銳的筆頭，政論家和叛徒們白白的投刺他們刺和爭辯的小爆竹。但是發聲的過程已經開始，社會上各種力量的平衡變動了，具有不同利益和成見的團體一旦出現，有辨別力的歷史家會看到昨天的真確已是今天的老生長談。在當前平凡真的持重者正在引用資本論的話，不再提到韋柏或是 Keynes 了。

（譯自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August 21, 1948）



略談敦煌藝術的

意義與價值 宗白華

中國藝術有三個方向與境界：第一個是禮教的，倫理的方向。三代鐘鼎和玉器都產生於禮教，而它的圖案畫發展為具有教育及道德意義的漢代壁畫，（如武梁祠壁畫等），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也還是屬於這範圍。第二是唐宋以來篤愛自然界的山水花鳥，使中國繪藝樹立了他的特色，獲得了世界地位。然而正因為這「自然主義」支配了宋代的藝壇，遂使人們忘懷了那第三個方向，那從六朝到隋唐宋初的偉大宗教藝術。這七八百年的佛教藝術創造了空前絕後的佛教形象。雲岡、龍門、天龍山的石窟，尤以近來纔被人注意的四川大足道像和甘肅麥積山道像。中國竟有這樣偉大的雕塑藝術，其數量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造詣之高，都足以和希臘影藝爭輝千古！而這藝術却被唐宋以來的文人畫家所視而不見，就像西洋中古教士對於羅馬郊區的古典藝術熱視無覓。

影刻之外，在當時（六朝隋唐）更熱鬧，更動人，更炫耀的是彩色的壁畫，而當時畫家的藝術熱情表現於張圖與戲異競賽這般動人的故事：

五代時，張圖，梁人，好丹青，尤長大像，梁龍德間，洛陽廣愛寺沙門義暉，置金幣，邀四方奇筆，畫三門兩壁；時處士跋異，號為絕筆，乃來應募，異方草定畫樣，因忽立其後曰：「知啟者敏手，固來贊貳。」異方自負，乃笑曰：「願陸，吾暫之友也，豈須贊貳？」一團願繪右壁，不假朽約，擲管揮寫，倏忽成折展報事師者，從以三鬼。異乃瞪目踉蹌，驚拱而言曰：「子豈非張將軍乎？」圖捉管展曰：「然。」一異雍容而謝曰：「此二壁非異所能也。」一遂引退，圖亦不候談，乃於東壁畫水仙一座，直視四壁報事師者，意思極為高逸。然跋異固為善佛道鬼神神術絕藝藝者，雖被斥於張將軍；後又在福先寺大殿畫觀法善神

，方約時，忽有一人來，自言姓李，滑台人，有名善畫羅漢，短里呼余為李羅漢，當與汝對畫，告其巧拙，異恐如張監者流，遂固讓西壁與之。異乃甚矜持，意與筆會，吃成一神，侍從驚駭，而又設色如龍。李氏縱觀異畫，覺精妙入神非已所及，遂手足失措。由是異有得色，遂誇詡曰：「昔見敗於張將軍，今取捷於李羅漢。」

這真是中國希有的一藝術熱情時代！一因了西域傳來的宗教信仰的刺激及新技術的啟發，中國藝人擺脫了傳統禮教之理智束縛，馳騁他們的幻想，發洩他們的熱力。線條、色彩、形像，無一不飛動奔放，虎虎有生氣。一飛一是他們的精神夢想，飛騰動盪是那時藝術境界的特徵。這個傑出的佛教藝術，在中原本土，因歷代戰亂，及佛教之衰退而逐漸消滅。富麗的壁畫及其崇高的境界真是「如幻夢如泡影」，從衰退疲弱的民族心靈裏消逝了。支持這家藝壇的是殘山剩水，孤花片葉。雖具清超之美而乏磅礴的雄圖。天祐中國！在西陲敦煌洞窟裏，竟替我們保留了那千年藝術的傑出遺影。我們的藝術史可以重新寫了！我們如夢初覺，發現先民的偉力、活力、熱力、想像力。這都是我們現代藝術所缺乏的，也是我們民族生活裏所喪失了的。

這次敦煌藝術研究所辛苦籌備的藝展，雖不能代替我們必需有一次的敦煌之遊，而臨摹的逼真，已經可以讓我們從「一粒沙中窺見一個世界，一朵花中欣賞一個天國」了！

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敦煌壁畫中的極其生動而具有神性的動物畫，我們從一些奇禽異獸的潑刺的表現裏透進了世界生命的原始境界，意味幽深雄厚。現代西洋新派畫家厭倦了自然表面的刻畫，企求再由天真原始的心靈去把握自然生命的核心層。德國畫家馬爾克 M. Marc 震驚世俗的「藍馬」，可以同這裏的馬精神相通。而這裏「釋尊本生故事圖錄」的畫馬，尤以一遊獵野務——一幅簡直是近代畫家亨利盧梭（H. Rousseau）的特異的稚稚心靈的畫境。幾幅力士像和北魏樂伎像的構圖及用筆，使我們聯想到法國新派 Rouault 的拙樸的線條及中古教堂玻璃窗上哥提式的畫像。而 Metzger 這些人的線紋也可以在這裏找到他們的偉大先驅。不過這裏的一切是出自古人的原始感覺和內心的迸發，渾樸而天真。而西洋新派畫家是在這尋着失去的天國，是有意識的回到原始意味。

敦煌藝術在中國整個藝術史上的特點與價值是在它的對象以人物為中心，在這方面與希臘相似。但希臘的人體的境界和這裏有一個顯著的分別。希臘的人像是著重在一個一個的由皮肉所組成的體積。所以表現得那樣具體。而敦煌人像是全是在象徵的圖案中（線條、墨線、墨點）也是在這體積圖案中；人像的著眼點不在體積而在那充滿了地心吸力的飛動旋律。所以身體上的主要衣飾不是貼體的形體而是飄飄飛飛的綉花的帶紋（在北魏畫裏有全以帶紋代替衣飾的）。佛青的圓光，足下的蓮座，聯合着這許多帶紋組成一幅廣大繁富的旋律，象徵着宇宙節奏，以容包道軀體的節奏於其中。這是敦煌人像所暗示給我們的中西人物畫的主要區別。只有英國的神祕主義，畫家勃萊克的一神曲一插畫中人物也表現這同樣的上下飛騰的旋律境界。近代影刻家羅丹也擺脫了希臘古典意境，將人體影像置入於光的明暗的節奏中，而敦煌人像卻係融化在綉紋的旋律中。敦煌的藝境是音樂意味的，全以音樂舞踏為基本情調，一四方淨土變一的天空中還飛躍着各式樂器。

藝展中有唐畫山水數幅，大可以幫助中國山水畫史的探索，令人想像王維的作風。但它們本身也都具有拙厚天真的美。在藝術史上，是各個階段，各個時代一直接面對着上帝一的，各有各的境界與美，是無所謂進步的。至少我們欣賞者應該拿這個態度去欣頌他們的藝術價值。而我們現代藝術家能從這裏獲得深層的啟發，鼓舞創造的熱情，是毫無疑義的。

（上接第十面）去，那麼昔日舊歷史中人類在相互關係上以及制度文化上所犯了的錯誤，當必然會明白明白的在已經有了清醒頭腦的現代人眼前呈現出來，根據這一發現，吾人之智慧能力皆必能勝任為今後人類社會找尋出一條不再有着曩昔錯誤的新的光明大道，大家也便不難在這條新的道路上，去建設始於一真、善、美）的人生。

我們要求生活得真實美滿，要求能滅除現世的痛苦，只有拋棄舊歷史的黑暗迷途，重新另找適宜人類生存的光明大道，在舊歷史的軌跡中，社會是不會有出路，人類也不會有的前途的。但是向一個新的方向去努力，却需要我們能首先勇敢的自覺，誠意的求善，然後才能達到。以往我們所遭遇的困難，皆不能視作真正的困難，而真正的困難是在吾人不敢去勇敢的自覺，不願去誠意的求善。人類的頭腦清楚，行為糊塗，有辨別是非好惡的能力，而不實際運用，倒行逆施，糊塗到底，這便是真正的困難，悲劇，和不可救藥了！

所以，肯真心尋求出路，社會便會有出路，肯誠意謀求前途，人類便會有前途。一切未來的成就功罪，皆賴我們現代人奮鬥覺醒的成度及我們肯為未來所付出的犧牲代價奮鬥努力以為定願了！

三十七年九月七日南京

觀察

· 版出六期星逢 ·

日五十二月九年七十三

分五角一份每 ·

第五期 第五卷



專論
悼貝納斯

朱若華
蕭乾

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阻

撓中國進步的絆腳石？ 樊弘

介紹
聯合國大會怎樣工作

張振鵬

外論選譯

朝氣勃勃的華萊士進步黨

Smith

金圓券與政治的延續

（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游剿制面與冀東戰事

（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浙江共軍實力及其分

佈情形（杭州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北平探監記

觀察特約記者

談方言文學

書評

評李廣田的「引力」

李長之

郭紹虞

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52432
電報掛號：590071
北平發行所：胡同二號
北平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北發行所：台灣台北館前街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半年：掛號一元八角，平寄一元六角
一年：掛號三元五角，平寄三元二角
三個月：掛號一元二角，平寄一元一角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元，全頁一元五角
封底：每行八角，全頁一元
普通：每行五角，全頁八角
通欄：每行四角，全頁六角
照碼：每行五角，全頁八角
退稿：附郵五分
平寄：附郵五分
航空：附郵一角
如欲退稿：附郵一角
事後函詢：務請附郵
定戶注意：務請註明定單
讀者：務請註明定單
地址：務請註明定單
說：務請註明定單



魔術！

編者先生，在民國廿四年法幣政策實行前一個擁有三萬萬塊銀元的大富翁，如果他是個安份良民，遵守政府法令，將他所有的現款，總是放在家裏，既不活動圖利，亦不注意保持幣值，則到了十三年後的今天，他所有的錢折合原來本位銀元的話，他便只有一分二厘五毫了！連買一個燒餅都不夠，道中間經過幾次的折合收兌，算式如下：

1. 30,000,000.00 元(銀元) = 30,000,000.00 元(法幣)……按法幣兌銀元率
 2. 30,000,000.00 元(法幣) = 2=15,000,000.00 元(偽法幣)……按偽法幣兌法幣率
 3. 15,000,000.00 元(偽法幣) = 200 = 75,000.00 元(偽法幣)……按法幣兌偽法幣率
 4. 75,000.00 元(法幣) = 3,000,000 = 0.025 元(金圓)……按金圓兌法幣率
 5. 0.025 元(金圓) = 2 = 0.0125 元(銀元)……按金圓兌銀元率
- 注：可參見九月五日 杭州

哥哥的不幸

編者先生：我的哥哥剛剛坐了八月十九日的美格斯將軍號船去美國讀書，不料不到兩天，幣制改革，一切結匯方法取銷

，要買一元外匯必需四元金圓券，這真是個晴天霹靂。廿五年夏天教育部舉行自費留學生考試，部份人當然有此經濟能力才去考試的，可是也有不少人是難去考試而經濟情形實際上是也很困難的，我的哥哥就是後面情形中的一個。考的時候外匯是二〇二〇，發榜的時候好像已經是四五千了，去年春天外匯放到一萬二千，始終籌不滿足夠的錢，但是法幣隨着時間而貶值，今年春天結一千美金（規定六個月留學期間的費用九百圓，另一百元是抵美後到校路費），祇要法幣一千二百萬，相當於一個月的薪金，於是才敢去申請入學證書，等美國入學證書寄來，結好匯，替太太找到工作，以償勉強維持兒女的生活，這樣才去定船票，準備出國。誰知上船祇有兩天事情就起了變化了。我哥哥申請的學校學費生活費都貴，一百五十元一月本來就不夠，現在連這一百五十元都空了。照現在這情形看，即便他祇讀六個月，回來也就連路費都沒有了。所以假使沒有一點補救辦法的話，他到了美國，註冊，繳費，頂多讀上兩個月就得買船票回來。國家舉行考試，希望選就人才，而且已經就的馬上回國來呢，這當然也是窮學生的不自量力，但假使政府隨時把自費留學生結匯價格提得和現市一樣高，弄得人家不上不下，尤其初到異域，一無親戚故舊，連工作也不容易找到，除掉抱恨終身的立刻回國之外，還有甚麼其他辦法呢？希望政府當局對於這種情形，能有一個補救的辦法。

蔣阿英 九月七日 台灣高雄

（上接第十四版）隊政治訓練如何？軍民之間的關係怎樣？部隊的行動力有多大？保護都市工礦及交通線的負重有多大？正規軍與地方團隊配合得怎樣？這些也都是值得研究的。

內容與形式是一件事物的兩面，是絕

對分不開的。形式不能割裂，內容也掩飾不了。如果本質不變，外形上的變化都是徒勞的。

游剿戰術的做法

華北剿總既有決定以戰略服從政略的說法，政略的方面是什麼呢？一時也難以看得出來。做為傳作戰智囊之一的王銘德，由秘書長調為政工處長，他過去是負責察綏幹部生活輔導的人，到政工處後人員增多了很多，據說這就是加強政治工作的表現。軍政會議前後，並且派定了一位政工處副處長專門研究「游剿控制面」的工作。這一部門的工作成了政工處的一件大實施，將全省劃為七個游剿區，各區設有指揮官，負責全區軍政，而以北平附近歸剿總直轄作為示範區。各區人事聞已大致決定，紅運南的王鳳崗已首先發表為冀中清剿指揮官，指揮部設在涿縣。在華北軍政會議以前，新城一度被共軍攻佔，王鳳崗於收復新城後來平謁傳，先會到了他的南遊時的導演李仲平（現在河北保安司令部政工處長），他說他去謁傳，報告收復新城及實施空室清野的經過，言下頗有自得之意。李就鄭重的告訴他說，「千萬不要說您的空室清野成功，您要說我遵照總司令游剿控制面的指示！主動撤離新城，現在又收復了，游剿控制面已獲初步成功，更望總司令多給一點指示。」王謁傳的一幕又導演成功，王成了第一個發表為清剿指揮官。將來冀東清剿指揮官屬於誰呢？現在還不得而知。

一般在國軍進入冀東時，認為「游剿控制面」的戰術即將在那裏實施，華北軍政會議上，用幾何原理證明了非常正確的確，一定會在我軍收到實效，國軍在冀東的行動上，確也有那末一些游剿的性質，不一定先攻城鎮也不一定固守城鎮，但結果他們希求打擊的共軍的「戰意」與「戰力」並沒有做到，您游剿他游擊，兩者名二而實一，而共軍在一游一方面的經驗，及其在鄉村中的基礎，實在遠出於國軍而不能以道里計。還未說起來，那就是以「已之短攻人之長」，其失敗與成功似乎不判可明的。

兩頭動

游剿控制面的戰術，在冀東沒有收到實效，共軍又進了冀東。冀東四線平古路不通，東線北寧、安山、石門又起戰事，連南線平津路北側武清楊村間，也有共軍十五軍分區警備一二兩團的活躍，冀東戰事有日漸擴大的趨勢，因為那裏和遼西是息息相關的。記者寫到這裏的時候，知道遼西的戰事爆發了，榆關綏遠路已經不通。華北共軍發動秋季攻勢，以前曾經有人指出可能從東四兩端動手，東端是冀東，西端就是綏東區及雁北。這樣可以使得華北國軍東西不能兼顧而疲於奔命。現在冀東戰事是與遼西戰事同時開始了，大同周邊也顯得緊張，賀龍部隊調動頻繁。西端戰場是察綏部隊的老家，那裏如有問題，對察綏部隊的心理影響甚大，而且可能影響榆林及陝寧邊境的戰事，使西北戰場有新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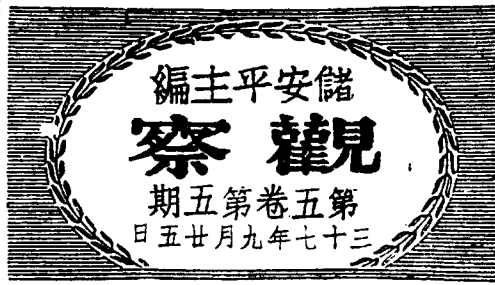
現在是秋高馬肥的戰鬥季節，北方原野上秋色已經成熟，金黃殺戮對飢餓的人羣又是一種大的誘惑，夾在東北與西北中間的華北，東西兩端都是主要戰場。游剿控制面的戰術，在冀東過去既無成果可誇的理想，也是疑問。如果將游剿戰完全打成了游擊戰，那就成了說力量對比有了變化，佔領面積也有了變化的具體說明。

截至目前，游剿戰術還是停留在大部分的紙面上和計劃中，剿總發佈的新聞裏充滿了「我游剿部隊」的字樣。就是共軍來攻，也多半寫成「我游剿部隊發現共軍立即予以痛擊」。從新聞上看，國軍天天是主動的游剿，控制面的大小倒不曾發現過在剿總發佈的每週綜合戰報裏。大概所謂游擊戰，還在宣傳，嘗試，計劃之中。

本刊傳統

一、紙張無奇于本刊刊例所稱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则，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朱若華：大公報社論委員
- 蕭乾：北京大學教授
-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 張振勳：
- 郭紹虞：同濟大學教授
- 李星之：北平師範學院教授

悼貝納斯

朱若華

捷克前總統貝納斯於九月三日在捷克西部斯摩瓦斯地(Šumava)病逝。消息傳來，舉世愛好民主和平的人士都感到無限的惋惜與哀悼。這不僅是捷克人民的損失，亦是世界和平前途的損失。歷史家常謂一個人的成敗不能蓋棺論定，但是貝納斯一生的事業在捷克的解放史上及捷克人民爭取和平的過程中將留下永遠不可磨滅的功績。他歷盡艱險，領導捷克人民兩次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國家，他爲了世界民主和平的理想會不斷努力奮鬥，以促進蘇聯與西方各國相互諒解，真誠合作。他一貫的政策是本著理性、容忍、協商的方式以解決國際及國內的政治問題，他的理想在使捷克成爲真正獨立、自由、民主的國家，溝通東西的橋樑；但是當他的理想未能如願以償時，他爲顧全捷克人民的利益，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毅然放棄了他的主張，使捷克人民終於避免了自相殘殺的內戰。捷克現在是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家，正向着建設的途中邁進，但是貝納斯對捷克的偉大貢獻是無可諱言的。

貝納斯早年即受着西方自由主義的薰陶，酷愛民主與和平。他是波希米亞一個農人的兒子，出生貧窮。但是年輕的貝納斯勤苦向學，先後在布拉格、巴黎、倫敦等地完成他的學業。回國後他便致力於革命工作，領導捷克秘密革命組織瑪非亞(Mafia)，反抗異族的壓迫。第一次大戰後捷克在老瑪薩里克和貝納斯的領導下，終於脫離了奧匈帝國的羈絆而獲得自由與獨立。

第一次大戰後的捷克處於歐洲列強之間，它的安危繫於各國之間能否和平合作。因此貝納斯的政策自始即以增進國際合作爲目標，主張集體安全，以防止侵略者的興起。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以後，歐洲局勢急轉直下，捷克在德國侵略政策下感到嚴重的威脅。當時貝納斯已經看出希特勒無止境的侵略野心，因此他除努力爭取英法及蘇聯對捷克的援助外，並儘量促進英法與蘇聯間的合作，欲藉集體的力量以防止德國的侵略。但是西方的列強不但沒有接受貝納斯的建議，反而在慕尼黑會議中單獨對德妥協，出賣了捷克的利益，結果造成了德國獨霸歐洲的局面，貝納斯的理想遂致全部粉碎。在內外壓迫之下，他帶着破碎的心靈於一九三八年底逃奔倫敦，欲在海外從事復興工作，待機而起。第二次大戰爆發後，貝納斯在倫敦重新組織了捷克臨時政府，獲得聯合各國的承認，勝利後捷克在他的領導下終於二度復興。

兩次大戰給予捷克的教訓，使貝納斯更堅信他過去的理想和政策的正確。他在戰時及戰後始終調着蘇聯與西方各國合作的重要性。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不顧一切阻礙，毅然由倫敦赴莫斯科與史達林會晤，簽訂了蘇捷條約，取得了蘇聯的瞭解和贊助。光復後的捷克在貝納斯的領導下，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由捷克四大政黨共同組成。戰後的捷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容納了東西的政治思想；在外交上，捷克與東歐及西歐的國家都維持着友好密切的關係，成爲溝通東西的橋樑，這是貝納斯的理想。貝納斯在他的「戰時回憶錄」(War Memoire)一書中會謂：「今後國際政策的成功，當在西方國家能調整其對蘇聯的社會政策；同時蘇聯亦必需嚴重的顧慮到西方政治自由的原則，而調整其政治及革命的策路；至少兩方面必需能到互相容忍的地步。」

但是貝納斯的願望和理想隨着英美與蘇聯對立的尖銳化而成爲泡影。三年來歐洲局勢的發展，使捷克無法繼續維持它不偏不倚的地位。去年六月馬歇爾計劃提出後，捷克雖然最初表示願意接受，但其後因蘇聯的反對而未能如願參加。今年二月政變的結果，更使捷克失去它過去東西橋樑的作用，而選擇了今後所走的方向。這次捷克的政變有人稱之爲「不流血的革命」，但主要的還得歸功於貝納斯的容忍與愛護捷克人民的熱忱。捷克共產黨雖然以合法的方式取得了政權，但是因爲它操縱了警察機關，逮捕反對黨份子，這顯然的與貝納斯的初衷相違背。但是這一個案以容忍見稱的政治家，始終以捷克人民的利益爲前提，勇敢的接受了這次政變，使捷克人民避免了自相殘殺的內戰。最後他在六月初辭去了總統的職務，因爲長時間的積勞和精神的痛苦，他在辭職後不久就悄然與世長辭了。

貝納斯一生最值得紀念的是他努力世界和平與合作的精神，他兩次奮力追求和平合作的理想，結果兩次都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貝納斯是一個能容忍、能犧牲而具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他酷愛民主與自由，他在「戰時回憶錄」一書中會謂：「人類具有數千年悠久的歷史，但從未發現比民主政治更優良的政治制度，任何脫離民主政治的社會，遲早仍將以不同的速度，回到民主政治的目標。」但是貝納斯更愛護他的國家，愛護他的人民，他爲了捷克人民的利益

託治：聯合國的試金石

蕭乾

國不在大，有主權則行。擁有五十多會員國的聯合國大是眞大，就苦了沒有一點點主權。由這點看，聯合國大可以省塊石頭，利用其前身國聯的基礎。在所有成功湖的大小衙門裏，安全、社經、文教、裁軍、原子管制，都需要干涉到各會員國本身的主權，單獨「託治委員會」干涉的是殖民地的主權。講起來，總算間接而又間接了。英國人民真在乎一二聯合國督察員在中美洲或南太平洋的英屬島嶼棕櫚樹下走走嗎？如果間接的主權動不得，這聯合國除了維持一批國際公務員，一個門嘴的指台以外，對於「天下一家」或「世界政府」那些崇高理想的貢獻，是等於零。

三年來，事實已充分證明連這間接的主權也動不得牛根汗毛。由亞洲人說，我們並不真地希望聯合國可以給我們「安全」，給我們公義，所以原子管制及新聞自由那些大名堂距我們的需要都還老遠。但三年前我們的確會對託治抱了些希望。中國不但四週爲殖民地所包圍，百年來自身也迄未能擺脫厄運。我們並不敢奢望殖民地立即超脫到獨立境界，但我們的確會希望在聯合國的保護下，先扯碎普世殖民地人民的永久賣身契，即名義上，殖民改爲託管，也即是由永世奴役改爲有期限的奴役。

然而這是個大大的幻想，其錯覺是我們忘了聯合國的真正台柱除了羸弱的中國及孤零零的蘇聯外，本身就都是殖民地國家（英法），或正成爲殖民地國家（美）。聯合國的方向，當然不出其台柱的左右。在舊金山開會時候，英美法對其真意便沒有過分隱瞞。英國做了些象徵的讓步，法國則聲明託治制不適用於越南，而美國則堅持單獨佔有戰略島嶼。那時中國的國際行市還滿高，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國代表本人道正要求託治的最終目的應爲獨立。那時，英美法在一邊，中蘇在一邊。那相持的形勢可惜並未延長。很快，世界便回到十足的強權政治去了。然而僅僅一利那的相持，英法便自動劃出非洲坦迦尼加、吐谷蘭、卡東隆三處作爲託管區；行政權也即是「實權」雖依然爲英國所有，但究竟聯合國每年可以聽取土人自治進步的政治報告及派人調查；比利時也逐步後虛「交」出一塊中非來。這是一九四六年的事。然而次年春天，美國便宣布單獨「託管」日本代管島嶼了。妙的是它託管的條件：「美國擁有全部行政、立

，竟犧牲了他的理想，西方的報紙批評他是一個「妥協者」，他內心的衝突與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站在捷克人民的立場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就是在病重的時候，他還拒絕醫生的勸告，遷居國外休養，惟恐遺人口舌。他這種顧全大局，忠誠爲國的精神是最值得欽佩的。

貝納斯的死是這時代的大悲劇，他的功績惟有歷史來證明。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貝納斯安葬之日）寄自英國。

法、司法權，他人不得修改或更正，所有土地當視爲美國完整之一部。」（第十五條）。『完整』自然不包括選舉權或生活水準，全文更未提到扶持自治的話。美國的聲明可說把聯合國憲章託治部分撕個粉碎，尤其是該章第八三條『所有託治協定，如有修改或更正，須經安全理事會之同意』。

這一來，聯合國被錐下的葛止一條腿。間接的主權都碰不得，還想碰直接的？新來的主人都干涉不得，還想干涉殖民地舊有的主人？於是，英法荷比得了救，而聯合國那時候實際便已入了土。

聯合國憲章關於託治部分訂的其實是滿含糊的。第八七條說『聯合國大會應有權及應託治當局提供之報告』，並可『於取得託治區地方當局同意後前往訪問』。用『訪問』(Visit)而不敢用『調查』，已充分表示出這世界政府的胆怯了，而報告及應後如果大會認爲不滿，應如何處理呢？憲章裏並無文字規定。澳洲代表倍理教授在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便承認其託治的新幾內島，託管了廿六年，土人依然逗留在石器時代！當場有位代表便幽默地質問：人類的石器時代經過了兩千年之久，難道新幾內島人民也需兩千年才能進入銅器時代嗎？三年來，法荷各在東南亞進行其殖民戰爭。如今，英國也出動三軍，在馬來亞施展起威風來。弗多僧少的澳洲說明了歡迎白人，多多益善，黃種人絕不招待。南非今春換了朝代後，一面釋放納粹奸細，一面把種族歧視政策變本加厲地擴大起來。然而聯合國連個屁也沒敢放！

本月先後開了兩個有關託治的委員會，而且都是不歡而散。上旬在日內瓦十六國代表開了個被統治區域委員會。當蘇聯代表斥責全球七十二處殖民地政治上毫無進步，並特別指出法國在安南的野蠻作風時，恰好剛來自安南的法國代表憤然離場，並以退出委員會來恫嚇，英比代表也同類共鳴地走開會場。在印度的領導下，中、蘇、埃重新提出聯合國對殖民地的監督權。今日的英國不比一九四五年的英國了。它理直氣壯地聲明：『殖民地的主權與母國同。聯合國既不能干涉各國內政，殖民地當然也不受干涉。英國堅決反對國際勢力干預其屬地』。至於南非對於前德屬的西南非如何處理，更無人敢過問了。另外一個集會便是本月中旬在巴黎開的護北非殖民地處理委員會。與會的是英、法、

美、蘇的外次。這份義大利和約遺產實在比的港更為棘手。軍事上，北非在本屆戰爭中已證明其顯著價值，誰拿去誰便是地中海的半壁主人。政治上，大家都要討好左右搖擺中的義大利，而對於首先遭黑衣相侵略的阿比西尼亞又不得不略為敷衍。法國則深怕代表民族獨立意識的阿拉伯聯盟的勢力西移，威脅到吐尼斯。反正英美法在北非都各有其基地。在西歐聯盟的軍部算盤上，北非無疑地佔很重要的位置。由西方三強看來，那片殖民地最理想莫如由英美法分一分，然後給阿比西尼亞一個海口。蘇聯前年的立場是主張將所有殖民地都歸還原主。美國前年的立場是由國際託管。這次會中，西歐聯盟支持人的美國突然改變主張了，它贊成利比亞的西林尼加 (Cirenaica) 交給英國，這改變並未使與會者發生驚訝。蘇聯也變更了主張，拾起美國放棄了的主張，提議整個交給國際託管。這不提便罷，一提便使在座的都相顧失色，認為是滑天下之大稽。於是，在無共同紀錄，無共同公報的澈底不歡情形下閉幕了。這問題自然得搬到本週在巴黎開幕的第三屆聯合國大會上去了。

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阻撓

中國進步的絆腳石？

樊弘

我不否認在傳統經濟學中含有許多的合理的成份，但我敢斷言說，在它裏面，確也含有若干的不合理的成份。這些不合理的成份可使一個受傳統經濟學影響最大的人，或對傳統經濟學造詣最深的人，對於經濟問題的看法不合理，並反對其他的人的合理的看法。這對傳統經濟學者的影響是很壞的。一來呢，使傳統經濟學者們，對於經濟問題所發表的建設的意見越來越不見重要。再來呢，使他們對於若干人所發表的若干的合理的言論不理不睬。如這一類的不良的結果都是任何一個對於傳統經濟學造詣最深的人的初衷所不及料的。可是在事實上確有這種不良的結果出現。但這種不良的結果的出現，究竟是誰的責任呢？一半固然也是學習經濟學的人的責任，但其他一半則不能不歸罪於傳統經濟學自身的不合理的假說了。試問這些不合理的假說是什麼呢？

我敢斷言的說，傳統經濟學中第一個不合理的假設，就是勞資擅定經濟學上的生產要素有四個：土地、資本、勞動、與管理，因而在分配的時候所得的形態亦有四種：地租、利息、工資、和利潤。這個生產要素的四分法的不合理關係，在於它的功用只能表示經濟學上的物與利的關係，而忽略了內中的人與人的關係。可是在經濟生活裏，人與人的關係乃是最重要的關係。從物的關係着眼，一個商品的生產實離不開資本、土地、管理與勞動。可是，從人的關係上說

我感到驚訝的是英美法的驚訝。要個聯合國，多少也得給它點活兒幹，不能儘拿它點錢昇平！安南它管不得，剛果它動不得，新幾內亞它摸不得，太平洋島嶼它眼睛也不許眇一眇，如今，北非好容易騰出這片無主的殖民地，難道「國際託管」就是如此大逆不道嗎？老實說，蘇聯外交辦得硬硬，對託治却還嫌太現實了些！為什麼當初不就堅持國際託管？而且，為什麼對美國在那樣違背聯合國憲章條件下合併的太平洋島嶼，竟為了美國在太平洋的戰功而接受？為什麼為了幾張選票，而居然贊成侵略罪行昭昭的義大利重回非土？那無異於支持日本戰後擁有朝鮮及東北！國際正義縱不論，當地人的感覺也不能不顧及呵！大家既然都擁護和平，包括基地的殖民地，多一塊由國際公管，和平便多一分保障。

聯合國是個混飯吃的衙門，還是世界政府最起碼的胚胎，託治是塊最基本的試金石。它試得出聯合國有幾成生機，也試得出誰是「天下一家」那崇高理想的敵友。

九月廿一日，上海。

商品的生產却沒有如此簡單。商品，在表面上，好像完全是由上述這四個生產要素合作而成的。實則，商品的價值，無論從它的使用價值或效用出發，或從它的交換價值或價格出發，都是勞動所生產的。從使用價值來說，除開極少數的野生的菓實而外，幾乎全部商品的效用都是勞動所生產的。生產是什麼？即傳統的經濟學者亦不否認，生產是創造效用的活動。但誰創造效用呢？除非我們相信麵包可以自由加倍的神話，當然只有勞動了。這裏所指的勞動係指廣義的勞動而言，純經濟的管理的勞動當然也包含在內。連三歲孩子也知道，商品的使用價值都是從有用的勞動創造出來的。紡工紡出棉紗，織工織成棉布，縫工縫成棉衣。這還不是很明顯的事情麼？固然從個別的縫衣公司看來，在縫工剪縫棉布之時，它需要資本作幫助，即需要棉布作原料，並要縫衣的機器，和縫衣的工廠，和其他的一切輔助生產之物。這些東西的存在，很使我們眩惑，即棉衣好像不是單由縫工裁製出來的。因為除了縫工之外，尚有資本。足見傳統經濟學的四分法似乎亦甚合理。可是，我們莫忘了，在縫衣的資本這個總名之下，一切的棉布、機器和工廠等都是織工、機工、土工和木工建造的結果。也就是說，凡屬資本的使用價值都是有用的勞動創造出來的了。更從商品的交換價值出發，幾乎所有的商品，經過交換過程，都可以把他們表現而為標

準商品的倍數或分數。無論這個標準的商品是什麼，是銅也好，鐵也好，牛也好，或小麥也好，都不能變更我們這個命題的真實性，即在紙幣本位之下，這個命題亦能存在。依照同樣的理由所有的勞動，在交易的市場上，也都可以把他表為標準勞動的倍數或分數。我們莫要忘了，在交換價值方面商品的交換價值有多少，那末，創造商品的勞動亦有多少。除了我們相信麵包可以自由加倍的神話外，我們勢難否認，即連商品的交換價值亦是勞動創造出來的了。正如馬克思所說，即凡有用的勞動創造商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又抽象的勞動創造商品的交換價值。即商品的一切的價值無一不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傳統經濟學上的四分法，從一個工廠來說，好像是對的，但從全體社會來說確是錯的。

商品既然純粹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那麼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硬說它是由資本、土地、管理和勞動四者創造出來的，這當然是不合理的。誠然，土地不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但土地生產商品的能力確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呀！傳統學派的生產的理論既然不合理，當然它的分配理論亦是不合理的了。傳統學派說，利潤是社會拿來作為報酬企業家的管理的功勞的，利息是社會拿來報酬資本的生產的功勞的，地租是社會拿來報酬土地的生產的功勞的，而工資則是以報酬勞動的生產的功勞的。現在我們既然在根本上示明所有的功勞無一不是勞動的功勞，可見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在分配論上的根本假設全是錯的。

不但社會一切的所得都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而且又也都是現在的勞動創造出來的。過去的勞動對於所得的創造完全沒有它的份。這個道理極易明白。為討論便利起見，現在我們假定在一定的社會裏面，商品的種類在某一商品生產年度開始之前是不變的。商品每件的交換價值或價格亦是不變的。只有一點可變，即在每一種類的商品之中只有它的件數，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是可變的。在商品時期開始之前，人類尚未從事生產的工作，不但商品的種類不變，連商品的件數和商品每件的交換價值亦是不變的。可是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隨着人類的生產的精力的消耗，在生產時期之末，每種商品的件數都有增加。除非我們相信麵包可以自由加倍的神話，此增加的商品的件數與其價值實不能說不是勞動創造出來的了。例如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前，商品共有N種，每種商品共有n件，總共商品的件數為Z，再假定每件商品的交換價值，以貨幣來計算，價值一元，共為Z元。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工人把已有的商品Z，毀了。這種毀滅的過程一名生產的消耗。工人在把這些商品Z，毀了之後，再重新創造出Z'的商品來。在生產時期之末，在這些Z'的新商品之中，固然有Z'件是過去的勞動所生產的，它可稱做資本。但其他的Z''件却很難說不是勞動所生產的了。此Z''件的交換價值之總和便是社會的淨生產物的價值。它係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的源泉。所以，我們又可以說，不但工資，連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都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了。

所得必是由現在的勞動所創造的。所得而未消費的部份，或不能消費的部

份，如用以補助生產，它又變成資本。里嘉圖 (David Ricardo) 說，資本是過去勞動的化身，而所得則係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所以利息、利潤、地租與工資，無一不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然而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却說利息是資本所生產的，利潤是管理的勞動所生產的，地租是土地所生產的，但只有工資一項才是勞動所生產的。這還不是不合理麼？

淨生產物的價值雖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但從法律的關係上說，社會上的一切的淨生產物的價值無一不是屬於有產者階級所有。這即是說，世上一切的淨生產物的所有權都是屬於有產者的。淨生產物的所有權既屬於有產者的那末，在這些淨生產物之中，隨着有產者自己，依照供給和需要的原理把出一部份出來，作為勞動者的工資外，其他的部份，勞動者使沒有支配的權利了。這其他的部份，便是有產者用以報酬他們的所有權的地租、利息和利潤了。由此可見，在經濟生活裏，利息、利潤與地租，雖為有產者所有，但却不為有產者所生產。有產者不事生產而能以法律上的所有的權利，強佔勞動者的生產的成業，這便是社會主義經濟學者所稱做的剝削了。

現在的經濟的制度完全建築在這種剝削的關係上。剝削是一種人與人的關係，然而傳統的經濟學者們却說現在的經濟制度是建築在物與物關係之上，這便是大錯而特錯了。

莫怪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一見着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主張無償的重新分配的法，心裏便十分的不喜歡。為什麼不喜歡呢？因為傳統的經濟學告訴他們，地主的所得，地租，是他所有的土地生產力生產出來的。因此，不應沒收。他們忘記了，土地生產力是過去的勞動生產出來的，不是地主所生產的。而在土地上所生產的生產物則完全是現在的農工所生產的。地主不事耕種的工作，單憑他的土地所有權，而不是依靠他的勞力，竊取農工的勞動的成果，遠在農工尚未覺醒的時候，當然是可行的。可是現在的農工逐漸在覺醒了，他們還不起來要求無償的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麼？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因受傳統的經濟學上的不合理的觀念所蒙蔽，至於莫法了解社會主義經濟學者們，對於今日中國土地問題的合理的解決，反而說它不合理。這種不良的效果，雖應歸罪於傳統的經濟學，但經濟學者們自己似亦應當不吝批判自我的不是，纔是。

傳統學派經濟學的第二點不合理的所在，我敢斷言說，就由於它不承認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經濟法則，但這並不妨害在各時代有一共同的經濟法則。可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經濟法則乃是最要緊的。社會的經濟好比一個社會的語言一樣。儘管各個時代的語言都有他們相同的地方，但在某一特殊的時代必有其一種特殊的語文的法則。現代的語文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必須受現代語文的特殊法則支配，而不要古代的法則支配。依照同樣的理由，現代人的經濟生活，無論在那一角落，都必須受現代的經濟法則支配，而不受古代社會的法則支配，這也是沒有問題的。又現代人的現代文乃是由於在文學革命之時推翻了古

代的語文，方纔產生出來的。同理，現代人的經濟生活，亦係由於在經濟革命之時，推翻了古代人的經濟生活而來。用具體的例子來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是由封建經濟的革命而來，而社會主義的經濟乃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革命而來。革命也許是流血的，也許是不流血的。流血或不流血是偶然的，但革命則是必然的。再從空間一方面說，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殊經濟狀態，猶如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殊語言，其理亦復相同。假令今日有一位語言學家他在研究語言之時，既不着重研究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語文法則，亦不着重研究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語文法則，假令他覺得地方的與時代的語文法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貫通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語文法則，我們並不否認他有去作如此研究的自由，但是我敢相信，他所研究出來的語文法則，必是對於各個時代和各個地方都不適合。不幸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竟至在研究經濟原理之時恰恰犯了這個毛病，這實是我們自己應當不吝批評的第二件大事。

把中國的經濟來作例，更可以說明這件事的嚴重性。中國並非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是一個被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一稱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可是在傳統經濟學裏找不出什麼叫做帝國主義的壓迫。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只是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如果須要以同一的勞動得到更多的享受，那麼，他使應當實行自由的國際貿易。因此中國便須與帝國主義者實行自由貿易，至於中國與帝國主義者實行自由貿易的結果，中國的工業便將摧毀，或中國便將永久的沉滯於半殖民地的階段，則不暇加以注意。為什麼呢？因為在傳統的經濟學上，根本便沒有帝國主義榨取殖民地這一章。這即是說，中國的人民，如果需要增高物質的享受，那麼，中國便應當努力推銷美貨或英貨。可是中國的經濟如要復興，試問中國能够盡量吸收美貨或英貨麼？中國既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那麼，中國所最要妨礙的，就是帝國主義者再向中國為窮凶極惡的資本的侵略。可是在傳統經濟學裏根本也沒有講過資本具有什麼侵略性。在任何一本教科書上，傳統經濟學的大師，無一不說，資本是輔助生產的。資本既是輔助生產的，那麼，中國今日正是一個資本最缺乏的國家，而美國確是世界上資本最豐富的國家。由此說來，中國頂好是歡迎美國來投資。只要他來投資了，中

國便一切都好。最好是中國變成美國的一州，中國人在美國人面前不妨自居於黑奴的地位。可是美國的資本侵入中國之後，假令我們無法控制美國的資本，那麼，中國的經濟的發展便只能以之適應美國資本家階級的需要，而不能以適應中國人民的需要。亦就是說，中國的經濟便將永無採行社會主義或民生主義的機會。這是中國人所願意的麼？可是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却無法判斷美國資本侵略中國的不利。因而大倡其資本主義、勞動中國的口號。中國如欲進入資本主義的經濟尚須經過一段的革命，即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可是在傳統的經濟學教科書上，並沒有說，這個革命是必要的。因而在中國的經濟學家之中，凡受傳統學派影響最深或造詣最高的經濟學者，也就反對革命。又中國如欲變為美國那樣強大資本主義的國家當然還須若干的年代，也許到了那個時代中國須要減少人口一半，始能適應美式資本主義的發展，可是中國還未達到那個階段，豈不是尚無減少人口的必要麼？又中國將來是否效法美國的資本主義，還說不定，為什麼我們今天便要把美國的經濟來作榜樣呢？又中國因為尚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亦無工黨，因此當亦不能行使工黨的社會政策。中國不但沒有工黨，且沒有代表任何資本階級的政黨。可是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却說，中國雖然沒有工黨，但亦能行使工黨的政策，試問工業的政策能在保守黨手中實行嗎？假如不能在保守黨中實行，還能在封建的官僚手中實行麼？英國工黨所採行的經濟的改革，既不能在封建的官僚手中執行，然而經濟學家們偏說他們能够，一則以阻撓革命，再則以阻撓革命，三則以阻撓革命。這還不是在無形無影之中，竟做了中國經濟進步的絆腳石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切的過惡都是容易改善的。中國傳統的經濟學者們，倘欲澈底的解放在他們的研究心靈上所桎梏的枷鎖鎖鍊，亦不是很困難的。但有一件，即必須從中國這個國度裏的特殊地位出發，而不能從傳統的學派的拜物教的和反歷史的傳統經濟學的不合理的根本假定出發。這些根本的假設，雖已漸末由英國的好商自印度殖民地，輸入來了專以毒化中國的鴉片烟，中國人雖然窮與愚，但千萬不可以把他們來當醫藥，這可不是好玩的。

民三七、八、十五、於北京大學。

聯合國大會怎樣工作

張振鷲

聯合國大會是整個聯合國組織的最高權威機關，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它可以討論憲章範圍內的任何問題或事項，聯合國組織中的其他機關，都有向它提出報告的義務，它的組成分子是所有聯合國的會員國，代表着世界上各種民族和國家，可以反映各種主義與信仰；固然在積極的執行工作上，它不及安全理事會的有教，但它的道義力。

量，却是任何其他國際組織所不及。

聯合國大會，每年舉行常會一次，常會之外，特別大會可隨時舉行；在大會的會期期間，它總是世人注目的中心，足可證明其地位的重要，然而大會閉幕後，聯合國的活動便很少為人關切了，最近由於東西集團關係的愈趨愈惡，將聯合國對照得更是黯然失色，彷彿它已迫近垂危

的邊緣，沒有重視的價值了，這種看法，在我國尤其流行。

聯合國是否失敗，是一個將來的事實問題，我們不願揣測，但有一點是必然的：即令聯合國真入國際的覆轍，第三個大規模的國際組織必繼之而起，國際合作已成為時代的需要，任何人為障礙都不足以阻止事實的必然發展，本

此而言，任何國際組織都顯得關切和重視，何況聯合國在目前猶未至讓人完全絕望的境地？

懷着這種堅定的信念，我願意來介紹聯合國最高權威機關的工作情形，所根據的材料是聯合國憲章，大會臨時議事規則 (Provisional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和過去的實際情形；在本文中，雖然有時提到特別大會 (Special Session)，但所着重的却是每年的常會 (Regular Annual Session)；又本文所述偏重大會工作的技術問題，故不及於其職權的分析，這是應附帶說明的。

會前籌備

大會的性質，如上所述，有常會和特別大會兩種，常會開始於每年九月的第三個星期二 (按：大會議事規則則是第一屆大會中通過的，故一屆大會，不會遵循)，所以去年第二屆大會於九月十六揭幕，第三屆大會於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這日子是固定的；特別大會則有異於此，它的召開有三種情形：第一，大會可決定召開特別大會的日期；第二，安全理事會可以請求秘書長召集之；第三，聯合國過半數的會員國可請秘書長召集之；在後兩種情形下，秘書長接到請求的十五日內，特別大會必須開始。

大會開會的地點原則是聯合國總部所在地，惟經前屆大會的決議或過半數會員國的請求，可移至任何地點，目前各國代表紛集巴黎，出席三屆大會，此次會議之在歐洲舉行，便是去年二屆大會中決定的。

常會開始的六十天以前，秘書長應將日期通知各會員國；會議開始之後，秘書長例有一篇常年報告，這報告涉及聯合國各部門的工作，所以大會開始的四十五天以前，秘書長應將其內容通知各會員國，以供研討；特別大會開會日期，秘書長也該先行照會各國，照會的期限有兩種：特別大會的召開如是由安理會之請，那末秘書長的照會應在會前十四日前發出，如是由半數以上會員國之請，則照會的發出應在會前十日以前；無論是常會或特別大會，其召開日期都應預先通知聯合國其他機構，委員會以及各專門機關。

各會員國於接到秘書長的通知後，便開始遴選其代表，各國對此多甚為慎重，因為聯合國大會中，不只可解決國際間的個別問題，各國之間，也可得一良機，商討其彼此間的個別問題，因之各國多選派其重要的外交人員，代表團長往往由外長充任，惟也有以外次 (如二屆大會中蘇聯的維辛斯基) 或其他人員 (如二屆大會中英國的國

務部長麥克尼爾) 充任的，代表之中，多包括各國駐在會議地點的外交使節，如二屆大會中我國代表有駐美大使顧維鈞，本屆大會則有駐法大使錢泰，又多包括各國駐聯合國機構 (尤其是安理會) 的代表，如我國代表包括蔣廷黻；每個國家，代表不得超過五人，副代表五人，顧問專家則不加限制；經代表團長的指定，副代表得代理代表，顧問專家可代表其國家出席各委員會；大會開始一星期以前，在聯合國秘書處中，有一部門名會議及總務部 (The Conference and General Services Department)，部務由副秘書長一人主持，目前的主持人是荷蘭的裴爾特 (Adrien Peit)，當開會的時間和地點決定後，他便督促僚屬，開始籌備會議的一切，舉凡大會期中的翻譯、紀錄、交通、信札等，都預先加以適當的佈置，俾便會議進行的順利。

當各國忙於遴選代表，會議及總務部忙於籌備之時，秘書長已在絞腦汁預擬大會的臨時議事日程了；議事日程的內容亦隨常會和特別大會而異，特別大會的議程中所包括的多為召開該會的特殊事件，有時經大會三分之二的通過，亦可加入額外項目；常會則不然，聯合國大會的職權既及於一憲章範圍內的任何問題或事項，其議事日程自可包羅萬象，在秘書長所擬的臨時議事日程中，包括有：第一，秘書長關於聯合國組織的工作報告；第二，各理事會、大會各附設機構及各專門機關的報告；第三，前屆大會時所決議列入的事項；第四，聯合國其他機構建議列入的事項；第五，各會員國建議列入的事項；第六，有關下一財政年度的預算及前一財政年度的決算報告；第七，秘書長認為應交大會處理的其他事項；議事日程是大會進行工作時之本，因其內容應先行通知各會員國，預為準備，通知的日期，又因常會和特別大會而異，常會範圍廣泛，故須於會議開幕的六十日前通知各國；特別大會內容比較固定，如該會係經安理會要求而召開者，則通知日期應在大會開始的十四日前，如係經半數以上會員國要求召開者，則通知日期在開會的十日以前；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期限和前述秘書長將會期通知各國的日子相合，因為這兩件事的本意，都不外預先給予各國以攻慮各項問題的充分時間而已。

秘書長將臨時議事日程擬妥之後，各會員國仍可要求將額外項目列入議程，這種要求，如為常會，須在開會的二十五天以前為之，如為特別大會，須在會議開幕四日前為之，這種要求列入議程的額外項目，列為補充名單 (Supplementary list) 中，特別大會的補充名單，應儘速通知各國，常會的補充名單，應於會議開始的十五日以前通知各國，以便加以研究。

秘書長所擬定的臨時議事日程和各國所提出的補充名單，都不是最後的，它們必須經過大會的接受通過，才算是大會的正式議事日程，大會於通過接受之前，必須先由統籌委員會 (General Committee) 或譯為綜合或指導或一般委員會，(譯名極不統一) 加以研究而後向大會提出報告與建議；這裏應附帶提及的，臨時議事日程和補充名單都是在大會召開以前提出的，在大會開始以後，各國仍可要求將額外項目 (additional items) 列入議事日程，惟也須先經統籌委員會的審查與建議，這一點，下面還要提到；此處還要注意的，是除非於大會開始的九十日以前通知各國外，任何修改當前還在生效的經費分配的議案，都不得列入議程。

大會揭幕

各方面的籌備都妥善以後，大會便按照其既定時間和地點，在世人的注視下，隆重開幕 (有意外情形時亦可以延期，如第一屆第二次大會)。

宣布這儀式的開始的，是大會的前任主席；每屆大會開會之初，第一件大便是自選其主席，主席的任期至該屆大會結束為止，惟在上一屆大會開始時，前屆主席所屬代表團的團長仍主持此項儀式，以選舉新主席，如以過去情形為例：一九四六年第一屆常會的主席是比國代表史巴克 (Paul-Henri Spaak)，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次特別大會時，比國代表團長是蘭金荷夫 (E. Van Langelshove)，因為該國為前次大會主席，會議開始即由蘭氏領導，會中巴西代表阿爾哈 (Osvaldo Aranha) 當選為新主席，特別大會中的主席一職，便由阿氏接任；同年九月，二屆常會揭幕，阿氏復以前次大會主席之職宣布會議開始，常會之中，阿氏重被選為主席；今年四月十六日，二次特別大會開會，巴西代表團長改為葛尼茲，他遂以前任主席所屬代表團長的身分主持會議的開幕，隨後阿根廷代表安斯斯當選新主席，本月二十一日，三屆常會開於巴黎，大會開始的主持者，即為阿國代表團長，如果大會選擇以前阿爾哈連任主席的慣例，阿爾哈仍有被重選為主席的可能。

大會又自選副主席七人，其任期與主席同，主席於因事缺席時，可指請副主席一人代行其職，但如主席不能行使職權時，便應另選新主席，以補其缺；主席的職權，在

宣布會議的開始與結束，主持大會的進行，授予發言權，宣布表決及其結果，以及維持會中秩序等。

主席是大會的首腦，地位甚為崇高，所以選舉時每有激烈的競爭，副主席雖有機會代理主席主持會議，但其重要性却不在此，而在於他們是有力的統籌委員會的當然分子，因此，在慣例上，副主席總是包括五強在內，其餘兩席，常是中小國家爭逐的對象；至於主席，則多由中等國家中選出。

會議進行

和其他國際會議一樣，聯合國大會的工作，實際並不在大會的全體會議，大會的本身只不過是一個完成法定手續的組織，聯大的真正工作者，乃是各種的委員會，聯合國大會的委員會，共有四類：

一、程序委員會 (Procedural Committees)：包括證書審查委員會 (Credentials Committee) 和統籌委員會二者。

二、主要委員會 (Main Committees)：包括政治及安全委員會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經濟及財政委員會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社會人道及文化委員會 (Social, Humanitarian, and Cultural Committee)、託管委員會 (Trusteeship Committee)、行政及預算委員會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Committee)、和法律委員會 (Legal Committee) 六者。

三、常設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Questions) 和會費分配委員會 (Committee on Contributions) 二者。

四、特別委員會 (Ad hoc Committees)：大會於必要時隨時增設。

此處不能詳究各委員會的內容，我們應瞭解的：第一，除第三類中的兩委員會其委員任期為三年外，其餘任期都限於該屆大會；第二，第二類的六個委員會之組成分子都是全體會員國，第四類的委員會其分子常包括所有會員國，其餘兩類委員會之組成者，則由大會委派或選出；第三，統籌委員會在組織和程序問題上，是大會的總指揮，其組成分子有十四人，即大會主席，七個副主席，和六個主要委員會的主席；大會揭幕後，除推選主席副主席外，另一件立即要作的事，即為指定六個主要委員會的人員，立即組成統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一經組成，便該馬上開

始工作，以研究業以備妥的臨時議事日程和補充名單，建議大會採納；在大會進行期間，各會員國又可要求將額外項目列入議程，事實上，許多重要問題，如二屆大會時美國所提設立「小型大會」和蘇聯提議「戰爭販子」的提議，都是用這種方式於大會開始後列入議程的，惟這種額外項目的要求，也須先經統籌委員會的致函與建議，然後大會方可採納(為節省時間計，統籌委員會常規定一個提出額外項目的最後期限，如二屆大會中定十月二十九為最後期限，即為一例；又這種額外項目，除非於列入議程的四天以後並經過有關委員會的報告以後，不得在大會中運作致廢，惟大會如以三分之二的通過另有規定時，不在此限，這一規定的原意，亦在給各國以秘密致慮該項目的機會)；由上可知，統籌委員會實操有決定一個問題是否列入議程的大權，如它不建議大會將某一問題列入議程，該問題便不能為大會所討論，它的重要性，即在於此；同時，它又輔助大會主席處理會議的進行，決定每次開會時各問題討論的先後次序，調諧大會與各委員會間的工作，對大會決議案可作形式上(非實質上)的修改，交回大會重從致慮，這也增加了它的受人重視，惟統籌委員會不得決定政治問題，它僅是一個程序委員會而已。

統籌委員會工作的時候，大會又選出證書審查委員會以審查各國代表是否合格，這不過是一個手續而已，它的工作，平靜而迅速；統籌委員會却不然，因為有時一個希望將一問題列入議程，他國加以反對，所以極易釀成劇烈的爭辯，這便大會各機構中各國(尤其是目前的兩個集團)首先發生一遭過戰「的會場，及大會議事日程由統籌委員會建議為大會通過後，大會第一階段的組織工作便告完成，而進入討論問題的實質階段，不過在此以前，還有一事須略加說明，即大會甫開之後，各國代表團長都在大會發表演說，闡明其對國際局勢的一般看法及對各特殊問題的態度，這雖是例行公事，但因有關對各國立場的瞭解，所以也常受到重視，回憶去年維辛斯基抨擊美國「戰爭販子」那一幕，在會場引起多大的擾動！不過，小國的演說，分量却很有限；這種一般性的辯論結束之後，秘書長往往也有一篇綜合性的演說，然後大會正式進入委員會的實質階段。

委員會中處理實質問題的是六個主要委員會和特設的特別委員會(如二屆大會時的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等)，大會議程中的各項問題，都先按其性質，交由各有關委員會加以討論，以過半數的表決程序，作成決議，報告大會，由大會作最後決定，除有特別規定外，大會在未接到委

員會的報告之前，不得對議程上的問題運作決定，換言之，委員會的工作，是解決問題必經的階段(各委員會於必要時，可增設分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因之，真正激烈的場面，往往見之於各委員會，在目前劍拔弩張的國際情勢中，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尤其是唇舌劍的外交戰場；可是委員會僅可討論大會交下的問題，其本身不得主動提出新問題；各主要委員會中，都包括所有會員國，各國在委員會中的立場，當報告大會後，雖有時也有激烈的辯論，大體上大會總是採納的，但這並不是必然的，委員會的決定完全採過半數的表決程序，大會對重要問題有時則用三分之二的表決法，在這種情形下，委員會的決定，便有為大會否決的可能，二屆大會中非自治領地交由聯合國託管案，即為一例；惟在事實上，這種情形，畢竟是百不一二。

大會和各委員會的工作，都需要秘書處的協助，才能順利進行，舉凡報告、文件、決議案的印刷、分配、保管、會議情形的公告、辯論演說的翻譯等，都是秘書處協助的主要事務，以語言一項為例，中英法俄西五種語言，是大會的正式用語 (Official Languages)，英法兩種語言為工作用語 (Working Languages)，發音如用一種的工作用語，則只譯成另一種；如用其他三種正式用語的任一種，則須同時譯為兩種工作用語，這種翻譯人員，即由秘書處供給，任何代表都可用正式用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言，惟在這種情形下，該代表須將其講稿自譯成一種工作用語，秘書處據此譯成另一種工作用語；大會決議都用五種正式用語，惟大會自作決定後，也可以其他語言發布文件；這種複雜的語言工作，如無秘書處的協助，大會是無法進行的。

各委員會和大會的會議，都以公開舉行為原則，以便全世界人民，詳知有關他們命運的各問題之討論情形，不過在情勢需要時，也可舉行秘密會議，只是大會秘密會議的決定，必須及早於下次公開大會時宣布；各委員會的秘書會議之後，該委員會主席可經過聯合國秘書長，發布一個公報 (Communiqué)，大體說來，聯合國大會正逐步為公開外交建立架構(最低限度在形式上如此)，在改善國際關係上，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大會和各委員會的開會，都以過半數的出席為法定人數，會議之中，代表的發言，應先得主席的許可，主席於授予發言權時，應以各代表要求發言之先後為序，惟在大會中，各委員會主席及報告員 (Rapporteur) 為解

聯委員會的決定起見，有優先發言之權；代表的言論，如超越正在討論的問題範圍時，主席可提醒其注意，這是關於發言的內容的限制，至於時間方面，議事規則雖有一大會得限制發言者的時間之規定，事實上大會尚未行使此項權力；為了各國意見的充分表達，此種規定也無實施的必要；在會議進行的任何階段，各代表都可提議主席注意議事規則的遵守，在辯論的任何階段，各代表都可要求辯論的休止 (Adjournment) 或結束 (Close)；這種意見，一經提出，即須立即由會議加以決定，這都是會議進行時的一般規則；在會議之外，各國可將決議案、修正案和實質的提案，以書面提交秘書長，由秘書長將其副本送交各國代表團，為了使各國對這些提案予以充分的研究起見，該項須於各代表團收到這類副本的一天以後，大會才可討論該項問題對該項問題舉行表決；議案案的各部分，如經代表的要求，可分開加以表決；建議案的修正案，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時，表決的次序應以各修正案在實質上與原提案的差別程度為準，與原提案在實質上差別最大的修正案，最先表決，依此類推，直至各修正案表決完畢為止。

留心國際組織的人都承認聯合國比國聯的進步，在表決程序上表現得最明顯，就表決機而言，兩種機構都以國為單位；一國一票，這是主權平等學說的必然結論，改進之點在於：國聯時代，無論大會或理事會，各國都有否決權，因之在緊急關頭，國聯往往不能立即有所行動，聯合國大會的表決程序，已矯正了這個弊病，大會對於重要問題的決議，以到會及投票的會員國三分之二的多數來決定，此種問題包括：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安全的建議，各理事會理事國的選舉，對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的許可，會員國權利及特權的停止，會員國的除名，關於施行託管制的問題以及預算問題，至於其他問題（包括另有何種事項應以三分之二的多數決定的問題），則以到會及投票的會員國過

半數決定之；表決的方式，通常用舉手或起立，惟經代表的請求，可以各國國名的英文字母之次序，舉行點名表決 (Roll-Call)，這是有關一般決議的表決方式，至於關於選舉規則的決定，則以秘密投票為之，這應注意的，是議事規則規定，聯合國大會中的秘密選舉，不得先提候選人，這一點是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在倫敦開會時經激烈的辯論之後決定的，意在保證選舉時的絕對自由與獨立，惟在事實上，各種人選常是各國事後活動的結果，所以雖說大會已在逐步建立公開外交的楷模，但在當前的局勢下，暗中的討價還價仍在所不免。

選舉一事，在會議中每易發生意外的技術問題，為預防計，大會議事規則另有詳盡規定：當需要選舉的職務為一人（或一會員國）時，如第一次投票後沒有人得到需要的多數（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視前述規定而異），便在得票較多的二人中舉行二次投票，如當需要三分之二多數而二次投票結果二人得票相等時，則由主席抽籤決定，如當需要三分之二多數而二次投票無結果時，則投票應繼續至有一人滿足條件當選為止（這時的暗中活動當然是很活躍的）；當兩個或兩個以上職務的人員（或會員國）需要同時在同等條件下選出時，第一次投票後滿足所需之多數（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視前述規定而定）者，即當選，如第一次投票後，滿足此需要之多數的人數（即當選的人數）少於需要選出的人數，則應繼續投票，以填充尚有空缺的職位，惟再投票時，選舉的對象限於在前次投票中得票較多者，其數目不得超過需要當選人數目的兩倍；以上是選舉可能發生問題時的解決法；選舉以外的其他事項可能發生的意外，也有解決的規定：對一個問題，如第一次表決結果，贊成與反對各佔其半，則四十八小時內應開會第二次對此問題加以表決，如二次表決結果雙方仍相等，則此問題的提議即視同否決。

才能日以繼夜的進行工作，問題是繁雜的，任務是重大的，代表之間，有面紅耳赤的爭辯，有拍案頓足的拍胸，但從另一角來看，這都不失為坦白率真的作風，比起官廳之間的陰謀詐術來，總不能不說是國際關係的進步罷。

會議結束

聯合國大會雖沒有一定的期限，當它認為議程上的問題都已得到適當的處理時，它便可以閉會；如果它認為暫時休會的必要，它也可以這樣作；第一屆常會分為兩次舉行，也是大會本身的決定；總之，它是國際組織中的最高權威機構，它可以決定本身的一切事項。

要希望聯合國大會每次都有十全十美的收穫，固然是不切實際，但如把它看得一文不值，也未免犯了趨於另一極端的錯誤；聯合國的基礎是各會員國，它無法決定本身的成敗，它的命運繫於整個國際情勢的變遷，由過去的經驗看，我們可以持平的說，在某些政治性的問題上它雖無甚成就，但在多數非政治性的問題上，它對世界的功績是不可泯滅的，只要一絲希望尚存，我們便不該氣餒。

不論是成功或失敗，每次大會中，課程上的各種問題都會有一個虛度，到這時，大會便近尾聲了；各委員會的工作紛紛結束，全體大會恢復了最初的忙碌，來對各委員會的報告，加以最後的裁定；這種裁定的形式，也許是作成決議，由秘書長負責分別實施或執行，也許是暫予擱置，留待以後討論；在後者的情形下，秘書長於擬定次屆大會臨時議程時，須將其列入，在前者情形下，秘書長應於大會閉會後十五日內，分別通知各會員國。

一切料理妥當後，各國代表便整裝待返了，最後在世人的歡呼或失望中，主席宣布會議的結束，一度緊張複雜的會場，剎時變得稀疏而冷落，人去樓空，徒供遊人的憑吊而已。

——三十七、九、十二。

朝氣勃勃的華萊士進步黨

The Wallace Party The Nation, August 7, 1948

Howard K. Smith

進步黨首屆創立大會曾給造謠記者無窮的機會。表面上最顯著的特色是青年的天真氣概。要想做好的空氣橫溢蔓延。被壓迫的和少數特別熱烈的入聲勢浩大，幾乎會使

人害怕大多數人的聲音透不出來。觀察場內如林的標語，目光會被奇異的口號所震動，好像：「亞米里亞是亞米里亞人的亞米里亞。」有一次，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青年請他

的女朋友吃一份「熱狗」，好像是為了她的營養要成感：「這進步是工會發動的。」在門外雇汽車時，一位黑人代表硬推了我一下，「不要買那黃色的，那是騙佔公司

的，更如獨立公司的。一利那間，好像牽動潛志識真的

在開會時他的話。

是共黨的手法。標語寫得很聰明：好像，Wallace on War (妙處是在 Wallace 靠近於 War-less 沒有戰爭

的意思，一聽來好像是「沒有戰爭還是有戰爭」，華萊士

代表了「沒有戰爭」。) Truman's tired talking over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we're tired dying

of them (杜魯門講厭了國際分歧，我們厭死了國際分

歧)又像 War-ent's an independent-independent of the voters who elected him (華倫是獨立的——

獨立於選舉他的人民)。帶着辣椒味的演說顯然是出於內

行的高手。所唱的歌——那是整個表演中不得的成功

——流行得驚人，有一次我聽到一個共和黨死硬派的朋友

無意中唱了一個調，其中有一句是：「我真受不了，那黨

黨比了人更大。」(這是諷刺杜威的。)

常用來反對華萊士的政黨的說法——這是個孟浪的領

首加上盲從的青年被共黨所操縱的集團——自從我看到了

這次大會，實在認為不足以解釋華萊士的運動。我可以以

此說明的，我並不是一個華萊士信徒，經了長期在歐洲工

作，這是我與進步黨初次接觸。我個人的看法，一向認為

華萊士脫離民主黨，在這反動勢力高漲時期，分裂了美國

自由主義的運動是錯誤的。但是自從到了費城，看了這大

會，我開始懷疑我原有的看法了。根據事實說，費城所表

演的，從量和質雙方，更從對於政敵的有力反對上說去，

這新政黨比了一般所說他的論調所估計的，實在深厚的

例如，控告美國共產黨的舉動，他們的罪名在過去和將來

的十年中隨時都可以揭發的。無可疑義的，這個舉動是對

付進步黨大會的，他們想在進步黨宣傳的高潮加以打擊。

同樣的，杜魯門在招待記者會上保證和平的機會——還有

兩個重要的政策決定者的附和：馬歇爾和柏林的主帥克爾

將軍——他們想奪走祇有華萊士是代表和平的信念。在開

會之前的幾個星期中，總統和國務院對於美國軍隊衝入柏

林的可能性守口如瓶；就是在杜魯門宣布和平在望的星期

中，柏林的危機事實上已到高潮。這些事實再加上民主黨

對保障人權的新努力(保障人權的意義是不歧視黑人)都

表示民主黨已感受華萊士的威脅，也說明了進步黨獲取

選票的潛在力量正在膨脹。

不論飛上什麼帽子，已無法否認，有很多人將投票華

士和泰勒一票了。我們再考慮到，報紙和廣播不斷的施用

壓力，甚至直接的威脅，不惜動武的對付擁護華萊士的羣

衆，還有這樣多的人對他這樣熱烈，真是了不得的。

在這次大會裏給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臺而是它的實

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兩次大會中，討論的和決定的都是

些人等問題。在進步黨大會裏，他們爭執的却是重要的政

治問題。這一件事足夠表示他們在政治水準上已超越了兩

個老黨。在這種被壓迫為性辭和盲從的人物的集會裏，他

們的討論却異乎尋常的精密。除了一些不免的濫調外，

三個大會中都是一樣——他們的演說，像他們的政綱，內

和委員會的正確判斷却在一個可靠的報告中表現了出來：

聯邦商業局發表了一個報告說明了美國獨佔事業的驚人發

展，它說：「如果不是該巨大的公司最後佔領這國家，政

府祇有被迫採取步驟，為了公共利益對它們加以直接管制

。——

和事實脫節的缺點是在外交政策的範圍裏。當前國際

關係的惡化中認為蘇聯是毫無責任這一點是很難使人同情

的。他們要求美國在沒有具體可行的蘇聯保障的情形下，

放棄原子彈，停止徵兵，和撤退佔領軍，對於有責任感的

選民是很刺耳的，這一點會使華萊士失去很多潛在的擁護

者。

但是就是在這個範圍裏，進步黨確是敢於面對事實，

比了其他兩黨的躲避技術實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指出事

實說，經了三年的佔領，西德工業裏的重要地位已有百分

之六十落入納粹的手中。這些位置，雖則表面上不是政治

的位置，但是實際握有永遠性的社會權力。這些事實表

明美國對總的社會政策是錯誤的，也就是這些事實引起了

那些曾受納粹蹂躪的東歐國家對美國的仇視。祇有華萊士

的政黨把這些事實——在解釋國際關係惡化時的重要事實

——公之於美國人民的。

也祇有華萊士的政黨告訴了美國人民美國外交政策中

最可慮的矛盾，一方面說支持聯合國，而另一方面美國對

外國最重要的行動，歐洲復興計劃，却並不由聯合國執行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金圓券與政治的延續

觀察特約記者

不許一些新的經濟勢力自由成長

(觀察南京通信)

秋高馬不肥的時候，軍事上高方告小小的停頓，而經濟戰線便開關了。一八一九一以來的這一個月內，經濟新聞成爲頭條新聞。前方的戰事不是在城防線外掘土匪，而是在城圍以內打老虎。城外的戰爭是一兩個不同生活方式的戰爭——城內的戰爭，捉一匪軍——與捉一奸商——同時進行，顯然是爲延續「一種生活方式」的共同命運。

德勝以來的局面，民族英雄雖再復原爲流氓無產階級，民族資本家也要還原爲買辦資本家，也並不全屬可能。這個鴉鳴不已的大時代，那個不在徘徊，那個不在傍徨？像少女懷春一樣的，那個既得利益者不爲個人利益而戰鬥？後漢推著前浪，新人代替了舊人，發抗戰財、發勝利財、發接收財、發勸勵財，這中間生長了一批新的「勢力」

，像小蝎子從母體中脫化出來，他們必須吃盡母體才能長大。本是某一「家族」的自家犬，如今則已羽翼毛長。這一個新的「勢力」不可輕視，國大會場上的白衣新貴，立法院內的八方嬌客，有不少轟轟烈烈的自發表演，嚇壞了許多牽線人，就是因爲他們已因有了實力，在變爲一個新的「勢力」，他們不能完全聽着單一方面的指揮。

美國國聯家們或多或少地要對這些新芽們寄托不少的幻想，但是他們可能跟着失望。石田上任你加了多少肥料，都不能得到良好的生長；小股的淡水，流入汪洋大海，也無法恢復原來的清流。新的「既得利益」者手中的一「既得利益」到達了某一個階段，他們便不願意暴風雨吹去了滿樹的鮮紅蘋果，他們要求安定，要求保守，要求資本主義的成長。而戰爭與安定對消了，全民無法就業；那裏會有資本主義的成長？於是這種類型的「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便更非循了，更傍徨了！

城與鄉的對立中，如今正各自要整肅自己的營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細流，有時突破一個大堤防。有眼光者都不會忽視於這問題演化的演化，於是當局雖然並未全得美國國聯家們的承認，他們便毅然走上了第一次大戰後德國變舊馬克爲「仁登馬克」(Renten Mark)的老路，也顧不得我們還算是一個優勝的國家，而學習的却是一個慘敗的國家；甚至那一個本身也在通貨膨脹與飢餓中的日本，也在觸目驚心地高叫「援助中國」！中國，真是有些挺不住了！

這也許就是總體戰的表現，既然一切爲了戰爭，大家的利益應當糾纏在一起，乾脆不允許一頭寶中再有例外。尤其更不允許初離母體的新的勢力自由地徘徊與傍徨下去。過去曾特別寬容的勝利財、接收財、勸勵財的既得利益者，如今好了，都一齊再讓他萬源歸宗，重新回到了一「母體」。封建的家長，也可以重演慈禧

「勸亂是抗戰的延續，一遭麼一個農業古國，到了第四個年頭也就不能支持，也就非有一個改革，於是才有了「八一九」的改革。德國的惡性膨脹有時還不如目前中國的觸目驚心。一九二三年七月初美金一元可換十六萬馬克，到月底可換一百萬馬克，八月間一元可換五百萬馬克了，十一月在柏林可換二萬五千億馬克，而中國一九四八年一月麵粉每袋不過二十萬圓，到一八一九一月已超過二千萬元。早已限價以前的東北長春的高梁米市價是到了三千萬元流通券一斤，指數是戰前的七十五倍。德國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指數僅到戰前的七十倍。瀋陽的限價高粱米是六十萬流通券一斤，指數是一億五千萬圓，也比德國九月份的糧價價格爲高。維持着瀋陽的一個人的費用，在南京却可以養活一百個人。

走上改革幣制的道路

歷史雖是曲折的，中國和德國的惡性通貨史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抗戰經濟幣制史上早已經歷過平價、評價、限價、與限價四個階段，特別是限價，從三十二年起到了勝利。這中間物價的變動，是從幾百倍漲到幾萬倍，票市却也始終屹立不倒。當時一位經濟學家說：

「不是等比，不是等差，而是加速度的上漲。」

到了三十二年下半年，預算等於沒有，通貨膨脹的具體現象就是一切都靠發行政。也許正如又一位名人所說，

「勸亂是抗戰的延續，一遭麼一個農業古國，到了第四個年頭也就不能支持，也就非有一個改革，於是才有了「八一九」的改革。

德國的惡性膨脹有時還不如目前中國的觸目驚心。一九二三年七月初美金一元可換十六萬馬克，到月底可換一百萬馬克，八月間一元可換五百萬馬克了，十一月在柏林可換二萬五千億馬克，而中國一九四八年一月麵粉每袋不過二十萬圓，到一八一九一月已超過二千萬元。早已限價以前的東北長春的高梁米市價是到了三千萬元流通券一斤，指數是戰前的七十五倍。德國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指數僅到戰前的七十倍。瀋陽的限價高粱米是六十萬流通券一斤，指數是一億五千萬圓，也比德國九月份的糧價價格爲高。維持着瀋陽的一個人的費用，在南京却可以養活一百個人。

那時候，德國史上有着他們只有走上一條改革的路，但不是革命的路。

「一個理財家和一個銀行行長，奉命施行從經濟上拔出深淵的奇蹟。不值錢的紙馬克，

銀行停止印行了，一個特殊的仁登銀行開始出現了，這個銀行開始發行一種新的臨時通貨，稱作仁登馬克。指定的票面價格，等於大戰時的金馬克，以德國的全部農業和工業的財富爲抵押担保品。仁登馬克與紙馬克相輔而行，比率爲一比一萬億。這樣，無中生有就產生了一種新的錢幣。」

換幣制却不是一種兒戲，他是一種不得已的慘酷行爲，把千萬萬人民手中的財富以一紙命令變爲廢紙。小

有產者一夜而變爲赤貧。美國資本家不能忍受德國人民全成爲無產階級，使馬克斯主義早日還鄉，所以戰敗的賠款減少了，公務人員辭退了，公家的借款都停付了，再加上外國來不了借款和魯爾撤兵，使德國的處境已比過去去爲樂觀。慢慢地當預算平衡及通貨膨脹停止的兩大目標局部地達到時，新的國家銀行才創立起來，而新鑄的國家馬克(Mark)才代替了仁登馬克。雖然又毀滅了一批中小資產階級，但鞏固了希特勒政權。

那時候，德敗的德國只有一點可以驕傲，就是政治家們彼此對立

，但是沒有引起了戰爭，雖然貧困，沒有死亡。

中國這一次改革幣制中的環

象

這一次隨着改革幣制明令的公佈，在濱海的三個經濟中心區域設了三個經濟改革督導員，上海南京區以孫越崎爲主，廣州區以孫文爲主，北平天津區以張

厲生爲主。西南方面由於鑄幣起了風潮，徐堪於十一日飛到重慶，從事於一個新設區域的穩定。

中國的金融力量隨地區分布，已經根深蒂固，各成一個經濟王國。與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對立的，在北方有所謂金城、豐業、大陸、中南的周作民，豐業的吳鼎昌，前者最盛時有分行一百三十餘處，控制了北方的棉花市場，從事對日貿易，後者主持上海國際飯店，業務似收縮而實在開展。江浙財閥則把持了中國腹地經濟的核心。如李銘之於浙江興業銀行，杜月笙之於四明銀行，陳光甫之於上海銀行，各有各的衛星軍。廣東方面由於

宋子文兄弟那樣的拍頭，再加以廣東省銀行活動，另是一個系統。四川的銀團在抗戰中開大了，劉航琛、康心之、吳晉航、楊曉波，各有其企業與金融的勢力。此外，山西孔祥熙的勢力並不普通，一部分與改的銀號已經衰微，雲南以經嘉銘與陸子安為中心的兩大中心勢力，依靠了地方的政治勢力在拖延。抗戰以後新起來一個安徽的半銀行系統，這一批美國留學生拉了洛克費羅等美國財閥却又捲土重來了。他們各有其金銀準備，特別是辛苦得來的外匯。

政府這回派出的大員似乎相當有斟酌。宋子文坐鎮廣東，本是他勢力的範圍，霍寶樹也是中國銀行系統的人，自願惟T.V之命是從。張厲生等於衣錦還鄉，他過去曾為河北人所不滿，這次表示得特別不滿和一，給大北方父老以好感。只有蔣經國是天下不怕地不怕的打虎將，把贛州專員的一套拿到上海灘，僅僅小試身手，便槍斃了戒再玉，逮捕了杜月笙兒子杜維屏、杜的表姪黃以聰、申新總經理梁鴻元、布業巨子吳錫麟、紙業公會

理事長曾濟霖、煤業公會理事長潘以山、中國信託公司副總裁家駒、大通紗廠胡國樞、以及一徐百齊改裝警備密案一在上海有關的一行人氏。初步業已壓制了上海灘上的惡風，在那告密的信還在粉至沓來中，他還要打下去。

怎樣解決失業與生產？

形勢戰勝了人。德國要在花旗旗重新再建，第一次大戰後主持幣制改革的戰犯沙赫特被判為無罪。日本也正在同一旗幟下復興。中國怎樣呢？同路還是不同路？

一勝者以拯救敗者為第一。在美英主持的東京審判法庭上，東條條成爲了英雄。東條說一日本是被迫作戰的，是自衛，是爲日本民族國家，爲七千萬人民的生存而戰，日本有此權利。中央社東京電稱：「若對東條處極刑，盟軍撤退時，多數人民即將以鮮花至東條墳頭憑弔了。」東條必能帶罪立功。

強國要有兩個條件

強國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四千萬人口，二是要有兩個萬里地帶的資源。他當政以後，幫助希特勒制定了四年計劃，在柏林和魯爾的邊沿上舉辦了兩個大工程博覽會，顯示德國的工業力量，加強美國資本家及德人的信心。這個老實衛術今天又自由功的，他一樣也會帶罪立功的。

從上次大戰後，看一個國家的能否復興，要看他對這兩件事有沒有辦法！一是失業問題不能夠解決，怎樣能使全民就業？二是經濟問題與金融問題的配合，如何能誘導游資走到生產建設的途徑！這兩件事也就是一件事，沒有生產建設的物質基礎，就不能維持全民就業。而全民不就業也就無從得到社會秩序的恢復。中國已走了半步，對於前面的課題作如何打算？

中國這個慘勝的國家

中國這個慘勝的國家，同樣徘徊在十字路頭。據新聞局十四日發表，政府控制內有五千萬難民，有二十一年以來重演的大水災，又有自古以來所未有的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對立。而城與鄉之間的對立也到了空前的局面，雖然我們自備在一個農業國家，時間會有辦法解決失業人口問題，可是也不能忘記，在三年中兩次幣制改革下，人民已經失掉了「重慶家園」的力量。勝利以後，中央先以二百元對一收兌中鈔券，一八一九一再以三百萬元對一收兌法幣，中小資產者的普遍無產階級化，假如僅僅連號名一老虎一而不能再生產，這有什麼用？一再生產能力的恢復，即生命的恢復，不保有生命一切的勞力又爲了什麼？

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國家太多了，一邊是法西斯主義，一邊是共產主義。希特勒登台以後，逐漸解決了四百萬失業人口的職業問題，他鞏固了法西斯的主權，把德意志從共產主義的魔爪中搶奪出來。日本內閣承認去年十月起通貨膨脹到了惡性的程度，直到今年二月才緩了一口氣，以後利用美

浙西

在浙西有目山和太湖兩大問題，同時又是蘇浙皖的邊區，所以在國軍行政三不管的地方，如省界的邊境、縣界的邊境，共軍傷殘部队的遺棄，以證明國軍的範圍是以行政區爲範圍的，過了界就不是我的事，責任可以推，樂於推。但是共軍却以地爲分界的。所以每個縣把國軍的兩個縣三個縣併爲一個縣。如上述的浙東路四縣政府即爲一例。

浙西蘇浙皖邊區大小有共軍十一股，一千八百八十二人，重機槍二百八十四，卡柄六，步槍一千二百五十五，短槍二百八十四，彈藥豐富，這些武裝的，是美式的武器，因爲戰時忠救軍戴雨農的部隊在浙西，有的就連槍帶人溜了過去。

浙共的策略

至於他們的軍政大計與他們的政策，可分以下各點說明：
一、浙江共軍最重要的作用還是在於與蘇北共軍在軍事上且有軍事的時候，會起來攻的；所以以京滬杭假如在蘇北共軍一旦南下的作用；一定以浙東的共軍爲策動，向北進攻浙東鐵路，向東佔領寧紹，以便與沿海及黃山主力會合，佔領杭州及上海的外衛和南京的外衛，再而攻佔京滬杭，達成控制全國重要底座的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以影響國際國內的共軍政治

來的話，那麼不知他要從什麼地方逃出去。縣政府令只可在城裏行行，四城門不到晚就關閉了，自衛大隊只保衛了縣長自己。由此可以看出，一個是以進爲守的政治進攻政策，一個却是以城爲壘的死守的被打的局面。

必能的一部份爲最強

必能的一部份爲最強，有重機槍，約有三五百人。在寧紹與寧國邊境，時時有共軍來征糧，綁綁保長，尤以淳安村爲最。

在大湖裏有七十二峯，有大小洞窟，湖面極闊，裏面原有各股湖區，近以新四軍在該區組織，均已在新四軍範圍以內。

二、在目前則要打

二、在目前則要打通四明會稽二山，以便加強其浙東的實力。同時在浙南造成控制溫州的各鄉日後的之圖。

三、共軍的戰略是以大吃小，化整爲零，化整爲零。所以以上次北大軍進攻淳安時，不必渡江，浩浩蕩蕩，竟如無人之境。及至被圍，已登陸餘，化整爲零。在必要時亦可下海、善戰。共軍兩棲戰略是其特長之一。四、四明山的共軍軍佔領區，會稽山共軍佔領區，所以是這一帶的軍事動向就是如此。

五、共軍每佔一鄉

五、共軍每佔一鄉，必先向鄉公所把壯丁名冊，征糧備糧，征稅薄冊全部燒燬，使老百姓最感頭痛的征糧征稅收心。同時把地方自治人員綁架，把土豪劣紳綁架，或殺或放或贖，則老百姓的公憤，在淳安，有一次黃四大隊到某鄉去宣傳，有一稅務人員問而不問之，教育人員不問不教之，所以小學教師與學生對共軍的印象就好了一層。

前次在寧波有搶米風潮，在象山有一有飯大家吃一現象。據說鄉間大月開辦入坐吃。政府對他們毫無辦法。（七月中旬）

游剿制面與冀東戰事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上月國軍重入冀東，有人在注視者冀東是否將為國軍控制，是否將作義運糧的軍入冀東與孫運仲有所不同。今天事實上證明並沒有兩樣。國軍不但沒有能夠控制住冀東，而且三河縣城又在九月八日被共軍攻佔。冀東戰火重燃，與遠西戰場相應，這也或許就是共軍在北方秋季攻勢的開始。本刊五卷一期「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一文曾經指出，「……冀東在將來還是北方最重要的戰場，因為有這個地區，才可以支援東北，使錦州乳虎有所依託……共軍在秋季攻勢中不會放鬆這個地區。」

冀東局面

華北剿匪在上次冀東戰事告一段落時，舉行記者招待會，副總發言人宣讀了一篇「冀東游剿的意義與收穫」的長文，在那篇長文中說，「國軍分路深入，搗毀匪巢老巢，已將遊化以北、長城以南盤據多年的根據地，所有軍政設施及補給物資，敵

底摧毀，雖然沒有將匪主力完全捕捉殲滅，但對匪軍的打擊，與冀東局勢的開展，意義顯然重大。(一)解除了唐山與北平路綫的威脅，粉碎匪襲擾的陰謀……就軍事觀點來看，充分證明「游剿制面」的正確有效。(二)由於國軍神速的游剿，匪主力已被截為兩段，如欲再構成一個新的企圖，短期內無法辦到。(三)匪冀熱遼軍區補給中心此次經我徹底破壞，其損失可與冀中河間相比，匪必深感平地不安全感，山地也不安全，冬天匪軍必須要遷徙個月，才能穿上棉衣和鞋襪。(四)匪的老根據地並不鞏固，共匪的狂妄宣傳，正是掩飾他內部的危機。那篇長文是在八月十五發表的，到現在還紙有一個月，冀東情形就又完全變了。當時國軍收復的各縣，又逐漸為共軍收復，唐山及北平路綫乃至平古，威脅未除，破壞時有。國軍認為他斷不能構成新的企圖，他却運籌的企圖都未曾放棄。所謂被

截為兩段的共軍，又開始集攏起來，重返冀東。東段的李運昌程子華部，退出遼天，在長城線上徘徊了幾天，就在開始向南遷徙，越過遷化遷安，第八縱隊又出現在北平路石門車站以北地區。西段共軍義榮、三縱隊撤退時攻佔石廳，越平古路至冀熱察邊境上，現也逐漸東移，四縱隊及二縱隊的第四旅却始終未離開平谷地區。現南移襲取三河，威脅通縣及平古綫。

三河之失

三河是冀東國軍一個突出的縣城據點。那裏的守軍僅有一個師團，是周毅亭率領的保安第三十八團。全團兵力也不過五個連。共軍二四縱隊一部六七千人六日接近三河城邊，那裏突出的小城，附近並無無險據點，而且東面是潮運河，南面是鮑邱河，西面是箭桿河，可以活動的範圍甚小。當晚共軍即以猛砲火攻城。周毅亭知縣城難守，預將守軍分為兩部，以兩個連守城，三個連在城外準備萬一不守時作接應。夜十二時，城外綫堡多已失陷，西門外的砲臺浮砲也被砲火轟毀。至七日拂曉，共軍即自城東北角突入城內，發生巷戰，到下午城內核心工事差不多就全完了，周毅亭又在東南城角的一個綫堡裏，撐到八日晨繞突圍而出，守城的團長和縣府人員多已死在砲火下或被俘，城外的三個連有一部分退回通縣，大部分也沒有下落了，這就是冀東三河之戰，三十八團五旅了。共軍開旗就又來了一個「以大吃小」，使國軍救援不及。

游剿戰術的內容

游剿戰術在華北追求了半年的主動，結果是一無所得，疲憊困感之餘，在華北軍政討論以後，喊出了一游剿制面的口號。這個游剿制面戰術，說來也沒有什麼稀奇，「剿」與「游」一同是打的意思，不過因為立場不同，說法各異。為游剿戰術也可以說就是游擊戰術。游擊戰術的內容是什麼呢？據說是剿匪配合土地改革方案將有一套新戰略，今後要絕對以戰略服從政略，加強地方及部隊政治工作，但全視一時不易看得。不過絕對服從傳作義的河北主席張漢卿，在九月三日對全省廣播中曾經提到游剿制面的問題，呼籲軍民合作，發揮綜合力量。下邊就是他的一段話：

游剿戰術的政治條件

「我們的戰略不是防匪而是打匪，不是「守點制面」，而是「游剿制面」，實行這種戰術，需要人民完成三種工作：(一)清奸除匪——匪是匪軍的耳目，探聽我們的軍情，破壞我們的政令，匪軍如果失去匪奸，便立時變成瞎子雙子，不敢輾動，所以我們每天在吶喊，編組保甲，清查戶口，用意就在捉拿隱匿各地的共匪耳目，使他們進不來，匪不住，跑不了。(二)供給情報——各地建立情報網，不論男女老少，都是我們的情報員，那裏有共匪，兵力有多大，有多少砲多少槍，我們知道的清清楚楚，這樣一來，我們的國軍便耳聽千里，眼看八方，敵人的行動，瞭如指掌。(三)空室清野——這是剿匪的基本條件，敵人多，我們實行空室清野，暫時躲避，繞到敵人的側面或後面，等候援軍殲滅他們，空室清野不是怕匪而是因匪，不是跑而是另變一個方向打，不是不要據點而是積極的保護據點。

根據張氏希望人民完成的三件事來看，游剿戰術所需要的也就是游擊戰術所需要的。但是一種戰術，要有他的社會的利部隊組織的基礎，不能勉強，屬於社會的，我們可以暫且不談，僅就所謂部隊組織(包括建制、裝備、性能、及其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也時常限制了他的必須採取的戰術。不僅不能勉強，必須因勢運用，如其不然，一味東施效顰，結果是重虎不成反而類大。有角者必須用角，有牙者只好用牙，這些先天條件是不容許不顧現狀的。軍隊革命的打破壞現狀的軍隊，當然就得向拿破崙學習。要想作堅強的制勝者，只有師法威靈第二。這是近代軍事思想史上的兩大派系。由於軍隊的目的不同，各有其優劣，實亦難以評定其優劣。國軍是根據那種思想建立的？這裏值得研究的呢？再者，華北國軍想實行游剿戰術，他的那

(下接第二頁)

浙江共軍實力及其分佈情形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杭州通信)

浙江在目前大局之下總算是比較安定的，但是仔細的分析一下兩浙共軍的實情以後，便可證明，這在表面上還好像是新鮮的蘋果，已經腐爛不堪了。浙江的共軍早在抗戰以前，就在浙南、浙皖邊境有了根據地。在抗戰期間，新四軍的葉挺等就自平陽出去的。同時在蘇浙皖邊區及四明山區、雁蕩山區均有分散的武力，直至戰後則先由地下組織改爲自今春起變成公開的暴露組織，並能把黨政軍民一元化，行動相當迅速敏捷。現在先述浙江共軍的軍力如何。

浙江共軍的分佈，以地形分，則以邱陵地帶爲主，有四明山、會稽山、雁蕩山、括蒼山、天目山等，而以沿海及太湖爲副。

浙東

浙東方面——最大兩個據點即爲四明山與會稽山——

四明山是浙東寧紹之間的大山，四週和鄞縣、奉化、慈谿、餘姚

、新昌、嵊縣、上虞等七縣交界，面積有三百方里之廣，內部包括人口二十餘萬，村落七百多個，山內古木長茅一似原始森林。此山利於防守，所以共產黨在裏面可以自給自足，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即使飛機大炮，對於這個地區，也無用武之地。裏面有朱之光、陳布衣所率領的四明山工作委員會，並有武力二百餘人。五月中旬有南雁龍黃彬部三百餘人渡河入山，再加上由蘇北分乘大船二十餘艘，渡海過舟山羣島，越過長江，深入餘姚登陸進山的有一千餘人，並有輕重機槍八十挺，步槍齊全，其他如無線電通訊器材亦均配備。並且在餘姚晚雲鄉設立後方醫院，治療傷病的兵民。至於在姚西、姚北、姚南的其他的部隊，亦均分散在姚南的南嵐、左溪、鳳亭、前溪湖、岩頭、黃石坑、溜水潭、張家村一帶。姚北有澤浦、小雙牛、小大楊山、李家山、李紅村、山腰村、臨山、馬渚、開行、坎度、謝家塘等地。姚西計

有芝蘭塘鄉、羅家路、前溪鄉、四海在慈谿、鎮一帶。同時在慈谿、上虞、新昌一帶亦有共黨份子公開或秘密的活動。

共黨的工作以商店爲名，實則是一個機關。如周行八字橋的一新公司，就是一個例子。在四明山一帶，對於鄉公所保甲長辦公處以及稅收機關等，均爲清算鬥爭的對象。每到一鄉，就先把鄉公所的壯丁名冊和征糧借糧的冊據，當衆焚燬，一面宣傳說是抗糧、抗稅、抗征；同時把鄉長或保甲長或重要當地士紳綁去，如若平時對老百姓苛征酷迫的話，就處死刑，槍決；否則就要限期在五天內拿×億元贖回。在這一帶的鄉鎮長，有的就兩面化。比如餘姚龍南鄉鄉長葉輝幹時竹節曾與共軍某女團長陳祥居，互通共雙方消息，便是一個實例。

四明山因爲聲名太大了，所以在六月十五日據各大報記載：「蘇北共匪大舉渡海南來」所以竟動員海軍兩艘兵艦，信陽和海豐號，在

東海海面弋游。又動員空軍 P-51 一架由某空軍少校駕駛，竟日在浙海一帶偵查。又動員陸軍浙保及各有關縣的自衛大隊等，晝夜提防，結果就是中了共黨的計。原來在上海有某一個通訊社，利用機會，發一消息，於是動員海陸空大小三軍徒勞一舉。這個玩笑可鬧得大大不小，居然中央多注意這個問題。

浙東第二個大山是會稽山脈。會稽山脈正在浙路中間，曹娥江以西的中間地帶，它有紹興、嵊縣、蕭山、諸暨、東陽、義烏等縣爲其四週的疆界。在四明山共軍正立定脚跟，以後就有最近的分向會稽山進佔的企圖。

台稽山裏的共軍組織，有浙東人民解放軍下分三大隊，以第二大隊的王新荷，第二大隊的蔣明德，第八大隊的蔣忠爲主幹。下面又分爲——

(一) 金義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有輕機槍七挺，短槍二十，步槍三十，人數一百餘名。

(二) 金水武邊區的會稽山區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第一大隊。由蔣明德率領，約有一百餘人，有輕機槍四，快慢槍七，駁克十，步槍五十。

(三) 會稽山區的人民抗暴游擊司令部人民抗暴游擊隊路東縣長蔣明德率領，有共軍一百餘名，計有輕機槍九挺，短槍二十，步槍三十。

(四) 在浦甯邊境有王新荷的部隊約八十餘，計有輕機槍二，短槍四，步槍十。

(五) 金玉現部有二十餘人，計輕機槍一挺，短槍四，步槍八。

(六) 在諸暨一帶還有路西縣政府在泌湖鄉四斗門大宣佈住山一帶活動。

會稽山區的共軍在軍政均發展之下，在富春江一帶的各縣如桐廬、浦江、建德、以及各路四路一帶的各縣，直接間接，所受影響極大，對於如四月裏把武義的省委機關國民黨武義書記何如玉的槍殺，以及對鄉鎮長黨部委員，縣參的無形威脅，實在極大。所以有的

人便由鄉遷鎮，由鎮遷城，由城遷省，在省的則預備遷申遷港。

浙東除四明會稽二山以外，以浙東人民游擊隊防大隊爲海上最大的一支力量。這支海防大隊是屬於蘇浙人民解放軍東海游擊隊的。東海是以江蘇的蘇南沿海與浙東的鄞縣、定海、舟山羣島一帶爲其範圍。在這邊隊裏有：徐小玉的一股約一百餘人，海上原來的海盜有三百餘人，兩樣的水陸部隊五百餘人。一共有一千左右。

而浙省邊海區司令部是浙境內共軍海上部隊的總部，以盧仁義化名爲周逸的爲司令。最近公佈作戰十大計劃，指令所屬，一體運行。

這十大計劃係由海防指揮官張大鵬轉飭各部隊的。

(一) 沿海部隊，自供自收。

(二) 沿海一帶設卡收稅。

(三) 重編漁船護洋旗照，調整漁業稅。

(四) 漁民檢核糧收。

(五) 商民運輸貨物，必先得海防部隊許可，否則沒收。

(六) 聯絡鄉鎮保甲自治人員，以爲利用。

(七) 重要地區，設立連絡站。

(八) 加強指撥連絡。

(九) 加強情報工作，調整情報人員。

員。(九) 組織漁民。(十) 改組鹽民工會，調整鹽稅。所以在浙江沿海的寧台溫洋面的問題，實較四明山會稽山等尤爲嚴重，但是海軍及外海水警，還在不知不覺中過其做官的生活。

浙南

浙南區的共軍有甌北的周丕振在永嘉仙黃一帶，共有二百餘人。有樂玉的鄭梅馨，有一百二十餘人。甌南有葉青景平瑞的陳大甫與徐彪，有五六百人。活動區域是青田的竹山鄉山口一帶。平場的北港曉坑有二座極好的砲壘，一名曉光，一名安民，均爲三層樓，磚瓦水泥所築，但竟被共軍攻克燒去，所以平陽縣政府竟聞訊後把縣城門緊關，以防攻城。這屬的各縣與處屬各縣，爲了與浙閩交界，所以各縣政府特別加倍仔細，又爲了共軍日夜出動居兵運送大隊，都去縣委書記長，省方的縣政視察團團長陳煥慶幾乎亦是受被綁，由此可見問題的嚴重。所以縣政府有的把後門亦堵塞了，免得共軍從後面來偷襲，但是縣長們却忘記了，假如共軍從前門進(下接第十三頁)

「惠」一「馮」一「蘭」一「侘」一「儻」等等以外，一些看不出與北方的語文法有什麼不同，這即因楚國文學早已被雅言同化了的緣故。楚國的左史倍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而孟子講到齊楚語言的不同，只說楚國人要學齊語，却不說齊國人要學楚語，此中消息，正可看出楚國文學同化於北方雅言的跡象。以最可代表方言文學的楚辭來說，猶且如此，何況其他，所以李調元與風所輯的楚歌，也除了採用少數土語語詞以外，假使儘從文辭上觀察，也幾乎看不出與雅言文學有什麼不同之處。

這種雅言化的方言文學所發生的影響，雖可以「一衣被詞人一，一才高者竟其詞裁，中巧者繼其辭辭，吟諷者銜其山川，豪蒙者拾其香草」，如文心雕龍辯騷篇所言，然而我們須得認清，這是駢文盛行時代劉勰所說的話。假使處在現代而加以批判，則這些雅言化的方言文學正暴露了他的弱點。我們可以歷舉他在此後各種文體中所生的影響。

在駢文流行的時代，妃青儷白，固然需要獵取駢詞，然而正因如此，不僅保存了許多不需要的已經死去的古語，也且保存了許多不需要的已經死去的古方言。由詞彙音，固然豐富了，然而堆砌塗澤的作品，既喪失了文學的價值，又使文學遠離了大眾。為什麼？要使大眾記取這許多不經見的詞彙已經不容易，何況記取以後還要能夠運用，必如曾國藩所說：「欲以戴段錢王之訓誥，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然後才為理想的標準呢？在現時時代，欲使文學家而兼小學者，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

在古文流行的時代，固然不需要獵取駢詞，然而為求行文之古色古香，對於一些不經見的比較怪僻的古方言，依舊也有被採用的價值。唐代如樊紹述，宋代如宋祁，明代如許多復古派，清代如胡天游，大都用此手法。即章太炎也不免有此習氣，不過以其通訓詁，用得比較愜當妥貼而已。他們對於古方言既這樣保存，那就對於今方言不免要歧視，因為這是引車賣漿之流所說的話。所以宋以後的正統文人對於方言的運用就另創了兩種手法。一是如江西詩人之所謂「化俗為雅」。釋惠洪冷齋夜話謂：「一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言為妙，如奇男子行人羣中自然有顯脫不可干之韻」。這樣的運用方言，其作用等於真量獨造，實在已軼出了方言文學的範圍。另一種則以遊戲態度出之，山谷詞之運用方言俚語即是如此，因為他作詞就沒有作詩這樣的嚴肅。後人所作的地方竹枝詞，也往往雜用方言以增風趣。如徐振之彬陽竹枝詞：「小槽醇酒不論錢，夜合春前一醉眠。聽去傳言呼阿憲，耶來隨意認同年

一。四繪軒詩鈔自注：「白酒曰醇酒，馳音祖，惠音宰，稱母曰馳，呼兒曰惠，男婦以同年稱則往還若兄妹」。如楊光輔之泌南樂府：「泌南好，海族珍珍羞。釜底添薪添鑊蓋，刀邊拍響吃頭頭，郎國未全收」。自注：「赤魚名鑊蓋，鱗魚曰頭頭，取形似也」。我們讀了這些作品以後就只覺其輕靈纖巧，絕對不會感到態度的嚴肅。為了這種遊戲態度的關係，所以即使到了語體成立的時候，在普通話的戲曲中間，有時再雜以方言，也只是為了發噱使人有輕鬆之感。所以明人的傳奇雜劇中，凡是說蘇州白的，或說杭州白的，往往都是五角的口吻。在口語文學中間而方言却成為五角的談吐，則方言文學之不被人重視又可知。

因此，我們可以說以往的文學路線，始終是「雅」的成份勝於「真」的成份。方言文學始終沒有被人重視過，始終沒有佔到文學史上重要的一頁。

現在假使要轉變這條舊的路線，使真的成分勝於雅的成分，那就非改其道而行之，提倡方言文學不可。方言中間，尤其是吳語粵語，都佔有比較廣大的區域，更應當使這些地方的人，把他們牙牙學語後和小兄弟小朋友們搶奪泥人竹馬的話，毫無縫毫隔膜地充分顯示他們的性情面目。到此地步，方言文學就成為嚴肅的正經的方言文學，再不是雅言化了的方言文學！更不是遊戲態度的方言文學。

近來讀到魏源先生的詩經新釋，更覺得方言文學確有牠的前途。現在隨便舉幾首詩為例：

齊風 盧令三章
 琳琳琳狗來哉，
 張家阿哥轉來哉，
 阿哥生得好身材，
 心脾軟得像米飯。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令令，其人美且譽。
 盧令令，其人美且偲。

琳琳琳狗來哉，
 張家阿哥轉來哉，
 阿哥生得好身材，
 頭髮曲得像柴草。

琳琳琳狗來哉，
 張家阿哥轉來哉，
 阿哥生得好身材，
 鬍子濃得像煤炭。

阿毛黑臉
 抗戰結束又要內戰，
 陸真一日哩好回轉？
 雞曉得進棚，
 太陽曉得落山，
 牛羊曉得歸欄，
 阿毛黑臉為啥還弗轉來？
 奎記啊我！
 抗戰結束又要內戰
 陸真一日哩好回轉！
 雞曉得進棚，
 太陽曉得落山，
 牛羊曉得歸欄，
 阿毛黑臉為啥還弗轉來？
 奎記啊我！

王風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雞棲於塢，日之夕兮，牛羊下來。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子！
 雞棲於桀！日之夕兮，牛羊下括。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但望啊！
 但望多喫白飯，
 少碰着砲彈！

這兩首：一首照着原來的情調，一首又按着現時的事實。這樣翻譯，正可看出方言文學可以媲美以前的雅言文學，同時更可以看出方言文學是針對着現實寫作的最便利最適當的工具。尤其明顯的，作者所譯的幽風七月一詩，內容完全是以前的內容，意識却完全不是以前的意識，可以當作翻譯詩，也可以當作創作詩，真可以說做到真而且雅的地步。

假使要在這些作品中再加以挑剔的話，那麼就是漢字的作樂了。如張家阿哥一詩心脾軟之一軟與阿毛黑臉一詩中日脚之「日」，「軟」「日」二音，吳語與國語都有分別，但在這些地方却沒法表示特別的音韻。所以最理想的方言文學，再應當與拼音文字相配合，然後聲音語與文字語纔可以絕對地相符。

到那時候，中國文學史將創成新的一頁，不復再走舊的路線了。

提高稿費

本刊稿費自十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三元至六元。此啓。

(第十九次調整)

書評

評李廣田創作

李長之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版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定價國幣二十八元 二四〇頁

引力！引力！人們上昇的努力是需要引力的，在中國近代史上，已經有過好幾個發生引力的地帶了。到廣東去！到重慶去！到一個更多希望與更多進步的地方去！這幾乎成了每一個中國現代青年在心上所燃燒着的三部曲。本書所寫，就是三部曲中的後二部。

因此，單以主題論，作者是抓住了了一個歷史意義的主題的。在行動決定以前，不，也是在認識上明朗以前，是有不少的猶豫、脆弱、以及糾纏不清的陰靈似的紛擾的，作者所寫的大部分，也就是劍重在這一個段落的心情。作者在後記裏說，海水灌溉了他的思想。這是不錯的。但我們更加上一句，這是一種健康的灌溉，而我們讀者也因此受到餘惠。

全書的主要故事是寫一個女人黃夢華，在淪陷時代服務於濟南的一個敵偽學校，受盡了折磨和猜疑，由猶疑而變為堅強，終於勇敢地到了後方成都，為的是去找她的丈夫雷孟堅。可是為她到了時，才發覺「原來是從昏天黑地的淪陷區走到這昏天黑地的大後方來了」（頁二三六），而她所要尋找的丈夫，却因為受了迫害，就在她到的前一天，走了，為的是一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到一個更多希望與更多進步的地方（頁二二一）。這便是那個故事的梗概。假若只是這樣，這部創作也許落入了幼稚的標榜口號或者所謂公式化，然而不然，因為作者所強調的乃是黃夢華這個人整個改變了。她沒找到雷孟堅，論說是可以悲哀或失望的，可是她沒有。她徹底認識了孟堅在信上告訴

她的一這一次長期的旅程（指孟堅之由邯鄲至成都），對我益處太多了，我見了許多未曾見過的現象，也懂得了許多未曾懂得的道理。我懂得了走路時道理，也認識了生活的道理，也認識了人類生活的道理。她同樣堅強起來了，她無寧已經獲得了一種支持並開拓人生道路的力量，一種可以使自己不斷前進的資本，她再不憚跋涉，她再不怕險阻，她已經知道人生為什末要在險阻中不斷跋涉了。她重新懂得了一「人生如寄」，人生原來永遠在一個過程中，到必須起程的時候，那怕在一個暴風雨的早晨，或者黑暗的夜晚，也沒有絲毫顧慮。她在從前總不肯忘掉過去，總留戀家，但現在她知道家是讓人長期休息，而不往前進的一個所在而已。總之，「她彷彿一下子都看得明明白白了」（頁二三七）！這裏有種健康的啓示，正是海水所灌溉着作者，而作者又灌溉着我們的。

可是主題的選擇有時和藝術上的製作也許不能平衡。我們推許前者而惋惜後者。

可是就這道失敗，作者也會敏銳地覺察到。他在後記中一則說：「生活與體力既不容許痛痛快快地寫下去，而那些現成的材料更成了寫作的障礙」。結果，「不過是在事實的銜銜中滾滾滾去罷了」。二則說：「我的幻滅之感大半由於覺察自己的小說算不得「創作」，也不過是盡了一段歷史的側面，而且又只得一個簡單的輪廓，我幾乎相信我自己有一個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於勉強寫些短短的散文而已，這樣想時，就難免有一種無可如何的哀愁」。

當人們仔細吟味這些話時，大概誰都會感到作者的誠懇和坦率的。現成的材料，事實的銜銜，的確是一個致命傷。我是對作者過去的生活有着相當熟悉的一個人，當我讀着的時候，就不免對那太拘牽於事實的細節而驚訝着。不用說，書中主人公黃夢華和雷孟堅都實有其人，而且大致的輪廓，除了最後的孟堅在中學時代一次被捕所關係的一本書名「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也並非虛構，這不太被事實所限定了麼？

作者向來的文章，一如他的為人，是樸樸、誠實、不夾雜半點兒假的。他那思想上給朋友或一般青年人的感染是如此的，他那構成吸引人的散文風格的原故也在此。可是這種優點到了他寫小說時便成爲障礙，使他有點過不開步了。有人說寫劇本的人須要有些詭計，現在看來寫小說也不能太老實，廣田這回吃虧就是太老實了！從前德國有

一位大詩人的作歌歌：「一位男性的文藝家其後發現實，而重新去組織」，廣田這本創作就在於此。這本創作的一個步驟上。他發見其藝術，他到了有些搖不動的地步。由於這個原故，在他的材料中常常不能動，往往因一枝節而滲入另一小枝節，雖然這些小枝節獨立去寫時也許是好的短篇。例如關於米紹堂往日的故事，就是如此（頁一五五）。

(三)

也由於這個原故，他往往在不肯放棄對已往的事去找補子敘述時，而耽擱了對於當前的場面的描寫了。例如對於雷孟堅，就是介紹他已往的零碎印象居多，而寫他在當前的環境中的反應處少的。作者在這一面應該有所開和擺脫！

事實的拘牽，和枝節上的繁瑣，是讓這本有健康的思想所澄澈的書受了些委屈！此外，我們感到作者在這本書裏長於寫心情，而拙於編故事。最初的黃夢華和雷孟堅雖然是在兩個世界裏，一個在舊禮教下沉埋着，一個面向着新生的力量，這兩種對立的心情，作者便很能曲盡地傳達出來。自然，寫黃夢華的地方要多些，但那多着的一些心情的描寫也都好。在這地方，我們究竟感覺作者的性格是近於詩人了！

反之一，涉及故事上的，總感覺太簡單，而常常不直接。例如說到莊荷柳的結果是，「檢舉、搜查、逮捕、槍殺、一場風波乃得以結束」，這像雜感！又如說到乘汽車的麻煩，也不會寫出一個具體的場面，而有些像概括的論文。許多故事，他往往往一聽說一開頭，而下文極短，他不會直接去寫那個故事。自然，他沒親眼看過，他不會忠實地那樣說得天花亂墜，可是，講故事是要像親自看過一樣的呀！他不肯。這又是太老實了！

就全書論，黃夢華這得到的新啓示，以及這種變化的過程，這應該是全部的重心，却總令人覺得分量還少些似的。然而作者所自以爲的不滿，簡直像失了勇氣似地所謂「無可如何的哀愁」，我們雖同情這心情，但認爲絕對應該屏除這個念頭。至於這次的關鍵，往大處說，完全在事實的束縛上，這恐怕是一下筆就受了拘束的，假若用狠心把這些事實揉碎，便一定會很不同；往小處說，便是敘述可以再直接些，再具體些，再口語些，假若書中那些寫那踏了草履看風旗，學生在偷看紀念五四，李嫂口中講的老公公等段一樣，不就非常好了麼？

作者認爲人生是一個過程，這話對。既是過程，只要方向不錯，就只有前進，沒有灰心的。對創作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相信他的另一部創作在藝術上一定不同些！

廿七年九月十日，寫於北平

觀察

每份一角五分

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逢星期六出版

第六期



第五卷

觀察通信

逃亡

文藝

讀者美國進步黨大會旁聽記
打書 留學生匯率問題

汪銘

四川政局的暗潮
(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閻錫山的生死關頭
(西安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濟南之戰(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政策

Mark Gayn

激速轉舵下的美國對日

外論選譯

波蘭之行

葉君健

歐洲通信

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

楊人棟

論物價的局部管制

劉滌源

政治力量安能穩定物價

嚴仁賡

專論

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一九二號
電話：(02) 5521
北平發行所：右街李閣者
胡同二號
台北發行所：北館前街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三個月：掛號郵寄一元八角
掛號郵寄一元六角
航空掛號郵寄二元二角
平掛號郵寄一元八角
六個月：掛號郵寄三元二角
掛號郵寄三元
航空掛號郵寄四元二角
平掛號郵寄三元八角
一年：掛號郵寄五元八角
掛號郵寄五元
航空掛號郵寄七元二角
平掛號郵寄六元八角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元
封底：每行八角
全頁：每行一元五角
半頁：每行八角
通欄：每行五角
普通：每行四角
照例：每行五角
退稿：郵費在內
定戶：注意
地址：務請註明或更改
碼：務請註明或更改
閱者：務請註明或更改

讀者投書

進步黨大會旁聽記

陶維大

(編者按：陶女士此文寄到時，本期業已全部排好，無法改動，本文有時間性，祇得改在讀者投書欄內刊出。)

美國總統選舉的日子一天一天臨近了，各黨總統候選人都在紛紛忙於競選運動，旅行各州演講。新成立的進步黨候選人華萊士於九月初曾深入南方各州。這區域是種族歧視最甚的地方，黑人除受到種種不平等待遇外，常受到三K黨的威脅，許多地方，私刑在戰時一度停頓，現在却又復活了。廢除種族歧視，黑白平等是進步黨對內政策與口號之一。這點大大激怒了南方人士，因此華萊士在南方幾個城市被羣衆用生雞蛋和蕃茄投擲，在有些城市，官方並禁止他演講，因為華萊士堅持黑人有權利與白人一起聽他演講，而這是違反當地禁止黑白混雜的法律的。無論如何，華萊士仍舊按照他的計劃完成此次旅行。他堅持不投宿不容納黑人的旅館，不到不招待黑人的餐館用飯。在此種情形下，使華萊士原來準備關於繁榮南方經濟的演講稿完全未用。但這個經驗使他更深刻的了解這封建與法西斯的習俗與法律是如何的須要及早剷除。

隨着這次艱辛困頓的旅行，進步黨在紐約召集了一次大會。會期原定九月九日，因雨延至十日。十日仍是竟日陰雨，到晚上七時餘才告停止。會場在紐約最大的球場 Yankee Stadium，大會於晚上八時開幕，六時左右會場附近的公共汽車站及地鐵車站都已佈滿警察。七時餘人們開始絡

繙不絕的到來。是晚到會的有四萬八千人。據說此次門票收入打破美國歷來政治集會的紀錄，約計七萬八千元。

到會的人士大部份是青年，奇怪的是黑人到會的並不很多。開會後最初幾個節目是歌唱，多半是黑人歌曲。最精彩的有著名黑人歌唱家 Paul Robeson 所唱 'Ol' Man River' 一曲，獲得全場熱烈彩聲。

接着是三一聖堂牧師 John Howard Meish 致詞。此後就有勞工黨 (A.L.P. American Labor Party) 按美勞工黨為擁護華萊士者) 國會代表及代表候選人數人演講。如 Vito Marcantonio, 勞工黨國會代表，大專攻擊紐約市長 William O'Dwyer (按 O'Dwyer 曾反對對杜魯門為民主黨候選人，後見勢不妙，乃又贊成杜魯門，而勸華萊士退出競選，以便有利於民主黨之當選。) 稱他為假自由主義者。Leo Isaacson, 新任勞工黨國會代表，則對杜魯門反覆不定的以色列政策加以攻擊。這兩位代表活潑生動的演說都博得掌聲不少。每逢提到杜魯門, O'Dwyer, 非美活動委員會等時，觀衆都報以噓聲。

華萊士出場之前開始向大家捐款。競選運動一向須要大批經費。民主與共和兩黨都很富裕。進步黨則全靠捐款及華萊士演講售票所得。這一晚成績非常良好，有十萬元之多。情況熱烈，使人感動。使人驚訝的是在場維持秩序的五百名警士也捐款相助。大家都對華萊士表示感謝。有人開玩笑說，此五人也許明日要被市長開除了。(按最近紐約市長曾下令市政府解僱許多勞工黨黨員。)

十一時二十九分華萊士步入場中，聽衆不約而同起立，掌聲連續不能停止，紙花紛飛。直到 Vito Marcantonio 警告大家如開會超過午夜十二時，須付會場過時費，掌聲才安靜下來。是晚華萊士的演講並不如其他幾人激烈。他聲調平靜，沉着。主要敘述他的南方旅行，及所遭受的法西斯滋味。他認為

北方有些大資本家大地主，大礦主等在南方握有大企業的實質操縱對黑人仇視的責任。他特別指出在有些區域，和平的集會也會順利的舉行。假若人們尊重憲法，尊重基督教義，種族歧視一定可以消滅，進步的南方人士一定可以勝利，此外他申述爭取和平是當前要務。我們須要和平使者而不須要戰爭製造者。最後他說進步黨絕不會像民主黨一樣的欺騙人民，開空頭支票，出賣自己。無論進步黨被加以紅帽子或黑帽子，都不能使他加入共和黨與民主黨的賭博。

此次大會給人的印象是擁護華萊士的人們對他有絕對的熱誠與信仰。全會場氣氛熱烈而嚴肅，每個演講者都能抓住觀衆，使四萬八千人屏息靜聽。據云這是政治集會的空前盛況，民主與共和兩黨從無此種表現。

本年度的選舉華萊士不見得有多少希望。第一，進步黨係新組成的，第二他的敵對者攻擊他為共產黨，使許多人躊躇不前。第三民主，共和兩黨政治力量雄厚，他們用各種方法阻撓進步黨。第四現在距大選只有兩個月，而在全美四十四州內只有十七州承認華萊士為候選人之一。但有一推測可以相信的是他所得選票將較現在各方估計為多。進步黨的方針與口號代表正義，和平與理想。當前美國國策對內外都捉摸不定，物價日漸高漲，政治日趨反動，戰爭的陰影時時給人威脅。假若下屆總統不能改變國策時，則將驅使更多的人投入進步黨。

留學生匯率的問題

編者先生：上期貴刊所登台灣讀者投書，內中說的幣制改革後的留學生匯率改變問題，這件事不是一兩個人的事，而關係着一千多個留學生的前途學業、政府的威信、和國際方面的交匯。

分析中國「留學外國」學生，約有四種：(一)公費生，(二)第一屆自費生，(三)第二屆自費生，(四)自備外匯

生包括獎學金生。其中公費生，政府照舊維持。第一屆自費生，在孔祥熙部長任內，已一次結匯五千生，均不成問題。自備外匯和獎學金生，由各人自行設法。成問題者，就是二屆自費生。

二屆自費生，是於三十五年十一月經教育部考試及格。是時匯率為二、〇二〇元，後又改為三、三五〇元。但是辦理出國手續，轉帳時，多數在匯率改為一、二〇〇元，纔結匯成行。這樣已超過原來預算約二、〇〇〇元以後，外匯跳動，格外厲害。一般學生如何能結得起！三十七年五月底，政府實施外匯證明書辦法，將留學生匯率，穩定為四十七萬四千元，叫做平衡基金委員會牌價。將留學生匯率，和進出口商品匯率分開，實含有獎勵留學的意思。政府德意，留學生非常感戴！留學生歷經種種困難，尤其是外匯波動，學費籌措，最為困難。一八一九一幣制改革，新匯率四圓合美金一元，較幣價增加百分之二千四百倍以上，增加之巨，為從來所未有！留學生之遭遇，極為嚴重！

二屆自費生，最早出國者，不過一年，最遲者尚未抵達彼岸。(九月廿二日一批)根據政府命令，倘無力繼續學業，本年底就要回國。且逾期不學，就這硬性規定了。並且逾期不學，政府不再予以旅費補助，難道忍令莘莘學子，流落異邦，宛如擊釘苦兒，彷徨無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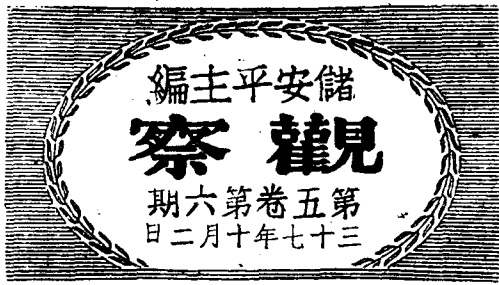
還有一部份學生，已經在八月十九日以前，接到中央銀行核准通知書，但未有去辦理結匯，該行竟推諉原案，一律按照新匯率辦理。以少數匯款，輕輕把政府威信，置之不顧，未免太不值得！最近蔣總統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中致訓辭，其中所提到的：提高學術水準，提倡科學合作，溝通各國學術，建設科學中國等等，無一不與留學政策相合，培養獎掖唯恐不暇，何能一旦摧殘，前功盡棄！

希望政府有個補救辦法，不要考慮於先，撤回於後，互相矛盾，留學生幸甚！ 汪家厚 九月廿六日 南京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嚴仁熾：浙江大學教授
 劉濤源：武漢大學教授
 楊人楨：北京大學教授
 葉君健：作家
 汪銘：

政治力量安能穩定物價！

嚴仁熾

這次幣制改革，最初政府標榜是以「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為目的。（見王雲五氏談話）。舊的幣制，早已喪失「穩定物價」與「安定民生」的功用能力，所以此次政府毅然改革，很顯然，「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為其必須奮力以赴而又為必須達到的目標。然而僅僅目標正確猶嫌不足，所採的手段方法尤實相當，方不至一切落空。否則產生的效果可等於零，甚至成為負數。不幸一月來政府所作所為，處處正表示方法錯誤與步伐凌亂，眼見不堪設想的結局隨時地可以演成事實。吾人焉得而不憂！

戰時的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治理下，管制物價頗收一些成效。但等戰爭停止，凍結物價的法令取消，物價乃作無止境的上騰。本來，美國聯邦政府的收支，不僅戰時，就在備戰時期以及備戰以前的若干年度，一直是超支的，然而這時期，物價却維持着相當程度的穩定。不料最近的兩年，雖然聯邦收支出現餘額，偏偏物價却發生巨大的波動。這現象很特殊，費人索解。粗心的觀察家見於這種特殊現象，曾經誤認為這不過是限價存在或撤消的原故，證明政治權威能使物價就範，一紙文令也可以充分發揮管制物價的效能。其實大謬不然。戰後物價漲，是因爲補貼政策，原料管制政策，以及定量分配制度的全盤取消，與所得稅率的降低免額的提商。一紙取消限價的文令焉能產生巨大的力量。單獨廢除限價，既不可即刻促使物價上昇；反之，單獨凍結物價，也不能有保持物價穩定的絕對力量。管制物價必須利用政治以外的方法先消除物價上漲的根因，然後再輔之以政治的力量，如是管制物價才可以收到確效。如果僅僅憑政治力量而在其他方策上面設法，縱有些許效果，這效果也只能是一時的。必欲執行，不是造成黑市，便是造成無市。此種成例數見不鮮，以前重慶的肉類限價就有過這樣的經驗。

先進國家戰時實施限價或頂價（price ceiling），無有不與控制人民購買力的其他方法一同實施的，蓋政治力量的實效究難持久。即令如此，黑市尚不易完全絕跡。例如美國在戰時有一度肉類、砂糖、咖啡、香烟都不容易買到，也都有黑市。英國雖多數消費物品仰仗國外進口，政府使於控制來源，戰時物價管制得比美國好，不過聽人說黑市還是沒有絕對的消滅。誠因政治力量，終難勝過多方面而來的經濟壓力。警察只是懂得如何維持社會秩序，會抓小偷會捉賭鬼，但是他卻沒有法子抹殺一切的經濟法則。舉世之間，連所謂「警察國家」管理物價，尚未敢純然依賴政治力量，經濟的方法與手段仍是重要的，何況組織散漫貪污腐敗相沿成風的國家。管制物價單靠政治力量，完全不足為恃。

二

戰時如何方能有效的管制物價？請以美國的方法為例。美國在參戰之前的一九三九年，國內物價已因備戰而開始上漲。至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她設立「物價物資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方才開始管制物價。一九四一年參戰以後，於次年一月三十日頒佈「物價管制法案」（Price Control Act），當年十月二日又成立「經濟穩定法案」（Stabilization Act）。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乃又凍結一切物價。自開始管制時起，先後頒佈幾項法案，逐次充實改善直至制度漸臻完善之後才實行最後一項凍結物價的辦法。全部制度可說是多方面顧到了的。所以，自備戰開始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國內物價雖見增漲，但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實行釘住物價的政策以後，物價即異常平穩；只有到戰爭停止前後，物價才開始蠕動。而共和黨全面擊毀物價管制後，物價乃直線上昇。

美國實施凍結物價政策有所謂「扯線命令」(Hold the Line Order)的一項辦法。表面看來：它好像就是我們這「緊急處分令」裏面那個全面凍結物價的辦法。其實內容和含義全然不同。最不同之點，是人家除去實施頂價之外，同時又有金融的財政的和經濟的其他手段，付之實施，以封閉和吸收人民手中多餘的購買力，保障凍結物價確實生效。她將生產原料的價格予以管制，如是生產成本易於計算控制，從根上摘除物價上漲的根源；她又將原料的分配改採優先制 (Priority system)，防止廠商競購物資，刺激物價；她又將售價不敷成本的貨品 (尤其關係民生的必須品) 予以津貼，務令物價站定；她並會提高所得稅稅率，推銷勝利公債勝利印花，去吸收另一部分的購買力。一面並實施限額配製制 (Rationing)，防止對於製成品的搶購，保障貨物的長期供應；一面又獎勵儲蓄和獎勵節約。檢查和告密只不過是輔助的工具，並不是統制物價中的重要手段。在這一個完密制度下，雖然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國民所得已有一倍以上的增加，物價却只有比較輕微的波動，這完全是各種辦法相互配合之功。聯邦政府的稅收，從年五十五億元逐漸增為年三百五十八億元；私人儲蓄總額，自一百四十一億元增為五百二十七億元。僅此兩項成就，已為統制物價幫忙不小。除此，她在生產方面同期間也曾增加百分之五十二，雖然一部分是軍事生產，但是消費品的產量却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增加，尤為可貴。開始釘價之後物價能夠維持相當長時期的平穩者，是各種政策配合的結果，絕不是憑空仗着政府的一紙文令就能收到這樣的結果的。

試看改革幣制後我政府採用的辦法為如何？軍事支出並未因改革幣制而停止創造新的貨幣。這新創的貨幣，政府也並未設法去收拾它，反而另一方面強迫着人民再把收藏的金銀外幣通通兌換新貨幣，一路擁入市場。因此短短一月間，貨幣實際增加的數量至少已有八億金圓之多。(根據中央社的一項不完全的統計，自八月二十三日起開始收兌金銀外幣至九月十八日止，因收兌金銀外幣的新增發行，已達五億六千萬金圓。如此，則截至九月二十三日止的一個整月，全部數額無疑已超過六億元。過去一個月的財政赤字，據估計至少亦已有二億金圓。)連流通的舊法幣折合金圓統計起來，今日全部市面流通的貨幣，最起碼也已合到十億金圓了。在這短短一月期間，貨幣的流通數量增加了四倍，發行量已達到法定最高發行額的半數，寧不可驚！對於物價，這將是如何大的威脅！本年的七八月，法幣增發率每月尚不過百分之五十以內，至多不足一倍，業已釀成市場上的巨大波瀾；如今一個月內貨幣即增加四倍之多，然而物價却只有溫和的上漲，不能說不是金圓權於政治的威力不敢輕舉妄動之故。不過貨幣已存在於民間，一旦政治力量鬆弛，鬥爭不過經濟的力量，它是就要衝入市場的。到那時，如果沒有其他控制購買力的辦法在實施，一月之內物價上漲十倍八倍是不難想像的事。

政府對於這個新的危機，事前事後都像沒有什麼準備。在新制度下，我們還沒有實施限額配製制，我們又沒有實行分配原料，我們更沒有辦法統制一切貨物的來源。控制生產成本沒有實施，獎勵儲蓄鼓勵生產也沒有有效的方法；公債雖欲發行，不比對外戰爭時期之易於激動人民的熱情；在全國節約聲中，京滬達官富賈一次觀潮所消耗的汽油足夠一個大學一個月的全部開支，還談甚麼節約！政府採用一切應付物價的方法和手段，不惟不是管制物價應採取的正當方案，反而多數違背着管制物價所應採取的正當方案。舉個例子：別的國家，戰時為維持貨物的長期供應一定要嚴格的限制人民購買貨物的數量，惟恐保不穩貨物的存底。我們如何？我們不僅對消費者購買的數量不加限制，且進一步的檢查倉庫，沒收貨物，惟恐商人不把貨物全部拋出。它只圖一時的快意，只顧一時的效果，只為博取人們的齊聲喝采，不望遠慮，貨物出清以後，如何供應市面完全不管。商品售價只知一味的抑壓，成本則不問不問，這種不合理的物價管制，摧殘生產則有餘，豈尚能鼓勵生產？政府祇憑藉政治力量，沒有一點經濟上可以控制物價的辦法和把握，而欲強使物價穩然不動，如何能够？

新幣制不幸失敗，絕不是人民不守法，更不是人民不信任政府和它所發行的新幣，其罪在政府之無知無能，強欲以政治的力量抹殺一切的經濟法則。自始，我就會反對在這個當口上強迫收兌金銀外幣。誰知道到如今，尚有人沾沾自喜，慶賀收兌金銀外幣之意外成功，却不知來日大難已經臨頭！

論物價的局部管制

劉滌源

一. 引言

幣制改革，政府將一切物價凍結於本年八月十九日的水準，不准上漲。此一物價硬性規定，在地域方面言，是包括全國城鄉各地的；在物品種類言，是包括全國所有各種物品的。所以，此一規定之原意，至少在字面上是屬於全面的物價統制。但是，在執行此一硬性規定時，不論從地域方面、或物品種類方

面看，此次物價管制仍屬於局部的，而非全面的。此項物價統制實行以來，為時現僅月餘，但已發現許多破綻。時日愈長，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變化愈多，究竟此一硬性凍結辦法能否貫徹到底，恐怕沒有多少人士可以預作肯定的答案。

物價問題在我國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凍結物價於某種水準而不許上漲的法令，這辦法在我國過去也曾公布過。民國三十一年下半年，大公報曾發表

述「海價休戰」的文章，後政府曾採行限價政策。此項命令公布時，當時正是戰時首都最嚴重的新聞；最高的當局發表各種文告，措辭非常嚴厲，大有一只能成功，不許失敗之勢；並將各種物品之限價表印出公告，以期週知。但是，法金雖在字面上雷厲風行，而並無切實可行的執行辦法。結果，滿街都是犯法人，商人最初尚陽奉陰違，價格上漲在偷偷摸摸中出現，及後則商人公開漲價，限價法令成爲具文。這結果，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方面缺憾重重的綜合結果。那次失敗的教訓，實值得全國朝野人士深加反省。

這次物價管制，在原則上與前次相同，均爲「限價」與「凍結物價」。但在執行方面，在某些區域中則比前次認真。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前次物價管制中，沒有經濟檢查隊的檢查囤積，沒有因漲價及黑市交易而捕過違法商人，更沒有因破壞限價政策而殺過人。儘管當時重慶大報屢次呼籲「借人頭，平物價」，但當局仍是顧慮多端，沒有採取任何積極而有效的行動。這次不同了。在平津京滬漢等大城市均有經檢人員大批出動執行限價政策中的各項規定。在上海尤其雷厲風行，上海經濟督察專員蔣經國氏採取大刀闊斧的手段，一改過去許多經濟管制人員「怕老虎、捉蒼蠅」的作風，對上海違法的工商巨子，與小民一視同仁的嚴加懲處。這種將權勢與小民同等看待的新作風，確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在施政的基本精神上，是值得稱許的事。

但是，這種事實上的局部物價管制，究竟能否如蔣經國氏自己所認定的那樣有成功把握呢？本文擬就這月餘來國內各地物價動態作一綜合分析，對今後物價管制之前途，作一預測性的觀察。

二、局部物價管制之含義

上文指出我國當前的物價管制，雖然在法令的字義上是全面統制，但事實上則仍爲局部管制。這裏所謂物價管制的「局部」性，含義是多方面的，茲分述之。

第一，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情形極不一致。以中央政府對各地政令所能貫徹的程度而論，其差異尤其懸殊。一般的說，物價管制以鄉村中困難爲最多，小城市困難較少，大城市則人口最集中，警察與保甲組織最嚴密，物品產備等最集中，故技術上的困難最少。其次，我國各地不論鄉鎮或城市，均有特殊的權勢力量存在，他們以自己的利益爲前提，對他們不利的政令，每設法加以破壞。物價管制自然與豪門地主的利益相衝突。所以，欲求物價管制不被這些豪富所破壞，即非對他們嚴厲的加以打擊不可。但政府對各地特殊力量所能打擊的力量，却有大小之不同。以這次物價管制命令所能貫徹的程度，以上海爲最佳，小城市次之，鄉村則幾乎完全沒有強制力；以大城市而論，上海執行物價管制最認真，平津武漢等次之，成都昆明長沙貴陽等又次之，至於其他邊遠都會則屬照例奉行公事而已。國民經濟是整個的。我國絕大部分的人民及市場

，在鄉村而不在城市。遼闊的鄉村及市場在事實上全不爲物價管制的約束，此有許多較大都市的物價管制也差不多等於具文，僅極少數的大城市對物價管制能比較的確與執行。這樣，即使這極少數的物價果被平抑了，對整個全國的物價水準仍無補益。所以，在事實上，物價管制僅屬少數大城市的專事。在地域方面言，我國此次物價管制是一種局部的管制，而非全面的管制。

第二，農產品來自鄉村，工業製造品主要產於城市。以上海爲例，上海的紡織業相當發達，但主要原料的棉花則來自海外，或來自各地的農村。其他許多製造業莫不如此。物價管制既然只能在城市——尤其是幾個大城市生效，則對於來自鄉村的原料勢將無法使其物價不超過限價。原料超過限價，而製造品不許超過限價，則製造商勢必虧本，結果即會引起生產之緊縮與減少。所以，這次物價管制，在事實上，只是管制大城市中生產的製造品之價格，對於來自鄉村及較小城市的物品，則無法管制其價格。這樣，原料及其他農產品價格上漲，如大城市中物價管制能絕對的收效，則農村產品勢將不入城市，而使大城市的物價管制政策有適毀根本破壞之虞。吾人可以說：這次的物價管制是一種大城市製造品價格之管制，其事實上的效力無法及於農村及小城市產物的價格。也可以說：只是對於大城市製造物價格加以凍結，而對於其所包含之各種成本，如原料等等，無法加以管制；換言之，即只能管制一部分製造品的價格，而不能管制其生產成本。

第三，即使在效率較高的大城市中，物價管制也只限於物價管制之本身，對於消費者的購買量全未加以任何限制，同時對於消費者的剩餘購買力亦未妥籌出路，使其不致大量在市場上抓購物資。上次大戰中，英美各國的物價管制甚爲成功，但所以能如此成功者，主要的在於嚴格的計口配給制度 (Ration system) 以限制每一人民對於物資的購買量，及政府戰時公債 (war bonds) 以吸收人民的剩餘力。惟有這兩種辦法能作嚴格而適當的配合，才可使物價管制有成功的希望。這次政府所定的辦法，只管制物價本身，而對於物價管制的基礎工夫，不能有所推行。要求物價管制有效，應該是採行各方面兼籌並顧的整套方案。今黃埔採物價管制的治標辦法，對於治本辦法則無法實施，實難保證物價管制之必能成功。所以，這次的物價管制並非全盤計劃，而只是注意到物價問題的表面部分。

第四，這次幣制改革時，所定銀元、黃金與美元對金圓的兌換率是全國一律的。當時此種比率與上海、南京等地的金銀外幣價格大致相合；但以各地市場的情形言，則實提高了黃金白銀及外幣的法幣價格。例如，改制前，上海等地的結匯證售美元市價，遠較此次兌換率爲低；武漢的美幣市價也較低，官定兌換率即提高了許多；成都重慶及其他內地市場之銀洋價格，均低於六百萬元法幣的水準，政府定爲六百萬元，則這些地方的銀洋立即上升。結果，凡從國外輸入之原料及製成品，因美元價格上升，成本增加；在銀元普遍盛行的內地城市，因銀元官價上升，物價自然隨着上漲。所以，因黃金、白銀及美元兌

換率之未能切合當時各地市場實際情況，事實上許多物品以金銀外幣官定價格去折合而改定新價格，即超過了「八一九」當日的市價。這樣，政府雖然在法令的文字上嚴格規定全國物價均須以「八一九」的法幣價格為最高限度，但事實上却經由金銀外幣官價上升，使某些物品之價格超過了「八一九」當日的法幣價格。所以，這次物價硬性凍結的規定，實只凍結物價之一部分，而未凍結所有物價之全部。

綜上述，吾人認定這次物價的硬性凍結辦法，不論從那一方面去觀察，都只是一種局部的物價管制，而非一種面面俱到的全盤管制。

三、局部物價管制中的各種破綻

物價水準的是否能穩定，為新幣制成功之關鍵。政府規定物價限度如此缺乏彈生，假若各地市價普遍的超過限度，則那時政府將陷於進退兩難之地步：硬生的堅持限價嗎？事實上限價已不發生效力，等於具文；放棄限價政策，改採讓價或其他辦法嗎？則無異自己承認物價管制政策之失敗，新幣制難免步舊法幣之後塵。所以，當這種硬性物價限價辦法公佈之初，許多人即為物價管制前途擔憂。現在，物價管制為時已月餘，這時期中的物價動態是：不遑限價的現象，全國各地均有發現；愈到內地，則管制愈脆弱，物價上漲之普遍性愈大。

在幣制改革以前，在直接受戰爭影響的區域內，以上海物價水準為最高；各地物價每以上海物價動態為基準。幣制改革以後，上海經濟管制工作辦得最有效率，上海經濟督察員蔣經國的鐵腕政策，對於上海違法工商巨頭加以嚴重打擊，使素來無法平抑的上海物價，獲得了相當的穩定。這一點，單以上海市區短期內的物價本身來說，實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在現行經濟制度下，物價是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樞紐。我們分析物價管制之得失時，絕不能單以上海一地為準，也不能以上海短期內的情形為準，更不能單以上海短期內的物價本身為準；而須將物價及與物價有關的其他因素，一併考慮，尤須將全國各地的物價動態，作全盤的觀察與檢討。

月餘以來，物價管制在各地出現了不少破綻。歸納起來，主要的可分為下列數項：

(1) 貨物逃避或隱蔽：貨物逃避是指物產從物價管制嚴格的區域，向管制不嚴格的區域逃避而言。貨物隱蔽是指將貨物加以隱匿，等待日後有機可乘時再行應市而言。貨物隱蔽的破綻，在管制比較有收的市場，差不多普遍出現，即上海也不能例外。上海的小菜荒，成都的糧荒、肉荒，青島的肉荒，武漢的肉荒和蛋荒等，天津的蛋荒和鹽荒，以及各地的香城荒，這些都是例子。內地各城市中，物價管制並不嚴格，貨物只作暫時的隱匿即够，用不着運往外地。在物價管制嚴格的市場，則貨物逃避者頗多。據漢口九月十五日大剛報載，上海在倉庫封存以後，每晚卡車來往，頓告熱鬧。有的說均係運往郊區，恍

如戰時之逃警報。弄堂馬路，物資堆積，漏夜打伴，爭先出運。這是物資逃避的一幅寫照。上海經濟管制督察員辦公處已公佈「上海區禁止物資運出境檢查辦法」，禁止民生必需物資運出，杜絕物資逃避。但是，上海附近城鎮及其他各地的製造業，其原料是部分的或全部的來自上海的半製品。今上海物資禁運出口，則對這些工業生產影響極大。九月廿四日上海大公報載，蘇州無錫等五縣染織廠所用棉紗原料，大部分來自上海，今上海物資禁運，則原料用完，已有半廠以上停工。這種區域禁運辦法，縱在上海行之完全有效，對全國物價水準及經濟生活的貢獻，也是極有限的。上海市郊及全國其他各地的物價在逐漸上漲，即令生產限價能完全成功，但到上海以外物價超過上海物價水準時，則上海市區不能生產的物資即不復能以限價而獲得供應。

(2) 生產減少的危機：上海是工業中心，上海的工業產品自然可置於嚴格物價統制之下。但是，許多原料大都來自物價管制無法施展的鄉村，產地價格高漲，則勢將影響製造品的原料問題。月餘來，因原料價格上漲，致原料缺乏，而使若干產業有被迫停頓之虞。消息雜見於報章者，就筆者所知，計有江浙兩省絲織品、上海鋼鐵業、漢口麵粉業、及武漢紙烟業等。(見上海大公報、九月十七、十一等日)這些只是許多同樣困難或危機中的例子而已；而且這僅為此一危機之開始，若不設法改善，日後勢必愈演愈嚴重。九月四日上海全市各工業同業公會代表八十餘人在社會局談話，對蔣經國氏提出原料來源的困難者，計有鋼鐵業、毛紡織業、紡織業、印刷業等；蔣氏答覆對原料來源加以「研導」，對工廠原料當儘量設法供應。(九月四日大公報)蔣氏於九月十三日召集上海工業界人士談話，宣佈在現行限價政策下，工廠不准減產停閉，違者政府決予接管。此點足以表示經營當局對此已甚重視。九月十八日經營當局復宣佈：下月經檢工作重心為扶助工廠生產。內容為：(a) 調查上海各工廠所需原料，由政府設法協助採購，國外的可准許以自備外匯購買進口，國內棉花、菜籽、花生、糧食等，政府可會同赴各地採購。(b) 對日常必需品，正在準備配售，現第一步先從米、油、煤、糖做起，對象為產業工人、職工工人、公教人員、學生、平民等，在正式實施日期，尚不能預定。(九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綜合起來，可分三方面來分析：

第一，如原料充足，而工廠減產或停頓，則由政府接管。在行政效率低落的現狀下，政府接管工廠在技術上及管理上勢將有許多困難；誰也不敢保證這些接管後的工廠在限價中能很順利的進行生產。

第二，如工廠需補充原料，則由政府設法「疏導」，對花生菜籽等則由政府派員協同各地採購。此一項中，問題甚多：如工廠自己能以限價買到原料，何勞政府派員協同各地採購？此其一。所以須由政府協同採購者，主要在於工廠自己依限價無法收購原料。既如此，政府協同人員如仍堅持依限價買原料，在散漫而無組織的鄉村或小城鎮中，能買得原料嗎？更何況有些原料且來自共軍控制的區域呢？此其二。假若以限價收購不到原料，或收購部分不足以

應需要，則政府應以一部以高於限價的價格去收買；這樣，這超過限價的原料收買費，由政府負擔。由政府有庫可以撥款來津貼嗎？此無異於加預算平衡的程度。由工廠自己負擔呢？則成本增加，而製造商不許上漲，勢必使其虧本。由總管當局准許其產品價格增加以調整嗎？則不啻自己承認「八一九」限價政策之失敗。這些問題之嚴重性，將更甚於前。

第三：上海日用品必需品之供應問題，也是很費考慮的問題。在過去，五大都市配給實物，其價格是低於市價，或根本不必付價款。上海總管當局所考慮的日用品必需品，大抵是由政府將這些物配給限價出售。如上海市面日用品必需品可依限價買到，何必由政府配給？故須由政府依限價買不至時，政府出而配給始有其必要與價值。所擬配給之物品如食油等大都來自上海郊外鄉村及其他較遠的城鄉，這些地區的物價水準如比上海高，則政府須以超過限價的價格始能買到。這超過限價部分的經費，如何籌措？仍如過去配給五大都市時一樣的由該庫負擔嗎？這一方面將增加配給數量，進一步又影響到物價上去；另一方面以全國人民的財力來維持上海一區的配售物資價格，實即使全國人民受犧牲而使這些受配者得利和益，有失公平。

(3) 物價上漲再出強：物價管制不嚴之全國各地，物價在或明目張胆的或偷偷摸摸的繼續上漲。以武漢為例，中秋以前九十餘元圍圍可以定到的衣服，中秋以後則漲至一百四十餘元。中秋以前，雞蛋每個法幣十萬元，現已漲到十五萬元，尚且缺貨。那時三砲台香包每包八角五分，現則一圓三角許，尚且難於買到。這些是明目張胆的漲價例子。此外物價更有偷偷摸摸，改頭換面的漲法，即商店將劣等貨色應市，而標上「八一九」上等貨的價格，這樣，物價在表面上很穩定，實際已告上升。除上海外，其他城鄉情形，大都類此。四川總管委員張其昌明已承認成都物價管制之失敗（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即是一例。

(4) 鈔幣膨脹，資金缺乏正當出路：幣制改革後，原已發行的法幣數量並未收回，而八一九以來月餘的軍政支出，及大量收兌金鈔外幣所付出的新鈔，這些都是新的購買力。這樣，使市面銀根非常鬆濫。但是，資金却沒有正當的出路。假若時局一靜，生產界自可利用這些剩餘的購買力，作擴張生產之用。但是，在這一均才上軌道的混亂局面之下，這些游資對生產却裹足不前。時日既久，這些游資勢必出而對物價大加推亂。

總之，這月餘來，以全國物價動態而論，物價被世管制政策已出現了不少漏洞；而且，在當前軍政大局之下，這些漏洞的嚴重性恐將與時俱增。我國人

民對政府下令管制物價一事，並不生疏。最後結果究竟如何，自不難於想像中得之。

四· 結語

物價水準是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動態的晴雨表。曾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行長之斯屈郎 (Benjamin Strong) 氏對於影響物價之各種因素，有過極廣泛的列舉。斯氏舉出下列十項，定為物價變動的基本原因，如：(1) 戰爭及政治之擾亂，(2) 政府的財政政策，(3) 貨幣供應與信用之膨脹，(4) 新金銀礦之發現，或已採礦藏之枯竭，而引起金銀產量之增減，(5) 一般人民之心理狀態——如買賣之方法，商人對商品欲求速售抑求儲存，消費者歡喜儲蓄與否，生產部門常鬧罷工抑係努力生產等，(6) 穀物收穫之豐歉，(7) 交通運輸之便利與否，(8) 流行疾病之有無，(9) 水、火、地震等及其他意外災禍，及(10) 其他。斯氏更指出：『我們應誠實的承認這種事實：這許多因素中，僅有第二項和第三項可以受統制 (control) 之支配，前五項中之其餘三項，也或多或少受信用政策之影響，但是，後五項則純屬另一嚮範，就多半只能「付之天命」(acts of God) 了。斯氏所列舉的各種因素，超越經濟科學的範圍以外，可謂極廣泛了。以貨幣機構的靈巧，經濟組織的複雜，和整個社會體系的錯綜，斯氏此種廣泛的列舉，可謂極與現實相切合。

許多人把物價問題看得太機械、太簡單，認為控制住某幾個地域，或管制影響物價的某幾個因素，即可竟硬性限價之全功；用不着全國性的全盤物價管制辦法。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國物價管制的過去教訓早足顯示這種錯誤。今後以全國為範圍而論的物價動態，也愈顯示出這種錯誤。

物價管制是國家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化的程度愈大，物價管制的客觀條件愈充分，物價管制成功的把握也愈大。上次大戰時英美德諸國物價管制之所以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他們的成功，是由於客觀條件優越，加上週密的全盤管制計劃；然後輔以國家的刑律。我們的物價管制，是客觀條件殘缺不全（如全國人口究有多少？各種物資生產、運輸、分配等全無精確可靠的數字……等），管制無法從全盤著手，於是把刑律站在第一位，而且刑律只能在極少數的大城市有用武之地的「打虎」政策，以為政府的基干精神，是值得讚美的。但是，這種區域性的局部物價管制縱然能完全成功，對全國物價動態之貢獻究有多大，也是一個疑問；更何況在全國物價波動中，區域性管制在長期中是難於收效呢？

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

楊人梗

我們要求科學與民主已有這幾年，然而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是一個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時代。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由於不會具備科學精

神與民主態度，尤其由於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未能配合。「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似乎已成了老生常談，其實這是最根本的；如不具備此二者，即使具備其

他一切條件，科學與民主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提起科學，容易使我們想到純科學的原理與實驗，應用科學的技巧與發明。不錯，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離開了科學精神，這一切都不能生根。而且，原理與實驗，技巧與發明，只是少數人的工作；我們不能希望每一個人都變成科學家，然而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有科學精神。強為體用之分，久已阻礙了科學的發展；沒有一個重視科學精神的社會，科學家只能以魔術師的姿態出現，終於不能完成其應盡的使命。「科學者，知識也。」所謂知識不但指認知，且須進一步有合理而透徹的了解。在西洋和在中國一般，也曾有過一個理髮師當外科醫生的時代，理髮師可能治好病，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其所能治愈的百分比會超出外科醫生，然而他不是科學的，因為他之治療并非根據知識。外科醫生的治療之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他對於人體構造、藥物性能及治療的程序與反應，都有合理而透徹的了解。科學的精神就是重視知識，在不重視知識的社會，祇有讓理髮師來代替外科醫生。

知識容有程度之不同，一時代之知識每因當時環境之限制而有其限度。科學精神却可使我們衝破此一限度，牠使我們不滿於現有的知識而更追求更完全更透徹的知識。這便是進步。科學精神就是使我們進步的力量；牠使我們創造新知識，牠也能使我們接受人家所創造的新知識。又以醫學為例：科學精神使現代醫學能有接連不斷的發明，更使現代醫生能充分接受或利用這些新發明——盤尼西林與消炎片在今日已是任何西醫所不能拒絕使用的藥物，除非他不曾受過澈底的科學訓練，而只知墨守舊法。就醫學一例來看，具備科學精神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實是很難的；欲其澈底，則更難。科學上要有新發明固然很難；要接受人家的發明，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即令最能發揮科學精神的醫學，有時亦表現其不澈底的地方：試看英美派醫生與德日派醫生的門戶之見是如何的深，他們不但在治療上是彼此不同，就是在對付病人的態度上也是大有出入。這是什麼緣故？

知識的敵人就是愚昧。安於愚昧的人，不但沒有發現或接受新知識的可能，甚至連這種要求也沒有。構成愚昧的因素是權威、傳統、偏見、滿足於已知、受制於師承；在這些因素所交織成的情況之下，新知識會變成異端邪說，追求新知識會被視為罪行。科學是知識，所以是反愚昧的；科學精神就是反權威、反傳統、反偏見、不滿足於已知、也不受師承傳授的限制。科學精神使我們去探求知識，使我們去探求更完全更透徹的知識。滿足於不完全的知識，其為害可能勝於沒有知識，托勒密的天地靜說便是一個很顯著的例。準此，已往用以衡量科學的體用之說，根本就不合於科學精神，因為科學所追求的知識原無體用之分，而且在本質上是偏重於體的，用是從體抽釋出來的，無「體」則不能有用。反之，既明乎體，則由體到用是很容易的，不過是遲早問題而已。原子能是體，原子彈是用；世人對於原子能的體既已明白，則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只是暫時的。安於愚昧而受制於權威與偏見的時代不會有科學，所以在受教

條支配的古歐洲，沒有科學。強分體用而抹殺科學精神的時代，至多只能接受前人對於科學探討的成果，而且只是一部份的成果，難得在這些成果上而有了新的加添。就外在的條件來看，羅馬時代應當是較希臘時代更有利於科學的；徒以只重實用之故，羅馬人不但對於科學的貢獻甚微，甚至連希臘人所已獲得的成果亦未能完全接受。由此可見科學精神是科學的根本，牠不但刺激科學家去探求新知識，同時牠可使整個社會有探求或接受新知識的胆量；這種態度是科學本身所需要的，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生活所需要的。

只有一個條件可使我們具備科學精神：民主的態度——必須先有民主的態度，始有探求及接受新知識的可能。

民主態度的基本意義是說服——說服人或被人說服。說服的目的，在於陳述自己所獲得的知識，使他人相信這種知識是正確的。要達到此一目的，必須陳述者有充份說明的機會，不受任何阻撓——這便是通常所謂言論自由。說服者當然自信其知識是正確的，然而可能不如此，他應當讓人家也有說服的機會，看看自己是否能被人說服；自己有言論自由，同時也讓人家有言論自由。要說服人家當然是很困難的，要被人說服往往更難；因為說服也有一大敵人——強服，牠可以阻止我們說服人家，同時更可阻止我們被人家說服。強服用以打擊說服的工具不一定是武力。不憑藉武力的打擊可能較武力更可怕。一般而論，強服力可能有三大來源：一是源於個人的，少數人的偶像、威望、地位、甚至年齡都可使我們感覺到說服無用武之地；往往在一個爭辯激烈的會場中，每每可由這樣一個人三言兩語把全部爭辯抹煞。在「年高德劭」或「服從領袖」一類的信條之下，無所謂說服，同時也無所謂爭論。二是源於多數人的，在一個「大勢所趨」的環境中，少數人如有勇氣去說服人家，可能就是犧牲者；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是一個很好的例。會議場中的「噓」與擲地板已是習見的；不寬容的精神可使我們扭造若干罪名來封住人家的口，遭受此類打擊的人反而要得着一個「不識時務」的謾罵。三是源於傳統的，理論與習俗一經變成教條，便不容許有反對者存在，自不容許反對者有說服的機會。萬一遇着不能不予以答辯的時候，「孫中山說」或「列強說」這一把利刃，可以解決一切所不能解決的結子。在個人、多數人、及傳統的強服之下，只有專制，決無民主；強服之目的在阻止新知識之產生，換言之，就是保衛愚昧，是反科學的，所以在欠缺民主態度的環境中，同時也會欠缺科學精神。在安於愚昧的時代，理髮師要來治病，我們還可逃避；在屈於強力的時代，巫蠱鬼魅要來治病，我們將無可逃避。

我們要爭取民主，必須先具備民主的態度——反強服而尚說服。要有說服的自由，必須破除個人的偶像，必須放棄多數人的霸道，更必須摧棄傳統的教條；這便是從根本上摧毀強服力所慣用的工具。在不民主的社會中，言論機構如出版物與廣播之類，只能傳達命令，不會根據理由來說明。當命令支配一切及口號指示一切的時候，不容許相反的意見，「××至上」與「思想集中」等